

周揚文集

蘇子知

PDG

周揚文集

周揚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罗君策

周扬文集（第五卷）

Zhou Yang Wen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字数38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4}$ 插页8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1—700

ISBN 7-02-001644-8/Z·138

定价9.40元



目 录

一九七八年

在斗争中学习	1
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13
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	23
悲痛怀念	35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38
《中国歌谣选》序	45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	53
《遇上梁山》序	71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75

一九七九年

在电影界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	104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洗星海传》序	135
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	156

《侯宝林相声选集》序	148
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	151
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160

一九八〇年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	198
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201
——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	219
《赵树理文集》序	233
《艾思奇文集》序	235
站好岗哨 当好园丁	238
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	251
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	262
“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278
——纪念罗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	
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学研究	284
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	293
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14
《何其芳文集》序	355

一九八一年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360
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	372
《阿英序跋集》序	383
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 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	385

一九八二年

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	404
发扬十二大精神	412
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	423
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和庆祝郭沫若故居 开放	428
研究问题, 摸索规律, 就会有所突破	432

一九八三年

序《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	437
怀念立波	441
研究人才 爱惜人才	447
要重新研究认识论	449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454
体制要改革, 艺术要创新	477
正确评价一位当代的伟大作家	480
怀念徐悲鸿先生	486
——在徐悲鸿纪念馆落成开幕式上的书面致词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489
写作要注重“事信言文”	494
——答《写作》杂志编者问	
尊重历史, 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	499
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问题	505
——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	

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的歌手	512
——纪念田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	
《邓拓文集》序言	518

一九八四年

对电影美学研究的一点希望	522
科学和文学要结合	526
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	528
怀念老舍同志	535
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541
纪念周信芳同志	544

一九七八年

在斗争中学习

听了郭老、茅盾同志的祝词和开幕词，听了黄镇同志代表中宣部的讲话，我很拥护。看了大会印发的许多同志的发言，这些发言是对“四人帮”的有力的控诉和声讨，义正词严，出自肺腑，谁听了能不为之感动呢？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大家有机会和阔别多年的同志们、朋友们重聚一堂，共商文艺大事。谁能够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全国文联创立快三十年了，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幕的那日起，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一直热情地深切地关怀着我们的文艺事业，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引导我们前进，当我们有了缺点和错误，他就及时地给我们以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周总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日理万机之中，还抽出时间来耐心地指导和帮助我们的工作，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到一九六三年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多次讲了话。多少年来，他一直是文艺工作者的尊敬的良师和亲密的益友。现在毛主席、周总理都与世长辞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伟大人格却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

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今天想起他们就觉得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同志们希望我来讲讲话。我想来想去，不少同志的发言都说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似乎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但是又觉得我一定要来看看同志们，这不仅是由于我是文联的副主席之一，而更多地是由于感情的原因。革命的感情驱使我不能不来。

“四人帮”把我打倒了，把大批文艺界的同志，不管和我有无牵连，也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错误，都打倒了。他们要从文艺这个领域打开缺口，首先夺取文权，然后再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的党，摧毁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打倒了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还不算，他们还解散了各种文艺团体，首先是全国文联、作协以及其他各协会，然后各省市的文联和各协分会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以为从此可以把革命文艺队伍斩尽杀绝。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不以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不管“四人帮”怎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除极少数败类向他们卖身投靠外，绝大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不跟“四人帮”走，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对付和抵制他们。“四人帮”虽然在一个时候，把文艺队伍打乱了，打散了，那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种表面现象，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却不但没有打散，反而使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彼此的情分更深了，可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亲了。这是一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对敌斗争的考验，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所达到的新的团结，新的同志式的感情。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认识不清或形势所逼，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只要不是属于“四人

帮”体系的人，我们都应该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团结他们共同对敌。我就是带着这种感情来到这里的。

由于长期和社会隔绝，和文化工作脱离，我讲不出很多东西，只能来和同志们谈谈心，谈点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会。

我要讲的题目是学习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最重要的学习。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帮派体系下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难得的反面教员。这些反面教员，让我们付出了很高的学费，付了学费，就该学点东西。怎么学呢？如果只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那不是好学生。我们要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不对的一定反对，这样的学习才是有益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但要消化和融会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学习到的东西，认真地总结我们学习的经验，而且还有更新的更重要的学习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如何来为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呢？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但是新时期的工农兵，经过“文化大革命”成分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了新的不同的精神面貌，不同的思想情感，我们怎样去表现他们呢？新时期的斗争，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行的，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有许多新的特点，我们怎样去表现它们呢？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熟悉，去理解，需要我们去重新学习。

许多同志都遭受过“四人帮”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一肚子气。凡物之不得其平则鸣，有气总是要出的。同志们有气，我也有

气。这并不是什么个人意气，而是革命之气，革命的义愤。愤怒出诗人。革命群众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所写的怒斥“四人帮”的诗歌就是这种愤怒的结晶。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已经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为全体革命文艺工作者大大地出了气。许多长期被“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也开始颠倒过来了，许多长期被“四人帮”禁锢的好书、好戏、好电影都重新出版、上演和放映了。文化界的许多错案、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也正在推倒。我们的气应该可以逐渐消除了。当然，还有“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和思想流毒，需要我们继续批判和斗争，需要做长期大量的消毒工作。单是有气还不够，还必须冷静地思考和观察问题，不然，就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一个人，一个革命者，总是有受委屈的时候。抗战期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同我谈过一个人受到委屈的时候。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

我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不轻，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和所有受过“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有着相同的遭遇和感受。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一定要互相勉励，有过则改，无则加勉，共同前进。我们的眼睛不要老是向后看，我们应该朝前看。

我们常常讲要从斗争中学习。我们正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不正是经过这个学习，空前地提高了自己思想和政治水平，特别是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吗？如果不经历这场斗争，他们的水平是不可提到这个高度的。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敏感和识别力比我们许多老干部更为敏锐，更为正确。他们经过锻炼，有了斗争经验 既敢想敢说 又更成熟了。我们应该向那些满腔正义 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们学习，向那些无私无畏的普通的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学习。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我们还应该从我们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一个人要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要遭到挫折和失败。又要革命，又怕犯错误 那就不要干革命。当然 我们力求少犯错误 不犯大错误 犯了错误就改。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 对我的批评 凡是说得对的，我都乐意接受，我欢迎从善意出发的同志式的批评。至于“四人帮”这伙敌人强加于我的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我想不用我说，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而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关于三十年代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有意颠倒了敌我关系。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是人民内部的争论，争论中的是非曲直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大家都可以各抒所见。我不因为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自己年轻而原谅自己的过错。同样，在开国十七年工作中，我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仍然欢迎同志们热诚的批

评。

总结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向反面教员学习也是大有好处的，使人长见识，开眼界，特别难忘。“四人帮”不仅教育了我，而且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我和陈伯达、江青相识很早，但真正认识他们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的。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候还把陈伯达当作“好朋友”哩。当然，他们坏到这种地步，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些人往往一朝得志，大权在手，就忘乎所以，本相毕露。只有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我才算向他们“领教”了，真正认识了他们。李春光同志说他当年作为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曾相信过江青，随着运动的发展，他才逐渐识破了“四人帮”一伙阴谋家、野心家，而毅然和他们决裂，贴他们的大字报，冒着个人危险，勇敢地和他们斗争。他的斗争历程代表了当年千千万万红卫兵和革命青年所走过的道路。这也是他从激烈的斗争中体验、观察和学习、深思的结果。

总之，我们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不少宝贵的东西，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青年的前途，重新认识了自己，解剖了自己，识破了大大小小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投机分子，看到了“风派”、“溜派”、“震派”、“捂派”等等千奇百怪的丑态。不懂得这些，怎么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能懂得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呢？我们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是宝贵的。

许多同志感叹着，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十多年的宝贵时光，耗费了我们多少有用之年啊！当时是青年的，变成了中年，中年的变成了老年，老年的就更老了。但是我要说，我们决没有白白度过这段时光，我们在某些业务方面荒疏

了一些，但是在学习中国革命、学习中国社会方面，我们却是获得了丰收。

现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大大地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来观察、研究和描写这个新时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

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这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由战争转入和平，由农村革命根据地转入以大城市为中心，这是历史性的空前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都亲身经历过来的，对它很熟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许多事情我们都不熟悉了，可以说还是一个“必然的王国”。我们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却有些跟不上。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不少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遇到困难和某些挫折，就容易发生摇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就发生过这种现象。我们对搞社会主义缺乏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缺乏经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比较抽象的。马克思、恩格斯常常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长久的阵痛，列宁多次引用这样的话告诫人们。他们讲的是长久的阵痛，而且是必然要经过的，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所要经受的“阵痛”也是必然的，而且只会更长久。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亲自尝到了这种“阵痛”这种“阵痛”以后还会有

的。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产生了一些灰心失望的情绪，甚至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思想。如果这是指的不再迷恋个人的名利、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许多事情看得开一些想得开一些这种“看破”倒是不坏的。如果是看破了社会主义，那就不对了。只有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一碰钉子就产生破灭之感。科学社会主义者，是永远看不破社会主义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永远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科学，只要是科学，总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它是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说过，“如果不会适应环境，不愿意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们不要做空谈家，要作真正的革命者。我们要学会适应环境，但决不投机取巧，看风使舵。我们要敢于在污泥中打滚，要紧的是能出污泥而不染。

要正确地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各种斗争，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善于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剖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集中表现在把这两类矛盾完全颠倒了，这种颠倒，曾经一个时期大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现在已经逐步地再颠倒过来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弄清楚什么是我们应当歌颂的，什么是我们应当暴露的。写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敌我界线分明，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界线就不那么容易划清了。“四人帮”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作什么“走资派”、“复辟派”来加以丑化，他们借口反对“写真人真事”来反对写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诬蔑这类作品是什么为谁“树碑立传”是什么“给反动路线唱赞歌”。他们的这种颠倒历史、混淆视听的种种谬论，确实也曾迷惑过一些天真的人们，现在大概是没有多少人听他们那套鬼话了。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倡树无产阶级革命家之碑，立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传，这是广大群众所热烈期待的，也是革命作家的光荣职责。清除了“四人帮”以后，在戏剧以及其他文学艺术方面冲破了“四人帮”立下的“禁区”创作了描绘和赞颂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歌颂，也正是凝聚了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当然，这类作品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如何按照历史的真实和党内路线斗争的线索正确描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这还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和研究的新的课题。除了写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应写历史上各种革命英雄人物，包括农民起义的领袖。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不就写了一个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吗？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来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他们中间出现了千千万万的新式人物，急待我们的作家去表现。我们还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前进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作品过去很少写他们，一写他们就往往是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对他们多少带些讽刺的意味，虽然是善意的讽刺，而没有足够地写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他们对祖国重大功绩。在最近一年多来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的形象，这是可喜的，也是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徐迟同志的一些描写科学家的作

品，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我们过去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往往是外国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自从出现了林彪“四人帮”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之后，描写和揭露这种新式的反面人物就成了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全新的主题。新的讽刺剧、讽刺小说、讽刺诗，新的漫画、相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讽刺文学应占一个什么地位，应当怎样写，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值得讨论的问题。

“四人帮”清除以后，一年多来文学艺术界所出现的新气象，所面临的新问题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分析、去研究、去认识。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任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文化艺术就不能很好地发展和提高。毛主席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艺术上的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毛主席在这里讲了两个“自由”，因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一定的民主空气是不行的。这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防止“自由化”的根本保证，就是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

毛主席特别强调艺术形式和风格的重要。讲到形式，我不能不提到民族形式、地方形式的问题。每个民族和地区的艺术都有自己发展的长期历史，都有其历史的连续性，都在人民群众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中国的地方戏曲，就各有自己的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如果各地方戏曲都变为一个模型，那还有什么百花齐放呢？“四人帮”企图消灭地方戏的地方特点，企图消灭民间的和兄弟民族的艺术，这就是要毁灭我国各族人民的艺术，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毛主席十分重视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和学派。“四人帮”否定艺术个性，要消灭不同的风格和学派，以便维持他们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我们清除了“四人帮”，就要为积极保护各种不同风格和不同学派的发展而努力。

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学术上的争论，动辄提到政治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中，也不要一切矛盾都看成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少量的，而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有时也很不容易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不容易区分，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区别这两类矛盾，尤其要特别注意矛盾的‘转化’问题。

许多同志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对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心有余悸。有的同志提出希望明令废止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等恶劣作法，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要知道，棍子等等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能说它们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和落后的斗争手段，但废除不了，也不能禁止人们去使用。我们所能作的只能是，用最先进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用更有效的说理斗争的手段来战胜它们。我们要有勇气，不怕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如果打得对，扣得对，抓得对，我就服输，就改正，如果不对，我就要进行反驳，不许反驳也还是要坚持真理。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应当提倡的革命学风，是我们革命者应有的气概。党中央再三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了我们以最有力的支持，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应当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真理。

文联和作协恢复了，其他各协也将逐步恢复。这不仅仅是一些机构的恢复，而是党的革命文艺传统的恢复，是毛主席文艺

路线的胜利。我们要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恢复和发扬好的东西，去掉不好的东西，以新的面貌从事新的斗争。当然在恢复过程中在恢复以后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今后还会有斗争，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斗争，我们会越练越强。

广东、安徽、上海等地的文联、作协都已经恢复了，他们在当地省市的领导下，比全国文联、作协还先走了一步。他们虽然恢复不久，但已有不少好的经验。巴金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一个上去，一个下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我们有理由希望文联和作协及其他协会将帮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学习，更紧密地团结。党中央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鼓舞人心的口号，我们大家都必须身体力行。我们所以要学习、要团结，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用我们的笔和艺术手段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继续斗争。

我们一定要把“四人帮”遗留下来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全部彻底扫除干净！

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

我们一定要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放声歌唱，以迎接我们祖国的光辉灿烂的未来，迎接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世界出现。

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今天有机会聚在一起谈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这是很令人高兴的。

我讲两点意见：

第一，要不要研究外国文学？第二，怎样研究外国文学？

要不要研究外国文学？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谈外国文学就有些谈虎色变。谁要研究外国文学，“四人帮”就说他是“崇洋”、“媚外”，是复辟资本主义。罪名可大呢，谁还敢谈。所以，现在我要先谈一谈要不要研究外国文学的问题。到底是研究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是不研究有利？我们说研究有利。而“四人帮”就是反对研究外国文学。过去我们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少。这个工作，做得还不够好。

为什么要研究外国文学？这要从马克思说起。《共产党宣言》里讲过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 产生了世界市场。产品交流，互相依赖，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再也不能存在了。随着物质生产向世界的扩大，人类的精神生产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哲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都成为世界性的 这样 也产生了世界文学 使文学摆脱了地方性、狭隘性。这是资本主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世界文学也不是马克思

第一个讲的。早在马克思以前，歌德就预言了“世界文学的时代”的即将到来。

当前，党中央提出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个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早就现代化了。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不搞四个现代化，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我国就会落后，就会挨打。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才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四人帮”污蔑搞现代化就是搞资本主义，吓唬我们，似乎卫星一上天，红旗就要落地。我们一定要作到卫星上天，而红旗决不落地，我们要为此而共同奋斗。我们既要研究外国文学，又不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同化。不介绍、不研究外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学情况，不同它交流，不向它学习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另一方面，盲目崇拜外国文学，对它亦步亦趋，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对它进行评价和批判，对它们的反动倾向不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就是投降主义，当然也不行。

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俄国的彼得大帝，学了西方，使俄国强大起来。日本明治维新，学了西方也强大了。当然，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总是向反面转化的。它们后来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清朝末年，一些有点见识的人士，提倡学西方，造枪炮，建海军，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但当时也只是提倡学西方的技术，而反对学西方的先进思想，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当时有个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物质文明，又要保持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矛盾，这怎么行得通呢？到了伟大的“五四”

运动，这才打开了一个向西方先进文化，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习的新局面。如果有人要问，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能不能说是“中学为体”呢？那也不能这样说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西方，它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并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四个现代化，向外国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相辅相成的。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是闭关自守，而是要把外国的东西拿过来，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应用到我们的建设上。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是这样，在社会科学、文学方面有所不同，但也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不能说外国社会科学、文学都是资本主义思想，一无是处，我们就不去研究它们，就不去从它们里面吸取一些于我们有益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采取了认真研究的态度，只有经过这种认真研究才能给以正确的批评。即使说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但是它们不但在西方世界，而且在第三世界还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有必要研究它们，不研究，无从取舍。既然是反面的材料，也要研究。不研究，我们就没有办法驳倒它们，战胜它们。本来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就落后，经过“四人帮”的破坏就更落后了。闭关自守，是自甘落后，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马克思讲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违背人民的需要，这种理论讲得再好听，也是行不通的。“四人帮”反对四个现代化，反对向外国学习，他们的种种谬论，不管说得如

何天花乱坠 因为违背人民的需要 还是行不通。“四人帮”骂莎士比亚也好，骂贝多芬也好，但人们还是要看、要听他们的作品。世界古典名著 你即使封存禁止 人们还要看 你不让他看 他就偷偷看。好书不让他看，他就看坏书。我们有责任把好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并指导和帮助他们正确地去阅读这些作品。中国人民需要知道外国的事物，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外国的社会、历史和人情风俗，增加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除了科学技术外，文学知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 需要指导 不能放任自流。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有它历史的联系，无论对本国和外国文化，都不能割断这种联系。苏联十月革命以后 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 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关起门来“创造”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坚决地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潮。记得我有一次和毛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解放以后没有犯苏联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那些人所犯的那种否定过去文化的错误。我们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也曾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四人帮”诬蔑我们“崇洋复古”叫嚷要对整个人类进步文化来一个“彻底扫荡”比波格丹诺夫还厉害万倍。当然“四人帮”不只是一什么思想路线问题，他们是要篡党夺权，他们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毁灭文化艺术。当我们制订规划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四人帮”对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破坏，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过去还做得不够，或有偏差的地方。

既然需要研究外国文学，那么怎样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细致的问题。我们主要研究的外国文学，一般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产物。怎么研究好呢？能关起门来研究吗？那是不行的。我们的各个研究所的方针任务，都要密切配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需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这样就是错误的。同时又要按照当前和长远的需要，从事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 研究和提出新的问题 写出新的有分量、有水平的著作 在这一学科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建树，不这样也是不行的。因此，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如何结合现实的需要，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和评论外国文学，对外国文学作品如何介绍，哪些要公开出版，哪些作为内部参考材料印行，如何写序，写前言，这些都需要花费气力，认真去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要对人民负责的。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的新成果和新思潮，给予恰当的事实求是的评价。这些年来，我们对当代世界文学状况知道甚少，十分闭塞。一谈到当代外国作家，似乎不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介绍的东西。我们经常引用列宁关于两个文化的观点，认为有少数统治者的文化，也有大多数被统治者的人民的文化。这种观点难道今天就不适用了吗？在沙皇统治的黑暗时代，俄国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难道今天的苏联，过去的光荣传统就通通丧失，就一个进步的作家都没有了吗？这是不可能的。至于西欧、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进步作家总会有的，而且不会少的。我们要尊重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成就，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封锁起来。这不但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应有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新成果，我们都要认真研究、学习和汲取它们中

间一切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能拿只对我国适用的标准来要求外国的作家，我们要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文化教养，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局限，他们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们要肯定他们在当前条件下的每一个进步的表现，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当然，我们在肯定他们成就的同时，又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缺点和不足，进行恰如其分的批判。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我们要进行有力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也必须是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谩骂。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评价外国古典文学，主要是欧洲文学的遗产。建国以来，我们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翻译介绍的工作；翻译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工作今后还要加强和改进。在人类文化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品，要翻译齐全，并提高译文的质量，要承认它们是各个时代的文化高峰。这是客观历史事实。比如，我国文学史上有过楚辞、唐诗、《红楼梦》、鲁迅，这些也都是高峰。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些高峰，研究这些高峰产生的原因和发生的影响，并向它们学习。当然，任何高峰都有其局限性，而后人总是要超过前人。我们决不能在它们面前拜倒。

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曾经对世界文学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被青年所喜爱，其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一九六〇年我们曾打算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进行系统的批判，有同志主张大张旗鼓地来批，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这是细致的思想工作，要细水长流地去做。后来我们虽然没有大张旗鼓，但也没有细水长流。时间一过快二十年，这个工作至今还没

有做，只有今后来补课了。

对外国文学，首先需要有一些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来研究它 要精通它。毛主席说过 对别人的东西 如果要掌握它 先要学，甚至要经过一段模仿，然后才能自己独创。鲁迅写《狂人日记》 不就是模仿果戈里 又超过果戈里 表现了自己独到的思想，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吗？所以不能把模仿和独创截然分开。所以 我们对外国文学要学习、要研究 不然就无法批判 也难超过它们。外国文化遗产，和中国文化遗产同样宝贵，同样重要，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财富。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它们加以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和批判。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文学知识，锻炼我们的鉴赏能力和识别能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

第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它的发展历史，研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这对于建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都要认真地来进行这一工作。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首先要研究马、恩、列、斯关于文艺问题的经典性的论述，研究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同时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史。普列汉诺夫是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而且卓有贡献的人，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从翻译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的。那时他只能通过日文来重译，是多么困难啊。梁实秋挖苦他“硬译”他为了尽量保持忠实 不怕人骂。我们现在人才众多，英文、俄文、法文以及其他各种文字都有人翻译，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更多的贡献，那就有愧了。从普列汉诺夫到现在，已经快一个世纪了。普列汉诺夫前后，还有梅林、拉法

格、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许多人，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都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所贡献。最近时期以来，还有哪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我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总有一些吧。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我们都需要知道。在西方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卢卡契的著作，我们过去多少介绍了一点，但是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我们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批判。当然不能说西方的著作全部都是资产阶级的，或都是修正主义的，一点进步的东西都没有了。最近英国出了一本《马克思与世界文学》，虽然是一本西方作家的著作，但作者用了功夫，也可以供研究者参考。江青和“四人帮”诽谤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鼓吹十九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其实那时我们还没有怎样介绍他们，那时主要翻译了一些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但也是很不完全的。比较多地介绍俄国三个批评家的著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三位大思想家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如他们高度评价狄德罗、莱辛一样，他们常常把这些俄国的伟大思想家和莱辛并提。列宁对于他本国的这些大思想家更是赞扬备至。他们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驱。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时候，一定也要研究他们的思想。此外，我们还要研究苏联文学发展的历史 研究资本主义国家 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历史，不能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变了或者当时就有错误，就对他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要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国早期的左翼文学工作者都曾受到过他们的教益，当然也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研究他们的历史经验，对

我们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应该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主线，结合当前思想界、文艺界的实际，参照外国的有关著作，编选一部适合我国情况的具有较高水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书 应该争取编得比苏联的更好一些。可是我们直到现在没有编出这样一本书来，目前还是用苏联的。文学所和外国文学所应该通力合作，编出这样一本来，那大家就受益不浅了。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了西方的文学经验，我们则要总结我国文学的经验，从我国文学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中探索出自己特殊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德国一个民族的产物，而是德、英、法三国的产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然也要吸收和采纳外国的经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已经搞了半个世纪了，我很希望出现几个出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出几本真正像样的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我自己很惭愧，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也要注意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普及中国的优秀作品，也要普及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要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来扩大眼界，了解世界，增加社会历史知识，提高鉴赏和辨别能力，同时指导和帮助青年如何正确地阅读这些作品。

最后，关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队伍和人才培养问题。外国文学研究者（包括翻译工作者）的队伍很小，这方面有素养的专门人才很少。对这种人才要爱护，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特别是一些学有专长的老专家 要尊重他们 年青人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要适当扩大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特别要注意培养新人，要尽一切方法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

业务能力。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员要建立一定联系，研究所除本所的研究员外，还要有所外的特约研究员。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自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这个方针，经过历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有的人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不敢讲话，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不仅老专家，很多中年青年也不敢讲话了，学术研究工作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现在大家仍然是心有余悸。现在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文学研究的园地也应该是百花盛开的时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不会出现毒草呢？有香花就有毒草。毒草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害怕毒草。我们在研究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要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辩论，敢于坚持真理，当然，也要敢于修正错误。打棍子、戴帽子，那是“四人帮”的暴行，也是他们的愚蠢作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复杂化，不能解决矛盾，只能使矛盾尖锐化。只有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要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关键在于要有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要有不只是几个，而是几十个、上百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一定会繁荣昌盛起来。我们希望在座的同志们都要为此而共同努力。

谈社会主义新时期 戏剧创作的任务*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都有喜人的新气象，戏剧方面也是如此。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话剧、新歌剧受到摧残，几乎绝迹于舞台。地方戏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京剧只有江青所窃取和霸占的少数几个所谓“样板戏”被捧上了天，可以说是被捧杀了。话剧是从外国传来的新的戏剧形式，“五四”以后才变成我国流行的剧种，它是一种新事物。在十七年中，我们发展话剧不够，这是缺点。“四人帮”则根本扼杀话剧。任何事物受压越厉害，反抗就越厉害。所以“四人帮”倒台以后，话剧如同获得新生，显得特别活跃。受压十多年，整个文艺界都憋了一股气，这是一种革命的气，一种革命义愤。话剧界的同志们就把这种义愤贯注到作品里，化为艺术的力量，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得到观众的热烈反应，是很自然的。一年多来，话剧题材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歌颂老一代，揭批‘四人帮’”。这些戏表达了千百万人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情。在“四人帮”的法西斯镇压下，这种感情在怀念周总理的革命诗歌中喷射出来了。粉碎“四人帮”后，在话剧以及其它各种艺术形式中也都表现出了这种感情。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感情，

* 本文是作者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原载《人民戏剧》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而是千千万万人民的感情。表现这种感情是千百万人民的愿望。艺术表现这个时代，就是要表现这个时代的千百万人的情感。

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揭批“四人帮”，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正是这两者为我们的戏剧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有歌颂，有暴露，敌我分明，爱憎分明。过去也有过揭露阶级敌人的作品，但是揭露像“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戏是没有的。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戏，过去也写得很少很少，多少写了一点和真人有关的事；“四人帮”就大批特批，说什么这是“树碑立传”，成了一条大罪状。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树碑立传，树无产阶级革命家之碑，立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传，要理直气壮去树去立。多少革命前辈、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难道不值得歌颂，不应该歌颂吗？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这一年多来，戏剧的题材、风格、样式更多样一些了，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比如，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涉及像周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过去都不敢写，现在开始尝试了。比如科学技术人员，过去很少写，要写也是写消极的方面多，而现在则写他们的积极方面，而且敢赞扬他们了。《丹心谱》的获得成功，不但由于它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了周总理，而且也由于它塑造了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科技、医务人员的生动形象。又比如，暴露黑暗的戏如何写；如何既要彻底揭露“四人帮”这种丑类，又要充分显示正面的力量，做到邪不压正。《枫叶红了的时候》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且不去评论这些戏的优劣得失，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它们在力求表现当前人们所最关切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蔑视，表现了我国革命历史上这场空前剧烈

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图景。这是广大群众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最关心的最愿意看到的，戏剧家们没有辜负广大群众的愿望，多多少少满足了一点他们的愿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们对革命老一代的歌颂对“四人帮”的揭露广大群众和你们共鸣我也和你们共鸣。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

我们的戏剧工作今天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我们也要使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戏剧有更大发展，水平有更大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戏剧真正做到与社会主义新时期总任务相适应，真正做到与加速四个现代化相适应。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就是要与这个时代的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一九四二年以前，我们虽然到了延安，但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解决这个结合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开始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毛主席所说的同工农兵相结合就是同新的时代相结合。那个时候，新的时代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延安整风以前我们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到了延安到了根据地不但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而且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结合的问题并不容易。经过延安整风，我们才真正向同工农兵结合迈开了一大步。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我们由战争转入和平，由农村进入城市。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群众结合的问题。当然这个结合也是不容易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来认识、熟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反映这个革命和建设，对作家、艺术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困难、甚至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回避现实，而要正视现实，迎着困难上。对这个问题，我们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同志受了一些冲击，就产生一种“看破红尘”的思想。他看到打倒了刘少奇，又出了林彪，又出了“四人帮”，特别是“四人帮”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许多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特别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思索问题，正确对待现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不可少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党，经过林彪“四人帮”空前严重的破坏和分裂，还是经受得起，这就证明我们的党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什么力量也打不垮的。我们应当对前途充满信心。

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比较抽象，把事情想得比较简单，不知道搞社会主义要经历多少千难万苦，经过多少波折和风险。社会主义是活生生的现实，又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该把它当作科学来研究。恩格斯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德国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如果党同社会主义科学中间有一点点不协调，那就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我们理论工作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是只背诵它的个别词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要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日新月异的活生生的现实，也当作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对象，认真地观察它、体验它、研究它。文艺

工作者要表现社会主义，就要时时想着社会主义，想社会主义只想它的顺利而不想它的困难、艰难、挫折，那是不行的。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未免就太容易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缺点，也有阴暗面 特别是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空前干扰和破坏 这种阴暗面就更多了，许多消极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这些现象现在也还没完全消除。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家不能对这些现象闭目不视，不能回避它，不能掩盖它、粉饰它，要揭露这些现象。但是我们揭露这些现象的时候，决不能采取单纯暴露的态度，不能流于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绪。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看到正面的力量总是主要的，压倒一切的，而表现这种正面力量正是我们每一个革命作家、艺术家的天职，也正是人民所希望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想，要很好地研究社会主义。我们要打开眼界，看中国，看世界。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果一看到困难就发生动摇 就“看破红尘”那怎么行呢 只有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一碰钉子就看破了“社会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是不会看破的。因为它是科学，只要是科学，总是经得起考验的。社会主义社会同过去的任何社会一样，是不断变化、不断变革的社会。如果你不这样认识问题，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觉得社会主义没有搞头了，这怎么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在今天来说，首先就是要求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就要求我们的戏剧在这场斗争中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要写得更好、更深 要揭露得更有力 要彻底揭露那些钻到党和国家机关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敌

人。文学作品应该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提高大家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过去写反面人物形象 还没有写过像林彪“四人帮”这类的人，现在事实已经教训了我们，这种野心家、阴谋家，是最可怕的。对这些坏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拿起最有力的艺术武器来批判他们、揭露他们 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四人帮”不管怎样横行一时 工人、农民还在生产 科技人员还在搞科学技术，教育工作者还在教书，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国家将不堪设想。他们是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是我们国家的真正的栋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该歌颂他们呢！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革命责任感，那种日常劳动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那种敢于和“四人帮”对抗和斗争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是多么值得大家学习，值得我们歌颂呵！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首先就要满腔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不是空的 越是有消极现象 越是有“四人帮”越是有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就越需要有高度的革命勇气来和这种消极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我们正是要在这种时刻来锻炼我们的共产主义意志 需要我们看得更远、更深。

表现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革命历史题材不要写，写社会主义时代，同时也要写革命的历史。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有社会主义的今天吗？没有老一代的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吗？所以表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只写社会主义、只写今天，也要写革命历史，要歌颂老一代革命家，要把这种歌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只是一般的歌颂，而是要写出老一代革命家走过了一段多么艰难困苦的道路。最近我看到《人民电影》上白杨同志写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她说她曾向周总理表示过，希望周总理写一本书，写他的革命历史。总理讲，如果他要写的话，也要写自己的

错误。总理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是这样大，他还是这样地富有自我批评精神，这样地谦虚。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文艺工作者应该写老一代的革命家，写他们走过怎样艰难的道路，这样才能教育后一代，使他们认识到走这条路不是容易的。写历史题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有严格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高度的充沛的革命情感相结合。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戏剧，要努力提高戏剧艺术的水平。文艺创作 包括戏剧创作 已有了一些好作品 但还要更多些 艺术水平还要更高些。提高水平要靠自己努力学习，也要靠经常演出，互相观摩。向古典学习，向外国学习。我国传统戏曲，京戏和地方戏中，都有不少好的东西需要整理提高，供大家学习。外国的东西也要学。不能说外国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苏联的东西都是修正主义。列宁曾经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中有反人民的文化，也有人民的文化，过去社会是如此，那为什么今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的文化就消失了呢？就绝迹了呢？既然有人民的文化，那当然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也还有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凡是外国的一切好的东西 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凡是好的东西都要学习。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理直气壮，一定要有勇气学习。不学习就是自甘落后。西方戏剧有各种流派，不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是布莱希特，都要研究，只要是好的，我们用得着的，就要学。外国的电影也有好的，也总有某些可取之处。我们的国家要加速现代化，艺术手段也要适应这个形势来一点现代化，要吸取他们表现手法中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现代化是科学技术的大革命，我们的文艺也和这个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文艺和科学更密切的结合，这样的时代到来

了。

要提高戏剧艺术水平，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要解决，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就不能发展，水平也就提不高。我们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粗暴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右的倾向。政治跟艺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分清楚哪些是属于艺术问题，哪些是属于政治问题，这是第一要分清楚的。第二，政治问题并不等于就是敌我问题，也有人民内部问题，而且大量地是人民内部问题。因此，必须在政治问题中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四人帮”把艺术问题“无限上纲”为政治问题，又把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为敌我问题，以达到打倒一切，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目的，其危害之烈，是空前未有的。我们一定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思想流毒，要把政治和艺术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分清楚。

要提高艺术水平，必须做到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毛主席说，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他在这里讲了两个“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即适合于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民主空气，我们的学术和科学就不能很好地发展。我们的政治需要民主，我们的文化艺术更需要民主，这正是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艺术来说，没有形式，没有风格，也就没有艺术。艺术就是要有优美的形式，要有独特的风格，这是艺术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不够。现在要好好注意和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艺术形式、艺术风格问题，我们的艺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们反对形式主义，但要讲求形式。我们的作家一定要注意形式问

题，一定要寻找最新、最美的形式，最新、最美的语言，来表现我们丰富多采的生活。文学就是语言艺术，话剧尤其要注意语言，没有生动的语言就没有人物性格，情节再好也无补于事。对于艺术，我们首先要求它有正确的充实的内容，也要求它有新颖的吸引人的形式。作家、艺术家为表现新的内容去寻求和探索新的形式，应当受到鼓励。我们不能一看到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就不顺眼，就当做形式主义来反对。风格就是个性，有哪一种艺术不表现作家的个性、不表现它独特的风格能成为好的艺术呢？当然这种形式和风格的形成主要是靠作家深入生活，来源于群众。我们应当鼓励作家、艺术家在艺术形式上有更多的钻研，作更多的探索。科学家为了寻求真理，找出规律，他就无止境地探索。为什么作家、艺术家就不可以，不应该去探索呢？艺术家应该像科学家在自然界探索规律一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来探索人的心理、人的性格，特别是社会主义时代群众的心理、性格，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情感。没有进行认真的探索，不下一番苦功夫，是不可能写出好的艺术作品来的。要使艺术不千篇一律，就要做这种探索。在这种探索中，难免犯一点错误，不要打击它，要进行帮助。要探索就有迷路的可能，但是不能因为怕迷路就不去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鼓励人们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曾对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一个编辑，有两篇文章摆在你面前，一篇文章没有什么错误，但也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都是人家讲过的人云亦云，四平八稳；另一篇文章有些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自己的创见，有自己的文风。那么你采用哪篇？我认为应该采用第二篇，因为第一篇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都是人家讲过多少遍的话，现在你再讲，那有什么意思呀？新的意见才是有所

增加，有所创造！过去讲百花齐放，没有十分重视形式和风格，
现在我觉得应该注意。

悲痛怀念

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诗人、学者和剧作家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科学、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们尤为失去了自己尊敬的前辈和卓越的领导者而感到万分悲痛。

郭老病重期间，正值全国文联举行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非常关怀郭老的病情，都想去探望，因医院谢绝而未能如愿。六月三日早晨，郭老秘书王庭芳同志来电话说，郭老一早醒来就问到，很关心这个会议，想要我去看看他。我立刻赶到北京医院，一进病房，看见老人消瘦的病躯仰坐在沙发上，不觉一阵心酸，陪伴我去的苏灵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郭老似乎没有十分留意，他朝我们微微笑了，显得那么平静、安详而且精神。据王庭芳同志说，今天郭老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来所未有的。我们都很高兴，就像在阴霾笼罩之中忽见天边闪亮，我们心头立刻浮现一个可喜的念头：这位坚强老人的旺盛生命力也许会战胜病魔，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他将和大家一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重上新的征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奋斗。我们是多么渴望着郭老长寿又长寿啊！我们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郭老这时虽然说话比较困难，但因为心情愉快，还是非常亲热地谈了不少话。

我向他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他早日康复的热切心情，也向他反映了文联会议上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热烈情景以及同志们为拨乱反正承前启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下定的决心。郭老听了很高兴，他再三要我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郭老还说，他因病不能出席会议，失去了一个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感到遗憾。人们知道郭老也遭受过“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这伙害人虫特别借批林批孔为名，在精神上折磨他，纠缠他但郭老屹然不为所动而当“四人帮”在他面前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时，郭老洞烛其奸，横眉冷对，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警惕。郭老的心是和会议的情绪完全一致的。

我对郭老说，同志们、朋友们对他的关怀，是出自对他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他和伟大的鲁迅一道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又是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众所推崇的领导者。我在心中回想起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我想起了郭沫若同志的第一个诗集《女神》，这些热情洋溢的诗篇开创了一代革命诗风他的有名的《凤凰涅槃》预告了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世界、新中国的诞生。“涅槃”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的新生这首诗充满了辩证的哲理热烈的幻想对自己祖国的眷恋之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光明理想。我告诉郭老，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他的诗歌的忠实读者也是他所创办的《创造》等刊物的热心的读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年代，我们的诗人不能再以写诗为满足，他毅然投笔从戎，在北伐战争中担负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当“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反革命正处于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郭沫若同志挥笔写了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篇传诵一时的革命檄文，这也可以说是我国二十年代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它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这个大叛徒、大卖国贼、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嘴脸，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勇气。

我告诉郭老，他的这篇讨蒋的革命檄文，在我年青的心灵上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共鸣。他参加了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亡命日本。当时我听不到郭老的消息，日夜担心他的安危，每天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探索他的行踪。一个和他素不相识的青年，竟会对他如此关怀，如此深情厚谊，事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这也足见我们的革命诗人在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中的影响之大，他的作品感人之深。我在和郭老相交的四十年中间，从未对他说过我青年时代对他的这种崇敬之情，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我却忍不住把这种感情告诉了他。

我思量着郭老的革命的一生，和他对革命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他的事迹一幕一幕地在我脑中闪过。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他和他的“创造社”的老战友们，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中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引导他们走向革命。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就在亡命日本期间，郭沫若同志也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活动。他在殷墟文字的研究上做出了使日本友人为之叹服的出色成绩。但他的真正兴趣并不在此。他所日夜思念和关心的是多难的祖国的命运，他和国内的左翼文化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爆发以后，他回到了祖国。抗战期间，他在周总理的亲切关

怀和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发展抗日的革命的文化，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勇敢地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写出了有名的剧作《屈原》。在这位古代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面影。屈原抨击楚国统治者残民媚外的反动政策，也是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申斥和抗议。这个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在当时国统区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又写了论述李自成失败原因的著名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主席高度称赞，并把它规定为全党阅读的文件。全国解放后，郭老主持了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工作。他在公余之暇，还创作了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热情的大量诗文和新历史剧。同时他配合国际斗争，也写了不少歌颂各国人民团结友好和反帝反霸反修的诗篇。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活动也是多方面的。他的功绩是巨大的。我们许多人都是他的晚辈、学生，都拜受过他的教益。而郭老却总是谦虚地说他工作得太少了，他没有作出多大成绩。

去年，我有一次去看郭老，谈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中间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我说我们不少人都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走过来的，累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郭老希望我们来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这次谈话，他又表示了同样的希望。

我们在谈话中，偶然谈到了哥德。我想起恩格斯曾经把哥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可以比作泰山之神吗？两个文化巨人确有相似之处。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郭老在这次谈话中，特别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自然科学。他对

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十分拥护的。但是比拟总是不能完全切合的，郭老和哥德到底不同。我对郭老说，您是哥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哥德。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我的话微笑了。郭老和哥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就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

我和郭老这一次谈话，想不到竟成为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到十二日上午我再去看望郭老的时候，他已在弥留之际，不能言语了。他的遗言犹在我耳边萦回，我将永远铭记。

于立群同志告诉我，郭老在昏迷状态中还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教导，对党中央表示无限的信任和拥护。

我们一定要学习郭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对敌狠、对己和的敌我分明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一生勤奋，在学术和艺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作风。

现在郭老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不朽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排除一切困难，奋勇前进！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次讨论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我非常拥护。我看了些会议简报和发言稿，得益不少，我想有些好的发言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哲学所的同志们要我来讲一讲，实在是讲不出什么东西，一个原因是没有参加会，再一个是我对哲学没有什么研究。讲实话，我很愿意跟同志们见见面，但又有点害怕。倒不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怕再犯错误，怕讲错话，这个我倒不怕。我说有点怕，主要是因为自己对哲学没有研究，对自己没有研究的东西，随便发言不好。今天既然来了，还是讲点个人的意见，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纠正。

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现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义何在？

这次讨论的意义，同志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意义很大，我想再补充讲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 本文是作者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原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1）。

原则。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党历来提倡的。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了问题，而且要开这个会来讨论呢？当然，作为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是可以长远讨论的，而且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专门著作，因为它是个认识论问题，对它可以各个侧面去研究，写出各种各样的书。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最初是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的，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很好研究，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但是有人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了什么问题。看出问题当然很好，可以讨论。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是“砍旗”的。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就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搞清楚，对它做出明确的回答。当前确实存在着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这样一种观点、一种思潮，所以值得我们来讨论。

如果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这次讨论会就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流毒来的。林彪倒了很久了，“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被摧毁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还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正因为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需要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不散的阴魂作斗争。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驱散林彪“四人帮”阴魂的工作。如果人家问你们写这些文章

干什么？我看就是作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苦的工作。这个工作做不好，打好第三战役就是句空话，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不能很好完成。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种阴魂附在自己身上。要驱散阴魂，因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阴魂，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把它驱散。这次讨论会，应该看作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学术问题而且是思想政治路线问题。从简报上知道，有的同志来开会，别人劝他要小心 多看多听 不要多说 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致使我们不少人心有余悸呀。我们共产党人还怕政治问题吗？一个共产党人就是搞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还能怕政治问题吗？要消除余悸，不要怕。理论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理论斗争就是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的。相反地，如果离开了当前的实际斗争孤立地空洞地进行理论讨论，就直接违犯了这次讨论会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又不敢联系实际，你这个讨论就离开了实践，就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违反，这就等于自己反对自己，直接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我们的讨论应当同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应当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同坚持党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结合起来。哲学理论讨论，一定要同这三个“三”结合起来。

我们讲的实践是什么实践呢？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历来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 从延安时就讲，《实践论》就讲了的。这三大实践是三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离开了这三个伟大的实践，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仇恨和反对革命实践，

他们宣扬和实行的是反革命的实践。他们以鼓吹阶级斗争为名，反对什么“唯生产力论”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破坏科学实践。他们借口反对“经验主义”来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经验，用反动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任意篡改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重视实践标准，既同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同经验主义也是相反的。

其次是要发扬三大作风。邓力群同志讲了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三大作风头一条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实事求是。第二条就是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三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生命，是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来的。三大作风保证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就是三大作风，因为没有三大作风，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我们党的生命。

我要特别讲一讲“四人帮”破坏批评与自我批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我们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同需要空气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离开了广大群众的实践，离开了群众的监督，离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靠谁来检验呢？怎样检验呢？理论要符合实际，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通过不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逐步做到比较符合。但是这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根本没有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了，他们实行的只是“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毛主席在七大闭幕词中谆谆教导我们，要实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我们多少年没有了，我们要把它恢复起来，发扬起来。没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真理怎么来

检验？谁来检验呢？

再次 要坚持毛主席指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三要三不要”原则是经过批判林彪之后总结出来的，头一条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这是根本。第二条是要团结不要分裂。团结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团结 没有这个基础 团结就没有可能。第三条是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忘记这一条 因为林彪“四人帮”不是一般正常情况下的错误路线的代表。我们党有过多路线斗争，但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 他们是一伙大阴谋家、野心家。在路线斗争中，我们的同志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就是犯过很多错误的，但我们同这伙搞阴谋的人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怎样学会同阴谋家、野心家作斗争，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从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学会如何识别阴谋家、野心家，学会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大的党，总会有阴谋家，今天把这个赶跑了，明天还会有另一个跑出来。像我们这样一个在人民中享有无上威信的执政党，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投机分子、阴谋家、野心家要钻进来，并千方百计爬上高位。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就是这类人。怎么办？这是客观存在。你同他讲马列，他口头也会讲马列，甚至比你讲得还多。此外，他还比你多一条，会搞阴谋。搞阴谋你搞不过他。怎么办？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 人们的觉悟普遍提高了 逐步学会了识别哪些是正派人，哪些是不正派的人。任何人要搞阴谋诡计就不那么容易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就遇到了同阴谋家巴枯宁之流的斗争，他们也有过痛苦的经验，也许比我

们少些。恩格斯把同阴谋家的斗争的经验总结了三条。第一条是，敌人总是想让我们在个别字句上犯错误，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字斟句酌，措词上尽量不要让对方抓住辫子。第二，阴谋家惯于把主要问题掩盖起来，因此我们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同他们纠缠，不要上当，要紧紧地抓住主要问题。第三，当阴谋家野心家还未彻底暴露时，你不要先发制人，要后发制人。待他完全暴露之后，就全线出击，狠狠打击。这三条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同阴谋家野心家作斗争总结出来的三条经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第404页 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阴谋家的专长就是搞阴谋，要对付他，首先是对付他的阴谋。恩格斯说，干正事的人就是斗不过搞阴谋的人。因为你整天干正事，忙得很，他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搞阴谋，你没有戒备呵！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增长了一点点见识。大大小小的投机分子、阴谋家、野心家 各个地方免不了都有 我们要提高警惕，时刻当心。

第二点：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标准？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否定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我想我们应该明确地回答：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就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唯一的标准。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不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不是削弱而是加强。问题在于你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理解。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背诵个别词句，而不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也就是 不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 那你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正如毛主席早在延

安整风时说过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是要否定它，要削弱它。只有彻底否定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加强。

当然，我们不是反对个别词句，相反地，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都要重视，虽然不是像林彪所说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但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必须通过熟悉和钻研这些词句，从这些词句里吸取智慧和真理。我们反对的只是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割裂上下文的意思来滥用这些词句 歪曲和任意篡改这些词句。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干的，这是他们的反动的实用主义，也是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不反对掉这些，我们就不但不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且会让这个旗帜受到玷污。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当作僵死的教条。如果是把它看成僵死的教条，多少个词句也不顶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个概念要在我们头脑中坚固地树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反复讲过的，我们不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一个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一个过程的集合体。世界就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有产生和消灭。所谓发展的观点，就是把世界看成一个过程。承认世界是一个发展过程 就不会有“天不变 道亦不变”就不会有“绝对权威”或“顶峰”一类的思想。把世界看成一个发展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基本的思想。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就不会产生以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样的错误思想，因为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要发展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僵死不变的教条，那真理还怎么发展呢？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背离的，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背离了这些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是必须发展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僵化了，这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对立面。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和真理都是发展的，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新的真理。已有的真理也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去丰富和发展。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讲过莱辛的故事。大家知道，莱辛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高度评价的一个德国伟大作家。莱辛说，如果上帝一手拿着真理，一手拿着寻找真理的能力，任凭你选择一个的话，他宁要追求真理的能力。当时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还有一股锐气。他们要自己去寻求真理。我们无产阶级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要掌握这个真理，作为我们思想的指导。但是我们不能像斯大林所批评的那样，躺在马克思主义身上过日子。我们要像毛主席那样坚决地反对“本本主义”。我们还需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研究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提出新问题，形成新的理论。不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了。因此，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会否定更不会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而正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道路。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有些人凭个人私利，个人意见办事，甚至凭个人感想、印象和冲动办事。有些人自己不动脑筋，谁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谁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做错了事，讲错了话，又不肯认错，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

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却硬要让客观来适合他的主观，因此就千方百计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黑格尔说过，意见同真理是两回事。意见往往只是按照事物的现象、外表、或一时的效果来作判断，而真理却要解决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问题，要符合客观事物的真实。这是只有靠实践才能检验出来的。意见同真理有所区别。正确的意见反映真理，但有许多意见并不反映真理，甚至跟真理是相反的。如果意见就是真理，那我们获得真理就太容易了，我们就用不着为真理而奋斗了。

有些人口里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言和行不一致。口和心不一致，有些人只讲动机，不讲效果。这些人当然不愿意承认实践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讲，判定一个政党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动。这不但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如此。对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是如此。听其言观其行。对一个人，一个政党都是这样，对任何事物我们都应取这种态度。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看你的话还不够，还必须看你的行动。话说得再好听，不见之于行动也是没有用的，只有行动才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科学无禁区，这话对不对？

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党对科学的领导作用？如果是否认党的领导，这话就是错误的。科学无禁区这句话原来是针对“四人帮”设置的大大小的禁区讲的，这些禁区窒息了人民的民主空气和活泼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发展，造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恐怖局面。不打碎他们设置的禁区，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们的科学就不能发展。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

否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科学也有不能进入的地区，例如，我们现在还不能到月亮上去，但那不是因为那里是禁区，而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水平还不行，我们的科学成就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许有人会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可以没有禁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学问，怎么能没有禁区呢？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应把它当作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各方面来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是不应当设置禁区的。至于在这个研究中是否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研究的成果是否适宜于公开发表，那是另外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无禁区，不但不是否定和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而且正相反，体现了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领导，我们应当千百倍地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在党中央领导下，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我们社会科学不应当落在自然科学的后面，更要加倍努力，急起直追。

如何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这就要：一、明确地给每个学科的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不是设禁区。方向定了，你这个学科三、五年内完成什么任务，要攻破那些难关，要解决什么问题，攻占什么高地，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二、贯彻党的一系列政策 发展科学事业要有正确的科学政策 三、讲求领导方法。党如何采取适合于领导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采取一般行政领导的

方法来领导科学。政治也好，学术也好都需要民主。学术特别需要有民主空气，需要有自由讨论的空气。要反对对学术问题采取粗暴态度，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考虑到科学艺术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坚决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逐步清除“四人帮”在知识分子心中造成的“心有余悸”的状态。恩格斯讲，对于科学没有什么法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只有民主讨论，不能民主表决。个人意见可以坚持，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可以发表，大家讨论。科学的民主，就是一方面科学家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要搞学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科学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党应当支持和鼓励科学家的积极性和他们的独立见解和创造精神。任何工作都应有创造性，科学工作更应有创造性。世界上有那一种科学没有独创，而能成为科学呢？同志们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怕压力，也要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而这两方面都需要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战士呢？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多来，政策深入人心，我们国家形势大好，虽然目前困难还多，阻力不小，但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依靠群众，凭着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我们是一定能够有所成就的。团结起来，为我们的事业，特别为科学事业而奋斗！

今天就讲这些。

《中国歌谣选》序

我国各族人民的歌谣，十分丰富。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歌谣是群众抒情言志的口头诗歌。每一首民歌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曲调。因为不识字的劳动者或根本没有文字的民族，无不习惯于以本民族、本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处境，记事抒怀，有的还以对歌作为社交手段和交流情感的媒介。歌谣从来是人民心声的自然流露，它也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时代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古人有审乐知政的说法。采风可以了解民间疾苦，虽然并不能由此而消除这些疾苦，这说明了民间歌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这些歌谣中可以听到人民的声音，特别是能听到群众的政治意见。综观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各民族的歌谣，更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在劳动和斗争中，不断用他们的诗歌创作描绘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这是我国各民族人民以自己的艺术天才和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财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重视民歌，特别重视政治民歌，他们高度评价这些民歌的社会意义及其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重视民歌，提倡搜集民歌的工作。历代杰出的诗人、作家也都懂得，诗是从民歌发源的，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民歌吸取了养料和形式。屈原著名的《九歌》，就是由楚国民间的祭神歌辞加工而成的。明代以拟古主义者著称的李梦阳，在编辑自

己的诗集时也深有感慨地说：“真诗乃在民间。”在封建时代民间歌谣一面被当作“下里巴人”遭到鄙视，一面由于所谓“兴乐教”“观风俗”或为了宫廷娱乐而被收进了乐府，被吸收进去了，著于文字，就保存下来了，而且每每成为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但是，大量的歌谣是被忽视而自生自灭了；只是由于人民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因而迄今还有以往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作品一直在群众的口头流传。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文化上也被剥夺了掌握文字的权利；因此，虽然他们有很好的民歌创作，在整个文学创作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艺术才能。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是杰出的诗人、作家吸取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发展和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历史也证明，诗人、作家如果不向劳动人民的诗歌传统学习，就会在创作上脱离人民，使诗歌艺术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毛主席提倡搜集民歌，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发展新诗的需要。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预言：“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不仅为克服新诗的弱点指明了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于各民族诗歌发展的规律的。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歌谣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于口头说唱的民间诗歌艺术和诗歌传统。各民族的歌谣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风格。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我们的社会主义诗歌，应当从各民族民间诗歌吸收丰富的养料和形式，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时代的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新诗歌。毛主席的指示，对于一切文艺工作者都有重要意义，对于民间文学工作者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这两集歌谣选的是近代和当代的民歌。近一百多年来，我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前赴后继，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这些民歌就是这个斗争历程的反映。

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民大众是牛马，体力劳动是苦役。在这部歌谣的第一集里，历历如画地反映了旧时代我国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其中有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愤怒之歌，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的英雄们的赞歌，有失去了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的奴隶的悲歌，有在封建制度剥削下广大农民的愤怒的控诉，有妇女惨遭封建礼教残害的凄苦的自述，有各种手工业工人及产业工人的悲苦境遇和奋起反抗的自我写照。这些歌谣的产生的年代可能更早，但他们反映了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要求，烙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人民开始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新时代的新民歌诞生了。它们和旧时代的民歌相比是迥然不同了。它们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洪亮的声音。它们有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中，我们听到了各族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破旧立新，艰苦创业的勇敢之歌，听到了我国人民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奋发图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高歌猛进，走上新的长征的最矫健的步伐声。

“四人帮”是人民的敌人，他们鄙视和仇视民歌。由于“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对民间文学工作的空前破坏，民歌的搜集工作长久中断。这部《中国歌谣选》的出版，也推迟了十年之久。现在当它问世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深切地怀念郭沫若同志。据参与编选这部歌谣的贾芝同志告诉我，郭老

曾亲自参加和指导了这部歌谣的编选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间，从最初集稿到第三稿的定稿，郭老是逐字过目的，看了三遍，认真圈选，并对个别辞句作了改动，有的注释是他加的；后一段的修改工作，他虽因年迈患病未参加，他在病中还对一首新民歌又作了修改。十年前郭老已为这部《中国歌谣选》写好了封面题字，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将书稿最后送他过目，他已不幸与世长辞了。

我没有为这部歌谣的编选工作出什么力，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同志要我为它写个序，我就写了如上的话，一以表示我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支持，一以纪念敬爱的郭沫若同志。他作为一代杰出革命诗人，是始终关注民间文学事业的。

载《民间文学》1979年1月号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同意胡乔木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问题的讲话。我也讲点意见。我讲的题目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发给会议的“哲学社会科学八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只是一个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致的规划，一个粗略的蓝图。这个规划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于大家的讨论、修改、补充，使之趋于完善，在执行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加以修订。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是有计划的。我们有自然科学、技术的规划，也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比较起来，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要更困难一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政治性是很强的。它要随国内外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斗争的形势而变化，因此，社会科学的规划就不可能那么稳定，那么严整，它的伸缩性、流动性就比较大。

* 本文是作者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原载《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十月号。

比如，在清除“四人帮”以前，我们的规划中能够列入“四人帮”批判这样的项目吗？当然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这却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项目。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由于大家的努力，过去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但是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远，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威望，是很不相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时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社会科学遭到了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研究工作陷于停滞的状态，混乱和倒退的状态。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作过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但是规划执行的情况是不好的，这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这些过去参与管理过学部工作的人，特别是我个人，工作没有做好，也是有责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兴旺的气象，人们对它的期望是很殷切的。由于我们在制定和执行规划方面缺少经验，又由于目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还不健全的现状，所以今天要制定一个既有雄心壮志而又切实可行的规划是有不少困难的。例如，现在我们的规划大都只是列举了许多必需的应有的项目，而没有规定每个项目要探讨什么问题，哪些单位或个人担任这一项目，完成这一项目的期限是多少时间。又如：有比较长远的基本建设性质的著作，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和中国史、世界史、断代史及各种专史等，又有配合当前斗争任务的著作，如“四人帮”批判等，有集体写作，也有个人专著。所有这些项目都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按照轻重缓急的程度不同，适当安排，不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我们的时代不只需要大量的政论性通俗性的小册子，也需要，甚至更需要有

高度思想学术水平的大部头著作。我们要大力组织集体写作，但也不可以忽略个人的专长和志趣。集体写作班子要有一个有眼力、有见解而又善于群策群力、博采众长的主编。总之，现在的规划还只是一个草案，一个粗线条的东西。但有规划总比没有规划好，规划也只能从粗到细，而且也不可能太细。将来冒出的一鸣惊人的著作，很可能超出于我们这个规划之外。文化史上多少鸿篇巨制，多少惊人之作，有几本是规划出来的？几乎都不是的。但尽管如此，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规划还是需要的、必要的，它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它指明哲学社会科学的航向，促进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清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上的一大障碍，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有了重要保证。现在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制定、讨论和执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了。现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这就向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课题，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属于思想、理论的领域。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我们的理论是否有用，就看它能否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需要，能否满足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以及满足得好还是不好。违反这个需要，是根本不允许的。满足得不好，软弱无力，也是不行的。

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定要和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定要和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

务的斗争结合起来，要为此总任务的实现服务。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的长远的任务。我们的研究工作，脱离了当前现实的斗争，那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两条针锋相对的思想路线。究竟是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呢？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死记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这就是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争论的问题。经过这场大辩论，巩固地树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路线的正确，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承认。在十一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亲眼看见了的，是被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经验，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创造性地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党内出了林彪“四人帮”这样一批最阴险最凶恶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顶峰”，才是“绝对权威”，他们打着“忠于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偶像化”、“宗教化”，以此来彻底地、肆无忌惮地践踏毛泽东思想，以达到他们背叛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我们党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对党内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的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政治水平

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能力是空前地提高了。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中，广大革命青年表现了为坚持真理 不怕挨打 不怕坐牢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就证明 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捍卫者，真理是在他们手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砍不倒的。那些担心“砍旗”的人们，是完全想错了。“砍旗”的刽子手是林彪“四人帮”肃清了这些坏蛋的思想流毒，就是保卫了这面伟大旗帜不被污染褪色，保持了它的鲜红的色泽。在革命人民的保卫下，我们更高地举起了这面旗帜，这是真正的高举。

最近报刊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就是涉及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究竟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问题，这是有关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大问题。

这个讨论是很及时的，很有必要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讨论所取得的成果，不止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

要把长期被林彪、“四人帮”所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首先就要端正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把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毛主席在有名的《实践论》中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 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中，类似这样的话不知说过多少。那些热衷于背诵个别词句的人为什么偏偏忘记了这些最重要的话呢？我们所说的实践，当然不是狭小的个人的实践，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有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

怀疑 不赞成 对讨论这个问题不热心 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甚至表示惶惶不安的情绪。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除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之外，就是因为这些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所以他们害怕实践、害怕群众，他们不是根据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看问题、办事情，而是根据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看问题、办事情。当客观实际和他们的主观愿望、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不是努力使自己的主观符合于客观，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在实践标准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只反映了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哲学社会科学是党性很强的科学，有资产阶级派性，就没有无产阶级党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有个人私心，谋个人私利，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在乎口号喊得多响亮，在这一点上有谁能够及得上林彪呢？而在于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对毛主席全部学说，能否作出符合实际、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比较正确的阐述和解说，而更重要的是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和研究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现状，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研究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号召我们写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我们至今没有交卷。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论述当代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三十年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们还没有一本根据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还没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也没

有一本阐述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概括性的著作。两年来，报刊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但像《反杜林论》那样的全面的系统的批判著作却还没有，虽然“四人帮”在学术上远远不能和杜林相比，但他们的影响，却太大超过杜林。现在，社会科学院正在组织力量编写这些著作。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这类著作也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最为盼望的。我们应当满足他们的这种热烈期望。明年是建国三十周年纪念，又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有些纪念性但又是学术性的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我们有理由要求我们的著作具有我们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学术水平，但也不能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正确。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世界上是没有的。有的同志说：“人无完人，书也不能有完书。”我很赞成这个意见。要求太高，就反而达不到目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还处在一个草创的时代，我们在学术上成熟的程度还很不够。一本著作，只要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有些创见，不是人云亦云，也就可以满意了。

为了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研究当前的问题应当占据优先的地位。但是研究外国的经验和研究本国的遗产，却是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外古今。研究方法，也正如毛主席所曾经很形象地说过的，是中外古今法，这个中外古今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研究和解答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割断历史联系地来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

由于“四人帮”长期实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蒙昧主义的反动政策，我们对于外国的事物本来了解不够，就越发生疏了。

清除“四人帮”以后，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向外国交流科学技术文化，向外国学习，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了。对中外文化学术交流，我们应该抱更自觉、更主动、更热情的态度。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主席说向外国学习要有勇气。什么“勇气”呢？就是放下架子，不夜郎自大。我们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要向外国学，这点是谁能够反对的了。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否也要学，是否也有可学之处呢？这就有问题了。要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应当学。每个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文化和反人民的文化。我们不但要学别人的先进经验，也要研究别人的反面经验。作为批判的对象，也作为自己的鉴戒。这就是“洋为中用”的意思。

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市场，相应地也开创了世界文学，即世界文化。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片面性越来越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终于被打破了。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传播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欧洲并不总是中心。古埃及、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波斯、印度和中国，都曾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对世界文化作出了特殊伟大贡献的古希腊，就是吸取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化营养。世界三大宗教都产生在亚洲地区。在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我国唐代的文化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只是到了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才有“文艺复兴”，十八世纪才成为“启蒙的世纪”。十九世纪在德国人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英、德、法三国理论思想发展和工人运动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思想移向东方，在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再向东移，在亚洲中部的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人类文化的中心和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这样往返流动，影响遍及全世界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总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推移的。我们应当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评价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

我国有三四千年的绵延不断的有文字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清理这份宝贵财富，重新给以估价和利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对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都是非常必要的 这就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意思。我国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对它加以革命的改造。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总结当前的运动，参照外国的先进经验，吸取本国历史文化的精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各个学科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我们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极端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批判他们以贯串所谓“儒法斗争”的主线来歪曲和篡改中国历史，用“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作为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手段。我们要还自己国家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人物作出符合实际的公正的评价，既不要美化他们，也不要丑化他们，不要把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有的思想感情强加在他们身上。现在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许多学者，由于他们本国的战略需要，或者出于他们本人对研究中国的求知欲望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都在纷纷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现状、历史和文化，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一种“中国热”。比起他们的努力，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研究就显

得太不够，太逊色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我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能否付诸实施，变成行动，化为成果，这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持续的艰苦的劳动，还需要创造保证完成这些规划的各种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能否发展和繁荣起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执行得如何。

自从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二十三年过去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则提出更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提出了。毛主席关于这个方针反复地作过多次的论述。这是他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贡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正式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成为我国根本大法之一。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研究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这个方针，本来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要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个前提下提出的，是根据科学、文化艺术工作本身的特殊规律提出来的。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激烈的斗争过程。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有两种倾向的斗争；既要反对右的或修正主义的倾向，又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简单粗暴的倾向。两类矛盾，两条道路，两种倾向，互相交错，互相转化。斗争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非常微妙而又尖锐的。毛主席一提出这个方针，就遭到了一些同志的怀疑和反对。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他们怕这样一来，从此天下就大乱了。毛主席从爱护同志出发，及时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还有的同志怕犯错误，提出了“力求避

免毒草”这样的口号。毒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要避免就是一厢情愿，主观幻想，就是不敢正视毒草，害怕和毒草斗争，软弱无力，精神状态不健康。毛主席批评了这种想要“避免毒草”的错误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和江青之间就曾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我们曾反对过对待文化工作的粗暴态度，江青却说我们反对粗暴就是反对革命，仿佛粗暴就等于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就以最粗暴、最专横、最野蛮的法西斯式的手段来横扫一切，清除一切他们不顺眼的、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東西。古典的和现代进步的中外书刊几乎全被禁止出版和阅读，许多好的电影和戏剧都遭到禁锢的命运。江青对文化艺术创作实行了最粗暴的专制和垄断。她窃取和霸占了所谓“革命样板戏”，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一切艺术创作都要按江青他们的什么“三突出”一类的公式来向壁虚构。稍稍摆脱了江青的控制，反映了革命生活的真实的电影《创业》就被扣上“十大罪状”而大张挞伐。在“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本来应当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却变成一片荒芜，死气沉沉。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正当文化生活的权利。人民和广大青年缺少最起码的精神食粮。精神的饥饿是和肉体的饥饿一样难以忍受的。许多青少年看不到好书，好戏、好电影，就去看手抄的黄色小说，看有害的侦探故事，寻找各种无聊的消遣。不少人在精神上被“四人帮”所腐蚀，丧失了理想，看不见前途，没有信念，一片虚无主义。有的人就走上了堕落犯罪的道路。这就是“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说“没有小说 没有诗歌”；“百花齐放没有了”。这种状况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不只是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问題，也是关系千百万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问题，关系对广大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总之，关系到最广大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和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文艺界和科学界同“四人帮”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采取各种形式，有时隐蔽，有时公开，一直没有停止。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在人们思想上所设置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破。他们套在人们的脖子上的种种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人们还是“心有余悸”。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人们“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必将逐渐成为过去。但是要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还需要时间，需要彻底摧毁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及其所遗留的恶劣影响。

我们说过，科学无禁区。设置和承认禁区，就是承认世界上有些事物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就是否认科学的权威，就是宣扬不可知论、神秘主义，宣扬迷信。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其所以存在“禁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由于人类知识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划分为阶级，对人们的思想来说，“禁区”从来是存在的，现在存在，将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科学还和自然科学不同，是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科学，关系每一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实际利益，触犯它们的利益总是不允许的，“禁区”就更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阶级的消灭，思想“禁区”越来越缩小，直至完全消灭。人类心灵的自由发展将获得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以图腾为标志的原始氏族社会，人们崇拜动物，视某一特定动物为神圣不可侵犯、为谁也不许碰的“禁区”。禁区最初是和迷信联在一起的。任何宗教，无论是原始宗教，或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禁区”无数坑害人的清规戒律。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禁区”也更厉害了，清规戒律也更多了。摩西“十戒”头一条就是：“我是你们的上帝，除我之外，你们不可信别的神。”别的神通通不准信，全是“禁区”。宣传无神论，更是大逆不道的，在“福音书”中无神论就等于魔鬼。在罗马教皇的血腥镇压下，谁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思想，就要活活烧死。布鲁诺就是一个为了坚持科学真理，不怕烧死的千古卓越的英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那种教皇势力的血腥统治，长期支配人民思想的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吃人的礼教。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在“五四”以前，批判孔子是不允许的，是“禁区”。虽然康康早就说过“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样大胆的话，但没有动摇得了孔子的权威。直到明代李卓吾公开提出反对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这才在封建学术界中引起了一场风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把李卓吾作为他们的一个光辉先驱是有道理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孔子这个偶像才动摇了，关于他的“禁区”才算打开。欧洲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启蒙世纪，有几百年的时间，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是清扫得比较彻底的。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虽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封建意识的残余还是相当大量的存在着。毛主席一方面非常重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我国全部历史遗产，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批判孔子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所以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各种表现，仍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封建宗法思想是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惊人了。

在封建宗法意识形态中，君和父的观念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创立林氏王朝，江青想做党的主席，当女皇。在我们党内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们看到，有些负责干部，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单位当作自己的“世袭封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们不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是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是“土皇帝”。在这种人的权力管辖范围内，就遍地是“禁区”，处处有“忌讳”。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禁区”、“忌讳”不是多到不可胜数吗？一千多年前，唐代的韩愈写过一篇短文，叫做《讳辩》，就是批判“忌讳”的。诗人李贺考进士，因为他父亲叫晋肃，“晋”和“进士”的“进”字同音，他去考就犯了禁，因此有人反对他去考。但是以推崇孔子著称的韩愈，从爱护年青天才诗人的观点出发，却赞成他去考，韩愈是言必称孔孟的，他说孔子并没有立这种规矩。现代人是很难了解这种奇怪的、荒谬绝伦的规矩了。“四人帮”给人罗织罪名，造成大批冤案、假案、错案，他们所立的规矩，其荒谬绝伦的程度竟远过于此。

我们所以要彻底摧毁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是因为他们是禁革命人民的，而不是禁反革命的，他们自己就是反革命。现在有些人还不认识这种“禁区”的为害之烈，它堵塞言路，破坏民主，窒息革命精神，扼杀民族生机。有些人在摧毁了林彪“四人帮”的“禁区”之后，还想继续设新的禁区，下新的禁令。这就是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至今顾虑重重，“心有余悸”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我们是最大多数人向少数人的专政，我们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我们并不设置什么“禁区”只有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才禁止。我们禁止的方法也主要不是靠行政命令，我们是靠亿万人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武器，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对它进行批评和斗争。资本主义世界总是夸耀他们的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是虚伪的，骗人的，因为在它们的国家里，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就缺少宣传的自由。我们反对对人民的思想设“禁区”也反对什么“绝对自由”的虚伪思想。

我们实行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要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必须很好地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包括理论、政治、经济三个方面，这三者是互相配合，互相联系的。政治要统帅学术、文化，贯穿于学术、文化之中，但不能代替学术、文化。政治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把政治和学术混同是不对的，把二者截然分开也是不对的。有些同志有一种幼稚的错误的想法，要求在政治和学术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样，我只要不越出这个界线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想一劳永逸地划出这样一条固定不移的界线，这是不可能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稳定的、经常变化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界线难划，就索性不划，而是更要经常注意地、细心地、谨慎地来划，使我们的政治和学术文化经常保持统帅和被统帅的正常关系，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协调。对学术文化来说，政治问题，大量是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现在很多同志还“心有余悸”就是因为“四人帮”不但把学术文化问题都当成政治问题而且把政治问题都当成敌我矛盾问题这样“无限上纲”人们就不能不提心吊胆了。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对政治问题或学术问题都应如此。政治问题不但有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别，就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这种矛盾的性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不同情况。毛主席曾经说过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照一般情况来说这是难以设想的，但这种特殊情况确是存在的，如果不承认这种特殊情况，就不能对章士钊这个人作出公正的判断，对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著作就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我这里不过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如何重要罢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学术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更不能简单地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敌我矛盾的问题。和学术、文化有更加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不但包括着政治观点，这是最重要的，也包括着学术观点和对其他一切事物的观点。人们的世界观往往不是统一的，而是矛盾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世界观简单地说成要么是唯物主义，要么是唯心主义，要么进步，要么反动。就在进步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由于他们的思想视野的宽阔程度的不同，斗争经验的丰富程度的不同，历史文化知识的修养程度的不同，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其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总之，我们对学术文化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有分析的态度，要想采取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类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党中央号召我们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在涉及理

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每个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既要十分慎重，又要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意见，反对错误意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对重大原则问题要敢于明确表示态度，敢于点头，敢于摇头，如果点错了，摇错了，允许大家批评，也允许被批评者反批评。这样大家都知道该说什么 该作什么 不该说什么 不该作什么 党内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能够得到保证，那么，无所适从，“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就可以逐渐消除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服从党的领导 遵守党的纪律 又要解放思想 独立思考 这是党员所应有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敢于纠正错误 只要真理在手 什么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都是毫不足畏的。问题是你所坚持的是不是真理，这就不能依个人的主观来判断，而要靠千百万群众的客观实践来检验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最正确的方针，也是最正确的方法。不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 反过来 不很好地执行这个方针 就不能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问题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

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自由发展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我们的学术、文化就会停滞不前。如果说我们的政治需要民主，我们的学术文化就更需要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它们就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要支持和鼓励自由讨论，特别要保护和鼓励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学术观点。可以说，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没有真正的艺术；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就没有真正的学术。

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要不要在学术文化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的问题，要不要满足社会主义新时期广大工农兵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问题，相不相信群众的政治和艺术的鉴别能力的问题。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我们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对立起来，把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需要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群众对文化的需要，越来越高了，方面也越来越多了，远非解放区时代，也非开国初期所能比拟。群众的眼界和识别力也越来越高了。究竟是领导高明还是群众高明呢？我看还是群众高明。许多问题，往往只有通过群众的讨论，通过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才能弄得清楚。群众最熟悉生活，对政治也最敏感，而领导往往是落后于群众的。这点，我们应当有自知之明。

要不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要不要按照学术文化工作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的问题。任何工作不按照它的规律去办，总是要碰壁的。行政方式、简单粗暴、官僚主义对学术文化工作是特别有害的。我们一定要改进领导作风，学会新的领导方法。

我国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前途无量。我们大家努力吧。

《逼上梁山》序

金紫光同志准备将北京市京剧团重新整理过的《逼上梁山》京剧剧本出版，我要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回忆起这个戏在延安的首次上演，想到它在我国戏曲改革事业上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便欣然应允了。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给杨绍萱、齐燕铭两同志的信中，对这个戏的上演表示热烈庆贺，对它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同时对郭沫若同志在历史话剧方面所作的努力，也给予赞扬。时间过得很快，事过二十年之后，江青窃取了京剧现代革命戏的成果，欺世盗名，自命为京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这不但是对于京剧革命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毛主席关于戏曲革命的伟大指示的蔑视。

毛主席在信中，对戏曲改革工作和新历史剧的创作，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旧文学、旧艺术中长期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所应该遵循的原则，戏曲改革和一切艺术创作，如果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会走上歧途或邪路。

写历史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得

我们去描绘和歌颂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清理我国各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芜存精，用完美的艺术形象把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再现在戏剧舞台上，这是戏曲工作者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的任务。这对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各兄弟民族团结友爱的情感，都是十分需要的。我们要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要把历史上的人物，放在过去时代的环境中 去衡量，看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不应 当拿只对今天适用的标准去要求古人。我们反对厚诬古人，丑化我们的祖先；也反对不适当地美化古人，把今人贬低。我们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也要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倾向。对历史人物既不丑化，也不要美化。我们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又指点出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

作家选择任何题材，都要根据当前时代的需要，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要浸透时代精神。我们不是为写历史剧而写历史剧。历史剧既要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不能歪曲历史，又要配合当前斗争的需要，为当前的斗争服务。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就是这个意思。这决不是叫今人穿上古人的服装来表演。我们不能把历史随意现代化，把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感情强加于古人。这样做，即使是出于配合当前斗争的良好动机，但由于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其效果也往往是不好的。我们曾经对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进行过讨论和批评，这是需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创作中任何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和林彪、“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完全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影射史学”是有意篡改历史，作为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认识，文艺倾向的问题。

戏剧表现人民创造历史这一根本思想，要通过各种不同人

物形象的塑造才能作到。要写正面人物，也要写反面人物。“四人帮”鼓吹什么“三突出”只准突出写所谓正面人物，不准突出写反面人物。没有“反面”何来“正面”不突出写反面人物，实际就是替反面人物打掩护，不使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写“正面人物”又只准按照“四人帮”所规定的模子来如法炮制，结果不但是千人一面，了无生气，倘若稍有生气，就很像“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模样，那就不成其为正面人物，而只是正面人物的反面和讽刺了。无论写正面人物，还是写反面人物，都要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刻意描绘，要环绕着驱使他们行动的环境去描写，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他的心理的细微的变化，写出他走向进步或者反动的内因和外因，他和周围人物的密切关系。总之，要把人物写活，写得有性格，有生气，有血有肉。

《逼上梁山》第一次尝试不把林冲作为一个孤立的英雄来表现，而努力写了推动他行动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写了不容他生存的险恶环境，他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直至最后选择投奔梁山的道路。虽然有小说《水浒传》和各种有关林冲故事的戏曲作蓝本，但《逼上梁山》，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指导，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生命，无论在剧本内容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和革新。延安的同志们继《逼上梁山》之后，又编演了《三打祝家庄》。这些戏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不断加工，已成为我们今天受欢迎的新的传统剧目。当时不论在延安和敌后各个根据地都尝试写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和革命现代戏，起了很好的配合革命斗争的作用。建国以来，戏曲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四人帮”妄图片面夸大戏曲改革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来否定这个成就，是办不到的。先驱者的努力是不容抹杀的。先驱者的东西总是难免粗糙，甚至难免失败，但

先驱者之所以为先驱者，就是因为他们担当了披荆斩棘、开拓新路的光荣使命。有了他们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才会使后来者在前进的道路上免除了许多障碍。对这些最早投身于戏曲改革事业的战士们的工作，我们应给予充分的高度的评价，而不应当求全责备。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总结过去的经验，为创造更好的新编历史剧和革命现代剧，争取戏曲改革的更大成绩而作出新的努力。戏曲一定要进一步加以改革。我们希望有更多好的革命现代戏和好的新编历史剧问世。我国传统戏曲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虽然沾满了旧时代的灰尘，但仍然具有生命力，至今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经过改造和革新，还可以焕发出青春来。“四人帮”把传统剧目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砍杀，完全违反了人民的意志，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要从“四人帮”的长年禁锢中，把优秀的传统剧目解救出来，但这决不是恢复它们的老样，而是必须进一步加以革新，这种革新应当是慎重的而又是大胆的。墨守陈规，不求改革，是没有前途的。我们期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戏剧事业必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迎接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万紫千红的戏剧春天的到来。

本文刚刚写完，就听到了齐燕铭同志溘然长逝的噩耗，这像晴天霹雳一样，使我感到震惊和悲痛。我悲痛京剧革命失去了一位勇敢的先驱，文化战线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战友，特在此表示我的深切的哀悼。

一九七八年十月

载《文艺报》1978年第5期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 文学艺术问题*

这次广东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感谢同志们盛情地邀请我来参加。我预祝广东的文艺工作取得新的更多的成就。同志们要我讲话，现在就讲一点意见，请大家指教。

我谈谈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一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

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现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宏伟的任务。这是经济、技术领域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大革命。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并把我们的工作的着重点也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呢？我们的文艺怎样去反映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怎样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喜群众之所喜，怒群众之所怒，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回答时代所提出

本文是作者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的各种新的问题呢？怎样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勇敢地揭露这一斗争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激励人民同心同德地夺取“新长征”的胜利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清除基地，扫清道路，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和帮派残余，大力革除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种旧思想、旧作风，特别是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其中包括对任何个人的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因为个人迷信和科学社会主义，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绝对不能相容。迷信和正确的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情，信仰和爱戴自己的领袖，是合情合理的，决不是什么迷信。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这种情感。至于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他们并不是真正爱戴和信仰毛主席，只不过是欺骗群众、蛊惑群众，制造对他们自己的个人迷信，以便他们篡党夺权的一种最险恶的阴谋手段罢了。

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正在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将它列入宪法，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一。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平反，伟大的“四五”运动被公认为“五四”运动在我国历史曲折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文艺黑线”论被推倒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得到了纠正和昭雪。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都正在恢复和发扬。正气正得到伸张，邪气正在被压倒。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正在蒸蒸日上。革命的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世界的大事。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的

大门，已经打开。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是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呢？是简单背诵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呢，还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它，运用它和发展它呢？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但和延安时期，而且和建国初期都大不相同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复杂曲折的异常激烈的斗争，经历了胜利和前进的喜悦，也经历了挫败和倒退的痛苦。我们的文艺作品怎样正确地而又有力地来反映这些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们的服务对象，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都空前地提高了。许多青年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演了最活跃的光荣的角色。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作战的战友，已成为整个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象的变化是多么大呵。我们的文艺作品怎样才能真实地表达所有这些服务对象的新的思想和情绪，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呢？我们的文艺为之服务的对象，同时也开始成为我们文艺的主体。当我们的文艺真正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时候，就真正称得起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了。

全国解放以前，是民主革命时期。那时为工农兵服务，就是

为抗战服务，为解放战争服务，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主要的就不是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当然“三十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从广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因为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只是那时文艺描写的对象是民族民主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理想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而开国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只是理想，而是逐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成了当前文学艺术的首要任务。

要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斗争中去体验它、观察它、思索它，熟悉和描写各种新人新事。这比之表现民主革命，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毛泽东同志胜利地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正确地总结了它的经验。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经验是正确的，有些经验并具有世界的意义。许多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一革命的胜利过程。但表现社会主义就不同了。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为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绩，但社会主义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正确的和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的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干扰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确实很好，前途是光明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是非常之多的，生活中有不少令人痛心和消极的现象。有些人就在这种现象面前，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

虑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林彪“四人帮”？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还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经常受到破坏？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能不能战胜，什么时候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类似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一些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盘旋。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正确地来回答这些问题，帮助人们正确地、从历史的发展中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克服各种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比较是研究问题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要只看到它的今天，而要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的纷争和多次的复辟，但终究没有退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去。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一时的、局部的后退，但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的。从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还只有六、七十年的时间，比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连十分之一的时间还不到。中国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从整个历史看，都只是一时的倒退现象。世界革命的潮流，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要悲观。但是我们如果只从光明的方面来看问题，看不到困难，看不到可能遇到的曲折和后退，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阴暗面；看不到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官僚主义的习气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都根深蒂固，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经受多么巨大的痛苦，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看不到二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如果看不到这些，盲目乐观，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决不能把搞社会主义看成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要有勇气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而不是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无所作为。我们也要有勇气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文过饰非。我们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者，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要实事求是，要作敢于正视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者。

我们的作家要正确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就要认真地、全面地研究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要研究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国际歌》是第一首伟大的无产阶级歌曲，但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才开始的。一九〇五年以后，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高尔基写了《母亲》，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石。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而资本主义文学艺术却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它已经趋向没落，比起社会主义文学来，是正在衰亡着的东西，但它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它所达到的熟练程度，在某些方面来说，要比无产阶级文艺更丰富，更高明。它们中间的一些具有进步内容的作品以及它们的某些艺术技巧，也还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我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翼。它是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以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为榜样，是密切地配合我国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它们引导许多对现实不满，倾向进步的青年走向革命，这是真正革命的文学。美国称他们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台湾当局曾把某些暴露当地黑暗的所谓“乡土文学”称为“三十年代文学的幽灵”，可见“三十年代”

是一个代表革命而不是代表反动的名词。林彪、“四人帮”污蔑“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反动。我国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是以伟大的鲁迅为盟主，为旗帜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作了正确的估计，既充分肯定它的成绩，又指出了它的错误、缺点。我们不要怕人家批评“三十年代”，那时我们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受过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当时正值革命大转折的时期，左翼文学还处于幼年时代，有缺点、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文学毕竟是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而不只是某一政治路线的传声筒，虽然有一些作家的创作不能不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不管这种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更多地还是反映作家自己头脑中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不能完全归咎于错误路线，因而也不能把任何错误都提到路线的高度。

林彪、“四人帮”诬蔑从三十年代到开国十七年的革命文艺贯串一条所谓“文艺黑线”，而且“又粗又长”，是“文艺黑线专政”。这种种诬蔑诽谤之词，早已被文艺界同志们批驳得体无完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七年中并不存在一条什么“文艺黑线”，已被实践所证明。开国十七年，我们的文艺工作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是努力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的，虽然在工作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但是我们从没有执行过一条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相对立的路线。三十年代，我们党内发生了错误路线，文艺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党就

是在不断地经受正确和错误路线斗争的艰难过程中发展和前进的。文艺战线也是这样。承认文艺工作某些时候受过错误路线的影响又有什么奇怪呢？

林彪、“四人帮”及其同谋者，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行了一条极其反动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但那也只是一时的乌云，现在乌云已经驱散，阳光开始重回大地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研究和总结我们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帮助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更好地前进。

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又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既要继续深入群众，又要和群众一起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以便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来描写人民的新的生活实践，新的智慧和毅力。只有投身于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中，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使我们的文艺焕发新的光彩。艺术和科学相得益彰，这是四个现代化对革命艺术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新时期艺术的需要，这也是共产主义艺术的理想。当然，文艺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不是要我们去直接描写科学技术，而是要描写新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新变化、新风貌，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同时，文艺的题材还是多样化的，要动员多种多样的题材为共同的目标服务。

二 歌颂和暴露的问题

文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又是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评判。作者对于他所反映的事物，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或是赞成，或是反对，或是歌颂，或是暴露。不表示态度实际也是一种态度。归根结底，总是有一定倾向性，不过有的明显，有的不那么明显罢了。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莫不如此。《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民间诗歌。《诗经》的内容照古人的解释，无非“美”和“刺”。“美”就是歌颂；“刺”就是暴露。

社会主义文学，从不掩饰它的倾向性，它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旗帜鲜明的。这也正是它的党性的表现。但是这种倾向性，无论表现为歌颂还是暴露，都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致的。

在文学中，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两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两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就表现手法来说，在作品中有时是现实主义占主导，有时是浪漫主义占主导，有时是两者乳水交融，浑然一体。这种情况，不但同各个作家、艺术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关，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和体裁有关。就思想内容来说，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有积极和消极、前进和后退的分化。现实主义可以演变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表面上强调纯客观，实际上并不客观，只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浪漫主义可以演变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反，只强调纯主观，不顾客观实际，单凭主观的幻想和华美的形式，它同自然主义殊途而同归，都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正道的。

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提倡两者的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究竟怎样结合呢？两者中究竟以何者为主导呢？应该根据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和他所描写的对象而有所不同。不应当也不可能规定一个固定公式，下一个固定的定义。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决不会按公式或定义去写作的。总之，要遵从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 从现实生活出发 观察、研究现实 既要忠实于现实，又不局限于片面的、琐屑的现象，而是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把革命理想溶合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毛主席所讲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的意思。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也就是列宁所提倡的求实精神和革命气概相结合。

既然社会主义文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那末歌颂工农兵，歌颂革命人民中的英雄人物，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区别于旧时代的一切文学的显著特征，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人民是我们文学的主人公。我们不歌颂人民，不歌颂人民的英雄，不歌颂人民中间的领袖人物，那还有谁更值得歌颂呢？

要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能要求把这种人物写成天生的英雄，十全十美，高大完美，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过程 这样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公式制造出来的什么“英雄人物”正是英雄人物的反面和丑化，只能引起读者的厌恶和嘲笑。我们的作家应当塑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这种人物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英雄人物当然具有优秀的品质，但也可能有缺点，有一点缺点并无损于英雄人物，包括任何伟大人物在内，哪个人

的身上能够没有他那个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没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呢？

在表现英雄人物的时候，如何正确地表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无产阶级的感情来歌颂我们的领袖人物。无产阶级领袖是从人民中来的，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而不是凌驾于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救世主”。我们的领袖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们最忠实、最正确、最坚决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不当把领袖当成“救世主”来歌颂，《国际歌》就表达了无产阶级只有自己救自己的伟大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群人。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借口“反对写真人真事”来反对我们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又鼓吹什么“天才论”、“顶峰论”来歪曲领袖的形象，损害人民群众对自己领袖的忠诚信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满怀热情地而又实事求是地来描写和歌颂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朽的英雄们。写他们的事迹，也就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也是比较熟悉这些历史的年老的作家的光荣职责。

歌颂不等于不要批判。有两种批判：一种是对敌人的批判，这就是彻底暴露和无情打击；另一种是对自己人的批判，是自我批判，这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批判，对于社会主义文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十分需要的。有歌颂就有批判，歌颂之中也必然有批判。

人们常常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样来划分界线，似乎只有后者要批判，而前者就不要批判，似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要不要批判。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至少是一种误解。这只能削弱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的任务。

没有批判，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性就没有了。社会主义文学不但要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敌对的思想，也要批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消极现象，各种弊端和阴暗面。当然 这种批判 应当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 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掌握分寸。因为我们的文艺任何时候都要有益于而不能有害于人民。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而不敢揭露和批评。无产阶级是不怕批评的，是经得起任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的，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革命的艺术。

社会主义文学，从来歌颂的是人民，暴露的是敌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哪些是我们最应该歌颂的人民英雄？哪些又是我们最应该暴露的敌人呢？前者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的榜样，后者是我们应当时刻警惕的祸害。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一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战友，是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英雄。他们既有无产阶级的共性，又有个人独特的个性。我们的文艺要以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写他们的丰功伟绩，用以向广大人民和青年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中国革命是经历了多么曲折复杂、艰难困苦的斗争，付出多少血和泪的代价，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使我们的子孙世代永远牢记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的文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 坚持生产劳动 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

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

在我们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式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不怕抓，不怕压，敢于撕下那些坏人的假面具，这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这需要胆略和智谋，特别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气。这是一种新型的英雄主义。

我们今天最需要暴露的敌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过去的敌人是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者，他们的面目是比较容易识别的。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敌人，他们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总是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往往能够迷惑人，他们的面目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就要暴露这种最危险的隐蔽的敌人。

在人民内部、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利用职权，专横跋扈，瞒上欺下，蛮不讲理，他们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无情地加以暴露和抨击的对象。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出现了像《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那样的新叛徒。叛徒的概念也应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像何是非那样的人，他不是反动时代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叛变，而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为了保官升官，争权夺利，而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这是一种新的、更可恶、更无耻的叛徒。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难道不应该对这种人加以暴露、加以鞭挞吗？《于无声处》第一次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新英雄，也写了无耻投靠

“四人帮”的新叛徒。这就是这个戏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也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不免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地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

三 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

正如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流派一样，社会主义文学，最初也只是一个文学的流派。这个流派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在一些国家中占了优势。但是即使这样，它也有个同盟军的问题。它如果不同其他的一切进步文学结成同盟，就会是孤立无援的，没有力量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也是从资产阶级的带有民主性和反抗性的文学中孕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文学家中许多人开始都只是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从民主主义思想进到共产主义思想，它经历了一个转变、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三十年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大都是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如鲁迅所说的反叛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民主派。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共产党员之后，虽然他们当时执行的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头脑中还保留着不少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决不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已经是

无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了，大多数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四人帮”把当年的什么“民主派”说成就是今天的什么“走资派”而“走资派”则是革命对象，这完全是篡改历史，颠倒敌我，是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和政治陷害。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又有不可割断的历史联系。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我们不但要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继续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宣传科学思想，破除迷信，同各种愚昧无知和落后现象作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也要在这方面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文学不应该孤军奋斗，而应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军共同作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也有过历史的经验。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文学势力还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同路人”文学还占据一定的优势。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无产阶级文学就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在这种胜利形势下，就发生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对原来是“同路人”的作家不是采取团结的方针，而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一九三三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毅然解散以“拉普”（即“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为首的各种无产阶级的艺术团体，清算了它们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成立了以高尔基为首的全苏作家协会，为苏联文学的更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三六年我们解散“左联”也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无产

阶级文艺本身的需要，主要地也就是为了争取和扩大同盟军的需要。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也还有扩大和巩固自己同盟军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队伍，还不够强大。我们首先要在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发现和培养新的文艺人才，建立起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艺素养的、经得起风吹雨打的新的文艺大军。我们有一批久经经验的党内外的无产阶级老作家，这是十分宝贵的。我们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的、民主的文艺工作者作为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文艺队伍，应该包括他们在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能光靠少数人包办，需要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台湾兄弟和海外侨胞，只要他们爱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我们就要欢迎他们，团结他们，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各国文艺界的进步朋友，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朋友，也是我们应当与之联合的同盟军。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争取这个同盟军，也就越加迫切和重要了。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而不应当对他们苛求，拿只适用于衡量我国作家的尺度去强加于他们。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文章中说过，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是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并且还说“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列宁把这个争取同盟军的问题说得多么重要呵！如果说在哲学思想战线上应当这样做，在文艺战线上就更应当这样做了。

文艺是最广泛的人民事业。人民对文艺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不能单靠现代社会主义文艺，而要吸收中外古今一切带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有价值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才有利于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才能满足人民的各种不同的多方面的需要。

这里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一切适合我们中国今天的需要，能为我们今天所用的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艺，既能使社会主义文艺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盟友，它在我国的整个文化生活中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社会主义文艺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外古今的一切进步文艺既有联盟的关系，又有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和一切旧时代的文艺有根本性质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又有和别国不同的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它决不能遗世独立，孤芳自赏，采取孤立自己的政策，而应当采取争取和扩大自己的同盟军的正确方针。我们既要向同盟者学习，又要对它保持独立的批评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和繁荣。

四 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

自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执行这个方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复杂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一方面，要反对那种抗拒‘百花齐放’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粗暴倾向；另一方面，又要反对那种把“百花齐放”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修正主义倾向。我们曾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从“左”和

右两方面来的干扰。我们自己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也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

“双百”方针已经经受了两个十年的严峻考验。第一个十年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第二个十年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第一个十年，这个方针提出不久，引起党内某些同志的忧虑，担心我们“放”就会放出牛鬼蛇神，天下就会大乱。可是，天下并没有大乱。经过艰苦斗争，我们保持和发展了开国以来文艺繁荣的局面。无论小说、诗歌、电影、戏剧、音乐、绘画和评论，都有显著成绩，包括江青所窃取来作为她的政治资本的所谓“样板戏”就是这期间的产物。第二个十年，林彪“四人帮”不但把开国十七年的文艺，而且把“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全部否定，诬蔑它是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他们借口反对“死人、洋人”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对“封资修”，把中外文艺遗产一概打倒。在这十年期间，“双百”方针根本被否定，被践踏，代替的是一条极端反动、极端黑暗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摧残下，革命文艺呈现了万花凋谢、一片荒凉的景象。文艺界同志喜欢说文艺是“重灾区”，其实何止文艺界，各行各业都有重灾区呵。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文艺界只不过是受害者之一罢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大批被他们禁锢的文艺作品和电影戏剧，大批被他们诬陷和迫害的文艺工作者都重新出现，重新得到评价，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恢复了名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列入宪法，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最有力的保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的长远

方针，又是正确方法。科学和艺术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一种需要有广泛自由来发挥每个人的天赋、个性和才能的劳动，也只有用“双百”方针这种民主的方法才能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激发他们互相比赛、互相讨论的热烈情绪，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识别能力和鉴赏水平。如果用简单的行政的方法，只推行一种学派，压制其他学派，只推行一种形式和风格的艺术，压制其他形式和风格的艺术，那只能导致科学和艺术的停滞和灭亡。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的考验，“双百”方针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不执行这个方针，却是最大的错误，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现在“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和帮派残余还有待继续肃清，他们所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和禁区，还有待于继续打破，因为它们是不合理的，是窒息人们的思想，阻碍我们前进的。我们要正确地执行“双百”方针 就需继续扫清各种障碍 排除各种阻力，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的坚持，错的改正；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准备长期进行斗争，不要以为粉碎了“四人帮”就万事大吉了。

所谓“双百”方针 实际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我们提倡的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化”的区别何在呢 划清这个界限，是需要的，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首先 所谓百花齐放 是为社会主义而放 不是为放而放 不是放任自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利益，这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化”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这是两者根本的

区别。

我们公开声言，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有倾向性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难道这样一来，我们的文艺就不自由了吗？难道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就不自由，为个人和少数人服务就自由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种‘自由’就未免太渺小了，它的价值何在呢？资产阶级作家常常喜欢夸耀他们的这种所谓“自由”，我看那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资产阶级作家往往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而不自觉，他们总是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我们党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破除各种迷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活跃的发展的学说。我们提倡的思想解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的思想解放。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百花齐放”，凡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都是花。社会主义的文艺是花，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文艺也都是花。既然是百花齐放，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花，有香的，也有不香的，或不十分香的，但只要它不是违反人民利益的，就不能说它是毒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

毛主席讲“百花齐放”，特别强调了艺术的形式和风格的重要性。艺术题材要多样化，形式和风格也要多样化。世界就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我们过去对形式问题重视是很不够的，似乎一讲形式就是技术至上，就是形式主义。其实形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艺术来说，更是如此。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世界上没有内容的形式，和没有形式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的。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变革、思想解放的运动几乎都要

从形式突破，因为任何革命的或反动的内容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五四运动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把它列为必须整顿的“三风”之一。现在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帮腔”、“帮调”、“帮八股”，不都是这样吗？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内容来谈艺术形式问题。但是，艺术没有一定优美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就不可能成为好的艺术品。各类艺术的形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形成了群众一定的欣赏习惯，这些习惯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可以说就是艺术形式的发展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各类艺术形式适应时代和思想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时代前进了，艺术形式也不能不有所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也不能脱离它原来的历史联系。不研究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就不能探讨出各个时代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的变化，也探讨不出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艺术形式。中国幅员辽阔，同一个汉族，又由于地域不同，各地方的艺术也都有自己的地方形式。各个地方的地方戏、地方音乐，例如广东的粤剧、潮剧，广东音乐、潮州音乐，都是很有特色的。其他各个地方的戏剧、音乐也都各有所长。这些地方戏曲、音乐的形式和方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我看全国推广了普通话，即使方言消失了，地方戏、地方音乐可能还会长期存在，继续为当地人民所喜爱。地方戏和地方音乐（包括民歌）和人民生活血肉相连，富于地方色彩，生活气息浓厚，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我们不但应当加以轻视和排斥，而应当积极扶植、改革和发展。发展革命现代戏，无论是京剧或地方戏，仍是我们戏曲发展的努力方向。传统剧目一定要改革。因循守旧，

不加改革是不行的，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太不相称了。

西方说，风格即人。我国历来也说，文如其人。我们要重视风格，也就是重视个人的独创性。一个作家、艺术家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形成自己的风格的。随着他的艺术才能的发展和创作经验的增多，就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为众人所注目和仿效。仿效的人一多，就会形成一个特定的艺术流派。这种艺术流派和政治上的宗派完全是两回事。在共产党内搞派性，是反党的，我们要坚决反对。艺术上的流派，我们不但不应反对，而且应当赞成。好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好的艺术流派应当受到鼓励和赞扬。任何艺术流派，都要靠艺术家本人的成就和声望，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不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不但对于艺术，对于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革命者，风格也是十分重要的。风格就是个性，就是人品。实事求是和革命精神就是每一个革命者所应具有的风格。

周恩来同志曾经引述过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样一段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是讲人类认识世界的发展历史，这对于文艺也同样适用。文艺和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只是两者认识和反映的方式各有不同。要认识世界，就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文艺也是如此。艺术要创造典型，探索和发现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我们正处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伟大革命的时代，我们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要充分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向外国学习。在文化艺术上，特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难道外国的东西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吗？难道我们不也应当努力去探求新的表现

形式和手法吗？当然，我们艺术的思想内容不同，又有我们自己固有的艺术传统和民族形式，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去放眼世界，向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学习。文学艺术史上，向民间学习和向外国学习往往会引起伟大的变革和进步，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不要忘记我们的时代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决不能以已有的成就为满足。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一定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五 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条是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再一条就是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但对于科学，而且对于艺术，自由讨论也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没有自由讨论，思想就要僵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会猖獗起来。文艺上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很多，有对当代的、外国的和古代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有文艺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是对我国当代的，或是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作品，都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都对许多个别的文艺作品有过十分精辟的评论，对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启发，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再需要我们去进行独立的研究了。对于一部作品，特别是伟大的作品，可以从各方面去评价，各人所见不同，评价也有所不同，经过讨论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发明。

文艺作品是客观世界和历史真实的反映，它所反映的世界越广阔、越真实、越丰富、越深刻，对它的探索和评价就越要费工

夫，花气力。这些作品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评定它们的优劣，对它们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有些作家和作品，是风格的不同，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李白、杜甫，各有千秋。“李、杜优劣论”的争辩，历千年而无结果，就是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对于作品的评价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要主观武断，也不要随风倒，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权威，就是最后的判断。文艺批评，既要阐明作品中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其真实、深刻和生动的程度如何，又要从作品中发现新的东西，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对一个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现象，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意见。要有勇气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公开说出自己的所见，不怕扣帽子，打棍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危险。

要实行艺术民主，开展自由讨论，至今使人心有余悸的一个麻烦问题，就是如何划清艺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的界限。艺术、政治、世界观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往往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正因为不容易区分，所以我们就要更认真地细心地加以区分。我们的艺术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但是，无论是政治也好，世界观也好，都只能包括艺术，指导艺术，而不能等同于艺术，不能代替艺术。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曾提出过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被批判、被否定，就是因为它把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和艺术的创作方法完全等同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代替艺术，根本抹杀了艺术有它自己固有的特点和规律。到三十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个以卢卡契为首的“文

学评论”派，他们就走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认为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把创作方法同世界观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世界观越反动就越能显示现实主义的胜利。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点和看法的总和，它包括艺术观，它指导艺术创作，但不能代替艺术创作。艺术作为形象地把握生活、反映生活的手段，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政治观点在世界观中起决定的作用，但也不是世界观的全部。每个人的世界观也是在变化、在发展的，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在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们当中，也有政治成熟程度的不同，斗争经验的丰富程度的不同，思想视野宽广程度的不同，观察能力的深浅程度的不同。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科学的、有分析的态度，不要动不动就把艺术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提到政治上革命和反革命的高度。要看到艺术与政治、世界观关系的复杂性，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斯大林否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号召作家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号召他们“写真实”。卢卡契及其他一些人就把“写真实”视为唯一的、最高的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我们批判了这种所谓“写真实”论，是对的，但不应因此忽视对现实主义的提倡。“四人帮”却走到完全否定文艺的真实性的极端。我们今天不仅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反动谬论，也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并使这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更好地相结合。要坚决反对一切说假话、说空话的虚伪的文学。文艺应当真实地反映生活，对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推动历史前进，而

不是拉历史开倒车。

六 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

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讲，因为十多年来我脱离了文艺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凭过去的一点经验讲话，是容易讲错的。何况我在长期工作中也有过不少缺点错误，又曾被林彪、“四人帮”打倒过，似乎只能讲自己失败的经验。如果要勉强安慰一下自己，就只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打过败仗，可能会使自己变聪明一点。在座的许多同志，在一个地区，或在一个方面，担负一定的文艺领导工作。我讲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也是应该的。

任何领导问题，首先是方针路线问题。我们做任何领导工作，总要有了一条路线，不是正确的路线，就是错误的路线。我们有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现在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可以沿着正确路线勇敢前进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难免要犯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

其次，领导方法是一个重要问题。领导文艺同领导其他工作一样，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领导方法。对文艺工作来说，一般就是政治，个别就是艺术。不能只有一般政治号召，不研究文艺工作的具体业务。在各个时期，各种不同场合，文艺怎么为政治服务，文艺本身有什么特点和规律，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和过去有哪些不同，当前存在哪些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那些热心科学事业的人去领导科学，是很有道理的。外行不要紧，但要热心于自己所领导的业

务，关心和钻研这个业务，并虚心向专家学习，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逐步使自己变成比较精通本行业务的内行。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就是缺少这种热心和钻研精神，不肯和被领导者交朋友，不向被领导者学习，不去或不愿意去研究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特殊规律。他们不是遵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质，根据今天新情况研究文艺上的新的问题，提出新的任务，而是以背诵《讲话》中的个别词句为满足。这决不是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用这个旗帜来掩盖自己的懒惰、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

领导和群众结合，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给予我们的一贯教导。领导任何时候都要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最近《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反复指出：人民群众是文艺的最有权威的评判者。这是不是否定领导的重要呢？难道领导就不是最有权威的评判者吗？他是不是，不能自封，这要看领导是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利益，是不是和群众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现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觉悟和判断能力是大大提高了，他们在某些方面实在比一些领导人员，一些理论工作者，包括我在内，都高明得多。不要摆老资格，要热情地欢迎青年人，要帮助他们，向他们学习。

文艺界许多同志都提到文艺作品审查制度的问题。我想必要的审查还是要有的，但是尺度要放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文艺书刊的编辑看稿，也不要把自己当审查官，而要当作是作者们的朋友。不是专门找错处，挑毛病，而是细心地发现和爱护文艺人才。电影创作单位和艺术表演团体，对电影和戏剧等节目应否拍摄和公演，可以经过集体审议，例如由各单位的艺术委员会来决定，只有涉

及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向上级请示时，才送交上级审查。这样，审查制度就简化多了，下级机关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双百”方针才能顺利地贯彻。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才能得到锻炼和发展。

作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极其重要，关系革命成败的东西。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历来提倡，今天更要提倡的作风。各行各业领导都有一个作风问题。作风最要紧的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不搞排场，不搞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群众对老干部恢复工作，是满腔热情地欢迎，对他们寄以极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在长期受迫害的生活期间，比较更多地了解了民间疾苦，对人民有了更深的感情。但是有个别人，恢复工作以后，又当了官，官架子摆起来了，不听群众的呼声了。有的人受“风派”人物包围，只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不高兴听稍有不同意见，这样就与广大群众隔阂了，这是很危险的。“风派”人物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这种人物，虽然一个时期依附过“四人帮”，但究竟不是“四人帮”，而且有些人是有一定能力的，我们不能不用，但是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并对他们保持一定的警惕，不要被他们的逢迎吹捧弄昏了自己的头脑。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摆官架子，搞特殊化，搞官僚主义，是和共产党员的称号绝对不能相容的。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致命危害。我们决不可以沾染这种官僚习气，这是一种最腐朽的封建僵尸的余毒。如果我们沾染了这种余毒，势必就会脱离群众，和群众处于对立面，甚至和群众发生公开的对抗。

我们要学习周总理，像他那样联系群众，平等待人，同文艺

工作者交朋友，谈心交心。他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友严师，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一九七九年

在电影界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

刚才胡耀邦同志讲了话，他说他不是文学家，没有激情。同志们可以评定一下（是不是有激情 笑声）大有激情啊 这个讲话，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不久要发表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文艺界的同志都应该很好地学习这个讲话，因为这个讲话是针对电影创作问题的讲话，对我们电影界的同志来说特别亲切。一九六一年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 我是十多年没有工作 被林彪“四人帮”打倒了。“四人帮”打倒大批老干部 是残害忠良啊。他为什么要残害忠良呢？就是因为他们要篡党夺权。但历史上的忠良自己也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包括岳飞在内，你说一点缺点都没有哇？一点错误都没有哇？那也不是事实。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就是使劲抓住你的弱点来残害你。当然，你没有缺点，他们也要残害你。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迫害的人，千万不可认为我们自己都正确。这一点我倒是有自知之明。黄镇同志刚到文化部的時候说 我新来 你搞文化工作几十年了 想向你取经。我说 我能够向你提供一点错误的经验供你参考。当然错误经验也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刚才耀邦同志讲要向过去看，更要向未来

看。林彪“四人帮”对我们的迫害要看 要清算 要批判。但是我们应该站得更高地看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林彪“四人帮”这一伙 为什么他们要夺权首先在文艺界打开缺口 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同时，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我们自己十七年中是不是都对，也要有分析。十七年也有错误。无论向前看也好，向后看也好，都应该采取这种分析的态度。刚才耀邦同志讲他充满信心，我也充满了信心。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应该充满信心，没有理由悲观。

我想讲这么一点意见：党中央提出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那么电影怎么转？在各种艺术形式里面要讲现代化，电影是最现代化的，没有一种艺术比它更现代化了。如果说要转，各种艺术都要转，首先电影要转好，要充分利用现代化这一点，不但要满足国内观众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像话剧这类艺术形式，外国人看不懂，电影人家看得懂（胡耀邦同志插话：是啊，我们电影出国的多不多啊？）不多，我们过去是手工业出口多，象牙雕刻嘛。

打倒“四人帮”快三年了，电影产品同当前形势不大相适应。我现在作为一个观众来表达观众的意见。群众每天要看电视，看电影，而现在这些节目，老是演十七年的，新出的又不能吸引人 群众有意见。这个问题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四人帮”倒了以后 电影上得慢 也有客观原因 因为电影生产的周期比较长。最快的是漫画，“四人帮”一倒就是漫画登场。再就是相声 是你们（对侯宝林同志）曲艺界打急先锋，你们的条件好，你们是轻骑兵。而电影的条件相比之下，就没有你们好。所以电影不能跟上形势也是情有可原的。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就是“四人帮”对电影的干扰破坏特别严重。他们话剧不要了，相声不要了，漫

画也不要了，都不要了。在那十一年中，这些艺术手段，他们都抛弃了，都禁止了，唯独电影他们还想抓一下，所以电影这方面的灾难比其它部门更大一点。“四人帮”搞阴谋文艺，搞“三突出”那套，主要是在电影方面。所以现在“三突出”对电影方面还有影响。由于以上的原因，一是电影生产周期比较长，一是电影受“四人帮”破坏比较大，使我们的电影创作不能很快地跟上形势的发展。

“四人帮”对人们思想上的毒害不可低估。包括一些好的同志，甚至包括一些反对“四人帮”的同志，在创作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四人帮”的“三突出”之类的影响。现在我们要把电影搞上去，一方面要承认赶不上形势总是有原因的；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些原因，就更应该努力把电影搞上去。我这里还补充一下，就是“四人帮”的流毒不但是影响了我们国内的电影，也影响了香港的进步的电影界，是不是这样（问夏梦同志）？四人帮”还在台上时，有的演员改行了。夏梦同志就不演了。有的电影学“四人帮”那一套，没人看。我们香港进步电影公司的影片，反而比不上人家。我看得不多，也许不应该随便批评。香港电影界的同志也很努力啊！现在香港等地的观众都愿看什么呢？是打架片、搞武斗！（众笑）所谓武侠片。有的片子很差，我看了觉得很难受。香港的电影事业，搞成这样，也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责任主要不在香港电影界的朋友。我没有讲错吧？讲错了纠正。

要搞好电影，还有一个问题。电影是最现代化的综合艺术，文学、戏剧、美术，整个艺术领域不繁荣，要电影单独地繁荣是困难的。电影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整个文艺水平，以及文艺繁荣的程度。整个文艺不繁荣，它也很难繁荣，所以电影工作是

一个很吃力的工作。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事业，而且是重要的企业。苏联人讲他们国家收入第一位是伏特卡，第二位就是电影。电影是国家的重要的经济收入。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样大的收入。电影不仅是制作，还有其它方面如放映、发行。所以电影既是艺术事业，又是企业，又是最现代化的工业。因此，电影要搞好，必须要按照电影艺术的规律来办，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经营电影事业，放映事业。电影事业必须赚钱，只能赚钱。胡耀邦同志讲是否要专门开会讨论如何繁荣电影创作，我是很赞成的。剧本是电影的基础，先要有剧本嘛。

电影的繁荣不仅限于故事片方面。电影事业大得很，在列宁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故事片，主要是搞纪录片，就是新闻片。新闻纪录片我们不能轻视。有些同志一提到电影好像就是故事片，而不重视新闻纪录片。要知道，新闻纪录片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它不仅体现了我们党的国际国内政策，也体现了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周总理多次讲过新闻纪录片的重要，也指出过我们的新闻纪录片的某些缺点，一点是有些纪录电影不够真实，另一点是纪录片只纪录了一些领导人的活动，为什么不更多地纪录群众的活动呢？这两点意见我们过去纠正了一些，现在又要重提这个问题了。总理的这两点意见值得注意。不要只拍领导人的活动，要拍群众的活动，不要弄虚作假，纪录片怎么能够作假呢？可以拍得艺术一点，挑选好一点的。但不能做假呵。到一个群众家里去，把这个群众的家布置得很好，摆了花瓶、凳子，外国人一看，中国工人的生活可好哇，实际上是假的嘛。电影工作的规划不要把新闻纪录片这部分看轻了，这一部分可能没有故事片那么多人看，但还是很重要。

故事片的题材要广泛些。要多样化些。要“百花齐放”。只

要它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可以放嘛。毛主席讲“二百”方针，头一个就是讲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四人帮”那时候就根本破坏了。无所谓形式，无所谓风格。就是在十七年中，我们对不同形式风格也是重视不够的。艺术如果没有风格算什么艺术呢？艺术如果没有形式算什么艺术呢？我觉得还是要解放思想，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益，对人民有益，还是多一点片子好。多一点才能比较，才能提高。过去我也审查过作品嘛，特别是在文化部初期。有人把审查电影不通过叫做“枪毙”。人家辛辛苦苦搞一个电影剧本，你跑来说剧本不行，一下就“枪毙”了。我就“枪毙”过，可能“枪毙”了不应该枪毙的，还可以挽救的剧本。你来审查时，如果人家不感觉你是个朋友，来跟他一起研究讨论问题，而是等你来宣判“行”或“不行”，那你就和创作人员发生隔膜了。黄镇同志要听我谈经验，这也是一条经验啊！（众笑）人家搞出一个剧本来，即使是不行的剧本，花了多少心血，怀着多么大的希望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投过稿嘛！那时在上海写稿，天天盼着发表。第一期没有，第二期一看又没有，第三期又看，发表了，高兴啊。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又当了官，就忘记了青年人的心理。（众笑）我赞成艺术作品让群众自己组织评议。还赞成电影创作可以让导演、编剧按照他们的风格相近，生活基础相近而组合起来，让他们负责。电影厂的厂长最多是在政治上负责。过去在电影局的时候，先是宣传部审查，再是文化部审查，以后才是电影制片厂审查。而宣传部哪里审查得了哇，审查不了。领导包办，下面的积极性就不能发挥。结果是包而不办。

影片的题材，大体上要有个规划，但主要还是得依靠作者的生活经验。如果他没有这些经验，你硬让他写，他都没有怀胎，

你要他生小孩，他怎么生呢？（众笑）你要他生孩子，就先得让他结婚，先让他怀孕，就是让他多下去生活，多酝酿。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领导出思想 群众出生活 作者出笔。这话听来好像不错 领导是应该有点思想啊 领导可以出题目嘛 而且 生活总是从群众中来的嘛，作者就是要用笔嘛！在这个意义上讲，也不能说这个话不对。但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办，作家还有思想没有呢？作家可以不要思想，你领导上叫我做什么，我就照你的写。我不需要体验生活 听群众讲 我写。如果创作这么容易的话，那么请上个秘书就行了。可以不要作家了。这就违反创作规律了。创作不是这样产生的，创作只能从生活中来，首先是从现实生活中来，同时也从历史生活中来，所以还要研究历史。

现在要拍些历史片，我赞成。我觉得，历史片，特别是革命历史片，要花功夫。我特别在这里呼吁一下，应该培养扮演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的演员。演这样的题材应该花很大的功夫。要研究党的历史，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的各种关系。研究每个领袖人物的性格、特点。你表演一个普通人都要体验几个月，何况表现革命领袖呢！要研究他们的生平、研究他们的思想。现在一些演员演周总理都是模仿外形，把手这样放（弯手臂），大家也就鼓掌。因为大家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并不是我们塑造的形象多么感人，他们不是鼓演员表演技术的掌，而是鼓敬爱的周总理的掌。我们头脑要冷静，要分析。艺术是艰苦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不要以为不要艰苦劳动，不要创造性，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不是我又在这里提倡三名三高呢？艺术艰苦得很。凡是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无一不是花了很大的劳动。梅兰芳就是这样的。荀慧生夫人说，荀慧生每天都要记很长的日记，哪怕演戏演得很晚，必须把日记记好。他在日记里记

录了解放以后他同什么人谈过话，什么人讲什么，对他的戏有什么意见，他对别人演的戏有什么意见，都有记录。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老一代艺术家确实花心血啊。我们新的艺术家条件好，要学学他们。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四大名旦”？“四大名旦”的成名不是偶然的，不是容易的。当然，这种男演女是要绝种了，而且应该绝种了。这是一种落后的遗留。但他们的艺术实践和刻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会书画，我觉得每个演员都要重视艺术修养。

要把评论权交给群众，同那些真正搞艺术的人一道去审查、评议。我们在场的这些行政人员，帮他们负政治上的责任。从政治上看一看，有了错误我们负责，厂长负责。你这样做他胆子就大了。厂长负责，部长负责。文艺家和群众一起评议，这也不要很多时间嘛。我感到剧本的题材要多样，可写的东西还是很多。问题是要给艺术家创造这样一种气氛，一种他们犯了错误就帮他们承担责任的气氛。如果不这样，他们的胆子当然不会大。我们老干部都怕嘛，艺术家他能不怕？

人才是有的。我过去也讲过，演员还是要年轻的，不论男演员女演员，还是要好看一点。这是不是资产阶级观点呢？如果你用来扮演无产阶级的演员都不好看，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都不好看呢？主席也讲过嘛，老旦不能老在台上，看戏的人都爱看青衣嘛，哪个爱看你这个老旦呀！不能都是佘太君。还是要年青的青衣嘛。当然有许多人年纪大了，不能演青衣了，只能演老旦，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演员都要下功夫。青年演员要特别努力。总之，要创造一种学习的气氛，提倡勇于创新的精神。有了这种气氛，这种精神，艺术自然就会发展。人才总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善于爱护。中国是个大国，

有几千年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有毛泽东思想，有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怎么会没有人才呢？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爱护、发现、保护他们。要为国家爱护人才呀，人才不是那一个人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是党的，是国家的。是“稀有金属”呀，要承认人才是“稀有金属”。当然并不是要把“稀有金属”捧上天去，而是要帮助和教育他们。

创作要有一个广阔的自由天地，真正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做。还有一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究竟对国外的影片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态度，耀邦同志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国家现在是把大门打开了，和美国、日本都建交了。还有许多的国家同我们都建交了。过去林彪“四人帮”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呢？他们采取的是反动的排斥外国政策和夜郎自大的愚昧作风，不去说它了。就是十七年中，我们在艺术上同外国交流的工作也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常有这种情形，国外举办电影节，我们不是很主动、很积极，而是被动地应付。我们的国家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有着优秀的文化遗产，光荣的革命传统，拿到国际上去竞赛的影片却不多，也不敢去竞赛。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行？所以我觉得，应该首先把我们自己的电影搞上去，然后才有条件和外国交流。对于外国的片子，也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进口，要交换。如果放映的外国片子群众都爱看，这个片子又不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这对我们就有借鉴作用嘛。外国影片在技术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现在我们电影的表演技术也往往是老一套，又不吸引人，不打动人心，比不过外国的好影片。我们要和人家比，要向人家学，才能进步。当然，我们不学那些色淫的、凶杀的、斗殴的东西，不学那些东西。但是他有好

的东西呀，我们应该学习。要有计划地进口和放映外国片子，登文章，作介绍，该批评的批评。我们的片子也要到外国去放映。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今天还要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孤立的状态、落后的状态吗？‘四人帮’在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说‘四人帮’现在‘四人帮’倒台了 两年三年以后 还说是‘四人帮’造成的 就不太好讲了。所以，我们要认真抓好电影创作的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想简单讲一下。我觉得电影事业要有一个规划。我想文化部已经有了。我听人家说我们的电影设备很落后，但是据说有些省倒有最现代化的，正在建厂。我不知道这些最新设备是哪儿来的，我想国家要花很多的钱。设备和创作是两回事，有了制片基地，有了剧本，就可以照剧本摄制。电影厂不一定都要搞大而全，不一定都要搞厂长、副厂长和政治部主任。为什么不可以组织好的剧本，把好的演员集中起来，到最现代化的摄影基地去拍摄呢？对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来说，一个省搞一个制片厂也不算多，几千万人口嘛。但是，现在的国家，还比较穷，还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因此，要把现有的电影厂的潜力发挥出来，要适当地集中力量，把制片基地紧紧地掌握在文化部手里。一方面权力要适当下放，一方面权力又要适当集中。我们国家还搞不了那么多制片厂，把新的设备放在那里，没有好的导演、演员 又不能发挥作用 岂不是浪费。所以电影事业要很好地规划一下，包括地点设在什么地方。不能你有外汇你就去买你的设备，你就去招兵买马。建议文化部应该管起来。过去批判了建电影城的思想，因为电影城太集中了。但是相对的集中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的人员编制就这么一点本钱，所以只能慢慢地扩大。各地都要搞，就会分散精力，浪费国家的资财。这些问题我也是听群众的反映，我作为一个观众提出来，供

参考。我们电影事业要发展，现在太少了。现在群众看旧戏，你管不住他，因为我们没有新的东西来代替。电影放映也太少了，所以要赶快发展电影放映事业，使农村能看到更多的电影。当然，现在农村里首先是吃饱饭，但是吃饱饭他要看电影，吃不饱饭他也要看电影呢！这不是现在才有这个问题，就是在过去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和发展放映事业。

电影事业要发展，要努力提高电影艺术，提高思想，提高技巧，外国的好东西也要学。要知道，十七年也并不是一个先进的水平。现在的电影，水平理应比那时更高。如果还是那个水平，甚至还不如，那观众就有意见了，就有理由来批评了。现在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努力，同心同德，无论如何要把电影事业搞上去，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光，为我们社会主义艺术争光。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
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伟大的“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整整六十年了。“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醒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前导，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旧思想已经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但是要想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因为它是漫长世代的历史形成的，在社会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成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它的背后还必然有保守的社会势力给它撑腰。所以，思想解放的闸门没

有打开以前，旧传统往往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渗透在社会之中，成为压制人们精神的因袭的重担。要想触动它，推翻它，不但得费很大的力气，而且得冒旧势力垂死挣扎的大风险。正因为这样，古往今来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总是具备一种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历史上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是抱着这种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打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这样才划破了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破天荒第一次创建了唯一正确的宇宙观，破天荒第一次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天荒第一次用严整精确的科学分析揭明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不可避免，破天荒第一次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已经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实了。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我想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一回顾和展望，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请大家指正。

—

“五四”运动何以是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严格的自我封闭的社会，除了邻近几个国家以外，不与外国互通往来。那时即使是最勇敢的思想

家，如明末的李卓吾，他是那么样的离经叛道，居然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攻击宋明理学为假道学，公开以异端自居。但是，他的影响也还是非常有限的，并未能使封建宗法思想的统治为之稍有动摇。与李卓吾同时代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但是没有广泛引起中国人的重视。清代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西方先进事物投以不屑一顾的鄙夷眼光。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长驱直入，用重炮猛轰沿海的许多重要城市，中国的万里长城终于被打破，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下去了。

照理，此时中国人应当睁开眼睛，认出从西方到来的侵略者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改变政策，使本身强大起来，才能与之相对抗。但是中国皇帝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实在蠢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他们尽管连吃败仗，割地赔款，受尽屈辱，还是死守一条叫做“祖宗之制不可违”坚决拒绝任何改革。而且确实任何改革都会有人出来摆出一副卫道君子的面孔，指责“用夷变夏”。戊戌变法，就为了变那么一点点，来讲求富国强兵，杀了六个君子的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他本人理想甚高，似乎还不以资产阶级革命为满足。但是这次革命除了“建立共和政体”一条以外，没有提出什么资产阶级的或者高于资产阶级的纲领，喊得最响的口号反而是“种族革命”。凡有种族观念的人，连同大批立宪党和守旧党也都混了进来。共和政体在一片“咸与维新”的欢呼声中产生，实权还是掌握在立宪党和守旧党手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刚刚萌芽，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变，上层建筑也没有变，只是换了政府的名称，其他一切照旧。所以袁世凯做了总统不满足，要求通过他做“终身

总统”做了“终身总统”还不满足，又要求“选举”他做皇帝，还立了太子，准备世代代传下去。诸如此类封建时代的丑剧一一上演，终于有些人看不下去了。

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年头，一次空前未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上以一种大概并不引人注目的形式开始了。当时，写文章还是习惯于用文言，虽然未必如何古奥，但是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是可以断言的。从内容来说，也只能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这个杂志出了一年，改名《新青年》，并号召青年要有新的觉悟，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来。一九一七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提倡文学革命，主张废除早已僵化的体裁、言之无物的文风和摹仿古人、不合文法的陈词滥调，改文言为白话，创造言文合一的新文学。这个倡议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反应，特别是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作品以后，其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也使旧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新青年》办了几年以后，新旧思想的冲突进入了高潮。当时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自己，并有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就是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为自己的信仰后来勇敢地走上了绞架。这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因反对屈辱的巴黎和约而爆发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思想基础。没有民主思想的觉悟，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向来是在发展过程中影响无产阶级

也觉醒起来，争取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规律。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 这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很快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造成一种声势，使工人和农民中的群众性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但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好形势下，党未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来巩固自己的胜利。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面对反动派的攻击，不是积极加强革命力量，反而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了失败。这时，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决然地反对了这种错误路线，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在革命遭受失败之后，重新积聚力量，使革命继续深入发展。这次失败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个幼年的党，还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历史表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同样，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达到解放中国的目的，也仍然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程，需要开展一次比“五四”运动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一九

四二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它是西方国家传来的一种主义。因而，自从它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后，就不断出现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国情特殊论”当然不是出自对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它不过是反动派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方便的借口罢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确实有一个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会行不通，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痛切地感到，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取得完全的、统一的了解。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三十年代先后进行的几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在这几次论战中，一些托派分子和国民党御用文人，一面抹煞中国现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把中国社会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面又夸大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否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说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反对和阻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的结合。当时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这些荒谬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论战没有能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结论，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

机的严重，革命的深入发展，就把这种争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十年内战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随着全国人民爱国热潮的高涨，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然而三十年代头几年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党的某些领导人，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脱离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就是王明。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具有革命创造精神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他们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生吞活剥地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奉为神圣；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总结实际经验并从中引出结论以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在他们看来，凡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说的，凡是苏联做的就是金科玉律，必须照办，丝毫不能更动，稍有违反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扣上种种大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马克思主义就走向反面，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八股、新教条。它同封建老八股，老教条一样，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一种精神枷锁，压制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这种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同时又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

“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那时候许多人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式，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就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老八股、老教条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肃清，一些新思想、新理论却又在一些人的手里变成了洋八股、洋教条。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过精辟

的分析 他说：“‘五四’运动的发展 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反对党八股》）这里所说的‘右’的形式主义 就是胡适、傅斯年他们所鼓吹的‘全盘西化’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 而所谓‘左’的形式主义，就是指我们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只是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前进中的缺点，那末党内的这种形式主义则已经发展到如此荒谬的地步，以致它本身就成为一种蒙昧主义，成为启发革命精神和发展革命斗争的严重障碍，不把它彻底除去，革命就要失败。因此，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左”倾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同志就在实际工作中，接着又在理论上对这种“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斗争，而且在一九三〇年明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不认真向社会作调查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 对革命极为有害。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

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警告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反对本本主义》）可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是以极端“革命”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面目出现，很能俘虏一些缺乏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以致“左”倾教条主义愈演愈烈，终于使白区的党组织搞掉了几乎百分之百，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在这个惨痛的事实面前，全党终于醒悟过来，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正确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党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这个运动从解决对党内路线问题的认识开始，最后发展成为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错误思想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宗旨，仍然是解放思想，但不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教条下，而是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关于马列的教条、第三国际的教条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整顿党的作风》）为了作好这种启蒙，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蒙蔽下解放出来，自觉地抵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号召全党同志对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以鉴别其好坏；对任

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反对奴隶主义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教条主义者所害怕的是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而所需要的正是盲从和迷信，也就是奴性的心理。就这一点说，它同封建专制主义是一脉相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不把主观主义和党八股彻底肃清，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不能加以摧毁廓清。可见，反对党内新八股、新教条的斗争，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彻底完成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前提。

发展和领导这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具有理论上的极大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然的话，延安整风便根本无从谈起，无法进行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善于区别它的精神实质和它的个别结论，绝对不能把迷信当成忠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亘古不变的宗教信条。马克思、列宁的威信那么高，但是我们在革命的实践中发现了他们的书上个别的话、个别的结论不适合中国今天的情况，那就不能照着办。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威信当然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出的主意不一定每一条都对；不对的、不适合我们情况的，也就不能照他们的主意办。当时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来进行整风，来反对教条主义，不难想象，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延安整风运动提倡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就是主张

我们要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受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字句的束缚，大胆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分析和解决新问题，既要有勇气实事求是地在行动中改动或者放弃本本上的个别字句和条文，又要有勇气以首创的精神去做本本上没有记载、前人没有干过的革命新事业，并且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正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产物，尤其是破除“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造成的蒙昧主义的伟大产物。

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思想上扫荡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得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得到空前的传播。这次整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用学习的方法，通过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服从真理，修正错误，使得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又纠正了“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的缺点，把“五四”的革命精神大大地推向前进了。

整风运动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在党内大批干部中养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从此，一切从实践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自觉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反对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和下车伊始，哇哩哇啦，就形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如果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样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 特别是在整风之后 才得到完全解决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整风运动取得了辉煌胜利，我们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这就为整风运动后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没有延安整风运动，没有那样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也就没有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三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动。延安整风运动冲刷了“左”倾教条主义多年来散布的蒙昧主义的流毒，使我们党建立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反对思想僵化的精神。我们党把有没有这种精神，提高到党性纯不纯的高度，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回想起从延安整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取得全国解放，到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整个过程，也不过就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我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得是那样快，我们不断遇到又不断解决了的新问题是那样多。很明显，假如我们没有延安整风运动所奠立的“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假如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不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急速变化，假如我们的思想不是解放的而是僵化的，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本本出发，那么我们恐怕早就寸步难行，早就在革命的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曾经非常注意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深刻地阐述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又利用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僵化，以及一些青年人的幼稚，采用极左的口号，极力制造现代迷信。他们假“高举”以营私，通过宣传“顶峰论”、“天才论”制造偶像崇拜、宗教仪式，提倡封建伦理、愚民政策，完全否定了延安整风精神，使得“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现代迷信风靡一时，流毒全国。这种现代迷信成为林彪“四人帮”借以进行篡党夺权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一方面，用来伪装自己，欺世盗名，给人们以只有他

们才是“最忠、最忠、最忠”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是打人的大棒，用它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暴虐摧残，实行“全面专政”。

由于林彪“四人帮”搞这套现代迷信路线是“左”的口号是“左”的，所以初期曾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真相便相继暴露出来。林彪集团被粉碎之后，“四人帮”的秽行劣迹也无法再行掩饰。这时候，林彪、“四人帮”多年推行的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充分暴露，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走上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伟大祖国，竟然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破坏了国民经济，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得以立足的物质前提。这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重新强调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就是为了扭转这种严重的危局，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牢靠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个“四个现代化”的纲领一提出党和“四人帮”的矛盾便愈形激化了。因为“四人帮”的利益，是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能相容的。他们的暴虐统治，只能是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落后、愚昧、奴化成性的政治环境中才能够维持得下去。因此，“四人帮”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成了对他们的最大威胁，他们抱着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拚命地反对“现代化”。他们把法家的封建专制主义、顽固派的闭关锁国主义、程朱理学所谓反对功利的假道学，以及消灭文化和教育的愚民政策等等这一套陈腐的货色，统统搬出来，向“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大举反扑。实行“四个现代化”还是反对实行“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和“四人帮”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这场斗争，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

成败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斗争，不能不引起一切有革命觉悟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密切关注。这场斗争，在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决战是不可避免了。“四人帮”力图通过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继续凭仗现代迷信的大棒，来打倒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坚决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老一辈革命家，压制和扼杀革命舆论，扑灭即将烧毁“四人帮”这群败类的革命烈火。但是，为“四人帮”意料所不及，在党的长期教育下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从斗争实践中认清了是非。现代迷信的紧箍咒，不起作用了。丙辰清明前后，人民群众在悼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同时，愤怒揭起了声讨“四人帮”的战旗。天安门事件这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预示着我国革命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即将到来。这次革命事件，虽然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但是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党中央领导我们，通过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斗争，通过多次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特别是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党中央为目前这场正在进行着的思想解放运动，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实行着正确的领导。两年多来，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令和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制造的思想流毒，促使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的同志，端正立场，跟上形势，摆脱一切落后于时代的陈腐思想，如官僚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

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党中央把思想解放的意义，提到这样高度，就是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革命者的认识必须跟着这种转变而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制度奠立巩固的物质前提。这是一场规模巨大、变化深刻、任务繁重的大革命。我们面临着许许多多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老、大、难”也面临着许许多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课题，因此必须愈加坚定不移地提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对于怯懦畏难、愚昧盲从、因循守旧之类的坏习气，特别是对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现代迷信的流毒，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要看到，扫除了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或新奴隶主义的流毒之后，许多所谓“老、大、难”，许多新课题，都是可以解决，而且不难解决的。因为，我们已经积聚了许多经验，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经验。看到过“左”的错误，也看见过右的错误。只要对这些经验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加以总结，我们就能正确地和比较正确地解决许多问题。

为了健康地进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从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甚至于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束缚着头脑，看不惯或

者反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这种错误倾向，像当年的“左”倾教条主义那样，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僵死教条，反对解放思想，反对破除迷信，甚至把我们党根据新情况做出的创造性的新方针和新政策，看成是大逆不道，看成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这种“左”的错误倾向是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它是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障碍，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阻力。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的资产阶级的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制和革命的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当了俘虏还自以为是“解放”，岂不可怜！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往往又和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它是极端有害的，有很大的破坏性。

必须明确认识：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背离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党如此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为了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和丝毫动摇的。

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坚决驳斥那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谬论，向全国

人民讲清楚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正在建设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能说都已经搞得清清楚楚了。一个时候，不是有不少人把“四人帮”鼓吹的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当成了真社会主义吗？不是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成了资本主义的货色，主张加以讨伐吗？应该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还是新生事物。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算起，社会主义的历史到如今还不过六十多年，这在历史发展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何况在这期间，社会主义还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而解决这些新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就拟制好什么现成答案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进行研究、探索和实践的领域。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必须克服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心理。要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善于发现和接受新事物，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比较研究，找出一条最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如果不解放思想，要想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办不到的。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相应地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经济事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就必然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不仅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思想的变革，从来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导。

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地研究新问题，就必须

彻底改变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现成公式来胡乱套用的错误作法，必须彻底改变凡是本本载了的一律不准更动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一再警告，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马克思本人甚至为此而声明自己不是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林彪、“四人帮”完全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好传统，他们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任意篡改、伪造，把它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甚至符咒化。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糟蹋，简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党风，破坏了我们的学风，破坏了我们的文风，破坏了我们的民族的社会风尚。对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那种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极左思潮，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我们决不可以低估。为了肃清其流毒，应当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场思想教育运动，应当按照党的优良传统来办。第一，要允许自由讨论。政策宣传和科学研究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工作。政策宣传应当遵守党和政府决定的政策界限，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则必须保证有研究的自由。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我们应当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第二，要尊重实践的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实践检验出不符合新条件的、或者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就应当予以改正；实践中提出了原来所没有的新发现，就应当予以补充。如果能够自觉地切实地做到以上两条，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树，也就可望常青了。

解放思想的方针，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临时性的方针。用毛泽东同志通俗的说法，这就是“放”的方针。运用到文学艺术和科学上便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党从来主张采取“放”的方针，反对采取“收”的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仍有指导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着由现代化而产生的许多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不断加以解决。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我们伟大的新的万里长征。

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问题还很多。林彪“四人帮”

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包括内伤和外伤，还没有完全治好。彻底扫除他们遗留下来的种种垃圾，还需要时间。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是世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产生和发展。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德国在欧洲国家中经济是落后的，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在思想文化上产生了歌德和黑格尔，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改变人类历史面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学说。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国在经济上也是落后的，人民受沙皇专制主义统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正是这个国家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遗产和革命传统的国家，本世纪又产生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光耀千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上也产生了鲁迅和郭沫若这样伟大的作家和卓越的学者。对我国建国三十年以来还处在这样落后的状态，我们深深感到惭愧。中国对于人类应当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和艺术上急起直追，刻苦努力，有所建树，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我们不能辜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望。

载1979年5月7日《人民日报》

《冼星海传》序

冼星海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马可同志也是优秀的人民音乐家，是新秧歌、新歌剧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们的作曲曾激励千百万人民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生产劳动而英勇奋战；它们是抗敌的号声，是生产的合唱，是英雄主义的颂歌，不但响彻于一时，并将流传于永久。马可曾师事星海，交谊甚笃，他生前以饱含热情的文学笔法带病写成了《冼星海传》。这是一本动人的音乐家传记，值得大家一读。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

学 习 鲁 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

我国学术界有许多同志对鲁迅研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筹备成立鲁迅研究学会，以加强鲁迅研究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促进研究成果和经验的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正式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以加强研究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同志们要我讲几句话，现在我说几点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 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

这个问题很重要，至少以我来说，对鲁迅就没有学习好，认识很不够。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当时对于鲁迅也没有很好的认识。那时我们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还处于幼年时期，我们许多人都还年轻，有革命热情而缺少社会历史知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真正弄懂，对于鲁迅的伟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充分认识鲁迅作为文化新军旗手的伟大作用，高度地评价他，认真地向他学习。

本文是作者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往往需要时间。他的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的发展而越来越显露，越来越看得清楚。鲁迅的伟大，不仅被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卓越功勋的光辉业绩所证明，而且被他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长远的、深刻的思想影响所证明。我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鲁迅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达到了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高峰，为我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宝贵的思想和艺术财富。他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解剖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无愧是文化新军的主将。鲁迅的方向也当之无愧地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人民能孕育一个如此杰出的民族英雄，是值得自豪的。他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尊重他，很好地向他学习。而在这方面，我们当时却做得不好，确有不妥当之处。鲁迅并不是到今天才被人们认识，也不是毛泽东同志所首先发现。在他的《呐喊》、《彷徨》、《野草》、《热风》等作品出世的时候 他已经被广大的青年所景仰，更不必说在他明确地加入左翼文化运动以后了。为什么我们少数同志会落在广大群众之后呢？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论争之后，由于党中央的指引，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他进步作家自愿结合在一个革命文学阵营之内，在一九三〇年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党内错误路线 特别是‘左’倾路线的影响 左翼作家们尽管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革命文化“围剿”上斗争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但在重大革命转折关头，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由于认识水平不同，在某些问题方面，就难免不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论

争，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如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一九三六年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在于左翼文学运动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或多或少地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往往不能冷静地正确地对待问题，致使争论复杂化。例如“两个口号”论争，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愿接受鲁迅的这个照顾大局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认为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要正确地认识鲁迅，就必须科学地评价鲁迅。鲁迅是伟大的，但如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样，鲁迅当然也有他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我这样说，并非要贬低鲁迅，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即他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从量到质的变化。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质的变化。例如，他对于革命文学论战的态度，开始时对于提倡革命文学的积极的首创的意义估计不足。到了一九三〇年，他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问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写了一批很有力量的文章。鲁迅不讳言自己的缺陷，在《三闲集序言》中他就说过把这次文学论争中他所写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文章，都搜集在这一本书里。他还说过创造社“挤”他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认为创造社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很有一批能干的人。可见鲁迅对于这次革命文学论争和对于自己的看法也是一分为二

的。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就他本人来说，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却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们学习鲁迅，正是为了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表示现在我对于鲁迅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当然还需要继续学习。鲁迅所遗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伟大高峰，包含了极为广博的学识、哲理和智慧。他的独特的深刻而热烈的文风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

这里我想提一下冯雪峰同志，在我们的党内，他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一九二八年他就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建国以后他曾经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编定和注释《鲁迅全集》。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更不能忘记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对鲁迅杂文的正确评价。

建国十七年我们研究鲁迅的工作做得还是太少。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又把鲁迅糟蹋了。现在清除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这项工作。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肃清“四人帮”在对待鲁迅问题上所散布的各种谬论的流毒，就成了当前一个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四人帮”对待鲁迅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大体相同。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宣传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但是有时他们也把鲁迅抬出来，把鲁迅神化，其目的就是要借此去打击一切反对他们，或不赞成他们的人，打击一切真正革命的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歪曲宣传鲁迅的一种新的形式，一种很阴险的形式。

二 向鲁迅学习些什么？

我想，首先应该学习他的勇于改革的精神。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的，为什么鲁迅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呢？因为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那些不革命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鲁迅，更谈不上学习鲁迅。我刚讲过，我们在处理同鲁迅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差错，但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这一些人当时虽有不少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对革命是忠诚的、坚决的。在这一个基本点上，我们和鲁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鲁迅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曾有过批评和指摘，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同志的关系却是基本的 这是历史事实 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鲁迅的战斗精神主要表现在勇于改革，勇于破旧立新，他坚信旧事物必然灭亡，新事物必然诞生，旧事物总是要被新事物所代替。假若说他的这个信念以前只是基于进化论的思想，后来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之后，这个信念就有了更牢固的科学根据了。他反对一切阻碍民族和人民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和旧习惯，不管它们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他都要一概推倒。鲁迅生活和战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于旧中国的一切，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 他不仅比我们许多人懂得多 而且看得深 看得远 他从旧营垒中来 站在坚决的、不妥协的革命者的立场上 反戈一击 能给旧事物以致命的打击。鲁迅知道旧势力根柢非常坚固，传统的惰性力很雄厚，改革是很难的。他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

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这一点他比别的许多改革家、革命家看得更清楚，因此比别人做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战斗也更顽强、坚定。他主张“壕堑战”主张韧性的战斗。鲁迅历来反对空头的改革，形式主义的改革，他要求改革要切实，要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他认为，改革者如果不深知民众的心，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对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候。鲁迅是处处着眼于人民的利益的。为了改造旧中国，鲁迅不断寻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道路。他先是用“生物学的真理”来观察世界，以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最初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改革，后来才重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相信只有无产者才有前途，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伟业。他寄希望于将来，他很清醒地看到，较大的改革，是要靠人民掌握政权之后，借助“政治之力”才能实现。我们的国家经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浩劫，经济上和文化上至今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现在，党中央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经济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贯彻了力求改革的精神。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漏洞，我们社会中还有不少阴暗面。要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断完善，我们党的领导不断改进，没有锐意改革的精神是不成的。首先，共产党人和一切先进分子都要做勇于改革又善于改革的模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这些人到世界上干什么，就是要使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使世界革命化。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改革，不

需要前进了，那么我们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改革就是破除违背人民利益的旧事物，给代表人民利益的新事物开辟道路。这种精神在鲁迅身上表现得最鲜明、最突出，也是最可宝贵的，在今天还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其次一点，是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学的人，许多人都提倡过写实主义，包括陈独秀和胡适。但是，真正清醒的是鲁迅。他不是空喊现实主义，而是真正睁开眼睛大胆地看取人生，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各种矛盾。他的态度是积极的、革命的，他把旧社会的病痛暴露出来，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给社会起震惊作用，推动社会的变革。鲁迅反对当空头的文学家，这种空头文学家或者没有战斗的实绩，或者是作品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关系，不关痛痒，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他特别反对瞒和骗，认为中国文艺的出路在于从瞒和骗的沼泽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反对在文学作品中说假话，反对编造不真实的人物和故事，硬造突变英雄，而把真实提到艺术生命的高度。鲁迅在自己的具有巨大艺术力量的创作实践中，贯彻了现实主义精神，他的作品表现了一个伟大文学家的诚实，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和面貌。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大师鲁迅，他的著作是我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它给我们提供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其他富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这种注意观察，反对瞒和骗的精神，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林彪“四人帮”不是就搞瞒和骗吗？他们讲假话骗人，他们在文学艺术上鼓吹一套唯心的、反现实主义的东 西，用阴谋、撒谎、捏造、诽谤来代替艺术，他们把瞒和骗发展到

极端，从而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学艺术造成了极端的危害。我们要通过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净化这种恶浊的空气。

当然，我们在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时候，应当注意到鲁迅时代的现实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是性质不同的。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时代，是反动的旧势力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那个时候，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揭露现实的黑暗，引起人们对旧制度的反抗和斗争，这才能达到真实。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却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掌握政权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虽然现实中还有阴暗面，但光明面是主要的。不承认、不反映这一面，甚至否定这一面，那是完全不对的，是违反现实的。我们赞成真实地揭露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也正是表明我们有信心克服缺点和错误；但我们也反对片面夸大阴暗面，追求个别现象的所谓真实。鲁迅也反对把个别事实当成真实性。鲁迅不赞成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是对现实的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

第三，还要学习鲁迅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有人批评鲁迅什么都怀疑，其实他的怀疑并不是怀疑一切，而是当他对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采取怀疑的态度，问一个究竟。这正是由于鲁迅看透了旧世界与旧事物根深蒂固，往往变换花样，冒称新事物而出现，因此他决不轻易地相信什么新事物，他总是大胆地怀疑，冷静地观察、思考，直到他真正认识清楚为止。例如对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最初不了解实际情况，就采取过怀疑的态度。以后，他搞清楚了，就不怀疑了。鲁迅的怀疑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探求真理的精神。他对于一切事物，都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但是，

当他一旦寻找到真理，认识到真理以后，他就坚决地为保卫真理而斗争。鲁迅的一生，也可以说就是不断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为保卫真理而斗争的一生。这种为真理而敢于怀疑的精神，是科学前进的一种推动力。在鲁迅身上，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精神。他在青年时代鼓吹科学的时候，就赞赏过屈原在《天问》中对神话传说敢于提出质疑的精神，又热情地赞扬过大胆鼓励怀疑精神的西方大哲学家笛卡尔等人。人类科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大科学家，不是富有怀疑精神的，像哥白尼、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一些敢于怀疑和推翻被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定论的战士。鲁迅也是这样一个富有胆识的大思想家，他在“五四”时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从来如此 便对吗 对从来如此的几千年传统观念，提出怀疑，这种怀疑使他获得了一个重要发现，这就是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道破封建社会这个残酷的秘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对于一些正确的东西，鲁迅也是经过思考之后才接受的，比如苏联革命时，他没有搞清楚，他就怀疑苏联到底怎么样，一旦搞清楚了，他便倾注他的热爱，为维护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他对自己所崇敬的人 也不是盲目迷信 比如高尔基 这是鲁迅最崇敬的人 鲁迅说他的伟大无人可比，评价是极高的，但他也怀疑高尔基有过错失。他在分析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珂德》主人公的模特儿时说，这位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可能就是许多非难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合成的，其中可能也有高尔基的影子。鲁迅这种“疑心”是有根据的 并不损害高尔基的伟大 中肯地指出高尔基的弱点，并不减少高尔基的光辉。鲁迅对高尔基的崇敬，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科学。鲁迅的怀疑精神，归根到底是一种科学态度。

鲁迅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 而并不下断语 这才是缺点。”怀疑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是要认识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就要光明磊落地修正，这是通向真理、发展真理的正常的道路。没有半点怀疑精神，人云亦云，习惯于重复本本上的东西，满足于已有的结论，我们的科学和革命事业就不能前进。早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和我谈到鲁迅，他突然问我鲁迅的作风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怎样回答，他就说鲁迅的作风是谦虚和断制相结合，这就是说，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就说不知道，虚心请教别人 决不自作聪明 不懂装懂 对自己所确信无疑的事物 就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丝毫不含糊，丝毫不谦让。不讲客气，不讲中庸之道，揭发别人，解剖自己，都不留情。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鲁迅的作风，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大力提倡的作风。

三 怎样学习鲁迅？

一句话，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鲁迅，学习鲁迅锐意改革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身体力行，自强不息，而不是把鲁迅看成偶像，在他面前顶礼膜拜。鲁迅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发展过程；鲁迅自己也不承认他是天生的圣人。凡是把鲁迅说成天生的圣人的人都是堕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研究鲁迅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科学性，要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比如鲁迅思想的发展是否经历了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这个过程是怎样从开始到完成的，这些都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可以百家争鸣。鲁迅从革命民主

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否定这个转变过程，这不是尊重鲁迅。鲁迅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他能够随时代而不断前进，扬弃旧我，诞生新我。他从不固步自封。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总是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包括自我斗争的过程。鲁迅开始是启蒙主义者，后来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启蒙主义者往往把思想启蒙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良方。他们强调改造国民性。鲁迅弃医就文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改造国民性，改造人民的精神状态看做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唯一出路。后来他才认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是不行的。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有一句有名的话，就是对人民“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他很怜悯被压迫者的不幸 但又向他们提出问题，为什么不斗争呢？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怜悯他们。阿Q、闰土都值得他同情。同时却又生气他们不奋起斗争。他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在思想领域中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过，鲁迅看到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的积极的革命的方面，这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农民的实际斗争的缘故。当然，鲁迅对于中国农民正如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察一样也是很深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也是要革命的，虽然他有那么多缺点。鲁迅说过“……阿Q可要做革命党……我的意思 中国倘不革命 阿Q便不做 既然革命 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 也只能如此 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在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为了劝说代表们选举犯过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仍然当中央委员，曾充满激情地说：阿Q的缺点还不多吗？三风不正，比谁都多，但你们不要忘记了，他还是为革命而死的。是谁杀死他的，是反革命杀

死他的，我们不能只是嫌弃他。我当场听了这段话，曾深为感切。

我们研究鲁迅，他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反映，在鲁迅的主观上也具有深刻的内在的思想根源。我们要严格地按照历史的真实来探讨和研究这个过程，找出鲁迅的伟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并从而更好地向鲁迅学习。

最后，希望正在筹备成立的鲁迅研究学会，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全国各地鲁迅研究工作者，组织和推动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活动，争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使鲁迅研究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一个新的境界。

《侯宝林相声选集》序

侯宝林同志是我国人民所熟悉、所喜爱，素负盛名的相声艺术家，他从事相声艺术达半个世纪了。现在他的《相声选集》即将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我便答应了。

相声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相声艺术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表演者和其他许多曲艺演员一样 往往卖艺街头 四处流浪 看尽世态炎凉 人情冷热。但也正因此，他们和社会底层的人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理和语言。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一些市井流俗的习气。新中国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和新生，他们作为人民的艺术家而受到了人民的尊重。

相声的特点和长处是逗人发笑。笑是人情喜怒哀乐之常，即令是极度伤心的时候，有时也会笑，也需要笑，所谓长歌当哭，不就是化悲为笑吗？但是我们人民的相声不是为笑而笑，是有褒贬地笑，有爱憎地笑。对敌对的事物，它应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直刺它的胸膛。对人民的缺点 则应满腔热忱 苦口婆心 与人为善，使人们笑过之后又浑身出汗，如同服了一付猛药一样。

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相声艺术大有用武之地。我们要前进，就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林彪“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和思想流毒 各种投机分子、风派人物、各式各样的昏聩的官僚主义者和自恃特权，违法乱纪的

不法分子，阿谀逢迎、拍马吹牛者的丑恶嘴脸，因循守旧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狭隘眼光，以及其他各种愚昧落后的现象和 不正之风，都是我们的相声所应该瞄准的目标，要按敌我矛盾和 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和轻重程度，又狠又准又稳地瞄准，既 不要宽恕敌人，也不要误伤自己人。

我们反对单纯追求笑的效果，因为那样会流于庸俗，低级无 聊，只会败坏观众的欣赏趣味。我们所需要的，所要提倡的是健 康的笑 高尚的笑 引人深思、使人振奋的笑。

反动阶级惧怕人民，钳制人民，不许人民笑，使人民变得麻 木。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因此在他们横行时期 相声就没 有容身之地“相声”变成“无声”了。“四人帮”被摧毁以后 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保障 他们又敢想、敢说、敢怒、敢 笑了；敢引吭高歌，也敢嘻笑怒骂了。我们不但用笑的武器打击 敌人，也要用笑的武器批评自己。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 物主义者，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靠真 理吃饭 靠科学吃饭。实事求是 不哗众取宠 不讳疾忌医 不怕 揭露生活中的缺点和过失，也有勇气和力量纠正它们。革命者 从来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缺点的过程中前进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相声艺术也 要不断改革和创新。既要保持它的传统的民族特色，又要有所 革新，不断地以社会主义新的沸腾生活来丰富自己，探求和创造 更新更美的形式，使相声艺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葆青春。任 何文学，都是语言艺术。相声尤其要靠语言的魔力。一个好的 优美的相声，它的每一句话都要语出惊人，出奇制胜，给人以意 想不到的惊奇效果和美感享受，它能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又能 移风易俗，端正社会的风气。

侯宝林同志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相声艺术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滑稽而不粗俗 诙谐而不油滑 动作洒脱利落 语言生动俏皮 富于幽默和风趣。趁他的《相声选集》出版之际 我祝贺侯宝林同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攀登相声艺术的新高峰。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

最近，《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讨论。许多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讨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们要我也讲点意见，我就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无产阶级文艺，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最早论述这种关系的经典文献，就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写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不久，这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俄国无产阶级不但要继续挣脱沙皇文化专制主义的锁链，而且还要和资产阶级的五花八门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顽强的斗争。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认为文学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一方面指出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又指出，在文学事业中最不能搞“公式主义”、“搞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的这段名言被人们不断地反复引用，有时不免被片面地理解。文艺是“螺丝钉”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正如列宁自己所解释的，“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把文艺这种“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比喻无疑地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革命

文艺无论如何重要，也只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那些把文艺看得高于一切的“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有害的。当然，这个部分却非同寻常，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面对的却是无限的“广阔天地”，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当真把它看成仅仅是一般的“螺丝钉”以为无足轻重那就贻害非浅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及如何服务的问题，也解决了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摆正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既要反对忽视政治，又要反对忽视艺术，这就是文艺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成败兴衰的大事。

要正确地处理党和文艺的关系，就需要在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文艺家之间，党政领导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是怎样对待作家、艺术家的，就可知这种关系是如何重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怀工人诗人维尔特的成长，恩格斯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对他的诗篇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伟大诗人海涅，有非常深厚的友谊。恩格斯称海涅为“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海涅不是无产阶级作家，但他写了歌颂工人阶级的著名诗篇《西里西亚职工之歌》，受到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同样，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也是很深厚的。高尔基的《母亲》是第一部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当普列汉诺夫贬低它的价值的时候，列宁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维护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但列宁也尖锐而诚恳地批评过高尔基鼓吹造神派的错误；在十月革命初期的艰难岁月，列宁又批评了高尔基思想上的摇摆。不论这些

批评如何严厉，但始终是热情诚恳的、同志式的。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他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同志在同我谈话和给我的信中都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消极面，忽略其英勇斗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参加过农民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同志这样说并不有损于鲁迅的伟大。毛泽东同志和鲁迅生前未曾见过面，但早已神交，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时期，对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历史话剧予以高度赞扬。开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同志不但时以诗词互相唱和，而尤其重要的是从思想上不断地帮助他。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期间发表过评论鲁迅和郭沫若的讲演，他在思想政治上和文艺创作上对郭沫若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诚恳的帮助。周恩来同志对其他作家、艺术家也是采取这种态度 这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式的、同志式的、互相交心、互相商讨的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的长官态度。周恩来同志对待作家、艺术家的态度，是我们一切文艺工作领导人员应该学习的榜样。

党领导文艺主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影响和正确的文艺政策。这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了解文学、艺术的规律和作家、艺术家的特点，为他们提供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较好条件，保证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的自由。在思想政治上，文艺工作领导人要帮助他们，同时也要向他们学习，要和他们建立互相交心的朋友关系，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创作个性和风格，用不同的钥匙来打开每个作家、艺术家的心扉，了解和体贴他们创作的甘苦。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作家的头脑中进行的，这个头脑就好比一个工厂，它什么时候冒烟，什么时候火旺，什么时候火熄，此中甘

苦，只有他本人能够体味。我们要帮助作家、艺术家体验人民群众的沸腾生活，在他们心中点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花，使他们头脑里的机器永远转动，炉中的火焰永不熄灭。领导艺术生产是一种非常细致的工作，最忌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要保证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站在一起，领导者首先要和作家、艺术家站在一起，才能体现党的领导。领导物质生产，要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才能发挥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领导艺术生产 对艺术劳动者 就更应如此。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证明：领导经济工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失败。领导文艺工作，也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否则，也会失败。聪明的领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从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领导是外行，要努力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不能满足于长期当外行，要向懂业务的人学，使自己逐步变为内行。

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其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反而影响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在思想政治运动中，我们曾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本来是好的或基本倾向是好的、不应该批判的作品，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而

应该受到保护的同志。这我们首先是我是有责任的，应引为教训。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一方面把我们曾经犯过的某些错误，当作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一方面又加以利用，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左”的错误倾向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用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阴谋文艺”代替革命文艺，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把它教条化，当做打人的棍子和骗人的符咒，在党和文艺的关系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完全破坏了党对文艺的正确领导。现在我们要恢复党领导文艺的优良传统，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现代迷信，批判文艺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当前文艺领导工作中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

文艺就其本性说来，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能不受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不以明显的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人民思想和愿望。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有反映封建主义意识的文艺，也有带着人民性、民主性的文艺，还有反映民间疾苦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在封建阶级内部，也有反映封建社会上升和没落不同时期的文艺。在封建阶级内部，也有反映封建社会上升和没落不同时期的文艺。在封建阶级文人内部，也还有因遭贬斥、心怀不满而发愤著作的作家，他们在人民中获得广泛的同情和赞赏。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文艺就越来越变成人民自己的文艺了。任何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都必须首先是艺术，足以使人为之欢乐、为之悲哀、为之奋发、为之同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重视文艺的这种艺术效果，完全自觉地

把它用作宣传教育的工具。党领导文艺，必须首先把它看作艺术，要求它在艺术上有高度的造诣。如果不成其为艺术，不足以动人情感，谁都不爱看，就无从发挥教育的作用，也不成其为宣传工具了。“四人帮”所窃取的八个所谓“样板戏”本来是还好的，但是几经他们修改，越改越概念化，远离生活的真实，而且强迫人们三番四复地看，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单调和反感了。“四人帮”企图驱使文艺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结果是惨败了。

我们过去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上，曾有过简单化的庸俗化的理解，致使文艺作品有时流于概念化、公式化，妨碍了真正艺术作品的产生。革命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政治任务。现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致力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文艺当然不能置身于这种政治之外，文艺要积极地 and 它相配合。但配合和服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题材、体裁和风格都应该是多样化的。要描写当代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现实题材，也可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古代历史题材，以及其它各种不同的题材。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文艺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因为现代化首先意味着速度，发展快，进步快，变化多，目不暇给。人们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对文艺的要求当然是多样化的。如果规定文艺只能写这个或写那个，只能这样写或那样写，那就会同人们的需要背道而驰。因此，把文艺从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冲破各种人为的禁区，应该是我们当前文艺领导工作中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上海前一时期讨论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问题。文艺是否始终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也有略加阐述的必

要。首先要看到，文艺和阶级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阶级斗争仅仅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分裂为阶级以前，就有了艺术，这就是原始艺术，那时连阶级还没有出世，怎么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呢？根据那时生产发展的水平，原始艺术只能充当渔猎和畜牧以及部落纷争的工具。人类发展到有文字历史以后，文艺就开始打上阶级的烙印了。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和阶级斗争就联系起来。随着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的程度，文艺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文艺往往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将来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也将消失，但文艺并不会因此而消灭或消失。即使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文艺也有各种的功能和作用，不限于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它首先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要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从精神上满足人民的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它要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人民群众并不是整天在那里搞阶级斗争，除了阶级斗争还有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文艺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应当是多方面的。人民需要战斗，也需要文化娱乐 需要艺术欣赏。很多山水画、花鸟画、抒情诗、抒情歌曲和舞蹈，难道都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并不是说只写工农兵，只写给工农兵看。任何阶级的文艺除了表现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之外，还要用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去感染和同化其他阶级，使他们能接受它的思想影响，否则，它就不能作为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发挥它的作用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如果只给工农兵看，不去用文

艺教育、影响、改造其他阶级的人们，对工农兵又有什么好处呢？中国古代讲礼、乐、刑、政。礼和乐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刑和政则是指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上层建筑。礼，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讲区别，讲等级。而乐呢，就是讲调和，讲同化。无产阶级既要讲刑政，也要讲礼乐，只是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同罢了。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也不光是斗争，也有联合。阶级联合也是政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是政治。

党领导文艺工作，首先要引导作家去接近人民，深入生活，熟悉各种人、各种生活，不熟悉生活就无法进入创作过程。领导者要积极主动地为作家深入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创作方向、题材和创作方法上，领导者可以向作家提出适当的建议和忠告，但不能强制和硬性规定。作家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当有完全的自由。作家如果不熟悉领导者建议的题材，可以不写，不要勉强。作家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只能写自己耳闻目见过的、了解的、有兴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现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新的时期。我们的文艺，要鼓舞亿万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但要使文艺工作者紧紧地和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且要使文艺工作者互相之间紧紧团结起来。在当前要特别做好文艺界的团结工作。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造成了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之间，作家、艺术家和领导者之间以及作家、艺术家互相之间的隔阂，造成了许多派性纠纷，使我们的团结受到严重的损害。经过三年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已经消除了不少隔阂和派性，增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但是，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有待进一步肃清；某些隔阂和派性还没有完全消除。这

种情况继续影响我们队伍的团结，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帮助和引导文艺工作者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相信，经过团结奋斗，我们的文艺事业是一定会更加兴旺起来的。

载《红旗》1979年第1期

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今天，在欢庆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距第三次文代会已经十九年了，从第一次文代会到现在，则已整整三十年。在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这段时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人民在胜利进军中，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多少惊涛骇浪！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有时还会有一时的逆转，但是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人民的力量终究是无敌的。

我国人民经受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动乱，灾难深重。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拨乱反正，使国家转危为安，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我们的各项事业又开始沿着正确的航道胜利前进了。去年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为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一个

鼓舞亿万人心的宏伟目标。不久前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和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胜利的信心。

这次文代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召开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将怎样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求得更大的繁荣和提高，怎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商讨的主题。人民期望我们这次会议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而实际的回答。我们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

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当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实事求是、总结和交流经验，既有批评又有自我批评的大会；开成一个发扬民主、心情舒畅、斗志昂扬、生动活泼的大会；开成一个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大会。

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领域。总结三十年的经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的这个报告，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讨论，求得正确的结论。

艰巨的战斗历程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同我国的其他事业一样，经历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需要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和智慧，探索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踏实地前进。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是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不够完善发展到比较完善，直到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最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长期的自觉的不断革新和调整来实现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也是不断革新和发展的。我们必须倾听实践的声音，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用历史作一面镜子，不断研究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就诞生于世了。社会主义文艺不是和和平平地诞生，而是经过激烈斗争才争取到自己生存的权利。伟大的十月革命使苏俄文学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文艺的前哨。我国新文艺，最初就是以俄国和北欧、东南欧的文艺以及苏联文艺为借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在散文和诗歌方面，为我国新文艺奠定了不朽的基础。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这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飞跃。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举起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勇敢地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用革命文艺家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

的新篇章。从三十年代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的就义，到四十年代闻一多的遇害，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记载了作家为真理而献身的光辉事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以它强烈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处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广大人民，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鲁迅的战斗杂文、散文和其他作品，茅盾的《子夜》等小说，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劫人的《死水微澜》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田汉、夏衍、蒋光慈、张天翼等许多革命作家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向广大人民和知识青年传播了革命思想；《包身工》最早描绘了我国产业工人的悲惨经历，为我国报告文学开创了新生面。在鲁迅倡导和扶植下产生的新兴木刻运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以《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为代表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和以《放下你的鞭子》为代表的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演剧队的活动，动员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崛起文坛，倾吐了国土沦陷后三千万同胞的苦难和反抗，《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小说就是当时斗争的真实纪录。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时期革命文艺的辉煌成果。当时江西、陕北等老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活动，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然，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它还是一个幼儿，就大多数作品来说，思想和艺术都不够成熟，许多作者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活动家，如瞿秋白、阳翰笙、冯雪峰、阿英等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组织左翼文艺队伍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但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对我国革命的实际缺乏了解，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

和社会经验，因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吸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滋长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鲁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对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最可珍贵的遗产。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国文艺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讲话》的最大功绩，就是从理论上正确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就使我们的革命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讲话》前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民间艺术和人民的新的创作，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重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给作家、艺术家以深刻的影响。以《兄妹开荒》等为代表的新歌运动的勃兴，新歌剧《白毛女》、新京剧《逼上梁山》和新秦腔《血泪仇》的成功，新民歌《东方红》和《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新木刻、新年画的流行；长诗《边区自卫军》、《王贵与李香香》、独具风格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以及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高干大》、《开不败的花朵》等的问世，都以描写新时代的革命变化为其特色，使我们的文艺面目一新。许多的文工团，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战争的烈火，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是我们自觉地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诗歌《火把》、《给战斗者》 长篇小说《淘金记》 话剧《清明前后》、《法西斯细菌》和《雾重庆》等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郭沫若的话剧《屈原》 以历史讽喻的手法 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挑战，曾经轰动一时。在党的领导下，各种进步文艺活动在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原在解放区的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两支革命文艺队伍的大会师。那次会议是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建设，从农村转入城市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一致表示要为坚持新的文艺方向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的实现。这就给我们的文艺提出了新的任务。首先，过去的文艺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现在则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更加扩大，更加广泛，更加多方面了。这就产生了我们的文艺如何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过去文艺工作者为了求得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曾经走过曲折的不平坦的道路，经过了一番探索和磨炼，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新的考验又摆在他们面前了。文学艺术这种意识形态如何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丰富多采地反映这个历史时期人民的新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我们必须正确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全国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正确地领导文学艺术事业，如何指引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的

轨道、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前进，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文艺界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的批判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斗争作为思想批判、文艺批判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就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极为深刻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大变革，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思想斗争，这就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战胜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力争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地位。经过这样一些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及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有着巨大的意义。

开国之初，我们就面临一个如何对待传统戏曲，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的问题。这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戏曲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历史中所创造的一份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必须进行改革。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对我国的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和戏曲艺人一道，进行了整理和改革的工作，使许多解放前濒临灭亡的剧

种获得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放出了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在培养青年一代演员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中，戏曲舞台上虽然也出现过某些不好的剧目，但好戏始终占主导地位。京剧和地方戏都产生了许多好的作品，如《将相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芙奴传》、《十五贯》、《杨门女将》、《生死牌》、《芦荡火种》、《红灯记》、《节振国》、《小女婿》、《刘巧儿》、《天仙配》、《搜书院》、《三打白骨精》、《朝阳沟》等等都是富有革新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戏曲。特别重要的，是改革传统戏曲使之适合表现现代生活的尝试，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一九六四年，京剧革命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就是这种成功的一次检阅。对传统绘画、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杂技的整理和革新对极为丰富的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

新中国大力发展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早在三十年代，我们的一些左翼电影工作者，就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力，开创了我国革命的电影事业。三十年代以来，一些优秀电影如《渔光曲》、《桃李劫》、《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至今为人们所记忆。全国的解放使电影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把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的电影艺术家摄制了许多好的影片，如《中华女儿》、《钢铁战士》、《白毛女》、《翠岗红旗》、《董存瑞》、《红色娘子军》、《槐树庄》、《李双双》、《永不消逝的电波》、《上甘岭》、《风暴》、《老兵新传》、《林则徐》、《甲午风云》、《祝福》、《大浪淘沙》、《农奴》、《兵临城下》、《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英雄儿女》等等都为观众所

喜爱。新闻记录片，作为时代的见证，为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了珍贵的资料。《百万雄师下江南》曾创造当时卖座率的最高记录。科教片和美术片都有优异的成绩和独特的创造。

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在十七年中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郭沫若同志虽然担任科学和文化方面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仍然辛勤地写下了不少出色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老舍回国不久，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创作他的《龙须沟》和《茶馆》等作品描绘了他所熟悉的北京人民的生活风貌，以深沉的笔触，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热情称颂了人民的新政权。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都对历史人物给与了重新评价并且以新的观点描绘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关系，表现了这些老作家的艺术勇气和探索精神。话剧《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歌剧《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珊瑚》、《江姐》、《刘三姐》等许多作品，从各个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当代的和历史上的斗争。我们看到了许多描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小说 长篇小说《创业史》、《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风云初记》、《林海雪原》、《小城春秋》、《三家巷》、《三里湾》、《山乡巨变》、《红日》、《铁道游击队》、《苦菜花》、《保卫延安》、《铜墙铁壁》、《原动力》、《百炼成钢》、《战斗的青春》、《上海的早晨》、《金沙洲》、《香飘四季》、《风雷》、《欧阳海之歌》、《李自成》等 中短篇小说集《政治委员》、《三千里江山》、《风雪之夜》、《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李双双小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春种秋收》等都是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赞许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其强烈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情感和

对人民军队的热情赞颂，而传诵一时。《罗文应的故事》博得了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对青少年儿童起了辅导教育的作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等勇敢地、敏锐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发挥了文学的批判作用，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诗歌方面，有毛泽东同志的传诵世界的诗词，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等同志的新旧体诗词，有工农兵群众中涌现的新民歌，有诗人们创作的为群众所喜爱的优秀诗篇如《甘蔗林——青纱帐》、《放歌集》、《石油诗》等，热情地唱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歌。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杂技、摄影等各种艺术门类，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我们的国画家们用他们的彩笔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歌颂了人民的新生活；绘画《开国大典》、《江山如此多娇》、《血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和大型雕塑《收租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合唱《长征组歌》、《嘎达梅林交响诗》舞剧《小刀会》、《红色娘子军》，都是描绘人民革命斗争的创新之作，对社会主义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曲艺、相声在新时代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新故事就是说书的一种新形式。少年儿童所喜爱的连环画和儿童剧也卓有成绩。

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各类文学艺术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那些忠诚文学、艺术教育事业的同志们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全国解放后十七年文艺创作的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它们对鼓舞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文学艺术不愧为伟大时代的镜子，同

时也是我国人民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的生活教科书。文艺战线上的这些光辉成绩 决不是林彪“四人帮”所能一笔抹杀的。历史是公正的 人民是公正的。只要看看粉碎“四人帮”以后 被他们长期禁锢的十七年中的电影和文艺作品是如何受到读者、观众的热烈的欢迎，就可知人心的向背和群众判断的公正了。

建国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形成了一支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的文艺大军。不少文艺工作者是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成长起来的，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输入了新的血液。这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的队伍。

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首先从夺取文权开始。他们通过诬陷《海瑞罢官》打开突破口。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他们实行全面夺权的信号，也是他们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的纲领。将近十年的时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他们所窃取和篡夺。他们利用所攫取的政治权力，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他们不仅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就，也否定从三十年代以来甚至从“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的伟大成果和光荣传统。他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把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诬蔑为“黑线人物”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诬蔑为“黑线专政”。他们禁绝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文艺作品，妄图扑灭人类一切进步的文化。文联和各协会被诬蔑为“裴多菲俱乐部”强行解散 大批文艺工作者遭到迫害和凌辱。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刚才，大会已向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和诬陷的许多已故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

表示了我们的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为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极左路线。他们篡改和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割断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用谎言和伪造代替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极大地败坏了革命文艺的声誉。他们歪曲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阴谋文艺”，成为反动政治的奴婢。他们在文艺上传播的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谬论和帮八股的恶劣文风，及其所推行的各种荒唐措施，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流毒之深，至今尚待肃清。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毕竟是短暂的，他们没有并且不可能完全打断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四人帮”的淫威面前屈服，他们通过公开或隐蔽曲折的方法坚持斗争。那些不怕牺牲，敢于冒万死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文艺界的战士，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人民和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之间的斗争，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也是在文艺思想上辩证唯物主义同主观唯心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同公式主义、帮八股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非常尖锐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身处逆境，却毫不消极，仍然潜心构思自己的作品，默默地进行写作或做写作的准备。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敢于坚持真理，破除现代迷信，以监狱作讲坛，以诗和歌曲为武器，反抗强暴势力，至死不屈。她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垂不朽。经过严峻的考验，证明我们的文艺队伍，除个别败类和极少数投机分子外，是一支压不垮、摧不毁的革命的队

伍。

周恩来同志在身患重病、工作处于逆境的条件下，仍然关怀着党的文艺事业，关怀着文艺工作者的命运。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免遭荼毒。他始终同广大文艺工作者心连心。“四人帮”在文艺上从批所谓“黑画”和批“无标题音乐”批电影《创业》和《海霞》到批《水浒》他们的罪恶矛头，都是针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四人帮”的一场威武壮烈的斗争，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具有独特光辉的不朽的一页。摄影工作者冒着万难和风险，摄下了这场斗争的壮烈情景。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

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认真的实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开始复苏和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四人帮”一倒，漫画、相声就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敌人的匕首。革命诗歌和诗歌朗诵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一批新老诗人所创作的歌颂人民英雄、批判“四人帮”的诗篇如《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

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 你在哪里 》、《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中、短篇小说《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窗口》、《我们的军长》、《伤痕》、《乔厂长上任记》、《大墙下的红玉兰》、《草原上的小路》特写《人妖之间》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让青春更美丽》、《未来在召唤》、《报春花》歌剧《星光啊 星光》等以激动人心的主题、战斗的风格和独创的艺术手法，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最近创作和演出的舞剧《丝路花雨》，以其新颖优美、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歌颂了古代中外人民的友谊以及劳动人民艺术家的不屈的斗争和艺术创造精神，博得了观众的称赞。此外，还出现了尝试表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剧如《报童》、《曙光》、《陈毅出山》等。一些老作家也焕发精神，继续创作；描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的长篇小说《东方》，描写古代历史人物的话剧《王昭君》和《大风歌》，描写当代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就是这方面的成果。电影在题材和艺术表现上也有新的进展出现了如《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小花》等一些新作。在对越南侵略者的自卫还击战中，许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写出了一些反映我国军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

艺术创造力获得大解放，在建筑壁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新近完成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大壁画及其他有关美术作

品，博得了各界人士和中外艺术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建筑壁画开创了新途径。这些壁画的作者大都是有才华的青年壁画家，他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融合我国民族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现代技巧，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这些壁画是他们和陶瓷工艺美术家、建筑师们密切合作的产物。他们的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成果及创作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首先是短篇小说和话剧，发扬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描绘了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尖锐斗争以及在那些灾难年月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描绘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长征路上涌现的先进人物，揭露了障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阻力和弊端。题材尽管不同，却都比较及时地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烈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理想、情绪和要求。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这些作品很多出自较年轻作者的笔底，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大胆探索的勇气，真实地描述了他们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他们要控诉，要抗议，要呐喊，因为他们的经历充满了酸辛和血泪、愤懑和悲痛，也有识破欺骗后的觉醒和斗争。他们以泼辣的风格突破成规和戒律，抒写了自己的深切感受和许多令人震惊的所见所闻。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

思想和情绪。人民需要健康的文艺。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

这些作品，来自人民的大海，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的作者多数是新兵，往往不够成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对有些作品，人们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当允许自由讨论和争辩，作者也应当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总之，这些新的作者是在思考，在战斗，在前进。他们代表我国文学的年青一代。他们处于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他们的前程是无限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鼓励他们，正确地引导他们。我们的文艺应当使人民团结，而不是使人民涣散；应当使人民奋发向上，而不是使人民灰心丧气；应当使人民胸襟开阔，而不是使人民目光短浅。一切腐蚀人们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品都应当受到抵制和批评。

回顾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 除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同志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他总是结合实际，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他和陈毅同志历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深刻地阐发了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发扬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对我国文艺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分别召开的讨论电影、戏剧问题的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是成功的。文化部、文联党组于一九六二年针对一个时

期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关于改进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即《文艺八条》）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无可否认 我们的文艺工作 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 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但是，同样无可否认，我们的工作中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诬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极左的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某些“左”的错误 和林彪“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所肆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而原谅自己的过失。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正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要善于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汲取教训，以戒未来。

我们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由于当时的一定历史条件和背景 以及自己头脑中“左”倾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有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实践证明，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极为有害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 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遭受了挫折。一九五八年全国所卷起的一阵浮夸风、共产风和
在知识界进行的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也涉及了文艺界使‘左’
的倾向又一度抬头。我们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一些文艺
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致助长了
理论上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产生了粗暴批评，损
害了艺术民主。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应该引以为
训。

那末，究竟有哪些主要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呢？归纳起来，主
要是正确处理三个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
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文艺和人民生活的
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也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
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
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这三个关系处理得正确
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

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
决定作用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
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
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
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
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
评价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和政治性是统一
的。我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提倡社会主义文
艺表现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承认正确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
导作用 这些都是对的。关于“写真实”、现实主义道路、写英雄
人物和中间人物等等问题，本来都是学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自由
讨论的 简单地、笼统地把‘写真实’、‘写中间人物’等等当作资

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这就不对了。对一九六二年大连会议及其“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也就谈不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生活是第一位的。生活的实践，包括创作实践，不但影响创作本身，也影响世界观，引起世界观的变化和飞跃。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对于帮助作家正确地而又富有远见地观察和描写生活，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都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革命现实主义往往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因为它要反映现实的发展前途和生活理想。革命浪漫主义也应现实主义为基础，即使幻想小说也不能脱离现实。当然，任何创作口号，都不应成为束缚创作生命力的公式和教条。在遵循文艺必须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这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每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创作，这是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我们要提倡我们所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同时更要鼓励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以某一种固定的创作方法来统一整个文艺创作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做不利于充分发挥不同个性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才能，不利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作家和艺术家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的世界观作指导。这种世界观承认社会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要勇于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反映。所谓歌颂和暴露，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中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阴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了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我们不仅要批判敌人，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实践，也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了。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必须以锋利的眼光，清醒地注视生活中各种矛盾及其发展，敏锐地反映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发现一切新生事物和先进力量，也勇于揭露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需要和利益。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联，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入歧途。在政治、经济、理论等各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中，政治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任何政治家，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总是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有所补充和修正，要根据当时当地的不同情况而有所改变。彼时彼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此时此地就可能变成不正确的了。因此，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凡是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凡是能直接间接鼓舞人们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都是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都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政策图解式的、说教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由于缺乏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力量，是不为人们所欢迎的，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的政治作用。

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也就是它的政治任务。把文艺说成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是不对的，文艺对政治发生影响，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采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段。作品的典型化程度越高，艺术手段越多样，感染人的力量越强，就越能对政治发生作用。无论在文艺的领导工作方面，还是在作家、艺术家本身，那种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思想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力求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而决不应当是只凭个人感想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家长式的领导。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而要善于诱导；要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讨论和争辩，要允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允许批评和反批评。

今天的文艺是从过去的文艺发展而来的，有历史的连续性，

有一定的民族特点。但是，社会主义文艺又是一种不同于任何过去时代的崭新的文艺。这里就有一个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问题。前不久发表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如何正确对待中外遗产，如何保持艺术的民族特色，如何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都是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必须把传统的继承和革新这两者的关系处理恰当。在批判了保守倾向之后，要防止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在批判了粗暴倾向之后，要防止保守倾向的抬头。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许多传统戏曲剧目又恢复演出了，并且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也有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返舞台而担心，对此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帝王将相是为祖国的安全统一立过功勋或给人民做过好事的杰出人物，有的才子佳人是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樊篱、争取个人自由和幸福的叛逆者。舞台上不但要有正面人物，也需要有反面人物作为谴责和鞭挞的对象。我们不当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一律赶下舞台，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评价他们，使他们在戏曲舞台上重新占有一定的位置。戏曲艺术，必须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革新，不断发展，停滞了，僵化了，就会失去生命力。戏曲有它自己一套长期流传的剧目、相当凝固的艺术程式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它向人民灌输了历史知识，培养了人们辨别邪正、是非和美丑的观念，它的民族气派和美感魅力往往令人倾倒。但由于长期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少戏曲剧目所描绘的历史情节常常是被简单化了的、被歪曲了的，给了人们一些不正确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同时又养成了人们固定的欣赏习惯。所以对传统戏曲的改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种改革必须是积极而又审慎，大胆而不鲁莽。既要反对因循守旧，也要反对粗暴急躁。任何改革都要注意不破坏它的民族特

色和艺术精华，而是使之更加完善，更加提高，更富于表现力。我们不但要改革传统剧，而且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创造新的历史剧。运用传统戏曲，来表现现代的新的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满足于民族的旧形式，而要努力发展和创造民族的新形式，一方面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也要把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拿来，加以改造，洋为中用。我们应当重视革命现代戏的成果，决不能因为“四人帮”曾经窃取和歪曲这些成果并荒谬地封之为“样板戏”，而对它们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污染，正确总结革命现代戏的经验，使它们重放光辉。

新时期光荣任务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我们的文艺应当反映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帮助人民认识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鼓舞他们的斗志和信心。我们的文艺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教育青少年一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年来，文艺战线冲破重重阻力，已经在新的长征中迈出了勇敢的步伐。但是，应该承认，目前的文艺还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的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人民群众波澜壮阔、龙腾虎跃的斗争实际还很不相称。文艺作品的题材范围还不够广阔，艺术风格还不够多样，思想上还缺乏深度，艺术技巧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

的文化艺术生活还比较贫乏，人民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呼声是很强烈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迫切和重大。我们应当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各类文学艺术有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挥更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有一个大的解放。从“五四”到“四五”革命文艺历来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一翼。我国革命文艺的奠基者鲁迅，就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和闯将。我们的革命文艺家，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整风就是和全党伟大的整风运动相适应，相配合的。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革命诗歌，吹响了向“四人帮”发起冲锋的号角，为人民的思想解放打开了闸门。我们的文艺应当深刻反映我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历程，促进和鼓舞这个运动持续深入地发展。

正因为我们的文艺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任务，文艺工作本身就需要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文艺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创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是一项宏伟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进行这样的事业，因循守旧行吗？墨守成规行吗？照抄照搬行吗？停滞不前行吗？胸无大志行吗？我们必须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必须从他们所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以及严重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必须从文学教条主义、艺术教条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要使我们的

文艺真正沿着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发展规律的轨道前进。要使我们文艺真正成为植根于人民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愿望，并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成为列宁所预言的那种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桎梏，摆脱了一切庸俗低级趣味的真正自由的文艺。

目前，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还存在着阻力。有些同志指责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过了头”造成了群众思想的“混乱”把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思想归罪于文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我们要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而是思想解放还不够，束缚思想解放的阻力还很大，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还大有人在。我们对人们的思想解放，只能促进，不能促退，只能加以正确引导，而不能加以压制。要求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首先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员自己要带头解放。

目前，文艺界正在继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开展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判，以彻底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这对于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对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肃清极左流毒，不端正思想路线，我们的文艺事业就不可能继续前进。

文艺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个新的实验。根据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实行这个方针，文艺就比较活跃和兴旺，违背这个方针，文艺就停滞倒退。多年来，思想政治斗争的频繁和扩大化，使这个方针在许多时候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林彪、“四人帮”则是把这个方针彻头彻尾地毁灭了。由于背离和破坏这个方针，对文艺的发展造成了巨

大损失，这个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现在“双百”方针已经列入我国的宪法，这就保证了人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保证了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有互相竞赛和互相争论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是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自由竞赛和自由争论的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和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化艺术。我们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威力，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鉴别力。我们一定要创造一种最适宜于科学和艺术自由发展的气氛，广开文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把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而共同奋斗。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摆在我们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首先，要积极发展各类文学艺术创作，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我们的文艺应该从各方面反映当代伟大历史性转变中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为实现现代化的斗争，是关系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也关系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命运的斗争。我们要鼓励作家、艺术家投身到沸腾的生活洪流中去，吸取最丰富的艺术原料，在我们的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斗争过程，提出并回答时代和人民所迫切关心的新问题，塑造出站在时代前列的当代人物的艺术形象，反映新长征的壮丽图景。作家主要是描写各种人的生活和命运，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表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描绘人们在为现代化斗争中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我们的文艺要写英雄人物，也要写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要更有力地、更深刻地去暴露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及其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社会基础，也要以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精神，去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习气、封建特权观念、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保守思想和一切因循守旧的旧意识、旧习惯，批判阻碍社会前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们的文艺应该充分反映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帮助人民群众认识生活，改造生活。

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应该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 把被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了的革命历史端正起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正确认识历史，认识我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用革命传统教育人民，激励人们进行新的长征。这不但在今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千秋万代，也将是鼓舞人民前进的思想动力。

在描写革命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形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当以饱满的无产阶级热情，在详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描写出我们的革命领袖们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表现革命领袖人物，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定要忠实于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要慎重从事，不可掉以轻心。我们高兴地看到 洗清了多年的文字沉冤 小说《刘志丹》已经重见天日。许多作者在描写老一代革命家方面已经作了可贵的尝试。从这一侧面或那一侧面描写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贺龙等的剧本出现了。革命回忆录也纷纷问世，这些回忆录除了它们本身的历史价值外，还为创作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文学准备了基础。文艺作品在表现革命领袖和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的时候，一定要正确表现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表现领袖人物杰出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领袖是人民的带路人，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

会公仆，决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全知全能”的救世主。任何对于领袖人物的神化，对于人民群众的恩赐观念，都是和生活的客观实际相背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都是对领袖人物的歪曲和对人民的蔑视。

其次，我们提倡文艺反映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反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也要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及各种形式、体裁和各自不同的风格，描写其他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认识古代和当代的一切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扩大视野，鼓舞斗志，增长智慧。古今中外 天上地下 上下几千年 纵横数万里 都应该在作家、艺术家的视野和关注之中，都可以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

在各类艺术形式中，电影是最具有群众性，同时也是手段最现代化的艺术形式。人们希望，电影的题材、品种、样式和风格要更加多样。我们的电影，不但要满足国内观众的需要，而且要在世界影坛上赢得应有的荣誉。传统戏曲和曲艺要进一步革新和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历史和现代题材的节目。话剧、歌剧和舞剧 儿童剧、广播剧和电视剧 芭蕾舞和交响乐 应该进一步提高表演和演奏艺术。应当造就一大批出色的表演艺术家。电影和剧团都要改革体制，改善经营管理，使之更有利于电影和戏剧的发展和提高。科教片应更好地配合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人们感到现在歌咏活动不够活跃，往往回忆起革命战争年代的动人情景。我们现在不但需要各种鼓舞斗志的进行曲，还需要有使人愉悦的抒情歌曲和轻音乐，希望我们的音乐家和广播电台能够满足人们这种迫切希望。雕塑、壁画、国画、油画、木刻、连环画和年画，都要积极发展和提高。工艺美术和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应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和提

高。应设立雕塑和壁画的专业机构；中国画和油画应通过复制或其他手段，使之普及。任何一类文学艺术，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传播文学艺术的各种工具和手段，如出版物的印刷质量和封面装帧，舞台技术装置和音响效果，电影工艺、技术、设备、器材 都要力求现代化 做到精益求精。

儿童文学、儿童戏剧和连环画一类的儿童文艺读物，对于教育青少年一代，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关系到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应该给以高度重视和积极提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地应当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得到普及。我国有九亿多人口，农村人口占八亿。所谓群众文化，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农村文化。如果不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去教育提高广大农民，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亿万农民兄弟继续受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落后习惯的束缚，他们在思想上就不能解放，所谓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大半成了一句空话。一方面，专业的文艺演出、电影放映、书刊的出版和发行，要千方百计地普及到农村、工矿和连队去，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广播，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网，改进电影放映设备和戏剧的服装、道具 使之能轻装上路 便于爬山涉水 有计划地发展乌兰牧骑式的流动文化组织；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工矿、农村、部队和城市人民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并从他们里面发现人才，培养源源不竭的文艺后备军。要积极注意和推动城市人民的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开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光靠专业的文艺团体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中的文艺爱好者、

业余文艺活动分子，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前进。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一定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不可妨碍生产，增加群众的负担。

第四，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占我国幅员百分之六十左右，他们世代代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生息，有各自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都为发展我国的文化作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今后，我们要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建国以来，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传统艺术的宝藏得到了开掘和整理，新的创作不断产生。长诗《百鸟衣》小说《花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电影《秦娘美》舞剧《召树屯和楠木娑娜》等的整理或创作，为我国多民族的文艺增添了异彩。虽然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摧残，但由于这些文化是千百年来植根于各族人民生活的土壤中的像长流的河水一样永远不会干涸。《阿诗玛》长期为人们所传诵。世界上最长的著名史诗《格萨尔》的手抄本，在濒于绝灭的境地中被歌手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流传千余年的东方音乐史上的巨大财富《十二木卡姆》，在继续得到整理。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也正在整理。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搜集和整理各兄弟民族的许多艺术珍品，用科学的方法记录、整理各种优秀的口头文学作品，使它们得以继续保存和流传。许多被废止的风俗性的文艺活动，只要是有益于兄弟民族的文艺生活的，就应该加以恢复和改进。要重建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表演团体和研究机构。要重视和培养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人才。我们要特别注意发扬各兄弟民族文艺自己的特色，而决不要削弱这种特色。各

兄弟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应该使各自的文艺更为丰富，更有独创性，而决不应该简单地用一个民族的东西来代替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因为这样做，是脱离群众，不符合本民族人民的利益，也是不利于发展丰富多采的多民族文化的。

第五，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在揭批“四人帮”、肃清极左流毒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促进了思想解放，促进了文艺创作。但是总的看来，目前文艺理论研究还不充分，文艺批评仍然不够有力，理论批评的队伍还不够强大，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从来是，现在也仍然是指导我们文艺工作前进的指针。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为所欲为地阉割、篡改和践踏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抛弃它的精髓即它所揭示的普遍真理和根本原则，抓住片言只语，把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才适用的个别论点，加以绝对化，当成愚弄人的符咒和打人的棍子。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绝不能允许继续存在了。现在帮派残余和思想流毒还远远没有清除，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思想路线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们不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千古不变的教条，而应当看成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我们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同志所没有遇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不能要求革命导师的著作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切问题提供现成的完整的答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联系当前的实际，来重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著，考察、探索和解决当前文艺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不只要遵循毛泽

东同志所阐述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根本原则，同时还应当加以具体运用和发展，对他的关于个别问题的某些批示和论述，凡属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有勇气适当地加以修正和补充。我们应当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出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外国输入的，但又必须在我们自己民族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艺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和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我国有两千年来悠久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传统，出现过不少文论、剧论、乐论、画论、诗话、词话、评点小说传奇等著名论著。历代大作家、大诗人、大画家、大思想家、评论家都曾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这是我们民族的美学思想的珍贵资料。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整理研究和批判继承这些宝贵遗产，以利于发展我们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要注意研究和了解生活，了解作家和读者。专门的理论批评家和群众的批评家很好地结合，要承认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最有权威的评判者。

第六，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当代进步文艺，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文艺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加强和扩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发展和建立同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我们要广开眼界，把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同时要积极地把我社会主义新文化和优秀的传统艺术介绍到世界人民面前。这种文化交流，不但对于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而且对于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都具有重

大的意义。

在积极主动开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时，我们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学习。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不能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很显然，在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中，如果忽视了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对我国人民和青年腐蚀的危险，如果不加强人民的思想武装，不提高识别和抵御这种腐蚀的能力，而完全拜倒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面前，以至丧失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那就是危险的，我们要有所警惕。我们既要反对妄自尊大，也要反对妄自菲薄。

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

为了完成上述的光荣任务，全国以及各地文联和各个协会，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积极加以恢复，切实改进和加强自己的工作。现在，有些地区和单位，还没有认真落实政策，文艺界的一些冤案、错案，还没有完全改正，这是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和文艺事业的发展的。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台湾、港澳的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推进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和繁荣，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奋斗。

中国文联是各个协会的联合组织。各个协会是各类文学艺术工作者（包括创作、表演、评论、研究、翻译、编辑人员，艺术教学人员和文艺单位的组织工作者）自愿结合，独立自主地进行学习和艺术实践，促进艺术创作、理论批评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专业

团体。

文联各协会要特别注意吸收青年、中年文艺工作者参加各协会领导机构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广泛采取社会方式，贯彻民主原则，真正体现人民团体的性质，力戒简单生硬的行政方式。要紧密切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使文联各协会成为生动活泼、富于创造性的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和评论的组织，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文牍主义的官僚衙门。文联各协会要在体制、作风各方面都有所改进，要有新的面貌；组织机构要力求精干，工作要富有成效，有声有色。

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又是集体相结合的个体的精神劳动，文联各协常设机构的一切活动和工作，都应当充分注意文学艺术生产的特点，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性，尊重每个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创造性的劳动，尊重其创作个性和风格。要鼓励创作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鼓励不同的创作风格、不同的艺术流派的自由竞赛，鼓励各种不同文艺观点的自由讨论。

全国以及各地文联和各协会应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和团结文艺界一切愿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团体和个人。凡对文学艺术某一门类、某一方面有专长、有贡献的人，各有关协会应发展他们为会员。要提倡会员顾大局，识大体，讲团结，讲互助，反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各协会会员中的共产党员，应当成为起团结作用的模范。

文联各协会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协同文化行政领导部门和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和它们密切配合与合作，把我们的工作主动地、积极地、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

首先，文联各协会要对专业的、业余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

适当的安排,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为文艺界的老、中、青力量进行创作、研究、学习和深入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有利的气氛,设立必要的创作场所。要按照作家、艺术家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灵活的方式,组织他们到工矿、农村、部队以及各行各业深入生活,蹲点落户,或参观访问,进行艺术交流和相互观摩,以扩大眼界,增长知识,积累创作素材。

其次,要积极帮助会员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我国和世界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和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积极开展文艺评论的活动。各协会都应当建立相应的理论研究机构,培养理论人才,办好文艺评论刊物。

第三,文联各协会应尽一切力量,协同文化行政领导部门培养各类文学艺术人才,以逐步改变和克服当前文艺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或埋没人才的严重现象。各协会可以举办各种类型的讲习所、讲习会,以加强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训练,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要努力办好文艺期刊、丛刊,创办以文艺青年为对象的文艺刊物。实践证明,办好刊物,是指导创作、繁荣创作、发现和培养人才的好方法。要提倡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评论家带助手、带徒弟、带研究生,传经授艺,培养后起之秀。要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创造更多的艺术实践的条件;文艺评论应该特别注意扶植青年艺术人才,坚决反对压制新生力量。文艺书刊的编辑在这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希望他们作勤恳的园丁和有眼力的伯乐,他们的劳动是光荣的。

第四,文联各协会应协助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美育,提高青少年的艺术欣赏水平和艺术修养,陶

治他们的情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美育是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和情操的有力手段。这件事做好了，不但可以为我们的文艺队伍的建设，造就大批的后备军，而且对于改造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第五，要保护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保障文艺家的一切正当权利，保障他们从事创作、演出和学术研究的充分自由。对于任何打击、压制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劳动成果，任意侵犯和剥夺作家、艺术家劳动权利的违法行为，文联各协会有义务和权利为之辩护，直至依法向检查机关、司法机关提出申诉和公诉。

要关心作家、艺术家的福利 按照社会主义“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协同文化出版部门重新制订或修订合理的稿酬、版税制度和上演制度。要协同文化行政部门，建立奖励制度，举办各种评奖活动，尤其要注意对青年和业余作者的奖励。要关心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状况，他们由于年老体弱或其他难以抗拒的原因而丧失工作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要给以补助和照顾。

第六，要更有计划、更积极、更主动地开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外交工作的开展，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必将日益频繁，日益重要。我们要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但要通过这种活动广泛结交朋友，向各国的进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学习，而且要更多地熟悉各国人民的斗争生活，促进我国国际题材的创作，加强对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教育，并支援世界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

同志们：

经历了三十年艰巨而曲折的道路，经过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必将以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在东方，这个强国也将创造出无愧于我国人民，也无愧于我们祖先的崭新的文化艺术，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并给世界文艺宝库增添新的财富。

面对光荣而繁重的任务，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有“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特别是有三十年来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而现在，我国九亿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所激起的沸腾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都为我们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丰富、最深广的创作源泉，并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最有力的精神动力。祖国的大变革为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新繁荣创造了优越的时代条件。我们前进的路上尽管还有很多困难，很多艰难险阻，也还可能遇到曲折，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斗争，敢于创新，就没有什么困难和艰险能够压倒我们。

创造伟大的文化，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没有“闯将”是不行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文艺事业，不仅需要有几个、几十个闯将，而是需要成千上万的闯将。在旧中国的时代，鲁迅曾经深深感叹于“无声的中国”他祈求能有“勇猛的闯将”，敢于“打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敢于打破文坛的沉寂。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热烈地渴望在我国文艺前进的道路上，将有“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纵横驰骋”。虽然林彪“四人帮”一度几乎又把新中国变成了“无声的中国”，

但是解放了的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他们的声音，到底是压不下去的。我们深信 我们的文艺战线上 必将有几百路大军，千万个“闯将”唱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战歌 能够在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灵中激起最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他们将突破我国文艺现有的水平线，做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新时期的光荣的先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满怀希望。在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 曾经出现过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艺术高峰，在现代文艺史上，又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代的文学巨匠和聂耳、冼星海、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周信芳、齐白石、徐悲鸿等杰出的艺术家。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我国人民经历了最壮阔、最复杂的斗争之后，又从事着新的更伟大的斗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要团结奋斗，一定能踏进前人足迹未到的境界，攀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雄伟的高峰。

奋勇前进，辛勤创造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一定要到来的！

一九八〇年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

沙汀同志：

殷白同志寄给我他写的一篇评论，推荐了蜀中一位值得注目的新作家周克芹同志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对这篇小说热情称赞，他的文章是有分析的，写得也生动，没有像某些评论文章的那种公式化、八股气。我已读了这部长篇的大部分，的确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我国人民和“四人帮”激烈斗争的一个短暂的曲折时刻，地点是四川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历史背景回溯到农业合作化初期，展示了从那时以来的时代风云的变化莫测和农村新旧势力的反复斗争，描绘了各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的面貌都不相同，亲近如父女之间、姐妹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每个人的性格、遭遇和觉悟水平的不同，心灵深处各藏有自己的秘密，彼此也并不能完全开诚相见。人物的命运，和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们的生活中经受了多少的颠簸，心中有多少良好的愿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又是多么丰富啊。作者对农村环境和人物个性的描绘是栩栩如生的。谁能说农村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呢？谁能说这些普通的每天从事平凡劳动的农村男女特别是青年男女不是足以震撼大地的伟

大力量？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已经充分地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无论如何，已使我们多少看到了这片令人神往的天地，看见了在其中活跃的一些充满活力的可爱的人物。小说也描写了我们农村中、社会中的不少消极面、阴暗面，但并不给人以消沉的感觉，相反给人以鼓舞的力量。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蕴藏的无穷潜力。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努力表现劳动人民中的这种真正的力量。

这篇作品中是否发议论和抒情的词句多了一点，就是说写得太显露了一点，不够含蓄，给读者的想象没有留下足够的余地呢？这是值得作者考虑的。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作者抒发的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不论怎样，它还是能够感动人的。

我还没有看完这部长篇，我现在谈的只是读后一点初步的印象。我将很快地把它读完，然后再通盘思索一番。

现在我把殷白的评论文章和发表在《内江三十年文学作品》上的这篇小说统寄给您看。我看的是《红岩》上转载的据说稍有修改的本子，您如有时间，可以对照再看一遍。您对四川的作家，包括这位年青作家，想必有所了解。您对故乡的人情风俗，都很娴熟，您创作上又素来以现实主义手法见长，您是最有资格来评论这部长篇小说的。我盼望能听到您的宝贵意见。

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十分重要。爱惜人才不只要热情鼓励还要严格要求。对有希望、有才能的作家也不能乱捧乱摔只有害处。

殷白同志的文章请您阅后转罗荪同志看能否在《文艺报》上摘要发表，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觉得《文艺报》应该更多地注意地方上的作品。

此致

敬礼

周 扬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

载《文艺报》1980年第4期

解放思想 真实地 表现我们的时代*

——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今天，我想讲三点意见：第一，讲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作品；第二，讲解放思想和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第三，讲如何看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干预生活”。这个讲话只是作为个人发言，讲得不对的地方，就请你们指正。

一 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作品

我们有些作品反映了当前现实中的尖锐问题，可以说是相当尖锐的题材：反映了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同官僚主义者、特权思想和党内不正之风的斗争。这些不正之风是人民所痛心疾首的。我们的艺术家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自从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家团结起来为四化出力，出现了许多新的、令人鼓舞的现象，值得我们拍手欢呼。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党内和社会上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文艺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的许多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特殊化和违法乱纪的现象，青少年中的流氓活动和犯罪现象还时有所闻，能不反映，能不揭露，能不斗争吗？“无冲突论”是要不得的。因为它粉饰现实，麻痹我们自己。要同这些丑恶东西作坚决的斗争，问题是怎么斗争，怎么反映。

有一位作者说，我们反映现实中的黑暗现象，实在痛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心驱使我们这样做。嫉恶如仇，一个革命作家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就不成其为革命作家了。不只你们青年痛心，老干部绝大多数对这些现象也是痛心的。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要改变和克服这些现象，已经而且还在继续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开始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也不是那么容易迅速见效的。我们的作家很多都年轻热情，他们很容易被生活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所激怒，以至看不见生活中更经常起决定作用的积极因素，而对于那些消极现象形成的原因，作为消极现象对立面的积极现象，往往缺乏冷静的全面的分析。所以，如何在作品中反映消极现象，就有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你是站在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反映这些现象，还是站在另外的立场，例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的立场来反映呢？如果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来揭露，那是人民需要的。如果站在另外的立场，那对人民就不一定有利了。即使是真心想站在人民的立场，真心想为人民说话，如果观点不对，观察不深，表现手法拙劣，社会责任心不强，你也可以写出事与愿违、不利于人民的作品。有的作者提到表现这些消极现象要有切肤之感，要感到自己同人民是真正休戚相关的，不要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我觉得这话说的很对。人民的作家应该站在人民之中，站在先进人民的行列，而不能站在人民群众之外来反映问题，评论问题，只有这样，你

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关于揭露黑暗的作品，我在这里要引证一下鲁迅对“谴责小说”的评价。清末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崩溃，官场中出现了许多黑暗现象，当时一些多少有点进步思想的作家，曾在作品中对官场腐败现象加以抨击。鲁迅称这类作品为“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就是当时这类的著名小说。鲁迅对这些作品一方面给以肯定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它们的缺陷和不足。他是这样评论这些作品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品和当年的所谓“谴责小说”根本不同，但对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丑恶现象的揭露，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我觉得鲁迅评论“谴责小说”的话今天对我们还有意义。要针砭时弊，但也要真实深切，不可夸张失实，迎合时好。真实性和政治性，要结合得更好一些，艺术性要更高一些。这个问题解决好，就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和文艺的发展。

对一个有争议的作品，经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这是一种好的方法，有利于发挥作家们的集体智慧和促进作家与评论家的思想交流。至于作者是否采纳，则完全有自由。对文艺创作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作者自己也不能强制自己。有时作者感到别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也愿意接受，但作品究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着作者整个的思想感情，整个的心血，有的地方可以照你的意见去改，有的地方就无法去改。修改不是打补丁，而应当是天衣无缝。大家提出的意见虽是好的，但能否化为作者自己的心血，还要经过一番咀嚼和消化。谁也不能强制作者修改。这是不能勉强的。但也要看到，一个作品常常

是要反复修改的，不要怕修改。一个剧本演出来，总是希望博得观众好的反响。我们不要曲意迎合观众，也不要盲从某一领导人的意见，但力求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注意社会效果，总是应该的。作者如果认为大家提的意见是对的，觉得自己过去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周，表现不当，现在要根据这些意见来作修改，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我们革命作家应有的责任感。作家要有主见，要保持自己的独立风格，但不能由此而拒绝采纳群众的意见。

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中反特权、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但由此而同情骗子，同情犯罪，那就不妥当了。难道因为有官僚主义、有特权，诈骗犯罪就可以是合法的吗？要看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蕴藏有一种足以抵抗和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种种弊端的健康力量。要写出这种力量，才比较合于真实。不要说在我们新社会，就是在过去旧社会，骗子也是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把我们的社会写成骗子可以不受惩罚，那就连旧社会也不如了。当然，现在的剧中，骗子最后是受到了惩罚，但在精神上仿佛还是他胜利了，人们的同情还是在他一方面。作者的本意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但依靠骗子、罪犯来反对，岂不是越反越乱吗？对骗子同情，对受骗子之害的人民，又将置于何地呢？那位身居高位的老干部揭发骗子，多少带有一些偶然的性质，而实际上又充当了骗子的辩护人。他对于官僚主义、特殊化的谴责，也只是道德式的说教，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我们希望这类作品能够改好。我前面说过，艺术作品是一种有机体，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要改，还是要通过作家自己的头脑，吸收消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经过重新构思才能改好，否则就不要违心地勉强去改。

作家不能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什么就一定要发表，要上演。他首先要考虑这种题材值不值得写，并不是什么题材都值得写的；还要考虑如何写法才好，发表出来是否于人民有利或有害。作家应有创作自由，但是否发表和上演，还要得到书刊编辑和剧团、电影制片厂的同意和协作，否则你有自由，别人就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那就是对“创作自由”的曲解，那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有政府管辖的地区都做不到的。我们的人民要思想活跃，要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不要无政府主义，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持安定团结，并以此来统一我们的意志和行动。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人民才能生气勃勃。作家不论写什么题材，首先要考虑你描写的是否真实，因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单是真实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考虑是什么样的真实。有各种各样的真实，并不是任何真实都是真理。真实和真理是有区别的。我们追求真理，也重视艺术描写的细节真实，但如果这些细节描写无助于放射真理之光，反而使它暗淡和变色，那就不足取了。我们不掩盖我们社会中还有阴暗面，也不掩盖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要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它们，但我们又要十分注意方式和场合，决不要轻易授予人民的敌人以诽谤我们的把柄。要求一个作品在思想政治上和艺术上都修改得好一些，更少瑕疵，这并不是束缚创作的自由，而是对作品质量的严格要求，也是对作者的一种爱护和关怀。任何作品的发表和上演，都不能不考虑社会效果。这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起码应有的态度。

二 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表现我们的时代。现在是不是解放过头了呢？是不是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不良现象都是解放思想过头的后果？我想不能这样说。文艺对社会有很大影响，文艺工作者对社会负有很大责任，应有高度责任感。但是决不能说现在思想解放过了头，只能说有些人对思想解放有误解，或故意曲解以便反对它。

所谓思想解放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种什么东西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然后才有要求解放思想的运动。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也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也好，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好，无不如此。要打破中世纪的黑暗，迎接新时代的黎明，才有文艺复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武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中间反复斗争几百年。不要以为思想解放是那么容易的事。中国受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束缚，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鼓吹科学和民主，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们才好容易从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旧教条的千钧重压下开始解放出来。后来，从外来的新思潮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又产生了洋教条主义。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这种新教条主义。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林彪、“四人帮”却又利用毛主席在人民中的无上威信，把他的片言只语当成教义，大搞现代迷信。要破除这种迷信，解脱思想束缚，就必须重新解放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束缚，思想解放不就成了无的放矢吗？现在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以及他们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残余势力和思想毒害，决不可低估。当然也要从其他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要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主要还是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本来思想解放不发生什么过头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思想不活跃，思想停滞不前了，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党，还有什么前途呢？思想解放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人类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个飞跃是没有止境的。从历史长河的观点来讲，这种飞跃是会永远存在，人的视野，不论如何扩大总是有限的，情况又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总有些新东西是你不认识的；遇到新的问题，旧的思想又往往束缚你，你就要突破它，才能前进。所以，思想解放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文艺界，特别是这三年以来，思想很活跃，这是件大好事。当然思想活跃不可避免地要出些偏差。按照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的原则，思想解放是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解放就是使我们的思想同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所谓不够，就是现实发展了，人民前进了，而我们的思想却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思想脱离实际，跨越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经过程，就是过头。但那是主观空想，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所以思想解放，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要滑到邪路上去了。那决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而只是对思想解放的曲解和嘲弄。

我们现在提倡思想解放，目的就是为要正确地认识我们今天的世界，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认识我们今天自己国家的形势。胡耀邦同志讲，现在我们是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期，在这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的东西是不会那么容易消亡的，新旧力量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而又复杂。新旧互相交替，新旧又互相交错。新东西里面残留着旧东西，旧东西里面又孕育

着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新东西采取了旧形式，旧东西披上了“新”外衣。在这样的时代，要很好地正确地认识和分辨它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新旧交替，新旧交错，也就是新旧斗争的时刻，人们思想上必然会引起一些混乱和波动。特别是在富于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这种波动可能更明显。现在人们不是说我们的青年是思考的一代吗？每当社会处于动乱和变革的时期，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会发生较大的动荡，大家都要思索问题，探求出路，这就会促进思想的活跃。我看，这是件大好事，思想停滞僵化才是坏事。思想活跃了，你这样思考，我那样思考，你这样主张，我那样主张，就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也必然会出现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意见。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识别和争辩，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只会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和斗争本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几次大的历史转折，都引起了思想的混乱，也促进了思想的发展。看一看历史：俄国革命第一次失败，那时思想界、文艺界发生多大的混乱！什么色情主义、颓废主义，风靡一时，所以高尔基说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是“最无耻的十年”。为什么无耻？因为革命失败了，思想动摇了，一些腐朽反动的思潮和流派都冒充新事物而出现。一些倾向过革命的人忏悔了，背叛了革命。当年高尔基自己也犯过错误。他自己也搞造神派，他想造个上帝来维系人们的信仰。列宁从爱护高尔基的立场出发曾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败坏了十月革命的荣誉，其影响所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当时，在东欧则爆发了波匈事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次空前未有的大波动。

由于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浩劫，现在有一些人，不只是青年人，也有中年人、老年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党失去信任，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这种现象值得严重注意。这也是一种大的思想波动，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思想动摇。思想活跃，敢想敢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人们的思想对革命也发生了动摇，连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也不相信了，那就很危险。对“四化”建设和安定团结都不利，那就应当反对。怎样帮助人们，特别是帮助青年端正世界观，正确地引导他们去认识这个时代，表现这个时代，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这个时代，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有些事情大家一时迷惑不解，所以提出要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客观实际在变化，思想要跟上这个变化，适应这个变化，促进这个变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点，除了要经常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外，就是需要努力掌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它来观察一切问题，应付一切变化。思想解放并不是不要思想，人总得有个思想，不是正确的思想，就是错误的思想。你说我什么思想也不相信，那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就是叫做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反对迷信，相信科学。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对社会主义，我们也只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不要搞感情的社会主义，感伤的社会主义。当然，一个革命作家，没有感情，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是没有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更不行，单单有愤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愤怒出诗人”，但不一定出真理。我们爱诗人，但更爱真理。有的作家在作品中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帮派势力，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是站在人民立场

的，但对人民群众中的一些不正确、不健康的東西，例如极端个人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有害倾向，他们就不那么反对，甚至予以共鸣和同情。人们常常把文学比作镜子，好像看到什么就要写什么，但人毕竟是有思想的，作家尤其要有思想，他要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法，决不可能毫无选择，毫无偏袒 毫无爱憎。人们又说文艺是“解剖刀”社会机体中有“毒瘤”，它就要动手术。作品中写了社会中的黑暗，只能怪社会不好，不能怪作品无情。但是作家如果是一个庸医，手术并不高明，就不但割不掉毒瘤，反而有使毒瘤扩散，加速有机体死亡的危险。作家不能没有责任感，其道理就在于此。

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要反对，问题是不能由此而同情盗窃犯、杀人犯和骗子。这是一个是非界限。不能说写的这些事情不是真实，至少有部分的真实，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真实的都要写。诲淫诲盗的书不也写了一定的真实吗？

黑格尔有两句名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对这两句话作了极为精辟的发挥。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确是很精采的。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既反映了他思想的反动的方面，也反映了他革命的方面。“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既然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合理的，那末盗窃犯、杀人犯和骗子的存在也是合理的。所谓合理，就是它有其存在的根据。黑格尔这样说，实际上就是为现存秩序辩护，因此被一切力图维护现存统治的反动阶级的人们所欢迎。但是黑格尔还有一句话，“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一句话就反映了他的革命性。有盗窃诈骗，就有反盗窃诈骗，前者因有其存在的根据，是现实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后者因是合理的，合乎现实的需要和发展趋势，因而更是现实的。作家要把两个现实、两个合理都

写出来 而更着眼于后者 因为后者才是更现实、更合理的。海涅是黑格尔的朋友，看到黑格尔前一句话很不满意。他问黑格尔，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当时 黑格尔看看周围没有人 说 你不知道我后面还有一句，“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黑格尔当时还怕有人偷听到他的话，会说他在鼓吹革命。因为革命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所以说这句话反映了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我们的文艺也应从这两句话里得到启示，既要反映生活的真实，也要表达革命的理想。

我们的文艺家应当有理想。作家不能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总是要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追求。一个革命的作家没有一点革命的理想 革命的感情 革命的意志 怎么叫革命的作家呢？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作家的责任是更加重大的。他们的作品和言行 都是人们所关心 所注目的。不能说作家只要讲了真话 就算是尽了责任。还要看看这个真话，真实的程度如何，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的需要，真正对人民有利。

现在有人讲要恢复“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要回到“五四”这给人一样印象 似乎只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才是现实主义的，至于后来的什么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至全国解放后产生的许多激动人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作品，似乎都不是现实主义的，至少不是那么现实主义的，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又有人称我国近三、四年来的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为“新现实主义”，似乎不在此例的作品都不是现实主义或至多只能称之为“旧现实主义”，这也是不恰当的。我们过去一些时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不够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 现实主义就完全被糟蹋了，现在重新强调革命现实主义，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要在今天新的条件下，以新的

精神来恢复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

总之 我们今天的文艺不能退回到‘五四’时代去。我们今天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要和时代相结合，要有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我们对于“五四”时期的文艺，要继承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但也不能全盘继承。“五四”离现在究竟是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且是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我们的国家不管经历了多少历史曲折，比起那时来不知前进有多远了。怎么能全部承袭过去的东西呢 左翼文化运动中 曾有过‘左’的偏向 例如号召脱下‘五四’的衣裳 贬低‘五四’式的白话 那是不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 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 就整体而言 比现在还高明，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茅盾、叶圣陶同志等最老一辈的作家当然知道得最清楚，也最有权威来判断。至于欧洲十九世纪的和现代西方的文艺，我们应该借鉴，但也要有所选择，有所评判 只能吸取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由于林彪“四人帮”横行长达十年之久，我国人民和青年对西方文化长期隔膜，以致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以致竞相模仿。这也可以说是对“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一种惩罚。当然，过去文化中确有许多好东西，但不能把一些本来不好的、应该批判的东西，当做新的东西来宣扬。学习过去的文化遗产，无论如何要有所选择，有所批判。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以革命精神来从事工作和创作，用革命的作品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和青年的。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事业，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三 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文艺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这确实是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說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但人的‘命运’是什么呢？有一次拿破仑跟歌德谈到悲剧的问题，他说古代‘命运’这一概念现在要由‘政治’来代替，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支配人们命运的东西主要就是政治。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但也不能由此就说人的命运，完全是由政治来决定的。文艺也不能说是完全从属于政治。回顾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革命文艺从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革命文艺运动就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我们文艺的光荣传统，尽管我们在处理文艺和政治关系的问题有过一些“左”的偏差。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文艺成为了广大人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作用又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生活，包

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而不只是政治生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这就是说，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经济基础，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为中介，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动力还是经济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艺也是上层建筑，最后决定它们的发展的还是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宣传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社会科学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革命，它是与剩余价值学说同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但为了宣传这个真理，就不免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以至有人就把这种作用当做唯一的了。似乎只有经济起决定作用，其他因素都不起重要作用了。恩格斯晚年就为此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和马克思两人都因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忽视了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因为看到别人甚至他的门徒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庸俗化了，就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打棍子，只是幽默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可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虽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要通过的中间环节往往是政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但他们都从来没有讲过艺术要从属于政治。艺术不但要受政治的影响，也要受

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又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当然，不是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们归根结蒂最后还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过去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把这种相对的独立性看成绝对的，认为文艺本身的历史，是一个不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独立发展的过程。好像它的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经济、政治的背景，这当然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在否定文艺发展的绝对独立性的同时，连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否定了，这同样也是不对的。

因此，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了文艺除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于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林彪、“四人帮”在其长期反动宣传中，一方面叫嚣反对什么“唯生产力论”否定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叫嚣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的作用提到吓人的高度，以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他们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从历史上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来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我国封建社会时代，封建主义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文艺不能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但并不等于文艺一定要从属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它更多地是受封建宗法道德等儒家学说的影响。

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也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要再这样提了呢？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过去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

就是讲为政治服务吧，也要分清是什么政治，是革命的政治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你也为他们服务吗？就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也要看这政治是正确还是错误。你能为错误路线，为官僚主义的政治服务吗？我们所讲的政治，主要是指总的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而不是指个别的具体的政策和工作任务。我们的革命文艺不应违背我们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但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配合当前的具体政策和工作任务。根据各种艺术类型和表现手段的不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的比较直接、密切，有的则比较间接、疏远，比如山水画、风景画、抒情歌曲、舞蹈等等。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题

要内容吗？

再顺便谈谈文艺“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所谓“干预生活”，主要就是要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干预当前的政治问题。假如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把文艺置于从属的地位，而“干预生活”，则反过来，把政治置于从属的地位。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文艺两者关系的问题。文艺可以干预政治生活，但也不能把文艺凌驾于政治之上。文艺的职能本来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影响政治，对政治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现在人们讲文艺干预生活，通常只是指那些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描写社会的消极现象，可以有助于克服那些现象的作品，而对那些描写人民生活中先进事物，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积极作用的作品，却不叫干预生活。这和这个口号的来源，以及这类文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有关系的。这个口号好像是五十年代苏联一位作家提出来的。在斯大林时期文艺创作中有“无冲突论”的倾向，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奇金，他到农村去实际考察了，他看到的不是像一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一片光明。于是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干预生活”。这个作家后来到中国来过，我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也和他交谈过。多少是在他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口号。那么可不可以干预生活呢？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

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只有这样干预生活的作品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是现实主义的或不够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就片面了。文艺既然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从广义上讲，都是干预生活的。写革命战争，写土地改

革，写地下斗争，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的许多作品在人民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难道还不算干预了生活，推动了生活的前进吗？一个作家应该多方面地表现生活，他可以侧重某一方面，但不能说只有侧重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才算是干预生活，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算干预生活，因而就不是或不够现实主义的。这样来理解干预生活未免太带片面性、阴暗性了，也许这个口号本身就多少带有这种片面性的毛病。作家眼界要广阔，题材要多样，取材要广，选材要严，挖掘要深。我们提倡题材应当广泛 要多样 在题材问题上不要加以限制 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列宁说过，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有他的自由。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文艺事业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加以指引。

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 运动的革命传统*

今年是中国“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创立了名震一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左翼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及其他左翼团体，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这支文化新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文坛纵横驰骋十年之久。这次伟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常被称为“左翼十年”，它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扬光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先驱。它在我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是光芒四射，留芳千古的。当年许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同志，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今天，我们邀请参与过左翼文化运动的老同志们，和文艺界的有关同志共聚一堂，开一个纪念会，目的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增进团结，为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事业更加繁荣而作出自己新的努力。

*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的。它同以后陆续成立的其它许多左翼文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共同接受我党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因为“左联”成立最早、影响最大、人数也较多,尤其是因为鲁迅是“左联”的领袖,是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因此,我们选择“左联”成立的日子,来纪念整个左翼文化运动。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还要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五十周年,那也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纪念。

“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是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出现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

“左联”和其它左翼文化团体都产生于三十年代。“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概念,长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歪曲和诽谤,使许多不了解世界和中国历史的人们竟把“三十年代”看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名称。这简直是对于历史的莫大的颠倒和嘲弄。台湾反动分子至今还在咒骂“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把它称作“幽灵”。可见“三十年代”正是叫敌人害怕的革命的幽灵、红色的幽灵。

三十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重要年代。在国际上,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崭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中取得胜利,而且可以取得建设的成功。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总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得到蓬勃的发展,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面貌一新。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

动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呵！苏联的文艺成了世界革命文艺的先锋。《铁流》、《毁灭》等作品产生了世界的影响。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左翼文艺也风起云涌。他们的作品和刊物成了我们珍贵的精神食粮。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国左翼作家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作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我们和苏联的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古久利，英国的萧伯纳，德国的布勒希特、路特维奇棱、珂罗维支、基希，美国的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秋田雨雀、尾崎秀实，新西兰的艾黎等，都有交谊，他们都曾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先后召开了世界革命作家大会，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并用几种文字发行机关刊物。中国“左联”成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正式成员之一。萧三同志就是“左联”派往那里的常驻代表。

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说，三十年代也就是从资本主义文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转化发展的年代。“左联”等左翼文艺团体正是在这个转折关头，顺着世界潮流应运而生的。它是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当然是在自己国家民族的土壤上产生的，是本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左翼文化团体的相继成立，正值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内战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革命是遥相呼应，密切配合的。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新军阀实行白色恐怖，把千千万万革命者投入

血泊之中。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都面临着严重考验，都在思索和探求新的革命途径和新的斗争方式。我们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武装斗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终于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光辉的一页。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从来不能没有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之配合。正是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四·一二”以后，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他们身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心在红旗飘扬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光辉名字，深深吸引着每个革命者的心。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红军的北上抗日和长征的胜利，都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他们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把大批青年召唤到革命旗帜之下，他们高举革命文学大旗，创办刊物，开辟阵地，写作革命文学作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像火焰似地烧向整个黑暗的旧中国。这种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伟大运动，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胆量，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禁令，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将独立地建设本阶级的文学艺术，中国的劳苦大众将开始占领文艺阵地。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它带有一切革命新生事物开始出现时的那种难以避免的左的幼稚病。一九二八年左右，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有名论战。“创造

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的成仿吾、李初梨、阿英（钱杏邨）、冯乃超等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初学者的无比锐气，不顾自己理论武装的不够齐全，勇猛地冲上文坛，占领阵地，充当了革命文学的急先锋。这在当时革命正遭受失败，中国变得一片黑暗，哑而无音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就像空谷的足音，就像寂静空气中的惊雷一样，使人们振聋启聩，为之奋起。因此不管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多少弱点和缺陷，他们的文章还是博得了对现实不满、渴望革命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共鸣。鲁迅开始的时候曾经对他们的这种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后来却作出了全面的正确的评价。鲁迅对这些早期革命文学家的弱点的一些批评是中肯的，深刻的。他指出，当时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家，有许多人实际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够和实际相结合，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就可以变成无产阶级。其实，没有和人民群众结合，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必然带上宗派色彩。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往往是相连的。也正因此，我们许多人未能认识比我们更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更了解中国民众之心的鲁迅，未能认识鲁迅的伟大之处，一个时候反而把鲁迅作为论争的主要对象。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党中央开始过问文艺工作，要求停止论争，要求正确认识鲁迅、团结鲁迅，并着手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组织。这个要求得到了鲁迅和其他同志的积极响应和赞同。经过不到半年的准备，“左联”便正式成立了。发起人除鲁迅之外，还有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等同志。郭沫若、茅盾当时不在国内，但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作为发起人。“左联”自它成立之日起，便是党在

文化战线上一面团结战斗的旗帜。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战斗纲领，这个纲领，至今还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的产生，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革命斗争发展的反映，而且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五四”的文学革命，打出了平民文学的旗帜，而左翼文学运动却第一次公开地、鲜明地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质的飞跃，是“五四”以来文化革命的深入。

党在“五四”时期对文艺战线还只有思想的影响，到了“左联”时期才进行了组织领导，并以自己的成员为核心成立组织，这是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是耸立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丰碑！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总结“五四”以来这一段文化历史的经验时说：“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今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把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一切诬蔑诽谤之词统统推倒。

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中，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地下活动中，展开了我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第一次有组织的英勇斗争，开展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创作，用自己同志的鲜血写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初篇章。

“左联”一成立，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出密令，要取缔“左联”，通缉“左联”成员。在反动派眼中，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就是共产党人。十年中，国民党颁布了各种法律和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害革命作家、艺术家。“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等都有同志被逮捕、被杀害。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想把左翼文化工作者斩尽杀绝，把左翼文艺彻底消灭。但是，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左翼文化队伍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下，踏着烈士们的鲜血，经过严重的考验和锻炼，成长发展了。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也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远及日本东京，影响及于南洋一带。“左联”和其他各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了几十种刊物，较早的有《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世界文化》、《巴尔地山》、《北斗》、《文学月报》、《文学》、《文学杂志》、《文学季刊》、《杂文》等，开辟了进步文化的阵地，创作了大量的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左联”还为革命根据地编过文化课本，输送过许多干部和革命青年。鲁迅写了许多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战斗杂文、论著和文学作品，茅盾完成了巨著《子夜》和其它优秀短篇，郭沫若当时亡命日本，除了和国内左翼文化运动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外，还以十分饱满的精力从事历史科学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第一部著作。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出色的序言，他协同鲁迅对“左联”的活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他们两人之间的战斗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左翼作家蒋光慈、丁玲、张天翼、叶紫、沙汀、艾

芜、欧阳山、周文、丘东平等的小说受到了人们的注目。鲁迅特别关怀培养青年作家 他为萧军、萧红、叶紫等的小说 和徐懋庸等的杂文都写了序文。在鲁迅的倡导和扶植下，一批革命青年美术家艰苦开创了新兴木刻。田汉以自我批判的态度结束了他创办“南国社”以来的艺术生涯 成为了“剧联”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于伶等同志活跃在戏剧和电影战线上卓有成绩。诗人柯仲平、殷夫、艾青、蒲风、杨骚都有新的创造。聂耳、星海的歌曲激励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高度热情。作为左翼文化的同盟军和战友，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许多有声望有影响的文化界人士和作家、艺术家 蔡元培、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陶行知、陈望道、吴承仕、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巴金、曹禺、老舍、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曹靖华、周信芳、欧阳予倩、徐悲鸿、林风眠、司徒乔、赵元任、黄自、孙师毅、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等等，他们都曾同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有过交往，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战友，有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由于当时党争取合法的政策，没有吸收他们公开参加左翼文化团体。有的人当时是秘密党员或后来参加了党，他们对我国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是有贡献的。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名字，挂一漏万，但也可以窥见当时进步文化阵势的一斑。

对于左翼文化运动的战斗业绩，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评价。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文艺不可能反映革命根据地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和革命人民的生活，但是，在大量作品中却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混战，农村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的侵略，劳动人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的痛苦和要求。把三十年代左翼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情节的生动和丰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性格的典型化，都达到了新的水

平，把我国现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鲁迅所说，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诬蔑和压迫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的年代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章。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革命先烈，不能忘记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童长荣、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光辉的名字。我们还不能忘记以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民权保障同盟、济难会在那些黑暗年代为营救被捕作家艺术家所作的努力。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勇敢的正义行为。今天还要纪念和缅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期间，文艺界许多英勇牺牲的烈士。郁达夫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死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刀之下，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仅能经得住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也能经得住像林彪、“四人帮”这类凶恶的内部敌人的恶意诽谤和残酷打击。

同志们，上述事实都说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介绍和宣传。

“五四”时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是他的哲学和经济学说。那时候，各派思潮、各种主义都在传播，都有人信奉。学术界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正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是所知无几。“左联”、“社联”成立前后，李达、许德珩、杜国庠（林伯修）、李一氓、彭康、吴亮平、王学文、何思敬、柯柏年、章汉夫、钱亦石等同志较早地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有功劳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用通俗形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普及到人民群众中的最早的尝试。随着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开始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进来。“左联”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就明确规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左联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任务正式提到了我们的议程上。一些同志，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冒着生命危险，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也包括有关文艺的著作在这方面，鲁迅和瞿秋白同志作出了最可宝贵的贡献。《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陈望道以及冯雪峰等同志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鲁迅所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及其他同类著作，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实秋攻击鲁迅是“硬译”，然而这种“硬译”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呵！从此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开始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对于左翼文艺思想来说，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来说，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建设，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由于这个转机，革命文学阵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便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开始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文学艺术的现象，用阶级分析的武器，取得了批判新月派的胜利，击败了民族主义反动文学思潮。斗争的胜利，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力的科学的武器，使左翼文艺工作者提高了掌握理论的自觉性。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贯穿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始终。这个观点的明确确立，是“左联”的一大功劳。

左翼文艺工作者曾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来解决文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左联”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开展了多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左联”根据列宁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文艺应当属于人民的观点，提出了文艺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的口号，发出了全体盟员“到工厂 到农村 到战场上 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个口号的提出，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新的创举。“左联”还在历史提供的活动范围内，进行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比如，创办通俗性刊物，创作民歌民谣，改编名著为通俗小说，建立工人夜校 在工厂组织读报组、办墙报 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 办蓝衣剧社等。但是，当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主观思想认识的限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文艺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当时提出的‘大众化’的口号 确实有‘化大众’的倾向。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以为自己已经“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而大众化，就是要将这种革命意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灌输给大众，去改造大众的落后意识，去教化大众，而较少想到首先要向工农群众学习，要与工农群众结合，改造自己旧的和思想和感情，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变化；首先要教育改造自己，然后才能教育改造大众，否则就很难有真正的文艺大众化。把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真正解决的，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讲话》的最杰出贡献 就是它用科学的世界观 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与群众结合，与时代结合的问题，给革命文艺指出正确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三十年代 我们在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 涉及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在火与血的革命斗

争中，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自由，它必然要受一定政治势力、政治倾向的支配和影响。一些人叫喊“勿侵略文艺”，文艺不要“堕落”成为“政治的留声机”那是别有用心，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学。“左联”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把左翼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更自觉地把自已的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大大地提高了革命文艺的战斗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完全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也还常常解决得不恰当，不正确，还有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特别在重大的革命转折关头，政治往往呈现出剧烈变化、错综复杂的现象，要认清政治形势，正确掌握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就更不容易了。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于观点的不同和认识水平的差异，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论。假如说一九二八年左右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左联”诞生的前奏，那末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左联”宣告结束的尾声。两次争论都是在革命大转折时期发生的，都是这些大转折的反映及其所引起的思想纠纷。当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愿为此而斗争。但是，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以及对各自的口号解释各有不同，究竟哪一口号更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需要，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就发生了认识的分歧。这种分歧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争论，本来是可以经过讨论和实践来解决，应该按照鲁迅所说的，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是，当时争论双方都有一些同志，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顾全大局的看法。对鲁迅许多

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随着抗日统一战线形势的迅速开展和“左”的关门主义的逐步克服，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还是获得了新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总之，尽管左翼文化运动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有许多弱点和薄弱环节，但是，它却从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纪念“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就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要为建立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努力。我们要继承毛泽东同志在《讲话》和其它有关论述中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要使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在我国更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注意研究我国当前的文艺现状，注意总结现代文学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把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提高到真正科学的水平。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理论的丰富遗产，学习哲学和历史及其它必要的科学知识。今天我们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条件比三十年代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了，我们有基本上安定团结的环境，有思想解放的时代条件，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的历次文艺运动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做了初步总结，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一定能造就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

最后，我还要特别指出“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在培养造就人才方面的重大功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同志，在创作和

理论著作方面，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创立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对我国新文化运动，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化成就，使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断在战斗的历程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因此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几十年的战斗中，为我们党造就了大批宣传、文化人才，培养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支生力军无论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从思想到形式，都是极大的革命，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这支队伍在当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是中流砥柱，充当了革命文艺的生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人成了我党我军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骨干。正是经过长期的严峻的考验和战斗，又经过这些骨干不断地培养了大批新人，在全国解放后，才能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事业。今天我们要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重视人才 也应当从“左联”等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历史中吸取经验。

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左翼文化的传统是宝贵的。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对人民赤胆忠心。我们要从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们一定要继承左翼文化的战斗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使社会主义文艺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们要接过前辈们手中的笔，坚韧不拔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历史继续写下去，写出更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无愧于我国和世界人民的伟大篇章。让我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攀登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高峰吧！

《赵树理文集》序

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作编辑出版《赵树理文集》，要我写几句话，并希望将我一九四六年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作为前言。我那篇旧作，作为对赵树理同志创作的全面评价，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他后来还继续写了许多出色的作品。我写那篇文章时，和这位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新星还不相识，只是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全国解放后，我才认识赵树理同志。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之感。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甚至对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他公正无私，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是最可贵的。

我没有把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全部读完，过去读过的，有的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就印象淡漠了。对他作品的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就让那些有专门研究的同志或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专家们去作吧！凡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同意重新发表我的那篇旧文章，为的是纪念我们多年的文字之交和革命友谊。至于那篇文章本身，现在重新来读，说的

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

一九五九年 我们党内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赵树理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曾为此受到了一些同志对他的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同批判过他的同志还是和睦相处。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座谈会上，我曾为此称赞了赵树理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同志的态度。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赵树理同志就没有能够逃过这一关，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书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爱女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赵树理同志的信念，也就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信念，现在终于实现了。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除了更加紧密团结，更加勇气百倍地工作和斗争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八〇年四月五日

载 1980年9月22日《工人日报》

《艾思奇文集》序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先后认识了两位从遥远边疆来的云南青年，这两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在音乐和哲学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左翼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位是著名音乐家聂耳同志，一位就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我初次和聂耳见面的时候，田汉同志开玩笑式地给我介绍这位的名字叫“四个耳朵”我才知道是聂耳，因当时有人在旁，我只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没有深谈。后来，他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赢得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心，也更引起了我对他的敬慕。不幸，正当风华正茂之年，邻邦的无情海水吞没了他的生命。我认识艾思奇同志则是读了他的哲学著作，知道了他的进步活动之后。我专程到读书生活社去拜访了他，作了亲切的交谈。艾思奇同志一九三五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去延安。周立波同志和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他前往延安的同行者。我们在延安和北京，相处数十年，只是除工作上的联系外，私人来往很少。但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一九六六年初，我们同住阜外医院，他曾来探望我，他说我们不要被病魔所屈服，我们还可工作二十年，说时充满了革命的自信和乐观情绪。他走时，我久久地遥望着他的瘦弱的背影，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时光如流，现在艾思

奇同志逝世已经十四年了。《艾思奇文集》即将编定出版，我现在写几句话来表示我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毋须介绍，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生涯开始于三十年代初。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走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终身。

在旧中国的哲学界，除了几个先后卖身投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为人所不齿的老唯心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远离人民的哲学家，他们的倾向互有不同，后来的变化也很不一样，但在当时，他们由于完全脱离人民的斗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抹杀和反对的态度，实际上起了为反动派的统治粉饰升平的作用。艾思奇同志从来同这样的哲学无缘。他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在上海所写的哲学文章就很少空论，这些文章或则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青年，或则向着种种错误的思潮开火。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到一九三五年结集出版成为《大众哲学》一书，是这一时期艾思奇同志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艾思奇同志到延安以后，即在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毛泽东同志对艾思奇同志所写的《哲学与生活》一文予以积极的评价，并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商讨的意

见。毛泽东同志提倡哲学走出课堂，艾思奇同志就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先驱者。在著名的整风运动中，他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这一原则。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比以前的作品显然更加深刻了。全国解放以后，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继续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艾思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工作，给中国的读书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艾思奇文集》收集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些著作，包括一部分早期的著作，作为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入门读物，作为批判哲学唯心主义的战斗成果，至今仍然保有它们的生命力。我们希望，《艾思奇文集》的出版将鼓励当代的青年哲学家们继承作者始终饱满的热忱，在新时期的思想战线上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作出勇猛坚实的努力。

一九八〇年四月

载198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站好岗哨 当好园丁*

同志们要我讲话 我就讲一点个人意见 供大家参考。

一 文学期刊的地位和重要性

文学刊物 在党的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它的重要性，过去我们许多人往往认识不够，关心不够 这是个缺点 今后要改正。

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先行。我们建党也是先有思想然后才有组织。我们共产党人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最彻底的批判者。马克思说革命有两种武器，两种批判，一种是批判的武器，一种是武器的批判。我们这些人生在世界上干什么？就是要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先有批判的武器，后有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都是创办刊物来宣传革命的。马克思办《新莱茵报》列宁办《火星报》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有《新青年》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创办了《湘江评论》。先有革命报刊这个舆论工具，而后才有党的组织。当然这些都不是文艺刊物，但文艺在这些刊物上却占有一定的比重。列宁很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讲党的报纸，当然也讲了党的文学，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载《文艺报》一九八〇年第七期。

但并不是专门讲文学的。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是很重视的，因为那时我们赤手空拳，报刊是我们唯一能够施展身手的用武之地。到了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批判的武器就退居配合地位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出的书刊风行一时，对推动民族解放战争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芦沟桥的炮声一响，就开始了武器的批判，用枪炮来说话是最有力的，这时报刊的作用就是配合的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所谓“革命大批判”名曰“批判”实际与武器的批判相差无几，所谓要文斗，实际变成了要武斗。这种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粗暴批评，都不成其为真正的批判，因为它们都不是以理服人。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大批判”，同以前的某些粗暴批评性质根本不同，它把同志当敌人，要致人于死地，因此造成了我们民族的一场大灾难。现在我们清除了“四人帮”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但今后是否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了呢？斗争还会继续，而且还会是长期的。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放下批判的武器，而要学会更善于运用这个武器。真正的批判 要摆事实 讲道理 要有科学分析 要有说服力 而不是强词夺理 要旗帜鲜明 要尖锐泼辣 又要与人为善 而不尖酸刻薄，做到使人心悦诚服。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要战斗，战斗就不能只有防御，没有进攻，批判就要有点进攻精神。不要一听到“进攻”二字 就感到紧张。这是“心有余悸”是“神经脆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既然要批判整个旧世界，彻底改造旧世界，我们就应当向阻碍我们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进攻，批判各种“左”的或右的思潮，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文艺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批判，通过形象思维，通过艺术形象来

进行的一种批判。谁能说艺术作品不是批判现实生活、批判现实社会呢？三年来我们的许多文艺所以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作品所以引人注目，就因为它发挥了批判精神。至于在这种批判当中，有什么不当之处、不足或过头之处，可以经过讨论研究，相互交流总结经验，以力求改进。但它的批判精神是好的，是应该受到鼓励、保护和正确引导的。我们现在的社会虽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旧事物的残余还大量存在，有时还伪装新的面目出现，新旧斗争错综复杂，互相交替又互相交错。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既要热情歌颂新事物，又要严峻地批判旧事物，为提高人们的精神道德品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出更大的努力。

这次开会，就是表明党中央十分关怀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就要求文学期刊办得更好，更有生气，源源不断地向人民输送更多更好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和评论，使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物，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中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几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文学刊物，解放思想，广开文路，整个的说，是办得有成绩的。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作家，发表了很多新作品，短篇小说评奖，戏剧、电影评奖以及其他各种评奖，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取得了成绩，但也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问题。任何事情只有成绩，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要不要纠偏，首先要问有没有偏向 又是什么样的偏向 偏向无非是‘左’倾和右倾。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有偏向就要纠正，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有偏向，就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纠正。不能说今天整个文艺界都发生了偏向，至少我看不出中央有这种意见。邓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祝词和中央十一号文件是正确的。我们

应该贯彻执行。

开这次会，既不是什么纠偏，也不是削减刊物。现在文艺刊物空前之多，应该说是好现象。是否需要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调整得更合理一些，各地同志可以协商解决，不要采取硬性规定，一刀切的办法。我们希望文学期刊要各有特点和个性，省、市、自始区的刊物需带有地方的和民族的色彩。

文学刊物是个重要的思想阵地。回想三十年代，为了争取一块报刊的小小阵地，要费多少力气，冒多少风险！现在我们文学期刊有一百多种，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更加重视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编辑人员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刊物办得不好，就是对革命事业没有尽责。报刊是我们党的思想阵地。在这个阵地上，我们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我们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反对极左路线的残余影响，反对资本主义、封建宗法主义思想 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家长制的思想和作风 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还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思想战线上所要进攻和批判的对象。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向旧世界进攻，向一切抵挡我们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挑战。我们不能回避斗争，超然于斗争之外。在斗争中，我们要站在积极的进攻的地位而不是消极地把自己摆在被进攻的地位。我们要批判旧世界。官僚主义、特殊化、家长制等等现象是属于旧世界的，而不是属于新世界的。进攻的时候，可能由于我们目标没有选对，或者枪法不高明，瞄得不准，不但没有打中敌人，反而伤了自己人。只要我们善于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 以后就打得更中 瞄得更准了。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我们是思想阵地上的一个战士，一个指挥员，

要学会战斗，学会进攻，而不是害怕进攻，更不是消极地把自己摆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从前中宣部有过一句话，就是要给党中央当哨兵，当参谋。扩大一点讲，所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要给党、给人民当参谋、当哨兵。既然是个思想战线，既然还有阶级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你怎么能不当哨兵，怎么能没有敌情观念，怎么能没有是非观念？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学刊物就叫《前哨》，我国‘左联’最早的一个机关刊物也叫《前哨》。但当哨兵这个词，也有片面性，因为当哨兵的任务主要是侦察敌情。现在有些同志，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敌情观念成了条件反射，似乎搞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敌情。由于世界上还存在阶级斗争，我们国内外都还有敌对分子，我们必须有敌情观念，千万不可麻痹。了解敌情仍然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唯一的任务。文学期刊的编辑，不但要做个哨兵，还要做个勘察员。勘察我们国家的人才、作品。这是我们国家的财富，这些财富，许多还未被发掘和被重视。如果单讲当哨兵，那就好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敌情。我认为不仅要当哨兵，更重要的还要去当勘察员，勘察我们国家的人才的财富、精神的财富。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才被埋没、被漠视。我们的刊物要让他们显露头角，英雄有用武之地，不致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编辑人员应尽的责任，这种事做好了，就是大功劳。荣誉应该属于编辑同志。

文艺刊物既是思想阵地，又是百花园地；我们的编辑既要当好思想界的战士，又要当好文艺界的园丁。对于人才，不但要善于发现，还要善于培养。百花齐放，各种花都要放出来。要放出的好花、香花，不可避免地也会放出一些不好的花、有毒的花。一个园丁的职责就是要善于选种、育苗，栽培好花、香花。不过要求

每朵花都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园丁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做园丁的要锄除毒草，保护香花，特别要细心爱护那些新生长出来的嫩芽。它们比较脆弱，容易被无情的风雨所摧毁。才能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有才华的作者写了一两篇不好的作品，要积极予以适当的批评帮助，使他的才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能对他责备求全。要爱护人才，严格要求和正当批评，这也是爱护的方法之一。

文艺工作取得成绩，文艺期刊的编辑是有功劳的。如果刊物出了差错，发表了一两篇坏作品，编辑要为作者分担责任，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又要为编辑分担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到编辑和作者身上，要使作家有创新的勇气，评论家有理论探索的勇气，编辑有鼓励探新的勇气。编辑自己首先要有鉴别的眼力，对党的事业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办刊物和经营出版事业，都要有事业心。日本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社长，现在半身已瘫痪，但他每天还在想着他那个出版社的出版物如何扩大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去 除了欧美 还要扩大到非洲、拉美去 而且还在想二十一世纪的规划。资产阶级有眼光的出版家，他们会想到非洲，想到拉丁美洲，想到二十一世纪，难道我们的出版家就不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吗？我们的宣传、出版部门，多么需要有这么一批有强烈事业心，有进取和革新精神的人啊。

二 执行“双百”方针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从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后 经过了几次反复和挫折 遭受过林彪“四人帮”彻底践踏。他们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怎么可能容

许“双百”方针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实行这个方针的最大障碍，我们又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今后不管碰到多少新的困难、阻力或挫折，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我们共产党员，全体人民只有执行宪法的义务，没有违反宪法的权利。当然宪法还只是纸面上的东西，要付之实践，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有充分精神准备。我们不要以为实行这个方针会一帆风顺，这是不可能的，要准备重新经受考验。这个方针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工作的一个创举，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试金石，将考验每个人，也考验方针本身。代表极左思潮或思想僵化的人，他们是要反对或不赞成这个方针的，有的人巴不得这个方针失败。代表自由主义思潮的人，则从右的方面来败坏这个方针。因此，我们要有精神准备，不怕遭受挫折和风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双百”方针首先要靠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也要靠人民内部正常的自由讨论的开展。在这种自由讨论中，可能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遭受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我们执行这个方针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慎重从事，决不能掉以轻心，把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看成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要认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斗争过程。

文艺思潮，是整个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的反映。我们常讲，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确是这样。社会上、党内外的各种思潮，都反映到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中来。所以，社会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文艺总是首当其冲。有的同志抱怨说，为什么社会上出了什么问题，都怪到文艺头上呢？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既然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是当代各种思潮的触角，触角不灵敏，那就不成其为文艺了，文艺也就没有生命了，灵魂的工程师自己也没

有什么灵魂了。文艺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有各种错综复杂的互相矛盾的现象，作家怎样去挑选其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来加以反映和概括呢？我们希望作家反映生活要真实正确。革命作家要有丰富的感情，但也不能感情用事，要对事物有锐敏的感觉，但也不能神经太过敏，对任何事物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家只能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运用自己特有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来反映生活，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勉强他的。我们所要求于作家的，只是希望他们反映生活更真实，更动人心魄，时时刻刻把人民放在眼里，注意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无论作家或评论家，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呢？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不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对他们采取同志式的帮助的态度。有些文艺上、理论上的是非问题，一时还不易分辨，不要过早地下判断作结论。我们编辑同志，要积极地帮助作家们，帮助他们深入生活，扩大他们视野，接触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不要绕开矛盾走；出了差错，就为他们分担责任。我们处在大时代的斗争旋涡之中，想要逃避、离开，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等于说文艺可以和政治无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而不可分的，你要离也离不开的。我们需要根据长期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正确地处理文艺和政治两者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使政治有利于开阔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眼界，保证他们创作的广大自由，而不是限制和束缚这种自由，更不是对这种自由横加干涉。文艺不能脱离当前政治形势，文学期刊更要和当前政治息息相关。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辨别风向，分析形势，但坚决反对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看上级脸色行事的恶劣作风。我们观察、认识形势要根据党的方针、路线，并经过调查研究，独立思

考。不要靠打听小道消息来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襟怀坦白，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错误；敢于解放思想，也敢于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想。如果真是自己错了，就大胆承认、改正，决不文过饰非或推卸责任。我们不要怕批评，包括并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不要听到别人指摘和批评文艺界的某些消极现象，就认为别人是否定文艺工作的成绩。对一切事情，我们都应该采取客观的、冷静的、虚心的态度 经过反复思考和调查研究 然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倾向问题，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包括文艺工作在内，从领导思想的角度来说 有没有‘左’倾或者右倾的问题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既反“左”也反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不好的，但是一般都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不能随意提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林彪“四人帮”所给予我们的惨痛教训，要永远记取。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注意思想倾向的问题，一种思想倾向，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明显、不露骨，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形成一种思潮，一条路线。所以遇到“左”或右的思想倾向的萌芽，固然不要任意夸大，但也必须及早注意，防患于未然，防止它继续发展。对于文艺作品，一般不要用“左”或右这类术语。“左”和右都是对领导思想倾向讲的 这是政治的概念，对作品的批评一般不要用这类概念，而应采取思想评论、艺术评论的方式 允许充分的自由讨论 可以批评 也可以反批评。从领导思想的角度来说，对文艺工作，我们既要反对粗暴干涉，也要反对放任自流。粗暴干涉和放任自流，看来好像是相反的，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不能横加干涉，就放任自流，放任自流出了问题就振振有词地横加干涉，说明这种干涉之有理。这样，我们文学艺术怎么能健康地、自由地发展呢？要加强党对

文艺工作的领导，就要改善这种领导，遇事多同群众，包括文艺工作者商量，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要把文艺看得太神秘，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关于思想问题、艺术问题，我们只能采取平等的、同志式的商讨的态度，不可一意孤行。涉及重大政治性、原则性的问题，党和政府就必须过问，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口头上批评了文学期刊的某篇文章，某篇报道，或者发了内部通报，以引起大家注意，这不能说是“粗暴干涉”，也不能说是违反“双百”方针。难道“双百”方针可以不要批评，批评就是违反“双百”方针吗？这样理解“双百”方针是不对的。问题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批评的分寸和方式是否适当。我们在进行任何批评的时候，都要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全国文学期刊整个来说，是办得好的，有成绩的。一个期刊发表了一两篇什么坏的作品，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一两本什么坏书，也不等于否定这个期刊或出版社的整个成绩。我们信任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协会的负责人，他们中间很多是思想解放的，也有鉴别的能力，但也要看到，有一些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还处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敢提出新问题，不敢发表新意见，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这对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错误思想，要严肃批评，但也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文学期刊以及其他文学出版物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和有害的作品，内容低级庸俗、粗制滥造，为了赶时髦，图私利，不惜贻害社会和广大青少年，这就引起了舆论界的正当不满和批评。我们的文艺界要虚心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应为此感到委屈。对这些不良现象，我们要有切肤之感。最近，我看到了张骏祥同志的一个谈电影创作问

题的发言，他说有些电影违背生活逻辑，单纯追求技巧，盲目模仿西方。我们要向外国学习，吸取他们的一切于我们有益的长处。但不从生活出发，不根据自己的民族的传统和特点，以模仿外国为荣，这就不对了，我还看了新凤霞同志的一个谈戏曲问题的发言，她说戏曲演员要提高思想和表演艺术，对表演要严肃认真，不要迎合和迁就某些观众的低级落后的趣味，要引导观众，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这些意见，都是讲得好的。这些问题，同文学期刊不一定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文学期刊，对文学艺术界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现象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难道它们不应当出来说话，提出改进意见，提出劝告，提出批评吗？在我们的文学期刊上，对文艺界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诚恳的善意的批评，人们决不会怪你们多事，而是只会感谢你们的。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不少人还“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希望同志们拿出勇气来，不怕别人批评自己，也敢于批评别人，不怕得罪人。批评对的就接受，不对可以反批评。我们的刊物一定要保证有不同意见的辩论，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如果只有一方的意见，那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不也成了一言堂了吗？

三 正确对待文学编辑和出版工作

首先，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重视这个工作。

其次，要解决文学出版工作的条件。编辑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要保障他们有一定时间接触群众生活和自己写作。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有些立法，定些条例。

当然有法，也不一定全能实行，但总比没有好。作家、艺术家的权益问题，如版权、版税、上演税等等，长期没有很好解决。希望文化、出版部门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使大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最后是对编辑人员的希望。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服务精神，要有使别人名扬四海，而自己却默默无闻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作品原稿是编辑阅读过、挑选过、甚至修改润色过的。他们付出了劳动，他们为党和国家发现和培养了人才，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的。他们是在百花园中辛勤劳动的园丁。我们要尊师，也要尊编辑，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师。当然，提倡尊重编辑，首先编辑也要尊重作家。

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都要注意培养评论队伍。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莱辛、狄德罗、别林斯基当年都是刊物的著名评论家。评论家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现在，文艺也像其他战线一样，要把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艺，首先要繁荣各类文艺创作，要有好的作品，也要有好的理论；要建设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要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科学理论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使之进一步得到发展。要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培养评论家。我们的评论家需要有比较丰富的文学、历史、哲学知识及有关现代科学知识，要懂得党的政策，要熟悉人民生活，还要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真正了解他们。一个出版社和刊物，在自己周围至少应有两三个有水平的评论家。我们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不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要教条主义的公式化的批评。要广开文路、才路。全国性的文学刊物还应特别注意地方刊物的作家和评论家，要看到五湖四海都有人才，要多发表和推荐他们的作品，否则容易形成

宗派小圈子，同广大的作者和读者脱节。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培养评论家和扩大评论家队伍，不利于百家争鸣的。要特别注意培养业余评论家，他们往往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高明独到见解。这样，我们有了广大的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的队伍，我们的文艺兵种就齐全了。文艺刊物既是个思想阵地，又是百花的园地，那就需要我们在这个阵地和园地上演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戏剧来。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我们的编辑和作家、评论家们紧密团结起来，站好岗哨，当好园丁，对党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设社会主义的、 民族的音乐文化*

讲几点意见，和同志们商讨，讲得不对，请你们指正。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什么叫着重点转移呢？就是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转折。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现在重点由斗争转入建设，当然，建设过程中也还会有斗争。这个转移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不但要从物质的建设，还要从事精神的建设，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与它相称的精神文明。要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建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就音乐来说，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同我们国家地位相称的、无愧于中国人民的高度的音乐文化，使之能够站立于世界先进音乐文化之林，放出自己民族音乐独特的新的光彩。这应该是我们一代音乐工作者的共同使命。

音乐文化是人类精神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产生最早的是音乐、舞蹈和绘画。我在去年音协举办的灯节茶会上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要“制礼作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日在音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民音乐》一九八〇年六月号。

乐”要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制礼作乐”。“作乐”的任务落在我们音乐工作者的肩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作曲家写了许多革命歌曲，那也是“作乐”那个“乐”对动员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曾起了巨大的作用。现在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乐”。这个“乐”要和这个宏伟的建设任务相适应，我们的国家要有现代化的新水平。

我们的祖先很聪明，讲上层建筑只用了四个字，就是“刑、政、礼、乐”。“刑、政”两字代表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礼、乐”代表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乐”代表整个艺术，“礼”是代表整个礼教。“刑政礼乐”四个字把全部上层建筑都包括无遗了。我们现在也要解决“刑、政、礼、乐”问题。只是内容和形式都不相同了。我们要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发扬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建设精神文明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是宣传一阵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建设任务，要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建树。

古代的人讲“礼、乐”，也讲得相当好。什么叫“礼”？什么叫“乐”？“礼”是讲“分”，讲“差别”，讲“等级”；“乐”是讲“和”，讲“协调”，讲“和谐”，这是有道理的。“礼”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封建等级服务的。你违背了这些，就是非礼，中国的封建社会就靠这个礼法维持了两千多年，“礼”最后就变成了“吃人的礼教”。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取消“封建等级”，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法权”，这也是讲“分”。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按劳付酬，还不能废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反对的是特权和特权思想。最近制订的党内生活准则也是讲“分”，讲“差别”的，但内容和意义却同过去完全不同了。历代剥削阶级一方面讲等级，

讲特权 不准你僭越 另一方面用音乐来调和 来同化你。音乐本是人类情感交流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同时也成了阶级调和、阶级融化的一种手段。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乐”也是要起“和”的作用，就是要团结和鼓舞我们的人民同心同德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奋斗，把我们人民的精神境界提高到共产主义道德的水平。

第二，评奖是一种发展音乐和一切文艺的好方法。

对文艺和科学，采取奖励的方法是需要的，有好处的。奖励，主要不是物质奖励，而是精神奖励。它应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一种重要的、经常的方法。要使这种方法，成为制度 并使之不断完善。这也是“制礼作乐”所不可少的。各类脑力劳动者都应受到人民的尊重。他们的优异劳动成果应当受到鼓励。评奖不过是鼓励的一种方法。

十五首歌曲的评奖，采取了群众投票的方法。有的同志认为，单靠群众投票不一定真正代表民意，但群众投票，还是有好处的。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编辑部十五首歌曲评奖，应该肯定。不是说每首歌曲都好，整个来说是好的。当然，它还有不够完善之处 没有完全做到“三结合”即群众、专家和领导“三结合”。最近美术作品的评奖 也有类似的缺点。他们也是采取群众投票的办法。油画就没有一个头等奖，未免美中不足！还有戏剧、电影等的评奖，基本上采取了普遍鼓励的办法。我们评奖既要照顾全面，又要注意避免平均主义的倾向。有奖，还要有评。评上了的作品要奖，得奖的作品，也还要评，让大家自由讨论，可以讲好，也可以讲坏，并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有定评的，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群众投票要和专家、领导“三结合”。每一

个艺术门类的奖励，一年奖一次也好，两年奖一次也好，三年奖一次也好。奖有好处，当然也不能太多、太滥。

第三，音乐创作的水平。

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正如这次座谈会大家所讨论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我们的音乐创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各类的音乐作品和各类演唱、演奏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这是问题的关键。音乐创作的领域非常之广，它的形式、体裁、风格是最多样、最广阔的。我们的戏剧、电影、广播、电视都离不开音乐。

对三年来歌曲创作的成绩应充分肯定。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是很有成绩的。音乐界的同志谦虚，说短篇小说、戏剧、电影等等都成绩很大，唯独音乐比不上。这种谦虚态度是好的。我看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有成绩，也都各有不足之处。总之成绩是主要的。

“四人帮”时期只准唱样板戏，除了少数几首经过篡改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歌曲，就没有什么革命歌曲了。现在完全改观了，歌声多起来了，轻音乐也流行起来了，各种地方戏曲，歌剧也活跃起来了。这种情况不但“四人帮”横行时期，十七年中也是少见的。三年多来，文艺的成绩是很明显的，谁也不能否定的。至于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现象，这并不奇怪，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难克服的。

过去一些歌唱伟大领袖的动人歌曲，今后还要歌唱，还要继续创作。但歌颂领袖也不能把领袖神化，也不能超过歌颂人民。人民是永存的、不朽的。最伟大的领袖也必然由于自然法则要有所更替。我们党推倒了林彪、“四人帮”所加于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赞颂

任何伟大人物的时候，也不要阿谀不实之词。无论电影、文学、回忆录等等，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思想路线。传记文学和电影传记片要忠实于历史，艺术的想象和夸张也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对于人民，对于党要热情歌颂，但也要实事求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要靠提倡艰苦奋斗而不是靠什么“歌舞升平”来鼓舞人心。

希望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更要深入到广大群众的生活里去，从中吸取营养和灵感。现在许多歌曲创作像其他文艺创作一样，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其中虽也有十年动乱所留下的某些“伤痕”和从外界所受的某些不健康的影响。音乐是一种可以超越普通语言来感染和交流人们情感的东西。由于过去长期同外界相隔绝，一同外来的文化相接触，就必然会受到影响，有好的影响也一定会有不好的影响。现在对外开放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起来了，可以互相吸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好事。问题是我们的作曲家、诗人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东西，要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土壤，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永远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自己民族的色彩，这是最重要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的生活，不注意提高他们的情操和美感，单纯去追求“新奇”、“卖弄”、“技巧”，虽可博得一时的掌声，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我们的作家一定要注意表现工人、农民及各行各业在为现代化建设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人民的丰富的思想感情。希望诗人、作曲家以及广大音乐工作者要多为工人、农民创作更多更好的东西，不要只听到了部分听众的掌声，就踌躇满志了。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工农兵各行各业的干部和群众的需要。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要

保证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我们的任何艺术都要有它自己的风格，风格就是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我们传统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曾创造了各种有名的流派，为什么我们现代声乐的演唱艺术家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风格，形成自己的流派呢？我们要有高尚的艺术风格。一味去迎合观众、听众的不健康的落后的趣味，是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风格的。

第四，要有抒情歌曲。

这次会议中讨论较多的是关于抒情歌曲的问题。文艺的百花园中，没有抒情歌曲这朵花，是不行的。这方面过去我们做得不够，今后应当注意这朵花，使它健壮地成长。有人耽心抒情歌曲发展起来是不是会影响革命歌曲呢？我看这种耽心大可不必。我们提倡的抒情歌曲，抒的是人民之情，革命之情，健康之情，优美之情。使人消沉颓废的靡靡之音，当然是人民所不需要的。文学艺术从来包含有抒情、叙事两方面。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一再讲需要有抒情歌曲，他自己也领着唱《洪湖水，浪打浪》。文艺作品如没有抒情，那算什么艺术创作！叙事作品也有抒情，叙事、议论和抒情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抒情歌曲应在各种歌曲形式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中国古代讲美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外国讲美也讲崇高和优美。人的生活中，不能只有严肃紧张而没有轻松愉快，音乐生活中也不能光有进行曲而没有抒情歌曲。我们的抒情歌曲，既要柔美，又要刚健，既要使人愉悦，又要鼓舞人心；它和进行曲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习惯讲文化娱乐，把文化和娱乐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人不能老是紧张，也需要文化休息。抒情歌曲、轻音乐，正是调剂人们的精神生活所

必需的。抒情歌曲要不要加“革命”二字，这不应成为争论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革命抒情歌曲，但第一不是把它当标签，第二不是排斥，而是需要一切有益于人民精神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抒情歌曲。

第五，传统和革新的关系。

我们要继承和发掘自己民族的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代音乐的传统，更要继承近代和现代的“五四”以来的特别是我们渊源所自的三十年代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的传统，并使之进一步加以发展。传统的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还要演唱，更重要的是继承老一代作曲家的革新精神和创作经验。聂耳、冼星海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当时技巧比他们高明的音乐家还有不少，为什么没有产生他们那么大影响，没有得到他们那么高的声誉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唱出了人民的声音。我们要学习聂耳、冼星海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历久不衰，至今还可以演唱。可是他们所表现的那个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演唱他们的作品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了。杜甫这么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好诗，至今还被人传颂的也只是极少数。传统是很顽强的东西，可以持续几百年，几千年之久，但终究要受时间淘汰。荷马的诗是永存的吧，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念荷马的诗？希腊的剧作是永存的吧，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演希腊的悲剧或喜剧？任何事物都是要受时间淘汰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古人知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艺总是要随时代而革新。传统要革新，学

习前人要超过前人。聂耳、冼星海不能超过吗？我们新一代的音乐家们应当超过他们。

第六，向外国学习。

外国音乐，不论是古典的和现代的，只要是对我们有益处、有启发的东西，都要学。要学它们好的东西，坏的、腐蚀我们的东西，不但不能学，而且要加以抵制和批判。自从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那种反动的、愚蠢的锁国政策，结束了长期同外国文化隔绝的状况，我国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了。不论世界如何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怎样错综复杂，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各国人民友谊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是不变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古老的帝国主义的逻辑早已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了。我们今天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以更积极、更自觉的态度来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我们在向外国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吸收，也善于批判。现在是世界交通空前发达的时代，十几个小时可以飞到美国，两个小时就飞到了日本，文化交流比之过去是频繁密切得不可比拟了。最近报上宣传“鉴真和尚”回国探亲。一千多年前鉴真和尚六次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日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向外国宣扬他所信仰的佛教同时也宣扬中国古代的文化。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信任任何宗教。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要向世界的人们宣传这个真理。这位古代高僧的精神，今天不是也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

中国古代音乐中的所谓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原一带的音乐。楚国的音乐叫楚声，它对中原的音乐来说，也是外来的。屈原把

楚国的民间音乐吸收了，创作了《离骚》这样的诗体。汉代以后，印度的文化传到中国来了，主要是佛教和佛学思想，对于中国的哲学、诗文、雕塑、绘画和音乐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外来的影响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时代，更大规模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当时十部乐只有两部是汉民族的音乐，其余八部都是西域的，就是现在的新疆以及外国中亚细亚一带。只有吸收外来的营养，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我国现代音乐文化是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难道现在西方的音乐就没有可吸收、可学习的东西了吗？难道一定要把德彪西一笔抹杀吗？资本主义世界走向没落，可是文化是人民创造的。资本主义制度没落了，统治阶级变反动了，但是人民并没有没落，人民仍在前进，仍在创造。

雅乐同俗乐，从古以来就有对立。“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恐怕永远会有。我们需要有“阳春白雪”，但也不能轻视“下里巴人”。现在所谓流行音乐，我们对它也要有分析。流行音乐大概属于“下里巴人”，是高级的专门音乐家所看不起的。民间音乐，民歌民谣，民间吹鼓手，都是“下里巴人”。大城市中流行的则有迎合市民趣味的所谓酒吧间音乐，也是“下里巴人”。高级的音乐可以说无不是从“下里巴人”中吸收了营养的。美国有名的爵士音乐原来是黑人音乐，不也是“下里巴人”吗？过去我们抗战时期的许多歌曲很流行，不也是流行歌曲吗？从来电影歌曲也有很多流行歌曲。不应以贬低的口气来谈论流行歌曲，我们需要有好的高质量的流行歌曲。

港澳的流行歌曲有好的，也有不少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我们的作曲家和歌唱家当然不应受它们的影响。但对所谓

流行音乐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可一概否定。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要学习别人的某些长处，但不能学落后的、庸俗的东西。要重视观众的正当需要和爱好，但决不能去迁就和迎合他们的落后低级的趣味。我们对观众也要进行教育，要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和水平，艺术家不能满足于某些听众的掌声，而要帮助教育和提高听众，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保持人民艺术家应有的尊严。

第七，音乐要不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的音乐，和一切其他艺术一样，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反映和推动了革命的政治。但音乐活动的领域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其广泛的，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简单地以为政治服务来概括的。轻音乐为什么政治服务啊？难道就能因此排斥或者硬要给它贴上政治标签？这样就容易导致限制艺术创作的广阔自由，把政治庸俗化，助长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较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涵义，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需要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 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服务。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统一体，有阶级、阶层的区别，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区别。我们文艺只能满足人民正当的、健康的、进步的需要，而决不能迎合他们不正当的、庸俗的、落后的需要。任何时候我们的艺术都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追求所谓“票房价值”。

第八，要重视音乐教育。

要把中小学的音乐教育课程恢复和健全起来。美育应列入课程计划，成为整个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报刊上提倡学生要讲礼貌，要有文明行为，这是很需要的。中小学都应重视美育，德、智、体、美都是培养文明行为和提高道德风尚所不可缺少的。专门的高等音乐学院毕竟是少数，要提高和普及音乐文化，还要靠中小学校中的音乐教育和广大群众的歌咏活动。军队的战斗歌曲，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所必需的，也是人民的需要。不但部队，工矿企业、服务行业、机关、学校都要广泛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并从中发现和培养音乐人才。

我曾建议，音协要同广播、电视、电影、戏剧各方面合作，以电台为主，成立一个包括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艺术委员会，作为咨询机关，定期商讨电台的音乐、戏剧节目问题，以不断改善和提高广播节目的水平。电台每时每刻都在向听众广播，没有音乐、电影、戏剧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通力合作，不依靠社会力量，单靠广播艺术团的力量，是不够的。我曾向张香山同志作过这样的建议，他也赞成。这样可以把音乐战线，包括电影音乐、广播剧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都集中通过电视和广播来传播。加上广泛开展业余的群众歌咏活动，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处处有歌声，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的、高度的音乐文化就一定会繁荣发展起来。

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你们准备在昆明召开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要我讲点意见。我对美学没有什么研究，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本书，^①也没有特别研究，但我一直支持美学研究，支持你们开这个会。

现在，我就开展美学研究工作的问題，谈一点个人的想法。

一 四化建设需要美学

对于美学的研究在遥远的古代就开始了。历史上许多思想家、艺术家都对美、自然美、艺术美、人的美感等问题发表过看法，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美的问题就曾提出过不少见解，但把关于美的研究正式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很晚的事，一般从鲍姆嘉通 1714—1762 发表《美学》(1750)算起。鲍姆嘉通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逻辑学研究理性认识，伦理学研究意志，这是已经确立了了的，那么还应该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去研究情感，即感性认识的问题。正是他首先建议并设立了这样一门科学，起名为“埃斯特惕卡”(Aesthetica)，即“美

^①指《生活与美学》，即《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学”。

鲍姆嘉通的美学理论在美学史上并不见得占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对后来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他以后，“美学”这个名称逐渐被人们所沿用。美学与其它学科的界限也逐渐清晰起来。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对美学问题提出过系统的学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半本，作为他的三大批判之一，是专门讨论美学问题的。黑格尔更把美学当作一个重要方面纳入到他的庞大的哲学系统之中。可以说，美学是在近代才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的。

我们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西方许多近代科学学科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才开始传入中国。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在中国最早进行研究的有王国维和蔡元培。蔡元培提倡美育，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他说文化运动不要忘记美育。虽然他搬来的还是康德的那些东西，但在当时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颇有创见。鲁迅也非常重视美育。三十年代，鲁迅更是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他和瞿秋白等同志一道亲自翻译了不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著作，例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人介绍了西方唯心主义美学，例如朱光潜同志的《文艺心理学》和《谈美》这两本书在当时颇有影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主要是克罗齐的，朱光潜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对美学研究用力最勤。全国解放以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力求用新观点来从事美学研究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重视美学的研究和教育，不仅成立了美学协会，出版美学书刊，而且注意在大专院校积极培养美学专门人材，甚至在中学里也设立有关美学的课程。二百多年

来，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所以能够确立，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是因为人们的审美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欣赏）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同时给予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阶级斗争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影响。有哪一个人在对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能够完全不带有审美的成分呢？有哪一个人能够与艺术完全隔离呢？没有。可见，美学所研究的问题可以说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密切关系。社会越是向前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越高，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显示出越益广泛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应该充分估计美学的重要性，应该把开展研究美学问题的工作放到一个应有的恰当的位置上来。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美学若干基本问题展开过讨论，对推动我国的美学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六十年代初期，一些文科院校开办了美学专题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建起了美学教研室，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机构也开始组织编写并出版美学方面的教科书。可惜的是，这些刚刚兴起的工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十年浩劫之中，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整个被宣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连美学这个名词也被看作是坏东西，消灭得无影无踪了。“四人帮”垮台之后，美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才重获新生。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们的美学研究和宣传工作还很落后，我们的美学队伍还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有不少美学部门至今仍是空白，对国外美学研究的状况也所知甚少。目前在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确实有一股渴望学一点美学知识的很高

的热情。这种追求美的热情是我国人民在清除了“四人帮”之后，精神上获得解放的表现，是十分可喜的事情。它反映出，人们经过十年动乱，饱尝痛苦辛酸，看够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表演和由他们所造成的无数丑恶现象之后，要求过真正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许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在重新探索着思考着理论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的问题。现实生活新的艺术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美学问题，有待我们回答。可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就会提出一系列赋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美学课题，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必须把美学工作迅速地搞上去。

二 努力建立与现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

我们用什么观点来研究美学呢？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也许我孤陋寡闻，我还很少看到世界上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专门论述美学的书，也许有，我还没有看到。

美学在历史上一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与马克思同时稍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唯物主义观点对美作了说明。他的《生活与美学》尽管篇幅不大，却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在美学上是一个革命。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解释美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虽然涉及到美的问题，并且据说曾试图写有关美学的著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都没有来得及对美学作系统的考察。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同志

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历史性纲领性的文件，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但也都还不是专门的美学著作。

马克思主义出现一百多年，普列汉诺夫是最早用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了艺术的起源和原始艺术的发展。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对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作了探索。他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但是他也并没有全面地系统地研究美学的课题。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学的现代人中，卢卡契算是比较著名的了。他的著作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过去我们一直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现在看来应该再仔细分析和研究一下。看他的观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虽然他的文章有些晦涩难懂。我们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美、美感这种现象，对美的产生和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

为了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美学工作者无疑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彻底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或者说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又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而仅仅是开拓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些话都是很正确的。可是我们自己有时却喜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到处套用，以致在有些场合，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向来把人类的认识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永恒过程，认为每一种学说的真理性如何无一例外地都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而

后定。

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必须承认和尊重事实。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的确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都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世界上出现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没有估计到的情况。在自然科学的不少领域，科学家们获得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发现。二十世纪以来，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控制论等学说的建立，已经根本改变了人们在十八、十九世纪所形成的一些对于物质世界的重要观念。随着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今天已经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以蒸汽机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时代，跨入了以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为中心的新的更高级的科技革命时代。这样巨大的变化就必然会在各个领域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用新的社会实践经验检验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今天的历史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容纳和吸收新的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有生命力。只有用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

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正确的运用和发展，当然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冲破一切障碍，克服一切险阻，同各式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思潮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才能回答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不就成了一个封闭的僵死的东西了吗？我

们的认识不就永远停滞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了吗？所以，当我们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去研究美这种现象的时候，决不是提倡那种翻来复去只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引章摘句的神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那样做是不会有出息的 只能害人、害己、也害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也毁了科学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我们总的指导原则，但是光有了这种最一般的指导原则还不够，还必须根据美学的特性和我们自己民族的特点探索和掌握一些研究美学所不可缺少的正确的研究方法。科学史上的无数实例已证明，没有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就难于取得良好的科研成果。

应该看到，美学实质上是一门跨界学科。它和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 和 各门艺术理论等多种学科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特点。因此研究美学一定要广泛吸取各有关学科的科学成就，要注意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和综合发展的特点。同时还应注意吸取和应用一些已被实践证明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先进的科学方法论，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探讨美学问题。另一方面，美学本身也可细分为多种不同的专科，除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原理外，还要分东西方美学、中国美学，以及各个艺术部类的美学等等，要组织专门人材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在美学这个领域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这是文艺理论中一个最根本的任务。各个艺术部门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某一方面讲，归根到底是美学问题。我们要对美学内部各分科之间，以及美学与其它各有关学科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探索，以利于做出适当的安排和配置，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得到共同的较快的发展。

在这里还需要谈一谈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总

的原则，但不可做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美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本质、美感、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真善美的关系等等，都是一些高度抽象的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对这类理论问题的探讨都直接地与某个非常具体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那是一种狭隘的简单化的作法。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有不同的等级，理论的深度有不同的层次，这就决定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也表现为许多等级和层次。不同性质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还会有不同的形式。所以，把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随意地斥之为“从概念到概念”、“理论脱离实际”是不对的。

但是，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科学的理论概括工作，必须建立在对大量可靠的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当然，所谓“资料”，不一定都是指直接的感性的实践经验，它的表现形式随着理论概括的水平而变化。不同层次不同特性的理论概括，需要不同形式的与之相应的“资料”。如果把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解为一切实理论工作都必须直接地去整理概括那些最初级最原始的感性材料，那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全面地搜集和掌握一切相应的有关的资料，不在资料上下一番苦功夫，甚至单凭坐在家里冥思苦想，那是绝不会得出什么有科学价值的成果的。所以，为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要提倡深入的理论研究，又要将这种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现实生活和艺术实践的大量资料的坚实基础之上。

三 整理几千年来中国的美学遗产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外美学史进行研究，是建立马克

思主义美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我们要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需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的美学思想，需要探索美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因此，美学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西方、东方和中国的美学思想史。我们是中国人，对研究中国的美学遗产肩负着特别重大的责任。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过去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文学艺术上有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气派。无论是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戏曲、舞蹈、工艺、园林、书法、篆刻，几千年来我们勤劳的祖先留下了许许多多水平极高的艺术作品，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艺术生活和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也是发达的，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例如音乐 春秋时代（前 770—前 476）就以阴阳五行为中心 形成了关于五音六律的一种理论。战国时期（前476—前 221）的《乐记》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音乐理论，同时也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古代美学著作。在我国，文论也很早。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是出现较早而且很有见地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则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画论方面，魏晋南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对我国绘画艺术的特点作了相当深入的说明。如此等等。历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在他们的哲学和艺术著述中，经常对美学发表一些精彩的议论。当然，这些有关美学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是由于它们的背后有着雄厚的艺术实践经验作基础，同时又受到我国古代深刻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自己民族的理论特色。我们应该组织力量进行挖掘，编出若干种内容比较完整的中国美学思想资料，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它，批判它，发展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

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这种美学理论不仅包含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材料，而且有我国古代的丰富材料作基础，既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则，又带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这样的美学理论著作现在还缺少，我们期待着它的出现。

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应该揭示出中国文学艺术和中国美学理论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与欧洲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医学、军事学以及音乐、绘画、文学、戏曲等都有自己一套特殊的观念、范畴和体制。研究中国的东西，就一定要注意这种特殊性，研究它们的特殊规律。当然，这种特殊性并不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一般规律，而且恰恰是这种一般规律的具体表现。在美学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范畴、概念和思想，如比兴、文与道、文与情、形神、意境、情景、韵味、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等等。我们应该对这些范畴、概念和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揭示中国美学的特点，也可以把中国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的作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中国美学的独到之处。虽然比较研究法的直接结果常常只能揭示出一些现象上的异同，但对于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找出事物的规律，仍然是很有用处的。多年来，在各学科中，很少看到有人用这种方法了。钱钟书同志在这方面占有大量中外文史资料，旁征博引，在他的巨著《管锥篇》中开创了在我国比较文学的新的途径。

四 重视审美教育，加强美育研究

我们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实现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艺术界、文学界、理论界在这方面如何作出自己的努力呢？这里面包括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在美育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美育同德育、智育、体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缺一不可的。一个人要全面发展，不能缺少技术教育，也不能缺少美育。在现代化教育中，没有美育是不成的。

美育又称审美教育、美感教育。它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美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趣味，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上全面健康成长。这就是说，整个美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美学理论的提高，而且在于发挥美学在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在日常生活和教育事业中的美育作用。我们知道，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与追求美的理想这二者常常统一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同时，结合审美教育，就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美育与智育也是相互促进的。要提高审美能力，就需要学习文化，增进科学知识。科学和文化的修养越高，审美能力也会越高。反过来，优美的审美情趣必然导致并表现为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和追求。良好的审美活动，可以使人们情绪饱满、积极向上，对促进人们身心的健康和智力的发展都有很大益处。科学地深入地研究、说明和宣传德、智、体、美的关系，是一项很重要很有意义的课题。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又是不可相互代替的。马克思说，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可见，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总是把自己的意志、道德和审美理想，以及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统一在一起进行的。因此，我们要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

主义，要培养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就不能不发展美学，不能不发展审美教育。

在人民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和实施美育，这是一件长远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而在当前，又有很大的迫切性。十年动乱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给我们民族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四人帮”一伙疯狂破坏文化，破坏人世间一切美的东西，把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捧为神圣，加以宣扬，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灌输，使得一些人，尤其是许多在十年浩劫中长大的青少年不清楚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野蛮 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邪恶，甚至根本颠倒了美丑善恶。这给我们的民族在心灵上造成的危害和创伤远远比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要更大得多，更深重得多。我们一定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为此，必须首先改善党的领导，搞好党风，同时需要大力普及科学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审美教育。正确地指导和积极开展审美活动，使人们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行为作风是美的，是应当追求和令人向往的，这对于移风易俗，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具有巨大意义。

我们美育的内容要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美育的形式应是多种多样的，不要把美育搞得太狭窄了。不只音乐、美术 还有语文教学 体育训练 各种艺术品的展览 文学戏剧的欣赏，业余文艺创作都属于美育的范围。文明行为、环境保护和清洁卫生在一定意义和一定范围内也与美育有关或属于美育。应该充分利用书刊、广播、电视、电影、舞台、讲座、展览、旅游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美育工作。在四化建设中，应

该争取把我们的整个社会和生活环境统统变为进行美育的场所。美化全中国，这也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要作好美育的宣传工作，使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懂得美育的意义。要注意培养从事美育工作的专门人材，有计划地在大、中、小学设立与美育有关的课程。一定要普遍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努力把中小学的美育搞好，这是整个审美教育的最广大的基础。同时也要使学生家长了解和重视美育，做到和学校相互配合。因此，普及美学知识，普及美学研究的正确成果，便是一个重要任务，这样才能使美学研究和人民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结合起来。如果美学不普及，人家怎么知道什么是美育呢？艾思奇同志写过一本《大众哲学》，内容并不是怎样高深，但它起到很大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作用。艾思奇把哲学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了，美学也要同广大群众结合。如果美学工作者能写一本《大众美学》，那不是很需要吗？要向这方面努力，不过，要避免庸俗化简单化。蔡元培在二十年代曾到处奔走，呼吁美育，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广泛实施美育是不可能的。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完全有条件而且有责任在全国逐步地把普及美育的工作做好。

五 学术问题要鼓励自由讨论

我们不能把美学神秘化，也不能把它简单化。对于美学上的一切需要探索的问题，都必须允许并鼓励自由讨论。通过自由讨论，促进认识的发展，推动问题的解决。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艺术美和自然美究竟应该怎样看？共同美、共同人性到底应该怎样估计？真善美是怎样统一的？外国出现了什么

新理论，应如何评价？所有这些学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应该鼓励建立不同的学术派别，各学术派别的争论对于繁荣学术、推动美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谓自由讨论，就是说必须允许批评，同时也允许反批评。否则，那还有什么自由讨论？蔡仪同志长期从事美学研究，他有劳绩，有著作，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他的美学观点，人们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本人也可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的批评。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主要精神就是提倡自由地、平等地同志式地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凭讲理，不凭权势。在学术、艺术问题上，领导人不要轻易地下结论，以免妨碍自由讨论的发展，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今后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当然，也不要提美学从属于政治，或者美学为政治服务一类口号。这并不是说文艺或美学问题同政治没有关系，但把这种关系说成只是从属，那就有片面性，就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来关系，势必导致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上流于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偏向。这不但不利于文艺和学术，也不利于政治。所谓不许“打棍子”当然主要是指打政治棍子。动不动就是“反党”、“反人民”这种作法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严重障碍，今后一定要加以克服。现在“四人帮”虽已垮台了，贯彻双百方针仍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仍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阻力，要进行艰苦的斗争。自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双百方针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经受了考验，我们取得了正面和反面两方面的经验。今后能不能搞好，要靠我们的继续努力，我们还要经受再考验。

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保证之下，一定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保证学术讨论的自由。在学术讨论中，我认为你的观点有

错误，你认为我的观点有错误，可以充分展开辩论，这是正常的，不叫“打棍子”。如果互相批评，互相辩驳的话也不能说那还怎么自由讨论呢？现在似乎连这种话也不能讲，讲了就说是打“棍子”。领导人更难讲话，讲的不好，也会有人说你是打“棍子”。其实，这仍然是心有余悸的一种表现。因为过去总是把学术上的争论硬是和政治问题扯到一起，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一涉及政治问题，谁都害怕，这是极左路线遗留的恶果。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可把学术问题随便和政治问题拉到一起。同时要说明，即使是政治问题，也必须准许发表不同意见，承认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如果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就成了了一纸空文？所以，只要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切实得到保障，害怕打棍子，害怕领导讲话的心理自然会消失，热烈的自由讨论就会开展起来。

在学术讨论中，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拿出可靠的论据，以理服人。讨论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启发，相互补充，通过诘难，打开思路。所以我们主张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决不是提倡相互指责、谩骂、挖苦，更反对随便扣帽子。我们要树立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良好风气。领导人讲话，要格外慎重。一般地说，领导人的好处是，党的政策和情况掌握得全面一点，但也有个缺点，就是他们对每门具体学科没有也不可能有很深的研究，所以领导人对于学术问题的是非，发言要谨慎，不要随便表态。领导的主要责任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美学至今仍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许多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要使美学具有真正严格的科学的形态，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对此，我们中国的美学工作者应该有志气，也有责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美学这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第一

次全国美学会议就要召开了，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预祝同志们
在美学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载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学》1981年第3期

“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

建国以来，我们正式悼念瞿秋白同志的活动，只举行过一次，那就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的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在那个仪式上，陆定一同志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同一天茅盾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秋白同志 学习秋白同志》的文章。

匆匆又过了二十五个年头。这期间，一位杰出的革命先烈，在离开人世三十年之后，也像我们许多活着的人一样，遭到了莫大的凌辱，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磨难。回忆当初我们怀着虔诚的崇拜之情，把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的时候，哪里料想到秋白同志的“寂寞身后事”会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四人帮”一旦被铲除，大家就立刻想起了秋白同志，为他身后所蒙受的冤屈愤愤不平。这个事实证明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功勋的革命家，中国人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秋白同志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从一九二三年初回国算起，他为中国革命工作的时间，也不过是十二年。可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

秋白同志却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著述。他不顾当年环境的恶劣，个人遭遇的坎坷，竟能够以情文并茂的、数以百万字计的论述译作贡献给中国人民，表现出那样充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和喷泉般的不竭才思，这是多么令人惊叹赞佩的业绩呵！

秋白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异乎寻常的卓越贡献，固然是由于他个人天资的聪颖，修养的深厚，治学态度的勤奋刻苦等等，但更重要、更根本的，还是因为他领受了世界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洗礼，有一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火热的心。他在早年所写的《饿乡纪程》中，曾经表达自己的志愿说：“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这是秋白同志的心愿和誓言。当然，这条路不是秋白同志一人的力量所能够开辟的，但他是最早的开路人和领路人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试探了自己的道路 锻炼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不管有多少风险，他坚持走到了底。他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敏感的文人学者，虽然有时也不免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情绪，但他始终保持了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在敌人和死亡的威胁面前无所畏惧。秋白同志的革命的一生将永为人们所纪念。

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贡献。秋白同志在“五四”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当着他以记者身份在苏联实地考察两年之后，就彻底解除了对社会主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成长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初，秋白同志回国之后，首先就活跃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成为我们党早期的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他从事《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致力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来分析

国际国内大势，为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宣传，做出了巨大的宝贵的努力。秋白同志对许多问题都有他的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当然，其中也不免包含着某些不成熟或不正确的论点。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后果，我们党内滋长了左倾盲动情绪，秋白同志当时就反映了这种情绪，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秋白同志无论在理论上乃至路线上有什么错误，都是老老实实在明处，当着他不知道错误的时候他坚持，知道错了就勇敢地承担责任，绝不替自己辩护和推卸责任。后来他受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击，但他对同志、对革命事业，仍然满腔赤诚，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毫不动摇，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秋白同志留给我们的理论著述，是一份很珍贵的革命遗产，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毫无疑问，秋白同志的论著中有不少见解，到今天也还是有生命力的。例如，他对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剖析，就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封建势力的“僵尸统治”，封建军阀、官僚买办，把宗法社会的旧道德、腐烂发臭的旧文化，奉为“国粹”，竭力加以维护。他指出，封建残余并不会一触即溃，它可以改变形态，比如，在“僵尸”的血液里再注射一些“欧化”的什么主义而使之复活。他指出，封建宗法文化、道德毒化着中国整个社会，连商人也要兼作绅士，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已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气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秋白同志对中国封建宗法制认识深刻透彻，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我们党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他是毛泽东同志、彭湃同志从事农民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同陈独秀忽视农民

运动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推荐和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秋白同志一方面认识到要想在中国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但是同时，对于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消极面，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到无产阶级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主持的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问题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既批判了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错误，又指出了必须克服革命队伍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的危险。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必须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为了彻底战胜封建势力，又必须教育农民，改造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封建主义的确是不那么容易肃清的。这除了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久的原因之外，也与我们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意识笼罩一切”分不开的。直到今天，我们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重温秋白同志有关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论述、有关克服革命队伍中农民意识的论述，并且大力加强这个没有完成的斗争，还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秋白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立下的不朽功绩，是众所公认的。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三十年代初期，秋白同志与鲁迅先生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率领和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促成了革命文学的空前繁荣。秋白同志以重病之身，忘我奋战，在上海的短短三年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他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情反击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同时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他写了许多锋利的杂感，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翻

译了大量外国革命文艺作品和论著，并且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作了积极的努力。秋白同志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显得评价不足，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第一次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作出了最正确的论断。但是应当承认秋白同志当时所阐发的文艺理论和他所从事的文学实践活动比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来，的确高出了很多。尽管他有时不适当地贬低了“五四”新文学的成就，但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还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文化运动的进步传统，把我国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与他的贡献分不开的。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了有名的序言，对鲁迅作了公正的、科学的评价。鲁迅为了表达他对为革命献身的生前战友的沉痛而深挚的纪念，他搜集秋白同志的文艺论著编成了《海上述林》，使他的文章永垂后世。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光照千古的。当然，今天和那时相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走过一段不寻常的曲折的道路，国际国内状况都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当年左翼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主张和论点，无疑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说，当年秋白同志所热情支持的鲁迅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开创性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秋白同志当年对于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把这一事业比作永远不会“盛极而衰”的“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他说：“地底下放出来的光明，虽然还很脆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多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秋白同志用他的生花之

笔表达的革命理想，他对革命进程的预测，是多么清醒呵！他对于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念，又是多么坚定呵！

从秋白同志就义到现在的四十五年中，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文化运动，几经挫折，然而我们的力量确实得到了锻炼，我们“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共睹的伟大成就。当然，这工程还远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我们文化战线上的战士们，现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不正是为着实现先烈们“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这个宏伟遗愿而奋斗吗！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努力攀登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峰。为了这项崇高的事业，我们将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对于秋白同志等老一辈开路先锋最好的告慰。

载198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进一步解放思想， 搞好教育科学研究*

随便讲几点看法：

第一，教育应当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大大落后了。在解放区时期，由于战争和农村环境，发展教育受到一定的限制，教育研究工作很难摆到工作日程上来。我虽然做过教育工作，但也没有研究。全国解放以后，我除了参与过文科教材工作以外，对教育工作情况就很少了解，只是一直感觉教育研究工作应该大大加强，而且不是一般地加强。教育这门科学能是很简单的吗？像石油、钢铁一些部门都有那么多的研究单位，机构很大，有的还有研究院。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材，研究培养人材的研究机构，却只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所。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把教育真正当成一门科学。与教育密切有关的心理学，一九五八年曾被否定了，好像心理学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心理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很密切，可是我们搞教育理论的对人的心理、生理都没有很好地研究。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要有机构要有人，要老中青三结合，主要还是要培养青年干部，这个工作刻不容缓。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我们的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座谈时的讲话。原载《教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毫无疑问的。过去我也写过一些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一定阐述得都对，恐怕有不少不对的地方。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我实在讲不出多少意见。我想，首先是怎么看待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教育工作、教育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且要研究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教育观点。这就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搞清楚，那么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会有困难的。党的十二大要起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一个最重要部分，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我们要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思想体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这需要认真研究。当然，这不是你们教育科学研究所能够单独解决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观点，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你们却有专责来认真研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加以阐述和发挥。我们对一切客观事物 对自然、社会、思想 只能把它们都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看它是固定不变的，就走上行而上学。它们都是物质不断运动的过程，思想只能是这个过程的反映，毛泽东思想也是个发展过程。它是在中国有了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了现代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这样一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天生的，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开始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自己也讲过。过去我们小学的教科书里曾写他从小不信迷信。有一次我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这是胡说！我小的时候，哪里不信迷信？我小的时候还信菩萨呢。”把毛主席神化 这是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有个发展过程。他少年时代也相信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相信过康德的思想，后来才变成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革命家，

这是在斗争中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的。我们现在要解放思想，首先要看到任何客观事物以及任何事物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都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有前进和后退，上升和下降，有它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它常常是一个曲折的、波浪式前进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往往都是这样。如果不用这样的观点观察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时，就会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也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否则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是怎样达到它的全盛时期的？我们大家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来的。毛主席自己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棵参天大树，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这棵树上添枝加叶。这当然是他的谦虚，但同时也说出了一定的真理。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就以他光辉的革命实践，树立了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他到了延安，写作和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有关整风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等著名文献，这标志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全盛时期。我们党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后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先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全盛时期。建国以后，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十大关系，毛泽东思想继续旺盛发展。后来，我们党在不少问题上，如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等发生了“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左”的错误就为林彪“四人帮”等阴谋家所利用，形成了一条极“左”路线，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就

和本来的毛泽东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了。

毛主席对文艺问题比对教育问题说得多一些，他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毛主席一向也很重视教育，但他没有来得及把他的精力更多地倾注在教育上，写成专门的著作。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一般地讲都是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但在他的体系里哪些方面表现得更完整、更系统、更正确，那就不平衡了。既然一个人思想都是有发展、有变化的，有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有的是就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对象而说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才适用。我们就不能把毛主席的教育主张，当成一个固定的教条，否则就会走到“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地步 那反而要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这是第二点意见。

再一个问题，我们党包括毛主席在内，过去提出来的一些口号，是不是都符合实际情况，都正确？我们现在还要不要运用这些口号？过去的口号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过去是对的，现在也还是对的，还可以用；一种是当时就是不对的，现在当然不要再用了；还有一种过去是对的，也起了好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 口号不够完善 不够准确 今天需要以更完善、更准确的新口号来代替。对这些问题，我们要解放思想，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来重新考虑。比如文艺方面，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过去起了好作用，但也产生了副作用。我们现在不继续提这个口号，并不等于说文艺和政治可以没有关系，相反，这个关系是十分密切而又微妙复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文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但是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文艺要从属于政治一类的话。这并不是说马、恩、列没讲过的，我们不能讲。

问题是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搞得简单化，庸俗化了，势必容易发展成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同时，这种从属的说法还可能导致政治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因为这个口号有这样的缺点，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提它了。提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较好。人民中工、农、兵占最大的多数，不但在数量上是绝大多数，而且在人民中是起决定作用的，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精华，所以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不只是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当然政治是首要的。所以，对过去的一些口号，我们都要根据今天的形势重新来考察一下，看哪些今天还适用，哪些今天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比如对“兴无灭资”的口号，也有些不同意见。我们也曾一直讲兴无灭资的。“兴无灭资”在发展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这个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这个口号并不那么精确。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很丰富，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你怎么可以把它灭掉呢？特别是搞教育工作的，你都把它灭掉，那你的教育还办不办了？教育总是要传授知识，现在最主要的知识并不是封建时代的，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复兴以来，从启蒙主义到现在的科学文化技术以至全部的文明，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文化也是接受和利用了资本主义文化中一切有用的东西而发展起来的，你怎么能消灭它呢？对资产阶级思想要批判，而且是长期的。但你不能消灭它，只能改造它。所以这个口号是不准确的。在思想战线上，情况相当复杂，在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上，要力求统一思想，有些问题，就不必强求统一，容许有自由讨论的余地。要解放思想，活跃思想，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思想混乱。这是难免的。只准有正确的思想，不准有错误的思想，那

还活跃得了？所以对过去的一些口号，也要解放思想，重新考虑，有不适合今天情况的就要改，今后不再提了，但也不必一定都要公开批判。我们对过去的口号，一定要重新考虑对今天是否合适 以便有所取舍 有所修改。比方 在教育方面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个口号影响很大，很普遍，今后是否还要继续宣传这两个口号？我个人觉得，比较起来与教育密切有关，还是毛主席讲的：培养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更合适一些。刚才董纯才同志说，这个口号可能也有缺陷，同今天的情况不完全适合。我觉得任何口号都是可以随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也可以不改变原来的口号而对它作些跟过去不同的解释，使之更完善或具有更多的新的内容。没有什么口号提出来后就不能改了，那就是把口号固定化了、偶像化了，那怎么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呢？有些人特别热心口号，我说，不要这样，我过去也是提口号的人。口号这个东西，常常时间变了，口号也就变了。我过去提了个“国防文学”五十年了 这个口号至今还纠缠不清呢。我劝同志们不要太热衷于口号，口号并不是万能的。

至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这是你们研究的专责。我们要总结经验，总结三十年、五十年以至近百年我国教育的经验，我非常赞成总结我们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经验就有个用什么思想去总结的问题，应当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用唯心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去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几个简单的结论。它的内容是丰富得很的，也可以是包罗万象的。它的根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我感到，我们过去总结自己的经验，有些狭隘，有些实用主义。刚才同志们讲教育科学研究所应该是教育部的战略参谋，这是对的，应该提供有

关教育方针、路线、政策、制度方面的意见 给教育部作参考 供采纳。如果不起这方面的作用，那么研究所就完全脱离了政治，那是不对的。但另外一方面，一个研究所不能只是这样，只是作教育行政部门的参谋，它应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它应该在科学方面取得成果。现在我们许多研究所都有这个问题：不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不配合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这又有它本身的要求，本身的要求就是发展本部门科学。你不能说给教育部当好参谋，教育科学就自然发展起来了，那不是这样的。它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有些东西是不能配合当前任务的。如果不承认这点，我们研究工作就会受到限制，就会流于实用主义，近视眼。我们要订出长期规划来发展教育科学，要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新的成果，作出新的贡献。要发展教育科学，单纯地研究和总结自己现有的经验就不够了。尤其是现在要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内外形势都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必须研究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苏联各国的经验。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在教育上也有很多创造，但很多是在农村、战争环境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建设的重点已转到城市了 没有战争 而是和平建设 并且向世界开放。不要说革命战争期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也是不大向世界开放的。现在开放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来研究我们的教育，就不能老停留在过去的一些经验上（当然过去那些经验很宝贵）。要把眼光看得更远些，要联系现在我国的现代化要求，联系现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突飞猛进。这些东西，从我们过去的经验里是找不出来的，也不能这样要求的，因为那个时期没有进入到世界的技术革命时期，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向世界开门。所以 要解放思想 放眼世界 不要搞经验主义、实用主义 要有远

大眼光，要有探索勇气，力求在教育科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要重视本国的经验，但也不能只限于自己国家的经验，同时还要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当然要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对于我们过去在教育方面曾经提出过的一些方针、政策、口号，也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来重新加以审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重新研究，对的坚持，不对的就改正。要知道，任何人，包括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有他个人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历史的前进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对于反面的经验，也要认真加以总结，使之变为我们的历史财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有很多好的东西。特别是在干部教育方面所谓“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都是非常正确的。还有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当然不仅仅是校训，也是整个党的工作作风），到现在还是我们思想路线的指针。这些我们都要继续发扬，坚持下去。我们无论搞革命，搞建设，都要严肃认真，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既要有锐意改革的勇气，又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遇事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单凭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是只能坏事的。对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这样。

中国的教育思想，从孔夫子到陶行知，有丰富的遗产，我们要很好地加以整理研究、批判、改造，进一步加以发展。陶行知是学杜威的，但他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在教育思想上也有创见，在办教育事业上是有贡献的，训练了不少人材。徐特立同志是我党的老教育家，他崇敬陶行知，甚至自称“师陶”。陶行知不是共产党员，也要师他，这就足见徐老对陶行知是如何地崇敬了。我们除了整理研究本国教育遗产外，还要研究外国的教育科学遗产。不论是美国的杜威，还是苏联的凯洛夫，都曾对我国教育

界有相当的影响，我们都要加以批判和研究。赞科夫的学说尤其值得研究。最近我看到上海铁道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几位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改革我国教育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希望大家也注意研究一下。

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

戏曲是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传统艺术。戏曲遗产之丰富，剧种、剧目之繁多，表演技巧之独特和精湛，都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

在将近一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戏曲艺术在我国的农村和城镇广泛流传。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精神联系，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文化历史知识，很大部分就是来自土生土长的戏曲艺术。这种情况，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

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之后，我国人民努力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的精神文明也应该是具有中国特点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拒绝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而是说我们应当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学习、借鉴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在我们所要建设的精神文明中，戏曲艺术占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由于戏曲与广大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她的继续流传和发展改革。但戏曲毕竟是从长期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艺术，带有鲜明的封建时代的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文艺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烙印，如何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使之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需要相适应，当之无愧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我国广大戏曲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一 总结戏曲改革的经验

戏曲改革的任务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在延安上演平剧《逼上梁山》时，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杨绍萱、齐燕铭两同志，祝贺此剧开创了旧剧改革的新生面。这封信就是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戏曲改革的宣言书。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北局刚成立不久，中央所在地转移到了河北平山，当时正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我们曾就旧剧改革问题，请示过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的那篇关于戏曲改革的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就是主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写的。从此，戏曲改革工作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累积的戏曲改革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几百年来，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护和培养，经过大多是无名的人民艺术家的努力，按照她自身的客观规律，一直在或快或慢地发展着。我们不但有元、明、清以来大量杂剧传奇的优秀遗产；近百年还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抗战期间，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家都积极参与了戏曲改革的工作。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戏曲改革的发展还是比较迟缓的，多少带有一种自发的、个别的性质。新中国

成立后，这一发展就进入了划时代变革的新阶段。我们自觉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去改革戏曲艺术，把我们民族悠久的戏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以及现代戏剧文化成果结合起来，这就促使戏曲艺术的面貌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它的经验带有开拓性和独创性。世界各国很少有这样丰富的改革古老传统戏剧的经验。所以，建国三十多年来戏曲改革经验很宝贵，特别值得总结。希望能有这样专门研究中国戏曲改革历史的著作问世，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丰富我们的戏剧理论，指导当前的戏剧工作，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建国以来的戏曲改革，无论剧本、音乐、表导演、舞台美术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经验。这些经验都应加以搜集、整理、研究，使其条理化、系统化，以指导今后的戏曲改革工作。我今天着重谈的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开展戏曲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既反对保守，又反对粗暴；第二，必须不断提高整个戏曲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使戏曲真正成为一门有完整体系又是丰富多彩的艺术。

要改革戏曲，就要反对因循守旧、拒绝革新的保守倾向。我国戏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遗产，一种传统艺术，它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却可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仍然保有艺术的魅力。对这种传统戏曲采取广为挖掘、十分重视和细心保护的态度，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能斥之为保守。但是，传统戏曲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包含一些陈旧的、过时的、为新时代所不容的糟粕，需要加以剔除和改革。传统中好的东西应该保存的，要坚决地保存，坏的东西应该抛弃的，就要坚决地抛弃。保守倾向就是犯了“时代错误”的

病症。时代前进了，人的思想感情和欣赏趣味都在变化，它却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留恋旧事物，宁愿抱残守缺，也不肯有所革新，这就是保守。一部戏曲史，实际上是戏曲不断推陈出新的历史。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面貌变化之剧烈，时代步伐前进之急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戏曲如果停滞不前，就势必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而为群众所抛弃。

开国以后，我们工作中既有过保守倾向，也有过粗暴倾向。而且一种倾向往往是作为另一种倾向的否定而出现的。如果说保守倾向反映了我国精神文化的停滞和落后状态，迎合了某些干部和观众在艺术欣赏趣味上的习惯势力；那末，粗暴倾向就反映了某些干部和观众对戏曲改革的简单化和急躁情绪。粗暴倾向，发展下去，可以走向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虚无主义。三十多年戏曲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和克服粗暴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分歧和斗争。

建国之初，就发生了如何正确对待旧剧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刚刚获得解放的几亿人口文化生活的問題，也是关系到成千上万戏曲艺人就业的问题。显然，任何轻率和粗暴的态度都是对戏曲事业不利的。当时，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剧目的取舍提出了三条标准：即提倡有益的，反对有害的，容许无害的。有益、有害和无害，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来说的。这三条标准的提出，是为了在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戏曲改革之前，便于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戏曲剧目作出衡量和评价。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戏曲工作的根本性的方针。但原来提出的三条在当时也是正确的，防止了对旧戏采取简单的“禁止”的方针。采取禁的办法将造成混乱，肯定是行不通的；正确的方针是采取慎重的、有分析的、区别对待的办法。

建国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改戏、改人、改制”。改制是因为那时戏班还存在把头，必须进行起码的民主改革；改人，是指艺人的思想改造，提高觉悟；改戏，则是要求清除旧剧舞台上的有害因素，要与艺人一道改，尊重艺人，尊重旧剧方面的专家，在戏曲改革工作中走群众路线。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正确的、稳妥的。

一九五〇年，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要百花齐放”，就是要让各种地方戏都得到发展。毛泽东同志非常欣赏“百花齐放”这个提法，认为这是反映了广大群众和艺人的意愿和利益的，就采用了这个口号。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同志为新创办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辞，就用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又和“百家争鸣”连接起来。这样，“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为我们文化工作的长期的根本性的指导方针。戏曲工作也是在这个指导方针之下进行的。因此京剧和地方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许多经过改革的地方戏，面貌焕然一新，特别给人们以清新、活泼、健康的感觉。戏曲改革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和我们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们中国没有犯过像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的错误。他们对待过去文化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指望依靠少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来制造“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坚决地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潮，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能离开当前政治，不能割断历史传统，不能靠少数专家闭门造车来炮制。解放后，我们中国没有犯这种错误，没有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对传统文化采取粗暴态度、反对党的“百花齐放，推陈

出新”的正确方针的人也还是有的，江青、康生就是这种人。记得我们曾经和江青有过一场争论。我们说对待文艺，包括戏曲工作不能粗暴。她说“革命就要粗暴，粗暴就是革命”。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反对粗暴与反“反粗暴”的斗争。后来江青又提出继承文化遗产只是采用其形式，认为内容是根本不能吸收的。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精华的原则，势必要引向文化虚无主义。康生在戏曲问题上，本来是一个热心复古的保守派，后来他又和江青一唱一和，并摇身一变而为极左派，成为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江青、康生等人粗暴野蛮的毁灭文化的行为，假“文化大革命”之名猖獗一时，彻底践踏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使我们的文艺和戏曲事业陷入了绝境。

江青一方面反对党的戏曲改革方针，推行灭绝文化、灭绝戏曲的文化虚无主义，一方面又抓住“革命现代戏”这面旗帜，大搞所谓“样板戏”，自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完全是政治野心家的骗术。建国以来，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一直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视，许多剧种都在不断地试验和摸索，地方戏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在现代戏发展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革命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由周恩来同志倡议举行的。所谓“样板戏”，原本是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创作成果，并非江青的创造，只是被她窃取了去，作为沽名钓誉、篡党夺权的资本罢了。江青窃取了别人的创作成果，又把别人打成“反革命”，《红灯记》导演阿甲同志就曾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所谓“样板戏”呢？“样板戏”这个名称根本是不科学的，应当废止。艺术应当是最富于独创性的，不可能也不应当有什么“样板”。至于那八个被江青称为“样

板戏”的作品，其优劣得失各有不同，其中被程度不同地掺入了“四人帮”的文风。我们应对之加以批判分析，重新进行修改和加工。“四人帮”借总结所谓“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得出的什么“三突出”、“高大全”一类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主义的创作理论，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提倡京剧演现代革命题材的戏是无可厚非的；但完全不顾京剧的特长和特点，采取强制的办法只准演现代戏那就不对了。提倡戏曲表现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这也是对的，是我们时代的需要；但是我们的戏曲和其他文艺一样，不应当只着重表现英雄人物，而忽视多种人物性格的塑造，更不能要求表现英雄人物一定要是“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不允许反映英雄人物身上的任何短处，这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势必导致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后来“样板戏”之所以受到大家非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提倡讲求革命现代戏的艺术质量，这也是对的；但这个质量，首先应当是作品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不是“四人帮”所吹嘘的那种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空洞词藻和表演程式。现代戏要与传统戏竞赛，就得提高它的质量。

总之，无论是古典戏曲，还是现代戏曲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应该慎重地保存下来。旧传统中和新创作中的好东西都要保存，加以发扬光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既反对保守，又反对粗暴，这可以说是三十多年来戏曲改革的重要经验。

不断提高整个戏曲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推动戏曲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使戏曲真正成为有完整体系、能更好地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艺术，这是我们进行戏曲改革工作一贯努力的目标。建国以后，许多新文艺工作者被祖国丰富的传统戏曲

艺术所深深吸引，欣然投入戏曲工作的行列，同戏曲艺人合作，共同从事戏曲改革工作，这件事意义十分深远。我们不能仅仅把这看成是戏曲队伍的扩大增添了新的力量，而应当充分估计这种新的力量对整个戏曲队伍所引起的质的变化。

戏曲既然是在旧时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而同新时代的需要许多方面不相适应。无论剧目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需要相应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但是，广大戏曲艺人在旧社会大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戏曲队伍总的说来文化水平较低，不可能单独承担起戏曲改革的任务，必须吸引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艺术素养的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队伍中来与广大艺人合作，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新文艺工作者加入戏曲队伍，同戏曲艺人合作，在短短的几年中，大量戏曲剧目经过甄别、整理和改编，恶劣的舞台形象得以清除，使戏曲的面貌为之一新。此后戏曲的进一步革新、发展、提高，也都是与新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艺人的合作分不开的。

一般说来，新文艺工作者有较多思想政治锻炼和一定的文艺理论修养，熟悉话剧、歌剧、电影等等艺术形式，他们的眼光不为传统戏曲所局限，能够向戏曲艺术引进进步的文艺思想、先进的表现技巧和技术，促进戏曲的现代化。编导制度的建立，对剧本创作质量的提高和舞台艺术的丰富、完整，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解放前某些有识之士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试验，但作为戏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成果大量出现，还是在大批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队伍之后。

当然，新文艺工作者也有对传统不熟不懂的问题，他们加入戏曲工作行列，有一个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的过程，更重要的，

有一个向戏曲艺人学习的问题。两者在戏曲改革实践中密切结合，相互取长补短，新文艺工作者向戏曲艺人学习他们丰富的经验和传统技巧，戏曲艺人也向新文艺工作者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和新的艺术经验，提高文化艺术修养，这就使整个戏曲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促进了戏曲的革新和发展。尽管在合作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某些问题，但整个来说，成功经验是主要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与建国初期相比，今天戏曲队伍的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或正在成长的中、青年演员，由于接受了正规的现代的文化教育，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老艺人也在不断的学习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缩短了同新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差距。那时的所谓新文艺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工作和学习，对于戏曲也由不熟不懂变为比较熟、比较懂了。但这不是说，提高整个戏曲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和革新戏曲艺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对于整个戏曲艺术的批判继承、革新创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在今后将是更加重要，更加艰巨了。时代在飞速发展，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姐妹艺术也日新月异，戏曲观众成分的变化和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都对戏曲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戏曲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如果不能相应提高，可能与时代的要求脱节，甚至会成为戏曲艺术改革的阻力。十年动乱中，毁灭文化的愚蠢行动，贻误了不止整整一代人，其中也包括戏曲队伍。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我们应当把提高戏曲工作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培养新一代，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要为他们创造学习和进修的条件，使他们打开眼界，增长见识，成为有比较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的艺术家。这

样，保守的习惯势力就会容易破除，粗暴的倾向也容易得到克服，阻力就会变成动力，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的工作，就能加快步伐，顺利进行。戏曲工作者所担负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就会完成得更好。

二 丰富和革新戏曲剧目

剧目问题是戏曲改革的关键问题。建国以来，我们执行了一个正确的戏曲改革政策，但也不时受到“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倾错误的干扰。“文化大革命”中，就把戏曲改革的正常过程完全打乱了。多年来，广大戏曲工作者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创作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方面，在整个舞台艺术革新方面都作出了很多成绩，这些成绩，曾一度被“四人帮”所全盘否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这些成绩又重新得到承认和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个时候，上演剧目混乱，一些坏戏在舞台上出现，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和批判，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现在我们的工作着重点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是新的形势，没有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戏曲剧目政策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以后，文化主管部门要根据新的情况，制订出一个戏曲剧目政策来，使戏曲事业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丰富和革新戏曲剧目，提高剧目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根本方针仍然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我们的剧目，一方面要力求丰富多样，有所创新，避免雷同和单调；另一方面又要遵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寓教于乐，而不流于混乱。对上演剧目，一定要放宽尺度，

不能随便禁演，只要不是政治上反动的，不是宣传淫猥凶杀的，都应当允许上演。要制定适合需要的剧目政策，要有必要的行政措施，更重要的是采取社会方式，靠社会舆论和戏剧评论来解决艺术思想方面的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戏曲的繁荣和发展，使我们的戏剧评论，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健康发展，戏剧理论的水平得以提高。

戏剧是一种对人类心灵、社会风习道德具有广泛影响的事业。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是非常重视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剧作家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的自由，但他如果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剧作家，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在人民中的影响。剧本不只是给人读的，还要演给人看。所以，剧作家、演员、导演、剧团、剧场和有关文化主管部门都要对人民负责。这里不只是考虑经济问题，考虑能卖多少票的问题。首先要考虑对人民是否有益的问题。戏曲，是娱乐，但又不单纯是娱乐。寓教于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任何时代，包括封建社会，戏曲也都是“高台教化”，不单纯是娱乐工具。我们要注意艺术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有的同志一听社会效果，以为又要“收”了，这是不对的。不能把社会效果和党的“双百”方针对立起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戏曲工作坚定不移的长远方针，我们要坚信和坚持这个方针，不要听到一点什么风吹草动就担心这个方针要改变，忧虑重重。我们大家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我们应当相信现在党中央的领导，相信群众的觉悟和判断力；我们应当更有勇气，而不是更胆怯。

“推陈出新”推什么陈，出什么新，这是同志们议论较多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艺术就整体来说，既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主要就是出社会主义之新。社会主义又

是和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不能分开的，所以也是出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之新。凡用这种新的精神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包括用新的观点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一般地说，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范围。

社会主义文化应当是广阔的，不但包括一切表现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艺术作品，一切对我国革命斗争历史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和艺术概括，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而且还包括对全部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研究和借鉴。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脱离了本国当前的现实、历史传统和同世界的联系，把它孤立起来，成为与外界隔绝的东西，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文化了。社会主义文化是从旧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推陈出新是辩证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采取狭隘的宗派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讲时代精神，主要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或者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精神。当然，现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有不少是产生于封建时代或资本主义时代脍炙人口的中外传统戏剧，这些剧目，可以给现代的观众以艺术上的享受，从思想内容上也能取得借鉴和启发，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对这些剧目，我们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排斥，而应当耐心地加以挑选、甄别和革新、提高，使之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戏剧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作家只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他的内心浸透着社会主义信念和对人民的情感，他无论是创作新的剧目或改编旧有剧目，都必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精神。用新的观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创作。既要改编传统剧目，更要创作新的剧目，特别是表现现代革命题材的剧目。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都是人民所需要的，都要发展提高。提什么“为主”都是不适当的，易于产生流弊，不利于贯彻

双百方针。文化主管部门要统筹兼顾，确定整个戏曲事业的发展方针。每个剧种、剧团适于演什么，可以有所不同，有所侧重，有所分工。不能否定分工，不能什么都一样。什么是你的优势，就多演什么；要发展优势，扬长避短。但就戏曲事业总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来说，我们应当着重强调现代戏。因为戏曲演现代题材的戏是新生事物，所以要提倡，更要扶植。各种地方戏，因更接近民间，形式也比较自由活泼，更易于表现现代生活，应尽量发挥它们在这方面的长处。一种艺术形式，如果只能表现历史生活，不能表现现代生活，那就限制它的发展前途了。一种不能表现现代生活内容的形式，起码是不完善的，没有广大前途的。戏曲要演现代戏，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要迎着困难上，要知难而进，不要知难而退。

现代戏的取材要广泛和多样化，当然也要考虑适合戏曲这种表演形式的特点。表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中包括反映十年动乱中和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的题材，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材，都可以有所尝试。话剧、歌剧等可以表现这类题材，为什么我们的戏曲不能在这方面急起直追，也显显自己的身手呢？当然，搞现代戏就要搞好。要提高质量，不但要注意思想性，还要讲究戏剧性，讲究文学性，不能粗制滥造。特别是国营剧团，要在艺术上花功夫，写出和演出较高水平的现代戏来。要看到演现代戏并不比演传统戏容易，因此，选材要得当，艺术处理要精益求精。对戏曲来说，无论是编演现代戏或历史剧，都要有相应的生活经验，都要掌握一定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写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戏，必须忠实于历史。我们的现代革命历史，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党史、军史为核心的，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力求真实，决不可任意臆造和

虚构。有同志提出，是否可以不叫历史剧，改叫历史故事剧或历史传奇剧。中外古典历史剧，大都是传奇，因为剧情与写作时间隔离较远，容许带更多传奇的色彩，人们也不会去挑剔和苛求。但写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戏，许多当事人都还活着，其中容易夹杂历史纠纷和个人成见，褒贬不当，有所失真，就势必遭到非议，即使改叫传奇，也无补于事。所以特别要慎重。

要重视培养戏曲作家，要为发表戏曲剧本提供更多的园地，要发展戏曲批评，注意培养戏曲评论家。要推广革命现代戏，就要重视那些热心和擅长演革命现代戏的剧种和剧团。例如，上海沪剧团、中国评剧院、河南豫剧院三团、湖南花鼓戏剧团、陕西戏曲剧院、山东吕剧团、浙江省越剧二团、山西省临猗县眉户剧团等，都在演现代戏方面有成绩，受到群众欢迎。要爱护和扶植这类剧种和剧团，给以热情关切和积极帮助，鼓励他们继续编演现代戏的勇气。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传统戏就不重视了。传统戏同样重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的剧种，例如京剧传统戏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在我国的传统戏曲中，京剧的剧目比较丰富，表现形式和技巧也比较精炼，为许多地方戏所取法，但也流于刻板和程式化，不及地方戏的生动活泼，所以要革新京剧，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需要，就要花更多的气力，用更多的功夫。我们决不能像江青那样，把其他剧种统统打倒，让京剧独霸剧坛，那是害了京剧，把它孤立起来，使得它失去竞赛的对手，反而容易枯萎。

无论是现代戏或是传统戏，凡涉及思想、艺术以及演出风格的问题，都需要采取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的方法来解决；通过艺术实践、群众检验的方法来解决。既不能采取禁的方法，也不能简单地采取由某一个领导、某一个权威来评断的方法。如何通

过互相竞赛和民主讨论来繁荣戏曲创作和开展正确有力的戏曲批评 是我们各级领导的责任之所在 对坏戏,一定要有批评 不批评,那就是自由主义,这是不对的。当然,批评一定要以理服人 不能粗暴。

传统戏曲大都产生于封建时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免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这些都是与新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有消极影响的 我们对这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但是 另一方面 我们又必须看到,封建时代产生的文艺作品,并非都是代表封建主义思想的,其中往往含有不少民主性的反封建的因素。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民主性的精华”的东西。否则我们整理和改编传统戏曲,就和我们今天在思想战线上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任务不相协调了,甚至不能相容了。在这里,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表现封建时代的人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不都是表现封建主义思想,有的还是反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有许多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民族英雄,在他们身上凝聚了治理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高度智慧和勇敢,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定程度上同人民的联系。关于才子佳人,特别是妇女,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她们是最受压迫最受侮辱的;但是在舞台上女将、乔装的女秀才、复仇的女性,却特别引人注目。在封建外衣之下,不正是表现了最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吗?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概赶下舞台是不对的;但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过多地充斥于舞台,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健康的现象。在开国初期,戏曲改革工作中,我们就曾提出要区别神话和迷信,爱情和色情,今天也仍然要注意这些区别。传统历史剧中,尽管大多带有传奇性质,带有

民间传说甚至神话的性质，但仍然应注意时代背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不要把现代人的思想塞进几千年前的古代人的脑子里去，成为主观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东西。在评论工作中也存在这类的问题。传统剧目如果不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看问题，许多事情就难以理解。演“打朝”戏，人们就要问皇帝今天是指谁？写农民造反，也要问，今天你造谁的反？我们反对简单的历史类比以古喻今。“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狠批“清官戏”，说清官是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比赃官更坏。这就不公平了。我们不能夸大清官的作用，把他当作救世主，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作用，完全否定，那也是广大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写历史上国内民族关系的戏，问题就更多，主要是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同时也要注意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写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历史上各民族中的英雄人物，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描写和称颂。同时，我们要多做些宣传解释工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加以阐明，否则许多戏就都不好演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演什么古代历史的、传奇的、神话的戏，毕竟是演给现代人看的，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欣赏能力，他们看后有什么反应和联想，会引起什么效果，我们都不能不加以考虑。如果和现代人的思想没有联系，在他们思想上引不起一点波澜，那他们就不会感兴趣了。有些在群众中有争议、有影响的传统剧目，在思想内容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但剧情和表演艺术却有一定的特色，曾为许多观众熟悉和喜爱，我们可以组织戏剧界的力量重新讨论修改，进行试验演出，这也是“抢救遗产”的一个方面。总之，对于传统剧目，要分别加以整理、提高。我们要鼓励戏曲艺术家的革新精神和创作勇气，不要怕失败，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改革有上千年历史传统的我国丰富的戏

曲遗产 没有这种精神是不行的。

三 革新戏曲舞台艺术

推陈出新不仅要在戏曲剧目的思想内容上出新，也要在舞台表演艺术上出新。我国的戏曲艺术，经过广大艺人和天才表演艺术家长期的悉心创造，形成了十分精湛的、独具一格的表演技巧和不同的风格、流派。但因为它们都是在过去物质条件不发达的历史状况下产生的，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条件的改变，艺术表现手段总是要起变化，总是会越来越丰富的。戏曲舞台应该有所革新，有所提高，才能适应今天时代和观众的需要。你有一个好的剧本，但没有好的舞台艺术、舞台装置怎么办？可以按照戏曲表演的需要和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来设计舞台和布景。舞台艺术应该是个和谐的整体，戏曲表演、戏曲音乐、戏曲舞台美术都要革新，都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有些老戏过去是专门靠演员唱，其他的都不讲究，可以闭起眼睛来听的；现在这种现象少了，观众对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要求都提高了，要求革新和提高戏曲舞台艺术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戏曲舞台艺术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整体。讲究完整、和谐，并不会损害传统艺术。传统艺术需要不断丰富、不断提高。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人民正在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在我们的国家里，电影、电视正逐渐趋向于普及，话剧、歌剧、舞剧，还有广播剧、电视剧，正在日益扩大影响，争取观众，它们已成为传统戏曲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的戏曲不但要在舞台上，也要在电台、屏幕上

争取自己的观众。所以戏曲舞台要有时代特色，要有新的面貌，这样才能跟时代的发展相协调，不致被时代前进的步伐抛到后边去，成为落伍的、不为新时代观众所欢迎的东西。许多观众反映，戏曲演出的节奏太慢，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我看传统剧目中，有些冗长的情节和不必要的重复，影响了剧情的顺畅发展，是需要改革的。戏曲语言的文学性也应当引起重视。许多新编或改编的戏曲剧目的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传统剧目中，虽有不少精彩的台词，但是也残留有不少文句不通的陈词滥调。这种缺乏文学性的台词，不能很好地刻划人物性格，只能使好的剧目因之减色。对这些剧目需要组织一些有文学素养的编剧来进行润色和加工。这是毛泽东同志过去曾多次提过的意见，现在应当付诸实施了。戏曲动作的程式化，这也是议论较多的问题。戏曲表演程式是从生活中来的，运用这些程式，又要与生活相结合，要为塑造人物服务。许多优秀演员在运用程式时，总是以刻划人物的个性见长，因而富有生活气息，能吸引观众，而不是刻板地表演。所以，运用程式去反映生活的方法，其基础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但是，生活是发展的。传统戏曲程式是在古代生活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们与今天的时代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所以，戏曲的程式应当加以发展。至于那些落后的、不适应今天人们美学趣味的成分，有些应该淘汰，有些则要经过改造，才能运用。

三十多年来，戏曲舞台艺术的革新是有成绩的。戏曲舞台美术已有不少的革新。戏曲舞台要给人以美感。希望舞台美术家既要保留戏曲的特点，适合于传统的表演艺术，又使它具有时代感，突破陈规。戏曲音乐，也有一些创新，应当使之更加丰富。戏曲音乐的改革，不能脱离民族音乐的基础，可以适当吸收西洋

歌剧的某些长处，但决不能照搬；照搬，观众是不能接受的。要使戏曲舞台艺术提高，各方面都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改进措施。当然，不一定所有的剧团都这样做，但可以由重点剧团进行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近年我们到国外演出的剧团演出剧目还不够丰富，还是《三岔口》、《闹天宫》等，应该有更多更好的新剧目，使人耳目一新。进一步提高和革新我们戏曲的舞台艺术是大有可为的。有些地方戏的革新比京剧大胆，京剧不应当落在他们后面。无论京剧或地方戏，全国都要有一批重点剧团进行一些革新实验的演出，起带头示范的作用。至于一般剧团，可以不去勉强它，它们可以量力而行。整个戏曲艺术的发展前途，总是要不断革新、提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整体观念，统筹安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四 戏曲剧团体制的改革

戏曲剧团的体制必须改革。这件事情要由文化部统一考虑；有些事情，要由地方文化行政部门来处理。

戏曲剧团，作为一种创作和表演的团体，它的任务是创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剧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它是一种文化服务行业，对教育和娱乐人民负有庄严的责任。它既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但它究竟是一个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团体。它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是以教育人民、娱乐人民为己任的。要讲经济规律，讲票房价值，但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是思想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剧团不可不讲票房价值，不可不讲经济

核算，但首先要看对人民的思想影响如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审美趣味，是否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戏曲文化以至整个文化艺术水平。剧团以及各类表演团体都应该首先考虑这些问题，而不应把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电影、广播以及其它文化服务事业也是如此。当然，在这方面也还有不少实际问题，需要从领导的角度加以研究解决。

剧团既然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艺术团体，它的编制、体制就应该以艺术业务人员为主，不是以行政人员为主，行政人员应该保证业务人员的活动，给他们以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能，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应凌驾于业务人员之上发号施令，束缚和压制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有些业务单位，非业务人员大大超过了业务人员，这是不正常的。我们不是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吗？行政人员太多，专业人员不足 配备不齐 青黄不接 还谈得到什么专业化、什么戏曲艺术的提高呢？这就涉及到领导制度、人事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剧团在有关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之下，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包括用人权和经济权。只有这样，我们的戏剧事业才能得到发展。总之 剧团体制必须改革 要力求精悍 使之人尽其才 坚决改变那种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以及艺术上得过且过的错误思想。

既要有专业剧团，还要有业余性质的剧团，专业剧团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全民所有制的，也有集体所有制的。每个省、市都应该通盘考虑一下，要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合理的调整和适当的管理，对业余剧团也要加强管理。管理剧团主要是对剧目要有一定的管理。要在方针、方向上，在一定时期内上演剧目计划的制定上加以指导，而不是对每一个剧目进行审查。既不放

任自流，也不进行不必要的干涉。这种管理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一刀切”的方法。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充分发挥戏曲剧团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戏曲艺术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前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的戏曲工作者，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们思想觉悟和审美趣味的崇高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就一定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断学习，要学习文化 学习社会 学习理论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提高革命的自觉性，使戏曲艺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九八〇年九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想了五个小题目：第一，关于思想路线的斗争。讲一讲思想路线斗争中我所了解的情形以及我的看法。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经验。在这里面讲一讲我个人对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想法；对于思想文化工作一些问题的看法。第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第四，文艺、教育和政治的关系。第五，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一 关于思想路线的斗争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者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而思想路线是主导。我们的政治路线，简单的说法，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还不是强国，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要建设这么一个强国，首先就要有个思想路线，没有思想路线作指导怎能提出来一个政治路线呢？这个思想路线简单的说法就是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有了这个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才能够有根据。为什么

要发展物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国民经济？为什么要搞民主？为什么要搞法制？为什么要改革？思想路线是灵魂，是指导。再一个是组织路线。有了思想路线，有了政治路线，要有组织路线来保证。所以这三个路线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有这样的思想路线才能提得出这样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要用组织路线来保证。思想路线是虚的，组织路线是实的。现在党中央提出民主制度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干部制度的改革，都是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空的。

思想路线讲起来好像不是太复杂，中央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一直强调思想路线问题，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问题。现在回顾一下，思想路线的提出确实经过了一场相当艰巨的斗争，这个斗争还在继续。我们党的历史，从来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怎么会有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会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怎么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呢？去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讲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一次是“五四”运动，这是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从几千年以孔子为中心的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没有这个解放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搞民主 搞科学 批判旧礼教 批判旧的文学 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二次就是延安整风。延安整风在座的不少同志是参加过的，我也参加过，这是个意义很伟大的运动。延安整风，可以说是恢复了“五四”的革命精神，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放出来。这一次解放，对我们革命者来讲，比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并不见得容易，因为革命者对封

建教条不大相信 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 但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教条，对我们的同志是很大的束缚。拿我自己来讲，对共产国际是有迷信的 共产国际讲的话 斯大林讲的话 是不怀疑的。在座的年纪大一点的同志都可以回忆得起来，哪一个怀疑呀？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就是他首先摆脱了这个迷信。在我们党内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才在党员干部中明确的。我开始不知道党内有什么思想路线，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才知道有一个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们从参加革命起，都是为了革命不惜赴汤蹈火，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只有一个组织上的党性，只有经过延安整风，才知道有思想上的党性，有组织上的党性，有政治上的党性。根本的是思想上的党性，并把思想上的党性摆在第一位。主观主义是党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对我是个大的启蒙。我们党内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同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领袖这个地位的确立，同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分不开的，不管他后来犯了多少错误。所以小平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其说是确立这个路线，不如说是重申这个路线。因为实事求是毛主席讲的，作为延安整风一个概括的表现，就是给党校写的题词“实事求是”四个字。现在党校还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一种最集中、最概括而且是带有民族形式的表现。我们现在来批评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也还是用这个路线，还是用这个武器。毛主席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惜在晚年他离开了这个路线，违反了它，走向了反面。当我们批评毛主席的反面的时候，首先不能忘记他的正面，忘记了正面，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他的正面还是主要的。

对于党中央提出的整个路线，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接受了。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已经三年了。当然，怎么看实践，怎么看真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反对两个“凡是”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提出后遇到那么大的阻力？现在也还有阻力。开始几乎所有省市没有表示态度的，以后都表示了态度，表示拥护真理标准的讨论，拥护实事求是，讲得很好，但是不是真正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呢？是不是真正从心底里拥护这个路线，为这个路线奋斗？口头上拥护一个东西，这是比较容易的，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不行了，一接触到实际政策问题，一接触到干部处理问题，一接触到平反问题，一接触到八字方针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检验不下去了。所以我认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还要继续斗争。讲讲容易，实践是难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路线的讨论，势必要归结到组织路线上来。我过去有这个看法：思想路线这一场争论，反对两个“凡是”，是思想斗争，也是政治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和国家用什么路线来指导，由执行什么思想路线的人来领导，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任何一个理论问题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有一个需要。比如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是要不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要不要这些比较注重搞实事求是的、真正执行毛主席实事求是路线的人出来领导。哪里有纯粹的理论问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要不要搞实事求是？哪个能够反对实事求是呀？最不实事求是的人也不会讲我反对实事求是。所以核心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执行什么路线的人手里的问题，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所以两个“凡是”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和其他比较实事求是的人出来工作。有人还是要执行林彪“四人帮”的那个思想路线因

为们是在那个思想路线上起来的，他们是在那个思想路线下做事的。所以思想路线问题，第一必然要与政治路线联在一起，第二必然要和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物质利益、实际利益、既得利益相联系。这一场辩论，如果离开政治路线的问题，离开实际利益的问题，就无法理解，它的意义也不能得到正确估计。思想上的争论和分歧，都是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集团的实际利益的反映。“四人帮”帮派体系尽管不存在一个表面上可以看得见的集团，实际上它成为一种势力。有的同志讲，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不是把思想路线问题过分强调了？我说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所以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思想斗争，并且也是一场思想启蒙。有的人并不代表什么利益，他就是思想僵化了，思想落后于形势，旧的思想成了习惯。所以对这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思想启蒙，要很好地进行分析，充分认识和高度评价它的重大意义。

胡耀邦同志讲，多换思想，少换人。他也讲过，多换思想，少换人，不是不换人。有的同志就理解为不换人了。现在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还不是要换人？耀邦同志讲的这个方针我是很赞成的，无论是保证安定团结也好，或者是别的也好，对于人事变动，组织变动，应该采取慎重态度，特别对于犯错误的人，我们再不能采取林彪、“四人帮”那种作法，但是不是不换人。思想路线必然落实到组织路线，必然要涉及到人，涉及到领导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的变动。所以对思想路线的意义不能低估。我们强调思想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现在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这样的进展，就是在实事求是

这个原则指导下，把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了。我们党要在全国人民中把实事求是的路线贯彻到底，不但要是非分明，而且还要赏罚分明。这次人代会、政协为什么开得好，民主能够发扬呢？就是开始有了一点赏罚。我们的人民代表第一次可以咨询政府机关中的领导人员，过去哪里能咨询？人民代表本来有咨询的权利，监督、弹劾、咨询都应当有，但是过去长期没有使用这种权利，现在开始实行这么一种权利了。可见是非要见之于赏罚才能申张，不见之于赏罚，这个是非是不能申张的。

思想路线斗争，主要的应采取思想斗争的方法，不是采取撤职的办法，处分的办法，这是正确的，而且是得人心的。但它是个斗争，而且里面有政治斗争，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对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经验

有一些人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割裂开来，这样解放思想势必走向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如果认为思想解放可以胡思乱想，可以随便想、随便讲，这是对解放思想的歪曲。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要使得思想符合实际，符合现实的发展，符合历史的发展，这就是解放思想。党中央提出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要总结经验。不但总结当前运动的经验，而且要总结历史经验。这样的思想解放才是正确的思想解放。我这里主要讲两个问题，可能讲的不一定恰当。第一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再一个是讲一讲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因为我过去一直在文化思想部门工作，我们来总结

一下很有必要。

第一，对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于毛主席，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是一个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而且关系到世界人民，不但关系我们这一代而且关系世世代代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掉以轻心。我这样讲，没有夸张。现在许多外国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保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但是中国人民有这个需要，世界人民也感到有这个需要。首先要看到这一点。这不是什么迷信，也不是什么思想不解放。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采取轻率的态度，应当采取郑重的态度。这一点同志们大概都会同意的。

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这一条要肯定。我想，也许时间更长一点可能更实事求是一些，因为一个运动要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才能看得更清楚。对于历史的评价，一方面是更近更清楚，但也有另一方面，有一些事情也许更远更清楚。人类的知识、认识总是越来越进步。例如对古代社会，对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认识，是当时人认识的清楚还是我们认识的更清楚？新石器、旧石器时代的人，他不会认识到他的时代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而我们却有这个认识。所以对事物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近有近的好处，当事人都在；远也有远的好处，因为远了可以排除许多个人利害关系，个人感情关系。为什么小平同志总是讲关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搞得越细麻烦越多。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当代人物，特别是评价像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应排除个人利害与感情的干扰。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工人、老农民、老干部，他们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可能有迷信的成

分，但是我认为不能笼统说是迷信。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感觉到毛主席正确，感觉到毛主席给了他好处，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也主张反对现代迷信，但是我认为人民、干部的这种感情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是革命的感情。这种感情反映了千百万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千百万人民的利益，评价毛主席时不能把这种感情认为都是迷信。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感情因素，就是这么多的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灾难，这个灾难不能说不是毛主席首先要负责的，他们对毛主席有反映，有些反映比较强烈。这两种感情因素都是比较强烈的，要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必须排除这种感情干扰，真正使脑子清醒、冷静。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没有感情。我有一次在中宣部讲，要有感情，一个革命家没有感情，还成什么革命家？但是不能感情用事。一个普通的人，有正义感的人，都有感情，你一点感情都没有，还算什么革命者？所以要有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我这样看法，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在对毛主席的估价，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上，感情、利益这两个东西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有一些人是受害者，有一些人是得利者；有一些人是伤害了他的感情，有一些人是保持原来的感情。所以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排除感情因素。感情是要的，又要不受感情因素的干扰，保持科学的、冷静的头脑，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样还是不容易哩！

再有一个问题，功过问题，是非问题。毛主席的功过，这个问题中央也讲了话，虽然没有正式的决议。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无非是功过是非，毛主席肯定是功大于过，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总而言之，毛主席是我们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当然还有别的缔造者。但他是主要的。这是他的

功。

过是什么呢？这要很好研究，研究他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过属于什么性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一个路线错误。十七年中间毛主席工作中也有左的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总之，对毛主席过的分析要合乎实际才能说服人，不合乎实际是不能说服人的。

有同志提出来，为什么毛主席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哲学思想各方面都很高，会犯错误？为什么伟大人物就不能犯错误呢？只有渺小人物才能犯错误吗？这是不是有一点唯心主义呀？伟大人物犯的错误就大，伟大人物当然也犯小错误，但主要是他要犯大错误，因为他掌握一个国家，掌握一个党，他犯起错误来那是不得了的。我们这些人是比较小的人物，犯错误总是一个局部问题。所以这样提出问题的同志，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不愿意把错误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伟大人物不能犯错误？难道犯错误都要分等级吗？

现在比较困难的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同志的讲话，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讲过这个问题，说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不当。这至少应该是一个原因。对当时国内国际反修防修的形势没有恰当的估计，把国内修正主义的危险估计得过高，这是一个原因。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国家的变化，他是有要反修防修这个想法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央开会的时候我就听他讲过：“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希望你们云南起义。”他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也讲过这种意见。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感到文化方面问题很多，我向毛主席汇报，那时他已经提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他说他在文化方面只抓了一个一个问题，比如武训传、红

楼梦研究等 没有统盘抓 他有责任。他甚至流露这个意思 就是大搞一下，搞错了，宁可将来纠正。所以不能说他要反修防修是假的，他真的想要反修防修，至于对修是不是认识的正确，特别是对中国这个“修”或者他心目中所想的“修”的认识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确实是要反修防修，不让中国变色，这种思想是有的。有的同志不是这样看法，认为他有帝王思想，就是要打倒功臣 搞权术 搞阴谋。这种看法相当普遍。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现在还不能赞成这种意见。要看整个的，毛主席这个人是坚决的革命家，他有左，并不能说他不是坚决搞革命的，只是在搞革命的时候特别是在晚年路线错了，思想左了。原因是对形势估计错了。我看这应当算一条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一条，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搞民主革命搞成功了，而且这个经验是丰富的，正确的，但是对于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工业化，确实比较不熟悉，没有经验。社会主义怎么搞？过去是按照苏联的办法。同苏联关系坏了，看法变了，苏联不能学了，怎么搞？要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搞建设，他没有经验。这一条也是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原因，由于革命成功，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骄傲情绪，一种猜忌情绪 对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干部猜忌 我看这点起的作用不小。毛主席自己多次讲不要骄傲，几次大的骄傲都使革命遭受到了失败，所以他经常讲。七大、八大都讲要戒骄戒躁“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但是他讲的这些恰恰是自己违反的。如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骄傲，那么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谁也没有他这么大的骄傲，那些人谁也没有他这么大的资本骄傲。后来加上林彪“四人帮”这么一搞 说他

不但领导中国革命，还要领导世界革命，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各国的左派党、左派组织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革命道路”；毛主席是我们的领袖”现在亚洲的共产党、欧洲的左派党当时都是这样宣传的。毛主席的左倾路线不仅对中国带来了灾难，对世界革命运动也带来了一些危害。所以骄傲情绪 猜忌情绪 这这也是一个思想原因。

还有一点，因为骄傲，只能听奉承的意见，不能听不同的意见 因而脱离群众。虽然他也说“我没有这么蠢 人家喊万岁我就相信”我就亲耳听到他这么讲过。五七年张奚若曾经说过“好大喜功”他没有明说毛主席 实际上是指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 好社会主义之大 喜无产阶级之功。还有你们原来的校长杨献珍同志，在大跃进的时候说，他去河南看了一下，回来说大跃进这一套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顶多百分之一是现实主义。毛主席听到了，讲了一句话，“百分之九十九呀？现实主义百分之一都没有？”我亲自听到他用怀疑的口吻讲的。我这里讲的是和他接触的时候个人的一些感觉。我这些话都不能算数，还是要等中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写出来，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

不少同志提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认为毛主席就是有封建帝王思想。我也承认他有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但我不大赞成作这种历史类比，人家说他主要看线装书 这是真的 他看线装书、看历史书。六二年我到东北，东北的同志告诉我，毛主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们超过秦始皇好多倍。他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有的。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早期共产

国际一直到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不能说对毛主席没有影响。那些影响比封建主义更大一些，至少不会更小。

这是讲对错误要分析。

再说：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问题。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没有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问题应当很好地研究一下。

首先，有没有我们现在要当作旗帜，还要坚持、还要继承、发扬的毛泽东思想？现在外国资产阶级都讲“非毛化”，说现在我们执行的政策和毛主席过去提倡的不一样了，好像我们表面上讲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在反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不对的。毛泽东思想是个客观存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是客观存在，能说这不是客观存在？对于历史现象采取否定的态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采取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这是最容易的。对于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包括毛泽东思想，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态度这是最难的。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过去一般的讲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简单的说法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毛主席的功劳。马克思主义早就传到中国来了，但没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所以造成了革命失败、挫折，而毛泽东同志把两者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是对的，确实是结合了。不管将来用一种什么表述方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是个事实。至于什么时候结合的最好，什么时候结合的不好，这要分析。结合好就胜利，结合不好就受挫折。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可以这样说，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经验的概括、总结。在这么一个东方大国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革命，毛主席把这个经验总结了，再没有别人这样好的总结过这个经验。谁也没有毛主席这样高的水平。这能否认吗？还有谁比他概括的更好？当然中国还有许多革命家，毛泽东思想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首先是结晶为毛泽东思想，以他为代表。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提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在马克思主义文库里面确实是新的东西，是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财富。统一战线，过去也有，但是在这样一个大国里面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并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过去是没有的。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只能这么评价，只能看他比前人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毛主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提出过的问题，他提出来了；没有一个人总结的比他好，他总结出来了。至于将来有人比他总结的更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武装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不少国家都是学中国，像古巴的格瓦拉都是从中国得到启示，越南也是从中国得到启示。所谓从中国得到启示，还不是从毛主席的著作得到启示吗？党的建设，把思想建党提到第一位，这一套建党的理论中国是很突出的。如果这些东西你不能推翻，那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有同志提出来，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不包括错误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只能包括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当然实践证明也有一个长的历史过程，可能今天认为是正确的，明天就不正确，那就经不起考验。也可能今天认为是错误的，经过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考证明它还是正确的。总而言之要经过考验。所以毛泽东思想只能包括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是科学的东西，是带系统性的东西。这叫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

同志的任何一个意见都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什么叫思想，什么叫理论，什么叫体系，黑格尔讲得很好，真理和意见是对立的，他讲得这么肯定，意见不是真理，一个人发表多少意见，哪里有那么多的真理，哪里有那么多的体系？毛主席的意见，特别是晚期，他的有些意见，不但不是真理，很多是违反真理的。你不能说不是他的意见，但是要把意见同成体系的、条理化了的、而且是经过实践考验了叫做理论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样讲当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不包括他错误的东西。凡是还没有系统化，还没有经过考验的意见，或者经过考验证明是错误的，不能放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我觉得黑格尔这话讲得很深刻，意见和真理是两回事。如果认为毛主席的意见都应当放到毛泽东思想里面去，那等于说毛主席讲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不是我们反对林彪，结果又走到同林彪一样的结论了吗？对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应当当作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去看它，在他的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些是系统化了，条理化了，而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把这些东西作为科学体系加以继承，加以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形成也是一个过程，并且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不是毛泽东同志一生出来就有毛泽东思想。那样就把毛主席神化了。有一次我去看毛主席，他说他女儿从学校里回来说毛主席小的时候怎么不信神，他说简直是胡说，我小的时候怎么不信神呢，我就信神嘛。这是把毛主席神化了。人，一生出来就是个天才，就是个全知全能，这根本不对，我们如果拿这个观点来要求毛泽东思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毛主席是一个人，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面的一个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人，一个革命家。所

以一定要看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对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否可以这样看：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有它的形成时期、旺盛时期，也有他的衰退时期。既然是一个发展过程，难道只有上升，不下降？只有前进，不后退？思想里面有强的方面，就有弱的方面。打仗 搞游击战争 搞统一战线 是他强的方面 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他弱的方面。这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讲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把那些走向反面的东西，那些衰落的東西，那些不正确的东西排除出去。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仅关系到中国，而且关系到世界。世界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毛泽东思想有各种评论，我们应当参与这种评论，我们应当在这个评论中发表我们的观点，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是否定一切，要实事求是地来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三十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

我是长期搞文化宣传工作的，我认为文艺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是密切结合的，毛主席历来都是这么讲的，要结合经济工作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过去没有注意这个结合，现在中央注意这个问题了，而且在这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对经济工作，最近中央召开的第一书记会议，讲了很多意见，主要是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同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一样，也要有一个总结。中央关于经济工作方面有了八字方针。八字方针虽包括文化工作，但主要是经济工作。文化宣传工作方面的问题不比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少。我想 宣传、文化、教育、文艺这方面工作也能按照中央对经济工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那样，对过去的工作联系起来总结一下。过去，毛主席对这方面的问题抓得比较多。我同

毛主席接触四十多年了，他在我们党里最注意思想工作、文化工作。在宣传、文化、文艺、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中，毛主席干预最多。所以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这方面的问题、缺点、错误都同毛主席直接的指导分不开。过去少奇同志在这方面，根据我的了解，抓得比较少。周总理抓得很多，但是关于方针性路线性的问题，周总理也是执行毛主席的。如果经济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左的错误，那么思想文化工作恐怕也同样的也是这样，甚至某些方面很严重。但我们不应该把责任全部推给毛主席。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应该由我们自己负责。

我现在着重讲思想文化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右的错误也有，主要讲左的错误）。同志们都是搞宣传工作的，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

拿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整我整得不算太厉害，但是批的多。批我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也承认过有修正主义。但是讲老实话，我这三十多年或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从三十年代以来，半个世纪，主要是左的错误。右的错误也有，主要是左的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感到辜负了毛主席。毛主席同宣传文化干部的关系，与我最密切。他对我的教育最大、最多。我跟同志们讲心里话，关了我九年，那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感觉：辜负了毛主席。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能不说有些左的错误是执行了毛主席的左的错误的东西。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不能把错误都归于毛主席。过去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不对。现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如果把一切错误归于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领袖，是最高领导人。我的基本态度是，共同来总结经验，这些错误、成绩我们有份，我们也是做了工作的。过去苏联

的那个口号：“一切光荣归于斯大林。”是不正确的 我们原来也是“一切光荣归于毛主席。”光荣怎么能归于一个人呢？光荣大家有一份，错误大家也有一份。

我想，在思想文化工作里表现为左的错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三十年来混淆两类矛盾，混淆学术工作、文艺工作同政治的界限。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讲得很清楚，要区分两类矛盾，而且这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发展和贡献。但是他自己就违反了。虽然他说要区分两类矛盾，但是他自己就不区分，自己混淆两类矛盾。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是他的功劳，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并且纠正毛主席混淆了的两类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搞错了，并不是我们都清楚的。第一个问题，胡风问题。胡风问题是建国以后第一个大案子，影响很大，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按语写得那么尖锐，向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有暗藏的敌人。但是搞错了，哪有那么多暗藏的敌人？胡风问题大家都关心，现在这个人已经出来了，到了北京。七十八岁。五五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文艺界有些人对他很同情。现在这个问题中央来抓了，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是中央、毛主席直接抓的，公安部处理的。公安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在中央给他做了结论 说搞错了 他们文艺思想有错误 但不是反革命集团。中央在结论里说，这一错案责任在中央。我们开始把他当作文艺思想问题来批判，后来主席批评了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那个时候拿我来说，确实感到自己思想水平低，没有看出问题。现在看来是搞错了，这件事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胡风现在有点神经官能症 因为搞了他二十多年 又坐牢。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把他关起来，神经受了刺激。我是几天前把中央的批语送

给他看，问他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向中央转达。现在安排他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顾问，将来如何安排再考虑。这是最突出的例子，混淆了两类矛盾。还有反右，右派不只是文化界，但文化界占主要部分，还有很多大学生，这也是混淆了两类矛盾。胡风问题、右派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两类矛盾登峰造极了，差不多党员、干部都是敌人。那个时候拿我们来说，思想上很痛苦，我们承认工作有错误，但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了？说左的错误是从五七年开始的还是更早，是否在三大改造运动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还有不同看法。但是对“文化大革命”据我所知道的，比较多数人同意这个意见：“文化大革命”是左的路线。从反胡风到反右，后来那些小的不算了，总而言之主要是左，混淆两类矛盾，同时还混淆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混淆两类矛盾常常从这个地方开始，先把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了。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有个区别，它们需要自由讨论。学术问题自由讨论，“双百方针”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也还是正确的。政治问题当然也需要自由讨论，但是这个自由讨论的领域比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小。特别是公开讨论。现在学术问题要公开讨论，要发扬这个风气不容易，因为它已经有条件反射，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说政治问题就是反革命。现在要打破这个思想顾虑，在党内党外还要做工作。所以要研究一下我们犯的左的错误，这是头一条，混淆两类矛盾。

第二点，阶级斗争扩大化。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里表现出来，只反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封建主义思想，也不反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算不算左倾错误？在思想领域里要坚持阶级分析观点。这对不对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没有阶级分析，那我们就不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应该讲阶级分析，应该有阶级观点。当然以政治态度划分阶级是不对的，不妥当的。政治态度不是不重要的，但是阶级只能从经济地位来划分。康生的一个所谓贡献，就是按思想来划分阶级。阶级只能按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不同阶级思想上的代表，有时可能同他经济地位没有多少关系。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出身的人，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也可以是资产阶级出身，思想代表同经济地位还要分析，马克思也讲过：思想代表同他的经济地位有时相差很大。所以强调阶级分析是对的，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错在把阶级斗争绝对化 扩大化 永久化 普遍化 庸俗化。扩大化到什么都是阶级斗争。永久化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并且越来越激烈。庸俗化到有些东西不是阶级斗争也当作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讲阶级斗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最大歪曲。

还有在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多少年来只反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封建思想，不反小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我们国家里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大量的。过去毛主席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多，但是后来他提出，不要讲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么一句话，就不批小资产阶级思想了，只提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他根本不提。还有封建思想嘛。民主革命在思想方面没有搞彻底。经过林彪、“四人帮”大量的封建东西泛滥，现在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多年来提出的一些口号“兴无灭资”“破资产阶级权威”“反对白专道路”等等 当时没有人提出怀疑。比如“兴无灭资”，我就没有怀疑。实际上稍微推敲一下这个口号很不科学，很不

准确。“兴无”可以“灭资”的“资”是什么东西呢？指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全部文化科学成果？首先没分清楚。如果指的是“灭资产阶级思想”，也“灭不了”，思想能够“灭”吗？文化大革命“中”讲“全面专政”，就是对思想也要“专政”，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思想怎么能“专政”？无论什么思想，封建思想也好，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怎么能“专政”？“专思想的政”除非砍掉你的脑袋，否则就没有办法。你不让他这样想，做得到吗？自己“专自己”思想的政都“专不了”。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是应该克服的，可以批判，可以反对，可以改造，但是不能“灭”，因为“灭不了”。第二，“资”包括资本主义整个的文化，包括它的科学，这些东西你能“灭”？不能“灭”。要继承，要吸收。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过多次的，毛主席也讲过的。我亲自听毛主席讲过，资产阶级的文化是不能“灭”的，真正有文化的还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所谓文化遗产，当然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但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要继承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遗产。还有个交际方式也可以继承一点。他为什么要讲交际方式？我想这是有道理的，首先是语言，语言就是交际的工具。最近强调文明行为，是我们也要继承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这些好的东西、科学的东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讲要继承。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面讲要继承人类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讲到科学、文艺、交际方式。他把交际方式看成人类的文明，是应该继承的东西。交际方式除了语言以外，还有风俗习惯，构成一个民族的特性。为什么形成一个民族，无非是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等。所以恩格斯讲要继承一切有用的东西，并且要加以发展。兴无灭资的话，这些都不继承了，还发展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从理论上搞清。毛主席他过去一向都讲要继承。他亲自

同我讲过：我们建国以后，没有犯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对过去的文化采取毁灭的态度，这是当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这些人的主张。列宁坚决反对，比反对资产阶级还厉害，认为是不能容忍的。还有一个口号，就是五八年提出的“破资产阶级权威”，我当时就有些意见。权威和学术权威是人们所需要的，怎么能够“破”呢？一个人有资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这个权威怎么能够“破”呢？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提出这样一个口号，“长无产阶级卫生志气，破资产阶级医学权威”。对资产阶级的医学权威，我们看病还是要请他看，越是权威大家越相信。你要把它破了，那怎么得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破了，好的大夫都在扫地、打扫厕所，可是病人就要找这些医生看病。破不了嘛。你叫那些小护士来看病，病人不愿意，还是要让医生看。江青看病还不是要找权威？这种口号根本没有意义，是不对的。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搞了，那个时候叫做“拔白旗”，拔得好厉害。康生当时还鼓吹一个“经验”，向我都宣传过。他说“拔白旗”好，怎么个拔法？自己出来现身说法。要教授自己讲演，当着许多人说“我是资产阶级”，怎么坏怎么坏。他说这个效果很好。我当时就有点怀疑，这个太难堪了，自我批评可以，但是怎么能这样当着许多人表演，弄虚作假。六〇年文科教材会议，我有个讲话，是向中央报告了的。我说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专”。现在看来更需要“专”，不是干部也要专业化吗？为什么要把这个“专”同“白”连在一起呢？“白”是个政治概念，反革命、反动。但是把它同“专”连在一起，越专就越白。对这些口号，现在我们也没有去批判它，但是应该认识到这些口号是不准确的，甚至于是错误的。

“厚今薄古”这个口号最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根

本不准确。厚今薄古，马克思不算古？一百多年了还不算古？你能够薄吗？提倡研究当前那是对的，注意当前的运动，研究当前的问题，这是对的，应该厚。但是古也不能薄。

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有一大堆，口号特别多。我现在有点条件反射了，因为我是提过口号的人，有些口号固然有它的作用，但是口号太滥了，确实是个灾难。“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讲句话，就敲锣打鼓。林彪讲句话，也敲锣打鼓。林彪讲什么话呢？“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人家的歌词，作为他的话，报上头条，大肆宣传多么深刻，多么伟大。我当时虽然被关起来，但还能看到报。

这是第二点左的表现，就是只反资产阶级，而且是那么一种反法。

第三点，破和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全国解放以后，就是有点只破不立。现在讲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要转移到立，转移到建设上来。二十多年来讲破，只破不立。破和立是对立的统一。不破不立是对的，要破。但是破并不等于立，立也不等于破。破什么，立什么，还要研究。现在来看，立，只能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破，只能破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东西，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东西。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像文化怎么能破？所以破等于立这个命题根本是错误的。

第四点，不是始终如一的、认真的贯彻双百方针。为什么现在人家心有余悸呢？我们搞双百方针搞了二十多年，人家把你看成是钓鱼。毛选五卷讲了很多，讲双百方针是长久的方针，永远的方针，不能收，只能放。现在我们还是这么宣传。可是人家不相信，他有经验主义，认为“鸣”“放”就是钓大鱼。我接触的一

些人，不少人还是怕。现在有的人敢讲话了，人代会、政协都会敢讲话了，这个气象非常好。坚决的搞双百方针，并不是说不要批评，不要斗争。要用自由讨论的方法进行批评，进行斗争。要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拿那些较好的东西来战胜那些不好的有害的东西。只有走这条道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简单的讲就是自由竞赛。这种方法虽然比较困难，但是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僵化，可以使我们的科学文艺发展起来。不用这种方法，采取打棍子的方法，那是容易的，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这种方法不但在政治上不利，对文化建设，科学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采取这个方法，不但国家的政治民主不能发展，学术也不能发展，这是肯定的。

马克思不是讲两种批判吗？一种批判的武器，一种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同武器批判差不多，低头认罪、体罚，那怎么叫批判？批判就是允许人讲话，要讲道理。大批判不讲道理，那怎么叫批判呢？不讲道理的东西不能叫批判，批判就是要讲道理。胡耀邦同志也讲过这个话，不讲道理的东西不能叫批判，叫什么都可以。“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已经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动刀动枪，打派仗，全面内战。大批判的结果是全面内战，这是清清楚楚的。

第五点，忽视文化艺术工作、思想工作本身的规律，忽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文化艺术工作有本身的规律，它是一种精神劳动，它有它特有的规律。我们过去忽视这个规律，不去研究这个规律。学校有学校的规律，文艺有文艺的规律，党校有党校的规律，教育有教育的规律。我们的事业、文化事业、宣传事业、教育事业是党领导的，要领导它不掌握它的规律，怎么领导？为什么小平同志在

文代会上讲不要横加干涉，下面的鼓掌最热烈？可见大家深受横加干涉之苦。在座的都是领导干部，你们要想一想被干涉者是什么滋味 我们都是负责人 或是局长 或是厅长 要想一想横加干涉造成被干涉的人的苦。他不好反对你。“四人帮”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偷偷的反对，现在的领导不少都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人家怎么好反对呢？

主要的是这么五点，是属于左的性质的错误。右的错误也有，但是主要的是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批判 那是对敌人。还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批判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总结经验的方式。所谓路线错误，左倾右倾，每次都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内容，用简单的话来说，左倾是超过了这个运动的可能性，超过了现实的发展，走到前面去了；右倾是运动已经向前发展了，他还落在后面，落后于运动的发展。所以左倾一般的就是求快，急于求成，急躁，不是一件事情上面的急躁，是国家前进的路线上面有急躁。列宁在胜利以后经常讲：在文化工作中间，急躁是粗暴。急躁粗暴可以说是我们在文化工作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大概在一九六五年，江青出来在文化方面开刀的时候，她与我有一场争辩。因为我们写了一个东西，反对粗暴，要搞双百方针。她跟我争，争论得相当激烈，她问为什么要反粗暴？粗暴就是革命。她就是要为粗暴辩护，所以后来她施行这条路线，就是搞粗暴。她利用毛主席左的思想搞粗暴，其结果非失败不可。到后来把所有的地方戏都禁止了，只准搞京戏，只准搞样板戏，一板一眼都不能违背，这能够不失败吗？所以对粗暴，你们不要轻视，尤其是现在管宣传的管组织的。粗暴可以发展成为路线问题。

三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人类没有生产，一天都活不下去。首先是物质生产；其次，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面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特别是现在，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这是新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生产力确实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革命。物质生产不能离开精神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了。我们讲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主要是指它的产品而言。恩格斯也讲两种生产。他是讲人本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而我们讲的是除物质资料的产品以外还生产精神产品。这两种生产以生产物质产品的物质生产为基础。因为人总要吃饭，要穿衣。衣、食、住都是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里也可以分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进行精神生产，生产精神产品。在《资本论》里有一章是专门讲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化，这两种生产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不可分。我们这些管精神生产的人，应该懂得物质产品的生产，因为这是基础。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大家研究经济科学，这是很对的。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活动。动物不会生产，人会生产。生产，无论是物质生产也好，精神生产也好 都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马克思讲过一个比方，蜜蜂同蜘蛛的劳动的技巧，是人类比不上的。可是人同蜘蛛、同蜜蜂不同之点在于他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他在生产之前 脑子里已经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设

计了。既然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所以他就必须是按照需要生产，他不需要的东西他不会生产。他首先要吃饭。最早的人就是采集，他也不会耕作，也不会搞农业，也不会搞畜牧业。后来慢慢的他就发展了畜牧业、农业，以后工业、商业都来了。最早的工业就是手工业。所以，生产都是有目的的一种行动。去年报刊上讨论生产的目的，虽然我没有研究过经济问题，但是，我对于这个讨论很感兴趣。我觉得要讨论生产目的确实很重要。我认为不但是物质生产的目的是要讨论，精神生产的目的也要讨论。去年看到报上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反映相当强烈，我感到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总而言之，要按社会需要生产。所谓社会需要 有积累的问题 消费的问题等等 是很复杂的。但是 不管怎么样复杂，总是按需要生产，使生产适合社会需要。这里包括着市场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消费的需要、积累的需要。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真正是按照需要生产，这就是唯物主义，不是主观主义。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发言权很小很小。但是我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了这个意思。后来到了上海，我又讲了一下这个意思。关于生产目的，我的主张不但是物质生产有这个问题，精神生产也有这个问题。不但是物质生产的目的有时候没有搞清楚，精神生产的目的同样没有搞清楚。我是搞精神生产的，人家问我什么目的，我也讲不清楚了。所以我说这个讨论对我有一个启发，就是要注意生产目的，不管是长远的需要也好，当前的需要也好，凡是不适合需要的生产都是浪费的、无效的 适合需要的生产就是有效的、有益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生产都是按照需要来进行的，这是共同的。文艺也有一个需要的问题，比方演戏，不按照需要那是不行的。怎样来看这个需要？演坏戏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种需要，

但那是错误的，还有正确的需要，更多的人需要得到健康的娱乐，你能不能够满足这个正当的需要？所以，这两种生产都要按照需要生产。

物质生产是基础。精神生产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高度的精神文明，需要有一个高度的物质文明作基础。

另外也必须看到，精神生产除了要有物质生产为条件外，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并不总是平衡的。就是说，在物质生产很差的时候，也可以有很高的精神生产。我们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要借口物质生产条件不行，精神生产就只能落后。相反的，应该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使在物质生产很低的条件下，也可以生产出很好的精神产品。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不平衡现象，好多大作家、大思想家、大艺术家都是在物质生产很低、社会政治制度很落后，甚至政治很反动的条件下面产生的。如果说物质条件不好，就不能生产出很高的精神产品，那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鲁迅那个时代物质生产高吗？政治很反动。所以政治、经济条件并不能直接地决定精神生产，可以在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产生很高的精神产品。这也不是我讲的话，这是马克思早就讲过的话。在希腊，就是在经济基础很低的条件下产生了希腊文明。后来，物质文明比当时的希腊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可是没有产生那样大的思想家，没有产生那样大那样多的史诗、悲剧、喜剧，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这两种生产的关系：第一是要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第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也不是平衡的。在物质生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很高的精神产品。这两种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要按照需要，适合需要的，才能够发展。不适应需要的就要被淘汰。马克思讲，哲学在

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它的需要的程度。这个国家需要这个东西，它就实现了，不需要它就实现不了，这是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就是因为中国需要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好，科学社会主义也好，如果不适应这个需要，它就不能够存在。我们搞思想、文化工作的人就是要时时刻刻去研究这个需要。好像搞经济工作的要研究国家的需要、市场的需要一样。如果你不研究这个需要，那是不行的。人们的需要是变化的，不是永久只有这一种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需要也是要变化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注意这个问题了。文化工作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宣传工作有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讲课，学生不喜欢听，你讲的不适合他的需要。当前许多新的问题你回答不了，当然他就不需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搞思想工作的人应把这个问题很好的研究一下。这两种生产的共同点都是要适合社会需要，适合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不是适合少数人的需要。不但是适合当前的需要，而且适合长远的需要。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共同点都是适合社会的需要。那么，精神生产、精神产品到底同物质生产、物质产品有什么区别？精神生产到底有什么特点？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创造性的劳动。比较起来，精神产品是具有高度创造性劳动的产品。物质产品也有创造性，不能说它没有创造性。比如说现在强调名牌产品，这个名牌产品它总是表现了更多的创造性吧。尽管如此，它生产出来的东西也都是重复的。比如这个杯子，开始第一批生产时，也许有点创造性，但是当你在做第二批杯子时，它就不表现多少创造性。而精神产品就不同了，它不能重复原来的样子，它特别要

有创造性，要有独创性，而且每一次都不同。当然，文艺开始也要模仿，它不模仿不行。但是它真正成为一个艺术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它一定是要有独创的。不但要讲前人没有讲过的、写前人没有写过的，也是他自己以前没有讲过的、写过的。他老是唱一个歌，人家就不欢迎了。如果损害这种创造性、独创性，如果束缚这种创造性、独创性，科学、艺术就不能发展起来。要保护这种独创性，这就是精神产品的头一个特点。也许这个独创性、创造性可能有错误的东西，可能有失败的东西，但总是要鼓励他。你不鼓励他，不保护他，那么未来的好的东西就出不来了。你保护了他，鼓励了他，也许将来会出现好的东西。这种精神生产与思想解放关系太大了，思想不解放，我们好的东西不容易出来。出一点错的东西，也不要紧，错了再纠正嘛！在保护独创性的同时，还要多作引导工作。我觉得我们做思想工作的，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要保护这个独创性，要保护试验，要允许失败。

第二个特点，它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精神产品是一种上层建筑，有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危险也是出在这种产品上。这种意识形态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掌握好这种精神生产，就要掌握好它同政治的关系。我们的文艺、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政治，非政治化的倾向是我们所反对的。过去反对，现在仍然反对。但是这两者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究竟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怎样搞？要搞好精神产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是不行的。

第三个特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要强调质量。对于精神产品来说更是质量第一，因为它是高度创造性的，又是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首先要强调质量。要掌握精神产品的质量，

不单单是政治思想要正确，而且还有艺术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要站得住。过去我们只注意政治思想正确，还有一个艺术形式，学术水平。如果学术水平、艺术水平不能提高，那我们的文化工作怎么提高呢？

第四个特点，任何产品都要经过社会的考验。物质产品要看销路。精神产品也有销路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精神产品是要经受人民的历史的考验。物质产品也要经过历史考验。但是这个考验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不一样，它好不好，要历史来考验。有很多东西你说它不好，但是经过历史的考验，证明它是好的。精神产品的好坏不是一下子能够考验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作领导工作的人，眼光、气度要大一点。不要急于下结论 说这个作品坏 那个作品好 这个文章好 那个文章坏。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一点虚心的态度，要有一点群众观点，也要有点历史观点。可能你认为它不好，而将来会证明它是好的；你认为它现在是很好，将来可能证明它是不好的。我们搞精神产品，比较起来比管物质产品要复杂一点。我们的国家要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什么叫文明？高度文明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有高水平的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有潜移默化人民思想的作用。这种产品究竟能够产生的快，还是产生的慢，决定于我们这些管宣传、管文化的领导同志。管得好，这种产品就产生的快一点，多一点，产品的质量就更高。如果我们管理得不好，产品还是会有有的，但是质量不高，或者质量很坏，甚至也可能有反动的。不能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产生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文章。

上面我简单地讲了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关系，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四 文艺、教育和政治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文艺界比较注意的，现在也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一向的看法是文艺服从政治，我过去也是这么讲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话讲的。毛主席讲过，一定的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错了没有？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看也不能说错。到底文艺要不要为政治服务？要不要从属于政治？要判断这个问题，也要有历史的观点。在历史上，我们从来都是讲文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三十年代，我们还没有教育，还没有政权，可是有文艺了。那时我们就讲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文学的论战就是要文艺服从政治。所谓革命文艺，实际上就是政治性的文艺，除政治性的文艺，还有什么革命文艺呢？所以文艺同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很密切的。文艺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宣传这个观点的。这个错了没有？我看不能说错。那个时候文艺战线上的论战，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文艺要不要为政治服务？要不要作革命的宣传武器。三十年代那个时候“第三种人”、“自由人”他们反对的也主要是这个问题，他们主张文艺不要同政治挂钩。我们说文艺一定要同政治挂钩。那么究竟是对，还是我们对？现在有的同志似乎有这么一种观点，好像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最早就反对文艺要同政治挂钩。文艺不同政治挂钩，那你还能够打倒国民党，还能够打倒蒋介石呀？还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呀？那个时候，有个叫胡秋原的，现在在台湾，他就反对文艺要同政治挂钩，在文艺上要反对干涉主义。现在我们也讲，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是不是说原来反对政治干涉文艺的

人就对了呢？三十年代胡秋原那些人反对政治干涉文艺，不是讲国民党不要干涉文艺，而是讲我们共产党（地下共产党）不要干涉文艺，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写的文章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矛头不是对着国民党，矛头是对着共产党的。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胡秋原还引了一句英文：Hands off art 你不要管文艺。苏汶写的文章就是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把矛头对准我们，对准共产党。那时共产党是受压迫的，我们在那种条件下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到底谁对谁不对？当然是我们对。不管那时我们怎么幼稚，我们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日本侵略者，我们要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当然，现在回顾起来也有缺点，我们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讲得简单化了，还有一点是不讲策略，应该争取他们，分化他们。我看至少有这两个缺点。比较起来，鲁迅对他们的论战就比较策略了，而我们这些人则反而是比较粗暴，不讲策略。然而不能说苏汶后来做了汉奸，胡秋原现在还在台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由我们负责。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现在有些文章没有从过去这个历史背景上来讲。抗战以后我们到了解放区，一直到后来都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产生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面创作的。这个问题要从历史上讲，离开当时的历史是讲不清楚的。在讨论四次文代会讨论报告时，有的同志不赞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提过文艺要为政治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文艺和政治是不能脱离的，指出非政治的倾向、脱离政治的倾向是错误的。这个话他们讲过。但他们确实没有讲过文艺要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是毛主席讲的。不

能说他们没讲过毛主席就不能讲，或者说毛主席讲了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现在看起来，经过这么三十多年或者再长一点四十多年来看，毛主席所表述的文艺要从属于政治这么一种说法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在讨论四次文代会报告的时候，首先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是不能讨论的。现在文艺界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说文艺为什么不从属于政治呀？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都要服从，还不是从属？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现在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政治，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文化。是比单提一个为政治服务要好。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工农兵是主力。大家对于这个提法都能够接受。至于文艺同政治的关系如何，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牵涉比较广泛。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点，毛主席讲过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历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大概都承认这一点。毛主席讲革命文艺是人民的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我看这一条是推翻不了的。不管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马克思有个公式，人类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经济又不是唯一的因素，只是一个决定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讲经济基础制约人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马克思有名的公式。基础是经济，生活不只是政治生活，他讲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所以讲文艺为政治服务或从属于政治，就容易把生活看成只有一个政治，把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排除掉。而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对于文艺来说恰恰是重要的。当然

政治也重要，但是政治不能概括整个人类的生活，不能概括整个社会生活。文艺的本质是生活的反映。文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形象，形象也是生活中来的。

第二点，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果理解得狭隘了，容易导致了这么一种结果，就是只讲政治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而文艺还有一个艺术形式。没有艺术形式就等于是没有文艺。艺术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过去强调了为政治服务，曾经导致为政治思想内容而忽略了艺术形式的重要，影响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艺术的质量不能提高。事物总是既有内容，也有形式的。恩格斯晚年的时候，对于经济同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一个自我批评。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死了，恩格斯说他们那个时候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当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互相影响的。文艺、政治都是上层建筑，也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基础虽然能够起决定作用，但是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恩格斯说，我们为强调内容而忽视了形式。他讲的形式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文艺形式。他是讲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形式。这个话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他只讲这个形式，把这个形式夸大成唯一的。当然是我们不赞成的。艺术形式有它相对的独立性，过去的唯心史观把相对的独立性变成绝对的独立性。好像文艺同经济、同政治没有关系。他们对待文艺发展的历史，也只看到它的形式的变化。比方：从诗经楚辞发展为汉赋，以至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文艺形式确有它自己发展的历史。但是唯心主义者把文艺发展的历史当作是一个绝对独立的历史，这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看到文艺形式是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我们这么多年来对文艺形式的重要，长期没有很好的注意研究，

这就影响到我们文艺的发展。

第三点，政治是什么？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政权机构——政党，这是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虚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讲文艺服从政治，当然要服从那个实的，虚的怎么服从呢？只能服从那个实的，实的就是政党领导。文艺服从政治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我还可以讲一件我经历的事情。我在延安的时候写了一篇评王实味的文章，文章中说文艺服从政治主要是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主席专门同我谈这篇文章。当时他说，文艺服从政治，只是服从政治思想，不服从人啊？服从政治，也要服从人。我当时觉得主席讲得对。你说服从政治，政治总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嘛。政治思想、政治倾向那是抽象的。所以他说服从政治也是服从人。后来我的文章里加上了这个意思。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

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是存在。文艺工作者应该尊重党委书记、宣传部长、文化部长、文化局长，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能简单地讲要服从。如果是组织作出决定那当然要服从，那是组织原则。作为思想来说，不能简单地讲服从政治就是服从哪一个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在组织上面也确实有这种毛病。所以，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讲不要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下面就鼓掌。

文艺服从政治这个口号，我认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现在不提为好，也不要再去批评它，可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因为这个问题是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文艺同政治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确实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文艺事业发展的前途。

关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口号，蒋南翔同志曾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问我有什么意见。这

个口号已经家喻户晓了。过去提这个口号也不能说错了。我个人的意见，觉得不再提这个口号为好。过去也提过另外一个口号，那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这样的口号是不是更好一些？因为只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觉得这种口号不能够代表教育的特点。这个口号只讲了一个共性，没有讲特性。那么教育的特性是什么？照我看，教育总归还是要发展人的智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办教育是一个人才的投资。现在外国人也好，甚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承认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是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

五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现在的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都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年轻的作家都是讲人道主义，讲人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过去我们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有错误的地方。对待这个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什么我们批人道主义呢？因为那时候苏联，还有一些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有一种理论，把人道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把人道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最高发展。他们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都是讲人道主义。一直到现在，这个作用还应该充分地估计。我们过去对这个作用没有充分地估计，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估计，是估计得不够。只是强调要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的

思想基础就是人性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不能详细讲了。我很希望同志们来研究一下，是很值得研究的。人道主义，在今天世界上还是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过去对于这一点估计得不够，对 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估计不够，研究得不够。

还有，对于人道主义在今天还能够起的作用，就是革命人道主义或者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用也估计得不够。我认为批判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批判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人道主义，还是必要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今天的 作用没有足够的估计。这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把人道主义都送给资产阶级了，都算作修正主义了，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六十年代初期我批了人道主义，得到过毛主席的称赞。现在我认为对于人道主义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过去的错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够。说我们都搞错了，向人道主义赔礼道歉，我也不赞成。那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所以，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又是像三十年代文艺同政治的关系一样。三十年代梁实秋不是讲人性论吗？鲁迅是批判梁实秋的。他揭露了梁实秋的所谓“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 其实是“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的资本家的武器。鲁迅认为 人在阶级社会里 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 但只是“都带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

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论，也指出阶级社会里面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这个现在还是站得住。有的同志主张在阶级社会里面人性就是阶级性，这种论点看起来似乎很革命，但却是错误的。主席的说法比较好，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不能说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这两者

是有区别的，这区别是很重要的。在延安讨论个性和党性时，有的同志说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个性就是党性，当时主席也不赞成。主席讲了两种个性，一种叫创造性的个性，一种叫破坏性的个性。我们要赞成创造性的个性，建设性的个性；要反对那个破坏性的个性。我现在还认为主席的这种说法比较科学。关于人性问题 关于个性问题 主席的这些讲话 我认为还是正确的。

下面讲异化问题。

为什么要讲一个异化问题呢？一九六三年我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异化问题。当时西方国家都大讲异化。异化这个问题，同人道主义有点联系。西方研究异化的著作不少，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人性本来是好的，让他自由发展就很好。但是人后来异化了，违反他的本性了，违反他的本性就是异化。克服异化就是人性复归。他们说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是讲人性的，后来搞无产阶级专政了。在欧洲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是不承认列宁，不承认晚期的马克思，只承认年轻时候的马克思。因为那个时候马克思是讲人道主义的，讲人性的。我没有很好地研究异化问题。现在我讲讲为什么有这个异化的理论。

所谓异化问题，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活动、实践的产物，成为一种同自己作对的力量。人不是有活动、实践吗？比如我劳动做了一个杯子出来，这种活动的产物就成为异化的力量，成为一种同自己作对的力量。异化同事物向反面转化还不一样。人的活动的产物变成了统治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异化。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异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黑格尔讲的。他讲这个世界开头就有理性、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他讲的逻辑。后来这个理念就异化了，异化成自然。从精神异化成物质。以后，物质慢慢地发展，

产生了人。人又有了思想，有了精神。所以，原来是精神变成物质，物质又转化为精神了。

费尔巴哈用这个异化的概念，说上帝本来是人想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结果上帝统治人。马克思也用了这个概念。他在《资本论》里还用‘异化’的字眼。异化大体上可以这样分 首先是经济异化。这是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里面讲得最多的了。经济异化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本来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商品产生出来以后，工人阶级他自己不能享受，享受不到它的好处。它成为一种力量，就是商品拜物教，反过来统治工人。所以，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越多，他们就越贫困。这就是经济异化，生产异化。

还有劳动异化。劳动异化不仅是产品异化，劳动过程也异化了，劳动本身也异化了。劳动本来是一件好事。最早的时候，人的体力要发展，劳动适应自己的体力，本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后来劳动异化了，成了苦事情了。因为劳动的产物统治着他，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所以这叫劳动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讲 人的手的产物就变成了商品 统治着工人 人的脑的产物创造一个上帝。人无非是一个手，一个脑。手的产物产生了商品，人的脑子的产物产生了一个上帝，这两种产物都反过来统治人 商品拜物教 拜神 信神。

此外还有政治异化、思想异化。政治异化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原始社会以后慢慢地产生了国家。国家本来是听人民的，是人民的公仆。结果呢？变成人民的主人。

我觉得这种异化现象是客观存在。异化现象是客观的社会现象，又是意识现象，思想现象。我们感觉到在什么东西统治我们，它是个异己力量。六三年我讲了这个话以后，好多地方的省

委书记要他们的宣传部长查，这个异化到底出于何典。就是我才讲的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费尔巴哈、马克思都讲过。这个异化现象，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确实有异化现象。到底怎么看这个异化问题 请大家研究。

苏联的理论家（所谓正统派的理论家），认为异化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私有财产。人类有了私有财产，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国家。私有财产消灭了，这个异化现象就消灭了。但是，是不是私有财产消灭了以后异化现象就消灭了呢？我还有点怀疑它是不是消灭得了。

我想异化现象通俗点说，可以解释为作茧自缚。蚕吐出丝来，结果吐出来的丝把自己搞死了。这个有点像异化现象。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这种现象会不会消灭？任何一种现象既然能够产生，它也一定可以消灭。

现在外国有一些小说家写所谓意识流。现在中国也有点模仿了。所谓意识流，是说人的意识里面有一种潜意识。一个人想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有一种下意识的东西。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一个作家叫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他是写异化的。我看过他的《变形记》写一个小职员，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甲虫。看起来相当恐怖。他是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人都异化了。这本小说可以看看。

异化问题，作为一个认识问题来看，从人类认识论的发展中来看，它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当人还不能掌握这个客观事物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东西对他压制，这就是必然王国对人的压制。当他掌握了客观事物规律以后，他就达到自由王国了。所以，这个异化的问题，是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异化就消失了。

如何克服这个异化现象，恐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要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要改造这个世界。世界不改造，这个异化现象消除不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使得这个世界能够更多地受人来控制而不是控制人。人不能控制它的时候，这个异化现象就解决不了。所以要克服异化，还是要改革。改革越彻底，这个异化现象可能会少一些。所以结论还是要革命。我看到一些材料 现在信神的、信教的多了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要使人智力、体力能够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可以这样说，智力、体力的充分发展，只有改革了这个社会，改革了这个世界，也改革了我们的思想意识才能够达到。

我讲的这几个问题，只是把我的一些想法向同志们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研究，请同志们批评。

《何其芳文集》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何其芳文集》即将出版，我很乐于写几句话，以表示我对他的纪念、友情和敬意。

我同何其芳同志相识和共事，是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年代，在全国人心向往的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当沙汀同志第一次把何其芳和卞之琳同志介绍给我的时候，他们已各以其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而蜚声文坛了。他们到延安不久，先后和沙汀同志等去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凭自己的新鲜感觉和革命热忱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他们原来陌生的令人惊异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民。后来，我在鲁迅艺术学院任职期间，何其芳同志担任了文学系主任。以他的文学素养和负责精神，证明他是一个十分合适而又称职的人选。

其芳同志自己曾说，他们来到延安，是“一个平常的故事”。当然这是一个“平常的故事”，但其中也有着不平常的意义。这个《画梦录》的作者他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飘渺的幽思见长；他和现实生活似乎离得相当遥远，他怎么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呢？一个作家对黑暗现实社会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经过一度的徘徊和孤独，或者是终于沉沦、堕落，为黑暗社会所吞没，或者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其芳同志不甘沉落，富于进取心，很自然地就走上了这条

追求光明的道路。其芳同志说他少年时代追求“三个思想（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但是 我们看到 他没有只沉醉于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他还要探索人生的更多的意义。他热爱人生，他对人生不是消极的、悲观的 他有理想 是个朦胧的理想主义者。他感到他所生活的世界是狭窄的，极力想突破它。他在《画梦录》中就说：“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就狭小了”。正是在这个思想支点上，他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其芳同志是一个严肃地思考问题的诗人，他走向共产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他痛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丑恶现实，只要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这个现状，他就会奔向它。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起了其芳同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承担起一个爱国公民所应负的责任，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开始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走了出来。他逐渐从现实中认准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的思想和文风也都为之一变。他在《关于 还乡杂记》中说：“从前我像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地阔大起来。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何其芳同志经过“太长太寂寞的道路”终于跨上了新的战斗的现实的途程。

其芳同志到解放区以后，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思想上发生一个突变，一个飞跃。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定“一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正确而且坚强的人”，努力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与提高着自己。他的诗文这时有了崭新的面貌。诗集《夜歌》反映了一个走到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有唯美倾

向的诗人的思想感情转变的历程。他唱道：“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夜歌》（一））他一面歌颂光明，强调快乐，热烈地迎着“明天的早晨”；在为未来而叫喊”；一面又不免有一些悲痛地怀念往昔，流露了知识分子和过去告别的复杂的心情。其芳同志喜欢歌唱自己，尽管对新事物的了解还不深，但仍然满腔热情地毫不虚饰地表示自己对于革命的一片忠诚。他到解放区以后，首先歌唱的是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他欢快地唱道：“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对美国惠特曼的诗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但他的诗文歌颂的不是个人主义的美国式的民主，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的民主，这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最热情最真挚的声音，是欢呼我国历史上一个崭新时代来临的声音。这个声音是震撼人心的，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号角。

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求。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不止一次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是他的志愿，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努力目标。每个国家的文艺作品都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和特点，每个国家的文

艺理论也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但要和我国当前文艺运动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要和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其芳同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其芳同志说过：“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我想我是在攻打着一座城堡 我想我是在黑夜里放哨 我想我不应该有片刻的松懈，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一个兵士有一个兵士的重要。”其芳同志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就把个人溶化在集体的事业中，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地攻打着一个一个的“城堡”。他不止是一个普通士兵 而又是士兵 又是将军。他数十年如一日，完成了一个光荣战士的应有职责。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进行文艺创作、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还是从事教学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其他工作 他都是那样忠心耿耿 兢兢业业。在“鲁艺”期间 他为学员看稿、改稿，有时一首小诗 他也会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评语；学员办墙报字写的不好，他就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五十年代，他服从党的分配，领导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就亲自深入地去熟悉材料 占有材料 从《诗经》、《楚辞》一本本从头学起。他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文艺创作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毛泽东同志称赞其芳同志做事“认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这就是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风。凡是和其芳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感到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之可贵，之值得钦佩。毛泽东同志用“认真”二字来称赞何其芳同志，这个评价是多么贴切、多么正确，又多么崇高。“认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共产党人就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我们要无负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就得做一个真正认真的人。在

这点上，何其芳同志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载1982年3月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八一年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我对最近发表的文学作品看得不多，讲不出很多的意见。好在光年同志刚才讲了话，他的意见我都同意。临时要我讲话，我就讲几句，来表示对得奖的同志们的祝贺，并借此互相勉励吧！

文学评奖是好事 要经常化、制度化

近年来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举行过评奖，效果是好的。这次短篇小说评选得奖的作者，不但有许多是中、青年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也有如谢冰心同志这样的最老一辈的作家，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而中、青是主力军。得奖的同志以自己优异的创作成果作出了贡献；许多没有得奖的，也都在创作上作了努力，各有大小不同的贡献。这说明我国的文艺正在兴旺繁荣。老作家中许多人，仍然精神抖擞，没有放下笔。但是整个来说，引人注目的作品，是出自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的手笔，他们已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经大踏步地跨进文坛，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这实在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事。评奖就是对我们的作家们的出色的创造性劳动的一种鼓励。评奖是促进文艺繁荣和科学进步的一种有效的好方法。我们要把评奖这种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当然，目前限于经济条件，评奖的奖金是很微薄的。但是我们革命的作家，绝不是为了金钱而写作，评奖的真正意义是精神鼓励。通过评奖，表示我们对这些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心血结晶的酬谢和评价，让更多的读者来注视这些大都是后起之秀的作者，鉴赏他们的创作。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两者都需要，但最重要的还是精神鼓励。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荣誉、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励和安慰，莫过于他的作品在人民中间得到承认，得到赏识，引起共鸣而又能起鼓舞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有不少同志建议设立“鲁迅文学奖金”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好的，也是可以实行的。我们今后要把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奖励经常化、制度化，并且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是不是所有得奖的作品都是无瑕可指，完美无缺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要求。但总的来说，得奖作品应该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值得奖励之处。我曾讲过，评奖也可以叫奖评。经过读者推荐、专家评判而得奖的作品，还是可以批评的，而且越是得奖的好作品，就越应该经得起批评。所以我说评奖也可以叫奖评。既然要评论，当然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绝不要拒绝批评，即使是不公正的批评。我们在过去几次文代会的报告中，都曾列举过一些较好作品的篇名，以引起舆论界和社会上的重视，这是有好处的。但也有缺点，往往品评不当，挂一漏万，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些作品都是经过领导认可的，这就不好了。作品只能由千百万群众认可，而且是要经得起历史

的考验。评论得奖作品，既不要有溢美之词，也不要有过苛之论。一个作品得了奖，要有评论，如果舆论界毫无反应，那就未免使作者感到太寂寞，也显得我们评论太不活跃了。如果你评奖选出的是不好的作品，那就更应该评论，应该坦率地批评。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多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文艺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但同时也无可否认，文艺工作中错误缺点不少，问题很多。现在无论党政领导或社会舆论，都对文艺工作很关怀，有鼓励也有批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今天得奖的作品仅仅是目前文艺创作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我们的所有作品都已达到同样水平了。就是这一小部分，也不能认为就是尽善尽美的。毫无疑问，你们的作品对于我国的文学，增添了新的财富，发出了新的光彩。但是，你们要以整个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利益为己任，绝不可以因为个人取得的一点小小成就而沾沾自喜，踌躇满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希望。

真实和忠诚

近年来，关于文艺真实性的问题，议论得很多。强调重视文艺的真实性，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就纠正和弥补了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失、偏颇和不足。应该承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尽管“四人帮”把这句本来正确的话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好多年。大家都知道，任何文艺作品，凡是不真实的都不能打动人心，都没有生命力，这是经过

人民和实践的检验，为世界文学历史所证明了的。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文艺上的应用，也是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是科学真理。一个革命作家不忠实于人民的生活，就写不出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作品。文艺要真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上，也有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赞同的。第一，有的人利用我们过去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某些缺点错误，而把真实性加以绝对化，对之任意地作了主观片面的解释，借此来贬低和否定开国后三十多年来我们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似乎我们过去的作品都是不真实的，只有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的文学中有过许多不真实的作品，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学中都不可避免的。比较起来，从根本上讲，真正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难道那些真实反映了工农兵斗争生活的 充满了血和泪的 描写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等的大量作品，不是我国革命的忠实纪录，而竟是瞒和骗的文学吗？

香港的某些刊物上有的文章说，我国现在的文学是新现实主义，好像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实主义，有也是旧的。如果这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现实主义当然也可以加个“新”字。但是他们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说过去的作品不真实，都不是现实主义的，甚至都是瞒和骗的文学，这就不对了。这是对我国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文学的诬蔑。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有些作家，也认为自己过去写的一些革命作品都不真实，也都错了。似乎是错听了某些领导人的意见，上了经常变化的政策的当，不免带着一种懊恼和忏悔的心情，这是不对的。革命难免要犯

错误，甚至是路线的错误，不管这个错误在于自己或在于领导，都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取得教训，而不是什么忏悔。如果你是真心实意投身于革命的，革命是正义的行动，为什么又要忏悔呢？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更高的自觉和独立的思考。

其次，我们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只是一般比喻的说法，说明真实对于文艺之重要，犹如生命对于人一样。但是对于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来说，世界上也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鲁迅在悼念诗人殷夫的文章中，曾引用过诗人喜爱的斐多菲的以下诗句：“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这位匈牙利爱国诗人为了民族的自由独立，不惜抛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我们今天的革命作家，难道不应该把忠于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吗？这正是我们的信念和理想之所在。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革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应当密切结合，这就是我们的革命观，也就是世界观。十多年前，当时还很年轻的一位女作家曾对我说过，她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党从来教育她要诚实，要讲真话。我告诉她，讲真话是应该的，我也相信她讲的是真话，讲真话有人不喜欢，但还是要讲。不过，你现在是一个作家，要反映和判断革命过程中的复杂的事物，也不要太自信自己的观察正确，还是要多听取别人，包括领导的意见。由于“四人帮”的灭绝人性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现在有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喜欢讲什么不可捉摸的“良心”，而不喜欢讲可以实际考察和检验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对人对事的出以公心。他们只喜欢讲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而不喜欢讲党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他们对于千百年来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世世代代因袭的陈腐语言津津乐道，而对无产

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却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权且用“良心”这个旧字眼吧。没有良心的所谓政治家是有的，旧社会有，新社会也有。资产阶级政治家，特别是那些政客，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哪里谈得上什么良心。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残余、打砸抢分子、违法乱纪分子、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的问题根本不是良心好坏的问题，也根本不配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们只是革命队伍中的败类。许多革命的政治家，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都经过长期的革命的严峻考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忠于人民的，是很有良心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来说，是很有党性的。如果笼统地说政治家没有良心，那么，反过来问，难道艺术家就都是有良心的吗？我们文艺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在十年动乱日子中，固然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经得起考验的，但是难道就没有少数败类卖身投靠、一点所谓的良心都没有吗？无论对于政治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都不是什么有无良心的问题，也不是他们自认为有良心的问题，而是要根据他们实际行动的表现——他们对待革命、对待人民、对待同志、对待朋友是否正派，是否真诚来评判他们的是非功过，这才是判别一切人和一切事物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一位以擅长描写新旧交错时期的农民而受到文艺界称赞的作家高晓声同志，他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好，无论你写什么东西，总要给人以力量。我们的作品无论如何不应该使人感到消沉颓丧，而应使人振奋精神，增添勇气。一个时期流行所谓“伤痕文学”，这是十年残酷现实的必然产物和反映。描写自卫反击战争的小说《西线轶事》，也不免于刻画了战士心灵上的深刻伤痕，但它并无损为祖国而死的无敌勇士的形象，使人受

到极大感动和鼓舞。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但是写了“伤痕”的作品并不就是所谓“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更不等于宣扬感伤主义的文学，只要写得好，只要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仍然可以给人以力量。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需要从更高的思想角度和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这是一项有待于付出艰巨劳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要求作品表现更多的积极的正面的力量，也并不是说，作品只能写正面人物，不能写反面人物，也不是说只能写积极现象，不能写消极现象。像“四人帮”鼓吹的什么“根本任务”论、“高大完美”论之类。我们提倡作品题材要多样化，要写各种人物，出身遭遇、教养、个性都要各有不同，这样才能构成我们文学中多种多样人物的丰富画廊。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但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呢？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他们是新人，但并不是“完人”。这种新人在某些人眼中来看，可能还是“异端”。“乔厂长”式的人物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主要就是由于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都要创造这种新人的形象，而只要求他们的创作能有助于培养这种新人，赋予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愤图强的力量，提高他们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这样，我们的文学就能给人以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只能从人民中来，从作家对于人民的深刻了解、高度信任和无限热爱中来，从作家对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强信念中来。十年浩劫，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中的威信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今天我们要恢复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中的威信，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个工

作中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 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文艺战线上“左”倾思潮 其渊源之久 传播之广 危害之深，都需要我们继续清理和批判，同时我们又要严重注意当前文艺界某些自由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 越出社会主义轨道 这是很危险的 必须加以反对和克服。现在我们有的文艺作品 包括戏剧、音乐、绘画 特别是电影、电视剧，不但缺乏社会主义思想，也缺乏爱国主义思想，甚至连起码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没有了。当然这样的作品为数极少，但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舆论界和文艺界有不少同志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作家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当然我们一定要用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思想、政治路线来坚持这些原则，而不应采取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原则。

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大党 混进一些野心家、投机分子是不奇怪的 他们总是妄图从内部来破坏和颠覆我们党。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的危险的人物。现在他们虽然被人民打倒了，但他们的帮派残余势力还在，一遇到合适时机 他们就蠢蠢欲动 妄图东山再起 对此我们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我们作家应该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人民的联系，为保卫党的队伍的纯洁，为实现四化和安定团结而共同奋斗。

也许有人认为，提倡对党忠诚就是提倡愚忠，提倡奴隶主义，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说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感情扩大，把思想境界更加提高 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民族 那岂不

是更加高尚万倍吗？

勇气和虚心

最后讲一讲作家、艺术家要有勇气，又要谦虚的问题。勇敢和谦虚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个作家、艺术家，他所进行的是高度创造性的劳动，而且是要影响千百万群众心灵的劳动，他既要谨慎，也要勇敢。首先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的领导，相信群众，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的文艺创作事业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我们自己也有了勇气，我们的信念就不会轻易动摇了。现在社会上，包括文艺界有一种风气不好，就是喜欢听小道消息，并且不假思索地传播这些消息，以致往往以讹传讹，无事生非，庸人自扰。我们的作家千万不要听到一点什么风吹草动就精神紧张，神经过敏，惶惶不安。我们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经受了十年动乱的考验，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们的党正在研究和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极为宝贵的教训。像十年浩劫那种恐怖的日子绝不会再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党虽然承受了空前巨大的创伤和灾难，但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坚强。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党中央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们要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群众的觉悟水平和识别能力，即使小道消息满天飞，甚至真地刮起了什么歪风，我们也要不为所动。在这种时候，我们更需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我们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损害安定团结的行为，一定要抵制并坚决与之斗争。如果你的作品是真正来自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利益的，你就不怕别

人批评，别人也批评不倒你。作家自己却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对的要接受，批评得不对的，也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你只是投机取巧赶浪头，那么即使你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即使别人不批评，你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艺术创造和科学研究一样，都需要勇气，需要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努力。文艺和科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人才不可多得，对于作家、艺术家，我们要特别加以爱护。要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要重视和正确地评价他们的成就。也不要盲目地吹捧他们，为他们护短，或掩盖他们的错误，也要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以促使他们不断前进。如果他们犯了错误，即使是政治上的错误，也要耐心帮助他们改正。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难免讲过错话 做过错事 对他们也不能过苛地要求。有些事情 我们作领导工作的同志还要多为他们承担责任。作家、艺术家进行艺术探索，也需要勇气，应允许他们有更大的自由，要支持和鼓励他们的探索精神，绝不可挫伤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和勇气。至于在探索过程中说了错话，一时迷失了方向，党组织要采取正确的方针，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思想分歧，要坚持采取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和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艺事业才会更加生气勃勃，兴旺繁荣起来。要相信我们文艺界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我们摧毁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长期闭塞状态，采取了向世界开放的政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世界上各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和流派也都不免要纷纷乘虚而入。我们的许多青年，包括青年作家，由于缺乏本国和世界的历史知识，缺乏批判的能力，往往容易受到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

和毒害。这也是对“四人帮”长期禁锢政策的一种反动和惩罚。有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东西在西方已经过时了、陈旧了的我们的一些青年还视腐朽为新奇，把它们当作新鲜事物来欣赏。对这类问题，应当经过分析批判、互相竞赛和自由讨论来解决。艺术是要探索和描写人的内心世界、灵魂深处的，但绝不能离开影响和支配人们行动的客观环境来描写。一个作家、艺术家，懂得一点心理学，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不面向客观世界，而一味沉溺于主观世界，那就只能引导我们的文艺走上歧途，陷入绝境。一个作家，在艺术的探索和表现方法上走错了路，不要轻易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可能是创作方法、思想方法不对头，创作经验不足，表现技巧不成熟，因而在创作上招致了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后果。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从创作实践中去改正。

前面已经说过，作家不只要有勇气，还要虚心。勇敢和谦虚两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勇敢而没有谦虚，那就要流于莽撞和狂妄。青年人容易骄傲，是不足为怪的。但如果写了一两篇东西，尾巴就翘得很高，有谁批评了他的作品，或不发表他的东西，就说是打棍子，是压制了新生力量，这就不对了。任何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行政干预都是不可少的。比如走路，就要受交警的指挥。如果闯了红灯，就要受干预。交警就是最有权威的干预者。如果没有这种干预，秩序就不能维持。当然，指导文艺创作，这比指挥交通复杂得多，不能相提并论。经过三中全会重申了“二百”方针，发扬了政治和艺术民主，文艺界许多人都受了思想解放的洗礼，不大那么容易崇拜偶像，接受别人的任意指挥了。但是，绝不可以把党对文艺工作的必要的正确的领导，都说成是粗暴的行政干涉。实际工作中，粗暴干涉是有

的。党中央提出的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和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从根本上反对和防止粗暴干涉的重要措施。党的负责人和文艺家之间，在工作关系上有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同志关系上，又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去年胡耀邦同志倡议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整个说来，是成功地开创了一种领导和作家、艺术家共同商讨，平等地自由地交换意见的民主风气。我们今后还要坚持采用这种方法。既要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鼓励他们创作的勇气，又要劝告他们谦虚，力戒骄傲。文艺家要尊重党的领导，对领导的意见要认真思考，不要拒绝领导和群众的批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中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也都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虚怀若谷，就是要像深谷一样，能容纳得下各种人的各种不同意见，博采众长。我们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让我们以此互相勉励吧！

按照人民的意志和 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 *

刚才张光年同志的讲话，巴金同志的书面讲话都很好，既有热情，又有文采，他们的意见我都同意。我现在也讲两点意见。一是关于评奖，一是关于学习。

先讲讲评奖的目的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我参加评奖揭晓的会议不止一次了，我赞成这种评奖活动。这回评奖是对几类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其他如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绘画等方面都各自举行过评奖。这回只是文学评奖，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文学评奖，包括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这些评奖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粉碎了“四人帮”经过了三中全会，文学艺术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时期取得的。这个伟大转折不能不在整个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引起空前剧烈的变化。它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了人民思想的活跃。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这种思想的活跃，就没有科学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就将受到阻碍。但是，这种思想的活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发挥评奖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社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促进我们的文学事业在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轨道前进，实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学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进一步提高。

我这里要讲一讲提高文艺鉴赏水平的重要性。文学评奖也好，音乐评奖也好，绘画评奖也好，都有一个如何提高鉴赏水平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要普及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也要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包括鉴赏水平。创作和鉴赏是不能分开的，就像生产和消费不能分开一样。生产从物质文化生活上满足人们的需要，物质产品要讲求质量，精神产品对质量的要求就应当更严更高。评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提高人们健康的欣赏趣味和欣赏水平，克服一切庸俗的、低级的趣味。评奖要有助于提高我们文学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提高我们的读者的识别力和鉴赏力。精神产品主要不是以数量之多见长，而是以质量之高取胜。数量当然也是重要的，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数量并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一篇好作品可以胜过好多篇平庸的作品而有余。从文艺史上看，文学艺术创作的每一个新的突破就是一个里程碑，可以作为划分文学艺术史上每一时代的标志。我们不要轻易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划时代的作品，但是可以说这次得奖的作品和许多没有得奖的作品，有一些是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虽然我看的当代作品不多，但就我看过的一些作品而言，可以认为有的确乎超过了开国后十七年的水平。

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物质生活条件

还贫困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去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古人讲“衣食足而后知礼义”。我们共产党人在衣食不足的条件下也要使人民有高度觉悟，努力创造新的精神文明。当然，首先要努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只有在物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才能有相应的精神文明。但不能说要等待有了高度物质文明，才能谈高度精神文明。这样说是不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并不违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不要说古希腊，就在近代国家中，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也曾产生了先进的精神文化。十九世纪德国在经济上比英国、法国落后，政治上也不统一，还保留许多小公国，但它创造了远远超过它经济的发展的文化。不仅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比他们更早一些就诞生了一批大思想家、大作家、大艺术家。真是群星灿烂。黑格尔、康德、歌德、贝多芬都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巨人。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状态落后，也不能成为替这个国家文学艺术落后辩护的理由。当年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还处在抗日战争环境中，衣食也不那么足，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还是极大地超过了敌人和国内反动派统治的广大地区，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同志早在《论持久战》中就讲过“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我们现在掌握了全国政权，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魄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化，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个传统数千年之久未曾中断，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近代远远地落到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后面，但其历史文化传统之悠久，却是世所罕见的。

最近几年，我国对外开放，人们从长时间的闭塞状况中打开

了眼界，这是好事。但也有一种现象不好，有的人就觉得外国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这种现象，虽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种风气，但有这种现象就是不好的、可耻的。我们千万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大大发扬文艺创作中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我们要学习和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好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我们不能闭目塞听，安于落后。最近交响音乐也在评奖，这是需要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交响音乐的欣赏能力很低，但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没有高水平的交响音乐。

评奖以什么作标准？我们提倡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三中全会后，又及时地相继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肃清政治思想上封建主义的余毒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以便防止和制止人们对解放思想、对“双百”方针的曲解，引导人们的思想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前进。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解放思想就必然会伴有错误的思想出现。见错误不批评，不引导，那就是自由主义，是不对的，但批评和引导一定要说理，不能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应当变得更成熟、更聪明一些。老路是行不通的。我国的宪法，人民的觉悟，也不会允许我们再走老路了。四项基本原则，是鉴别人们言行是非的普遍标准。除遵循这个标准之外，鉴别科学和文艺，还有一些各自的标准。一般不能代替

特殊，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样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既讲了容许各种各样艺术品自由竞赛的必要，也讲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既要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还要帮助那些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需要的艺术改造为适合群众需要的艺术。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的“双百”方针，就是他的“容许各种各样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这个思想的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这里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对文艺作品要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艺术研究是一门科学，要用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作品以正确的批判，而不是错误的、粗暴的批判。艺术批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要使我们批评和评奖尽量讲求科学性。而政治标准，就是要遵照党的方针、路线，代表人民的意志说话，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只有这样，我们的批评和评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我们的评论和评奖要鼓励文艺创作沿着革命现实主义（其中也包括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要鼓励作家敢于接触和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敢于和善于描写尖锐斗争的题材。这可能要冒一点风险。我们应该鼓励作家创新的勇气。他们在创作的探索中犯了错误，我们要给以善意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并为他们分担一定的责任。批评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党的文艺政策应该帮助作家提高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心情舒畅，敢于讲话，敢于

负责，而不是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这才是我们国家兴旺的景象。要人们敢于讲话，也难免要讲些错误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人们不敢讲话才是可怕的、危险的。对政治上反动的言论，当然要加以反对和抵制，但我们必须慎重地区别什么是反动政治言论，什么是有错误的学术文艺观点，对这些错误观点，则只有通过讨论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才能逐步解决。有些被认为错误的观点，可能实践证明并不是错误的。我们要学会同群众一起，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辨别什么是真正好的，于人民有益的，什么是真正坏的，于人民有害的。这里需要正确的群众路线，既不是脱离群众，也不是一切由群众说了算。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也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努力学会这门科学，就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鲁迅说过 评论作品要“知人论世”要顾及全篇 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应当具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要顾及全篇，而不是断章取义 顾及作者全人 而不是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 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不能强人所难，求全责备。鲁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这里正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鲁迅又是一个大胆的革新家，他对当时的保守派、复古派作了有力的针砭。“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 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45年）这些话虽是针对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中国而言的，但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社会中不也还残留某些“旧状况”吗？官僚主义、

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不是旧状况么？有些人不是也对这些旧状况心平气和，对新事物求全责备吗？这能说是合理的现象吗？鲁迅反对对于客观事物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他反对任何对新生事物的扼杀和摧残，比之为“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古人说，人才难得亦难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官僚主义对于人才的压制，文人的相轻，同行的嫉妒，这些旧社会的残余现象，不是还所在多有吗？发现和重视人才，正确对待和扶植中青年一代，就是我们一个责无旁贷的义务。

去年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开创了一个领导人员、作家、评论家在一起自由地、平等地、同志式地讨论文艺问题的新风气。这个会可能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是无论如何开了正确风气之先。毛泽东同志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两个“自由”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科学就不能进步，艺术就繁荣不起来。科学和文艺既需要最广泛的自由，又需要有领导。现在有的文艺工作者，有一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倾向，这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评和帮助。如何正确对待文学艺术这类意识形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要有领导又要有自由。简言之，就是要有领导的自由，而不是没有领导的自由。没有领导的自由，势必流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那是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是不利于文艺事业本身的发展的。

至于这次评奖是否还有缺点，是否公正，张光年同志说可以请大家批评。不能说得奖的作品就不能批评。我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评奖会上讲过，评奖也可以叫“奖评”，要鼓励人们对得奖的作品来加以评论。作家不应该认为自己得

了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无疵可寻了。要看到，还有一些没有得奖的作品可能比我的还好，而且一定还有比我好的。我们评奖的单位，也要看到我们的评奖可能挂一漏万，或玉石不分。这次评奖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应该认为总的来说是评得恰当的。希望今后的评奖一次比一次更完善，也就是更科学，更能体现人民的意愿。

其次，讲一讲学习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就必须学习或重新学习，使学习成为一种更经常、更自觉的行动。我们要根据党的方针路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就是整风学习的方法来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业务水平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学习任务。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正是毛泽东同志最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的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都曾深受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要为群众服务，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文艺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是引导我们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决不能因为毛

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贬低毛泽东思想，那是根本不对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能照搬照抄，那当然也是不对的。我们要重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但是再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了，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今天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采取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呢，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呢？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 曾被林彪“四人帮”大大歪曲了 践踏了。粉碎“四人帮”后 又一度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思想 大大妨碍了对毛泽东思想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将近四十年了。《讲话》指出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基本方向，基本原则，至今还是正确的。任何时候，我们也要把工农兵首先放在视野之内。有的同志指出，近几年来，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题材，重视不够，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现在我们党在文艺上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原是毛泽东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倡的，其中包含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并不是从这一原则后退，而是新的情况下对这一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 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 还是抗日战争，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在则已取得全国政权，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如果看不到今天所处的不同环境和不同时代的特点，不把《讲话》的基本原则和当前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是照抄照搬，那就很不恰当了。现在我们进入了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与过去解放区时期比，又是一个更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工农兵，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和四十年代迥然不同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四十年代也大不相同了，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和工人并肩战斗的脑力劳动者。这些服务对象的成分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不到因时代发展所引起的这种变化，还是用老眼光去看他们，那是完全不对的，那就要犯时代错误。

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更符合实际，也更为科学的规定。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削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是使这种关系更加正确，更加合理。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理论上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造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努力的过程，要靠自觉，要靠实际行动，要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很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学习社会。这对文艺工作者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向社会作调查，要接触和了解各个阶层和各种人物，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接触，而是深入的了解，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当事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一样，对待人民群众，事事关心他们，摸透他们的灵魂深处。改造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就要从实处做起，结合各自不同的业务，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和实验，文艺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单靠书本条文和响亮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总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现在，世界和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不见这种变化，就要落后于时代，就要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深入

生活实际，克服政治教条主义，也克服艺术教条主义。我们今天得奖的作家，不能说没有社会经验，但也不能说你的经验已经够丰富了。我们大家都还要学习社会，都要扩大和丰富自己的经验，加深对这些经验的体会和理解，才能成为人民意愿的表达者。“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故。这些经验，我们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了。不能说中青年作家没有什么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也要看到，任何人的经验和见识总是有限的，永远有不足的时候。所以，老作家也好，中青年作家也好，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现在青年人不喜欢年纪大的人教训他们。青年人不虚心，有骄傲情绪，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帮助他们，严格地要求他们，而一定要教训和训斥他们呢？那样，即使你一片好心，他们也不会领情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虚心一点，首先去了解青年人，也向青年人学点什么呢？他们不正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么？青年人向老前辈学习，尊重老前辈是应该的，老年人难道就不应该尊重青年人，也向青年人学习吗？我想，只有建立这种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关系，一种同志式的亲密的关系，才有利于整个党的事业和文艺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这种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它，使它不受任何损害。我就讲这些意见，讲得不对的地方，请你们指正。

《阿英序跋集》序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我国进步的文艺界并没有被血腥恐怖所吓倒，并没有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里，反而挺起胸膛，高举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旗帜。“太阳社”和“创造社”就是当年的重要代表。蒋光慈和钱杏邨（即阿英同志）是“太阳社”的两名主将。《少年漂泊者》曾经打动了渴望革命的青年读者的心灵。《死去了的阿Q时代》敢于向伟大的鲁迅挑战，对这部杰出作品的评论并不确当，但却提出了一个惹人注目的问题：阿Q时代到底死去了没有？我们的回答应当是阿Q的时代并没有死去，但却应当死亡。鲁迅以其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无比锐敏的洞察力，解剖了这个代表我国国民性的阴暗面的典型，他是希望这个时代死去的。这里，我想起了俄国伟大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那篇有名论文，他分析了这个典型是旧俄国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并以高度的热情期待埋葬这类人物。如果我们中国的批评家也像杜勃罗留波夫那样来评价鲁迅，鞭挞阿Q，那该多好啊！

一九三二年以后，我在“左联”、“文总”曾和阿英同志共事三年，我们相处很好。他治学勤劳，待人诚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已不见当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青年锐气了。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因阳翰笙、田汉、杜国庠等同志被捕，他受到了连累，老父和幼子一度入狱，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上的打击。但他

并没有从此倒下去，他继续以另外的方式进行斗争。他致力于近代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研究和历史剧的创作，他对近代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作出了前人未有的贡献。他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是卓有功绩的，我们永远纪念他，人民也将永远纪念他。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 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大开创者——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诞生以后的一百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鲁迅诞生的时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祖国大地上黑夜漫漫，风雨如磐，而现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却充满生气和光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复杂的斗争，排除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以新的力量充满信心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鲁迅虽然没有来得及目睹新中国在东方的出现，但是他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却为这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遍及全球。今天我们中国人民以深切的敬仰和怀念来纪念鲁迅，并以他的光辉榜样来激发我们前进。

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无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的产物。它往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原载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往植根于自己的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产生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斗争和各种思潮巡回激荡的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鲁迅思想产生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挫折失败、又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代。如果说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统治，那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鲁迅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是大变革时代产生出来的，是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因此，他的天才和修养没有仅仅使他成为单纯的作家和学者，而是同时使他成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诞生地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近代，这里又首当资本主义入侵的前沿，接触外来事物较多，甚得维新风气之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纵横交错。维新的道路已被事实证明无法走通以后，浙江又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反清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这里是秋瑾、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家乡。鲁迅曾师事章太炎，和蔡元培有长期交谊。鲁迅又参与过光复会的活动，对孙中山先生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敬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危亡迫在眉睫，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先驱人物呕心沥血，奋进不已，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形成了强大的学习新学的热潮。正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条件，以及

家庭环境的变故，使鲁迅从少年时代起便脱离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读书应举’的‘正路’，顺应时代的潮流，走上了“异路”。在这新的路途上，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而深刻的矛盾运动过程。由学洋务到赞助维新，再由赞助维新转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鲁迅的思想是和时代的发展共同着脚步的。他曾经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其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等的民主自由思想，十九世纪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反抗精神，吸取了东北欧与各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的营养，同时也一度多少感染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他的探索道路，始终充满着勇敢的进取精神和高度的爱国热忱。鲁迅一生道路的出发点，正是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他弃医就文，也是为此目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经过一段沉思和观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革命也从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迎着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英勇地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之中。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和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思想先驱们，包括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站在一起。这个时期，他又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当着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和屠杀的严重关头，他更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民权保障同盟，并直接参与了许多支援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的国际性反法西斯斗争。鲁迅在国内外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坚强旗手，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道

路，典型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道路，不断地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以鲁迅为伟大代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例如宋庆龄、郭沫若、茅盾、邹韬奋、闻一多等都是沿着这条光荣的道路走过来的。作为一个埋葬旧时代、开拓新时代的伟大先驱，鲁迅对新旧交替时期中我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对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小市民、官僚绅士的生活和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的作用和影响，有着极其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前期用民主主义，后期进而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进行了气魄雄伟，鞭辟入里的总结性的批判。以鲁迅和他的这种批判为标志，结束了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旧时代。

鲁迅进行了成绩辉煌的文学创造。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后来又创作了风格特异的《故事新编》。他对我国人民中的消极落后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但他对人民的不幸遭遇又是充满同情。他创作了蔚为世界文学奇观的、独树一帜的杂文，这就是后来瞿秋白高度赞扬的鲁迅式的杂文。与此同时他又撰写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小说史。此外，他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艺术作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不畏艰辛，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高峰，成为我国新文化最伟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正是这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贡献，确立了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崇高的地位。他的作品也流传于世界，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已为世界所公认。

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卓越的历史功勋是他在文化

战线上，以自己辉煌的战斗实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方向概括地说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它的性质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我们今天的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而且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今天的文化，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各方面和它的不断发展完善过程的社会主义文化，其内容之丰富多样，都非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可同日而语。但是不应忘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和发展下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的文化也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过去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但要吸收和融化人类一切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借助于这种营养来丰富我们的文化，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鼓舞人民，使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得到普及，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方面负起历史责任。因此，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方向，并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而过时，而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而进一步发展和发扬光大。鲁迅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并加以发展的方向；鲁迅的遗产，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前进道路上无可争议的前导和明灯。

世界任何国家的伟大文化无不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和独

创性。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或者说正因为是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鲁迅逝世之后，他的老友沈钧儒所题的“民族魂”三个字，正代表了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鲁迅以其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富于民族特色的风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和悲愤，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我们民族内在的最宝贵的品格，最高尚的思想情操，最坚韧的战斗精神。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鲁迅处在中国新旧时代的大交替中，敏锐地感到时代的脉搏。他为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他对于那种主要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损害而造成的民族精神的偏枯和国民性格的弱点怀着极其沉重的痛切之感。但是，鲁迅没有因此而消沉，他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满腔爱国热忱，为中国的新生而战斗。

鲁迅早期开始探索民族出路的时候，就提出我们应当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道路。一方面吸取外来文化思潮，一方面又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这反映出鲁迅试图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潮流结合起来的宏图，注意到要兼顾两个方面。但是，他此时所理解的“世界思潮”，主要还是西方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论中的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潮。辛亥革命以后，他目睹这场革命的失败，痛感中华民族精神负累的沉重。这种事实的教训和深刻的体验，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空前的战斗豪情，和同时代的其他前驱一道发动了对旧文化的批判。他当时认为，保证民族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使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才是第一要义。他大声疾呼地主张改革，坚决抨击那些以

“保存国粹”为借口、钻在硬化的传统里不肯革新的封建卫道士。他呼吁青年不要唱千篇一律的八股老调子。他呼吁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创造出新的文学艺术。他以无比锋利和尖锐的笔法，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历来所最缺少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个时候，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封建主义糟粕是那样致命地窒息着我们民族的生机。我们的民族要复兴，要强大，必须无情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非把束缚人民的封建主义枷锁打碎不可。

因此，“五四”以来，鲁迅更坚决地大力倡导接受外来文化，他希望能通过这一途径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获得新生和发展。他主张以雄大的“汉唐气魄”大胆采用外来事物，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毫不介怀。鲁迅本身的艺术实践，正是这种豁达闳放的“汉唐气魄”的发扬光大。

鲁迅在“五四”时期激烈地抨击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但是，他却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最善于鉴别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等文学论著中科学地评价了我国的文化艺术的起源和优秀传统，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发扬了这种传统。他看到民族文化是相递嬗的，新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扬弃，是肯定其积极的部分、精华的部分，而对于消极的部分、糟粕的部分，而对于积极的部分、精华的部分则应当保存继承下来。鲁迅为了民族的复兴，不能不怀着深广的忧愤鞭挞自己民族的弱点，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对我们民族的消极方面作过如此痛切而深刻的解剖和批判。但是鲁迅在这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民族向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拚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这些人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支撑着我们民族的

生存和前进的力量。即使在黑暗的年月里，鲁迅仍然对我们民族充满信心，批判所谓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悲观论点。他严肃地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 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 倘若加于全体 那简直是诬蔑。”鲁迅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 就描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特征，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魂魄。他在临终前不久 还特别指出 我们的民族几经浩劫 屡遭失败，“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露自己的弱点 这是意在复兴 意在改善。”鲁迅是一个充分尊重外国人民并善于学习他们的长处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尊严感的人，是一个像钢铁一样坚实的伟大爱国者。

鲁迅一方面实行把外国文化拿来以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拿来主义”，一方面又把民族文化的成果 介绍给世界 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鲁迅坚持的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既反对夜郎自大，也反对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他鄙视那种丧失民族自尊心、对外国人卑躬屈节的“西崽相”，鄙视那种认为中国样样不如人的买办文人。同时，鲁迅对从西方舶来的和自制的毒害青年的颓废文化，更像对待鸦片一样地进行扫荡。他是保护人民、保护青年精神健康的卫士。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家，应当始终忠于自己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善于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要具备能够突破狭隘的民族局限性的眼光，把握世界文化进步的潮流，善于择取外来的文化丰富自己，从而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断推向前进。鲁迅正是一个能够勇敢地博采外国文学的众家所长，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的人，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都非常熟悉。因此，他成为屹立于世界的中华

民族文化的伟大代表，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要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联系今天的实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鲁迅从事社会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从来都是出于一片爱祖国，爱人民，力图改革社会的热忱，而又保持着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也必须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办事，尤其在长期受封建迷信统治的中国，更需要科学的武器。鲁迅青年时代受过自然科学的熏陶和训练。鲁迅一生那样严肃、认真、透辟地解剖社会，那样尊重实际，尊重真理，那样坚定地摒弃任何迷信和偶像崇拜，都是与他的科学素养分不开的。鲁迅在“五四”前后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掌握分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由于他的坚定地探求社会人生真理的科学态度，因此，他的作品对中国社会的解剖仍然达到了异常深刻的水平。

鲁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他的科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也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认为这种科学将大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前进。他说：“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 是一个好的 正当的转机 不唯有益于别方面 即对于文艺 也可催促它向正确 前进的路。”

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确实像他自己说的，是经历了“事实的教训”之后才接受的。在追求真理的中国人中，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很早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才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和它所指明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

义适合中国国情，救治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先前许多文学史家说了许多但仍然是纠缠不清的问题，终于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回答，于是他毅然地纠正自己思想上的“偏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中，鲁迅挺身而出，公开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由于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状况、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他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和创作时，便毫无教条气息。他知人论世，分析复杂的社会矛盾，比前期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他对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革命队伍的状况，他们的力量和弱点的所在，也认识得更深透、切实。他反复强调革命者应当“明白革命的实际”他指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因此，他从不为血污所吓倒，不为困难和挫折所屈服，在革命非常艰难的时期，仍然相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当革命队伍在行进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时，他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仍然坚定不移，深知这是革命行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带着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鲁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宝贵的革命气节和政治操守。

鲁迅一生，都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从“五四”时代起就一直遵从革命先驱者的将令，甚至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遵命文

学”，另一方面又始终忠实于艺术的真实，大声疾呼作家艺术家应当大胆地睁开眼睛观察社会。他正确地指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在旧中国强大而残酷的文化专制高压下，鲁迅表现了一个作家最高的道义和现实主义勇气。由于鲁迅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他一再强调革命作家首先应当成为革命人，亲身体验革命的生活，这样，才不会把革命写歪。鲁迅在强调革命作家正视现实的同时，又指出革命作家应当有远大的目的，应当有理想。鲁迅的科学态度不仅在于他重视实际，而且还在于他重视从实际出发，不倦地追求远大的目标，远大的理想。他对那种丧失理想从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主义者，一直是加以鞭挞的。他说：“厌恶现在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敌，他们一日存在，现在即一日不能得救”。与厌世者相反，鲁迅对于人生，对于未来，都是满怀信心的。鲁迅的作品所以达到非常成熟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它能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伟大目的地的战斗力量。

鲁迅的这种科学态度不仅贯彻在他的创作中，而且突出地体现在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中。鲁迅的战斗一生就是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社会、旧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一生，而鲁迅的批判其所以最深刻有力，就因为它抓住了根本，就因为它科学。鲁迅指出“文学是战斗的，文学家应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任何中庸主义、巧滑、自由主义都是同鲁迅精神不相容的。他把杂文看成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主张“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当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沉渣泛起和泛滥的时候，鲁迅总是给予迎头痛击。他与“国粹派”战，与“现代评论派”战，与所谓“自由人”

“第三种人”战与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战与鼓吹闲适和性灵、以标榜自我为中心的所谓“论语派”战，其中虽有旧友、同事和上司，他也一点不退让，毫不留情。他决不对之“赔笑脸，三鞠躬”。在论战中，他采取了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他强调，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对于敌人或敌对思想的斗争是最明确的，是最坚决的。鲁迅逝世前不久，回答托派分子恶意挑拨的义正词严的书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鲁迅经常指出，我们需要坚实的、懂得社会科学的批评家，需要科学的批评。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怀有“热烈的好意”，即纯正的动机和团结的目的；这种批评，就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鲁迅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正如他严于律己一样，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与他们也时有争论，对同志的缺点错误，从不轻饶，批评起来也很尖锐。他常常告诫我们要注意克服“左”的思想情绪。但他总是诚恳地对待他们，正确地肯定他们的长处和成绩。他没有任何私敌，即使在他生前与他有过争论和误会的同志，在为同一目标的共同斗争中，也决不记着“个人的恩怨”。

我们每个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人，总结痛苦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批评的武器。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要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使我们的批评工作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称，就要提高我们的文艺批评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批评

(包括自我批评)的水平,使这种批评更加切实,更加科学。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宣告成立,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创举,鲁迅是这个联盟的主要发起人,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真正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学运动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给予了高度的又是科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这个运动的弱点。

鲁迅在临终前曾高度评价高尔基,说高尔基的崇高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鲁迅也正是一个把自己融入大众,和大众的情感无不相通的人,他一生始终怀着对人民大众的最真挚、最热烈、最深厚的爱,为人民群众而呐喊,为人民群众而战斗。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用笔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他把自己的笔当成匕首与投枪,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鲁迅以自己的战斗,为迎接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是我国伟大革命先驱者中极其杰出的优秀人物。他的声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要革命、求解放的心声。他的声音引起我们人民大众的强烈共鸣,就在于他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鲁迅的不朽力量就在于此。毛泽东同志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做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要我们学习鲁迅热爱人民、献身于人民的最本质的伟大品格。

对于人民群众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鲁迅并不是一开头就认识清楚的。他在早年,作为一个年轻的启蒙思想

家，曾经热烈地希望中国得到改造，希望人民大众迅速地摆脱痛苦的命运，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同凡响的超群英雄身上，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估计不足，“五四”时期，他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但有时又痛感到中国大众只是戏剧的看客。一九二五年以后，鲁迅逐步看到支撑世界的正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当时统治者视为“愚人”的民众。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自觉地找到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就在于人民大众，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首先着眼于作为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一九三〇年，他针对我国一些资产阶级作家的偏见，强调指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看到中国的改革的伟大物质力量和成败的决定力量在于人民大众之中，这是鲁迅后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使我们的文化变成人民大众的文化，鲁迅作了坚韧的努力。他对反人民的反动文化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鲁迅切实地把革命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斗争的一翼，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只有像鲁迅这样，文学艺术才能在根本上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为了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人，鲁迅和他的同志，为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文字和文学的贵族倾向和士大夫倾向，反对文字和文学的故作烦难和故作高雅，反对把文字和文学变成“特权者的东西”和“特殊阶级的工具”。他以高度的热情，提倡中国文字的改革，提倡连环图画，提倡新木刻，提倡民间戏剧。当时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如连环图画，被许多人所不重视，而鲁迅却站出来为它作了感人至深的

辩护。在中国，鲁迅是文化素养极高的知识分子，但他又是科学普及和文艺普及的热情倡导者，他是把提高与普及结合得很好的典范。

鲁迅也坚决反对无原则地迎合与俯就大众的艺术尾巴主义。他对人民大众怀有一种革命作家的高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鲁迅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 能思索 有决断 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 却不是骗人 他利导 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这是鲁迅对革命者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和群众关系的最精辟的概括，也是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作为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作家、艺术家 他的崇高职责是他的‘利导’，而不是‘迎合’。鲁迅说：“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 故意多骂几句 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 但这样下去 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作这样的论断决不是耸人听闻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文学艺术不是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站在人民群众先进部分的立场上去观察生活、理解生活，而是降低思想的水平线，借大众的名义，用庸俗性的东西偷换通俗性的东西，用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去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胃口，污染群众的心灵，这种做法，文艺家不就变成新帮闲了吗？

鲁迅具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时时考虑到艺术作品问世之后的客观社会效果。当他的作品发表之后，他总是想到它对人民心灵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说“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又说：“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 直抒胸臆 其实是不尽

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自觉地改造自己，严肃地解剖自己。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作家艺术家富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家们，要学习鲁迅这种高度责任感，把这种责任感看成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是不对的。一切有抱负的革命作家艺术家都应当把这种责任感作为自己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动摇。有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是坚实的，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下，鲁迅以韧性的战斗精神，整整奋斗了一生。鲁迅的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他最基本的思想作风，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彻底唯物主义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没有这种精神，鲁迅创造民族文学艺术的高峰是难以设想的。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创造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今天，我们要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毫无疑问，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

鲁迅指出“在文化战线上要有成绩 非韧不可”。鲁迅这个论断，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他清醒地看到，中国旧社会的根柢是非常坚固的，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因此，在中国，任何一点社会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鲁迅认为，“即使艰难 也还要做 愈艰难 就愈要做”。这就非有坚强的韧性战斗精神不可。

与韧性战斗精神相对立的，是追求形式、追求表面轰轰烈

烈、一曝十寒的浮泛作风。鲁迅一再批评这种作风，他认为，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激烈得快，也颓废得快，是办不了大事的，尤其在中国，更是得不到成功。因此，他教导青年应当“有一分力 尽一分力 不必一时特别愤激 事后却又悠悠然。”应当注意克服“愤激一时的缺点”。鲁迅还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 没有勇 而单靠一种所谓‘气’ 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 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实的工作了。”鲁迅这些意见，确实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根本之点，这对我们是一种切实的、意义深远的教导。

鲁迅告诫青年作家、艺术家，千万不要把文学当作一种敲门砖 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 取得了一点小成绩 就放弃艰苦的努力，以为用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就可立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同时，鲁迅也希望文学批评家注意保护和激励青年做长期努力的积极性 切不可“捧杀”和“骂杀”这是语重心长的教导，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的。鲁迅深深知道要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化，让我们的文化事业如无尽的长江大河奔腾不息地长流下去，就需要造出大群新的战士。为达到这种目的，还应当进行长期坚忍奋斗，用韧性战斗精神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武装大群新的战士，使他们永远保持和广大劳动人民血肉联系。这是建设我们民族新文化的战略任务，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希望所在。这样，才能从广大青年中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优良的战斗作风、能够攀登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高峰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地这样做，这才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艺术家们所开辟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无比广阔的，只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党中央所指示的四项基本原则，认真学习党的六中全会

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队伍，我们的文学艺术必将取得更光辉的战绩。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国家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曾经产生了以鲁迅、郭沫若和茅盾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巨人，今天，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更加需要涌现一批社会主义的文化巨人。我们今天隆重地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既是表达我们对鲁迅的崇高敬仰，又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代新人寄予一个殷切的希望。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沿着鲁迅等先辈所开辟的新文化方向前进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期望今后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涌现出更多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和冲锋陷阵的闯将。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大大地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生气蓬勃的。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恢复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也闪耀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的光辉。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正在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推向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正像耀邦同志所指出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其他错误倾向，没有受到领导方面的及时的应有的批评和斗争，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急待克服，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使我们的文艺队伍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富于战斗力，从而使我们的

的文艺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坚信，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里，一个崭新的东方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一定会到来。让我们用自己千百倍的努力来迎接它的到来吧！

一九八二年

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在京文艺界的同志举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开得很好。

关于文艺问题有不少分歧意见，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活跃。我们不要求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在领导思想上却必须力求一致。党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已经作了阐述。胡耀邦同志也先后有过多次讲话。最近，胡乔木同志重新发表了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也谈到了文艺问题。这些都很重要。

这次座谈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认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

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就要正确地宣传、解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中，我也可以算是一个。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时，我曾出过一本小册子，叫作《表现新的群众的时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在中国文联、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代》序言中我表示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个任务却没有完成得很好。虽然我对毛泽东思想历来是忠诚的，但忠诚并不等于正确。所以，宣传、解说的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容易。一方面，不应该违背原意；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变成照本宣科，而应有所发挥，有所建树。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唯陈言之务去，但我们讲话和文章中的陈言还是不少。要准确完整而又结合实际地解说毛泽东思想，也很不容易啊。

为了正确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我想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很形象地说过：“马列主义是一棵大树，而我们只是一些枝叶。”当然，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谦虚，但不止是谦虚，也是真理，因为确实是从马列主义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繁茂枝叶。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列宁把它发展了，以后毛泽东同志把它应用到中国革命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方面、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但都是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这棵大树在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是充满生命力的。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传统，十亿人口的大国，丰富无比的革命历史经验，在这样的土壤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棵大树难道不应该根深叶茂，地久天长，万古长青吗？

其次，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只有对毛泽东思想有完整、准确的了解，才能很好地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这

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普遍意义，也是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当然是大家所熟知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但几乎在他所有重要著作中都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最突出、最丰富，也最有特色。《讲话》本身也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第三，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我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割裂开来。刚才有的同志讲话提到这个问题，好像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五四”新文学讲得比较少，这是事实。但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能只限于《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章，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包括和个别文艺工作者的谈话，总是十分亲切、深入浅出，使人心悦诚服、永志不忘。还有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文学作品，也不可忽视。他没有因为自己擅长旧诗词而有所偏爱，仍然提倡要以发展新诗为主。他对以鲁迅为主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有一次在和我谈话中突然问我对鲁迅的作风如何看法，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说鲁迅的作风就是断制和谦虚的结合。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本人所一贯提倡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高度评价“五四”功绩的时候，也严正地指出过它的形式主义的错误。“五四”新文学运动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在当时是很革命的口号。但认为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就是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毛泽东同志本人受过桐城派古文和《文选》的不小影响。桐城派统治的时间很长，一百多年，后来曾国藩当政，桐城派又再度复兴，起码有一二百

年统治中国文坛。桐城派的古文有个优点，比较简洁，不能说都是谬种。《昭明文选》是我国古代韵文的精华，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是熟读过的，也不能说是妖孽，所以我想，毛泽东同志的文风不可说是桐城派古文的简洁和“文选”的华丽文采两者的结合。这是个不成熟的意见 提出来和大家研究。“五四”运动是彻底革命的，它在初起的时候，不能不对统治千百年之久的旧文化传统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三十年代我们有些同志也曾一度对“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加以贬低 认为是非驴非马 甚至比文言还坏。从革命历史的过程来看，革命往往伴随着某种简单、粗暴的现象，面对比自己强大千百倍的旧文化传统努力，似乎非此不足以廓清它的影响。这也要以历史观点来看。总的来说，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要有历史观点，不能割断历史。

《讲话》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得起考验 过去是、现在还是指导我们文艺运动的指针。这也就是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怎样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一切照搬。那样，就变成“句句是真理”了。我们讲的坚持 是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学说。根本不要坚持，那就无所谓发展；根本不发展，也不可能坚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又坚持又发展。如果列宁句句照搬马克思，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点，那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因而也就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也不是照抄十月革命。如果照抄十月革命，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也不可能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我们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才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这样。

应该看到，从《讲话》到现在，国内外起了空前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历史时代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进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驱逐日本侵略者，推翻旧制度。我们要看到这个变化。现在我们讲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就要具体看一看，什么样的群众，什么样的时代？《讲话》讲为人民服务。人民这个概念，当时主要包括四种人，除了工农兵以外，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内——那时是把知识分子的多数列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但一般都是提“为工农兵服务”似乎知识分子不包括在内。后来，主要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又把多数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多数知识分子就只是改造对象，而不是服务对象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用过去那种眼光去看待他们就不对了。一九六二年 在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题目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论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尽管这篇社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批判，现在看来，这个提法还是对的。至于为社会主义，四十年前没有这么提，因为那时还只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有些同志只是拘泥于旧口号，有一点不同都不行，这样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就有落后于时代的危险。

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过 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后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公式。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我们过去批判把这种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那是批判得对的，但由此而连相对的独立性也不承认，那就不对了。研究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联系及其发展，正是文学史应该探索的问题。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我们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文艺的党性原则是自觉自愿的。在今天，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的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但是也有错误、也有支流。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巨大政策转变而来的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是不容忽视的支流。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反对这种倾向。

大家对深入生活谈论得很多。作家要深入生活，这是天经地义。所谓深入生活，就是不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我看这一点最要紧。做当事人，就会感到与你所描写、所反映的生活血肉相连，利害与共。毛泽东同志说，感情的变化是最主要的。立场、

观点、方法都以感情的变化为标志，感情变了，对事物的观察和体会就会不相同。因此，所谓深入生活，不是纯粹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问题。

文艺评论工作十分重要，这几年有发展，也有成就，但和创作相比，就显得逊色一些。评论工作问题很多，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我觉得有一种误解，以为共产党人、革命者不能讲人道，不能讲重视人。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人是一切事物中最宝贵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应当被轻视、贬低，应当被重视、尊重，而人的价值和尊严都不是抽象的，不能离开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现在谈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异化”问题。这个问题，一九六三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大会也讲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我当时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异化，按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辩证的规律来理解异化，……就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看。由于“异化”这个概念不好懂，常常产生一些误解。我曾想过，是否可以用“作茧自缚”这个成语来形象地说明“异化”呢？当然，从生物学上说，蚕吐丝作茧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过我们这里是按照“作茧自缚”这个中国成语的意义来了解的，就是自己的产物束缚了自己。）马克思本人也有这样的比喻。社会异化，无论经济异化、思想异化或政治异化，都是一种很复杂现象，需要作专门的研究。是否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异化现象就没有了？但至少现在还有。至少有阶级或阶级残余的存在，异化现象就不会消逝。宗教就是异化，人的头脑想象出一个神，这个神反过来统治了人。这和“作茧自缚”不是一样吗？不但人的头脑的产物

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束缚人、支配人，人的双手的产物也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用双手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财富，也成为一种神秘的、异己的、奴役人的力量。换句话说，是物统治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现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些人迷信金钱万能，一切朝钱看，这是不是异化啊？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研究。

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都非常复杂，我们要研究这些现象。青年人特别喜欢探索，热心于探索，我们不要去反对。我们只有鼓励他们探索的义务，而无阻碍他们探索的权利。在这里，最需要的是正确的引导，是循循善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果他们在探索中出了差错，领导人该负责的就负责，该批评的就批评，批评也还要采取保护的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三十多年了，好多青年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走错了路，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都负有一份责任。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在这点上要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他们学习社会、学习历史、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不要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得到发展，就看它和中国的历史、现状结合的程度如何。如果结合得好就发展得快，结合不好就发展得慢。这也是马克思讲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你的理论不能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那这个理论就是不行。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发扬十二大精神

十二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开得很成功的会议，是空前团结、民主的会议。从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其它有关文件的讨论，到选举中央及其他有关委员会，都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讨论，真正做到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同心同德，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许多同志都说，十二大是七大、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七大以后我们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七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没有七大，不可能有全国的迅速解放。八大路线也是正确的。但当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估计不足，提出的正确路线和许多正确主张，后来在实践中也没有能坚持和认真贯彻实行。十二大迥然不同了，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一，十二大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了团结和民主的方针，恢复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七大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延安整风，全党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十二大同七大比较，当然情况不同得多。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党内第一个总结历史经验的文件。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又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去的那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

主持下起草的，现在的这个决议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民的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刻地对党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某些错误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作自我批评，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所不容易办到的，是我们党高度成熟的表现，党有了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同志们切勿看轻了自我批评，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不用说一个大政党，就是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大胆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也并不容易，这需要有很大的科学勇气。我们许多同志在文化艺术战线上工作的时间很长，有的同志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有必要把‘五四’以来的历程好好回顾一下，看看哪些问题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基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都应该适当地加以总结。做错了的事情，当然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有个人的原因。现在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使我们自己变得更成熟更聪明一些。

这次大会能够开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的同志说，十二大的会上，还有某些犯错误的同志没作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的可以等待；或多或少作了自我批评的，就要欢迎。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有的甚至很有功劳，所以还是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他们是正确的，我就投了他们的票。我认为，这次十二大比过去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自我批评都作得好。七大会上，王明没有作自我批评，但毛主席仍然劝说大家投他的票。毛泽东同志说，阿Q浑身是缺点，三风不正十分严重，但同志们不要忘记，他是被反革命杀死的。毛泽东同志当时把敌我是非界限分得很清楚。党的正确的路线应当如此。

第二。十二大所以开得好，还因为发扬贯彻了三中全会的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种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广大群众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对十二大的精神作了高度概括的、非常精辟的阐述。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党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情况，用概括性的语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也正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而且也只有发展中才能前进。坚持走自己的路又是多么不容易啊！当然，过去毛泽东同志也讲过类似的话，但这次党中央是在新的情况下作出的新概括，包含的内容和深度不同于从前。开幕词还说：“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也是讲得很精辟的。我认为十二大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这样两句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两点是十二大精神的精髓。

应当看到，这个经验得来不易。党成立以来，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做到了走自己的道路，而是经过许多的摸索和追求，在总的前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局部的失败和挫折。启蒙主义者曾试图走的西方道路，它虽比封建主义要进步，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决不是要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中学和西学诚然是有区别的，但对于如何救中国来说，不应该是中学、西学之分，而应该是进步、保守倒退之分。马克思

主义并不是中学，而是从外国传来的，它是普遍真理，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后来我们学苏联，又把第三国际的话看成句句是真理。我当时就曾是这样认为的。这也因为中国革命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有点像不大会走路的孩子，当然就要学人家的。我们不能责备小孩学步。同样，对尚处于不成熟状态的革命者，也不应嘲笑。革命的发展，建设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由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以及积累大量经验的过程。现在党中央这样讲，正是对长期历史经验的概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单有教条主义而无个人崇拜还好一点，这二者一结合，就有产生专制主义的危险），意义是很深远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对“两个凡是”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我们党才有了三中全会的正确的路线，使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实现了安定团结，出现了人们向往已久的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不是说，今后一切都一帆风顺了，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曲折和困难肯定还会有，只不过路线正确了，就为克服困难、避免更大的曲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这也是总结了长期的经验教训后取得的辉煌成果。胡耀邦等同志的报告，就是无数老一辈革命家鲜血的代价换来的。

我们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提出十二大的宏伟纲领。这个纲领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目标、重点和步骤。就是说，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工作，为十二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在十二大上得到了系统的概括，成为胡耀邦同志向大会所作报告的根本内容。

第三，这次大会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的问题，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许多同志在学习文件中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到底有无可能？我看了会议上许多同志的发言，特别是一些作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发言，我对翻两番是信心倍增的。这和过去曾提出的高指标不同。同时还要争取三个根本好转，即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应该说也是有现实依据的。因为中央同时还提出了四项重要保证，有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具体措施。所以说十二大纲领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纲领。我们文艺界都拥护、赞成这个纲领，并愿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十二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单独作为专门问题来谈，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至少是少有的。这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党中央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也很及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适应 两者互相依存 互为条件 但又不是绝对平衡 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讲得很清楚的。马克思明确提出过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艺术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与这个基础相适应。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唯物主义。但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不相适应的情况。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文盲还很多，大学生又这么少，这和我国现代化是不相适应的。如何改变这个状况？每次开

会教育、科学、文化部门几乎都提出经费太少的问题，有的地方还不能做到专款专用。这种状况的确不应再继续下去了。我相信，随着十二大的召开会逐渐有所改变。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有物质投资，还要有人才投资。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爱惜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增加必要的文化设施，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我们对人才是不够重视的，不要说“四人帮”时期，就是在开国后十七年，我们对爱惜人才这一点也注意得很不够。搞的运动太多，时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贻误了不少人才。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唯物论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封建社会尚且知道应该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并解决好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不过2,500万左右，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应该依靠他们，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逐渐落实，他们的工作条件有的已有所改善。但做得还远远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现在还有人认为不要知识也照样能革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

的。因此应该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过去尊重得不够，这是我们的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面临着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文联这个团体，一定要做好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改进文艺团体的工作方式，包括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都要好好研究。要反对形形色色敌视和蔑视知识分子，轻视科学文化，为愚昧辩护，鼓吹落后的错误论调。文联成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它是党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专业性的又带综合性质的群众团体。这是人民自己的团体，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团体，应尊重它的一定的自主权。如果说政府机关像文化部，应该有自主权，那么文艺团体像文联和各个协会，更应该有自主权。应该保持和尊重它应有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这些团体的负责同志，要善于充当党的助手，善于与党外的专家、群众合作，向他们好好学习。并且与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军队的政治部实行密切的分工合作。要提倡服务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自由散漫的倾向。要帮助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深入到人民当中去，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为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提供一个必要的创作和研究的气氛，提供起码的工作条件。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动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办不好的。我们的农业战线所以取得迅速的极大的成就，在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要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就在于善于调动文艺工作者（包括专业和业余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如果不是调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就会调到单纯追求个人名利的错误道路上去，这就不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总的方向。

关于“双百”方针问题。“双百”方针是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问题，新宪法草案上已经对这种自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用不着怀疑。“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学术文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不要有任何怀疑和动摇。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责任感，他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就不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了。另一方面，我们主张领导机关要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特别是艺术上的必要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掌了权，如不保证创作必要的自由，谁来保证？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限制得太死或强求一律是不行的。一定要保证必要的自由，必不可少的自由，这不是自由化。只有保证必要的自由才可以更好地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保证这个自由，就可能造成文艺工作者与党的隔阂以至对立。所以创作上特别是艺术风格上是应该给予必要的自由的，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风格进行自由的艺术创造。我们说要保证作家的权益，这就是最大的权益。我引过《周易》上的一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的思想是千变万化的，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框子都框起来。现在有些青年人的思想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你引导可以竞赛可以但却不能加以压制。所以《周易》上这两句话对我们也还是很有启发的，殊途而同归嘛！科学家有科学家的途径，创作家有创作家的途径，这个家与那个家的途径都不一样。如果都一样就没有科学了，也没有艺术了，也就没有世界了。我们是要求“一致”、“同归”，“同归”于社会主义，在大的方向上，在根本利益上一致起来。但达到“同归”、“一致”的手段则应该是多

样的。你不多样也不可能。要允许多种颜色。毛主席讲过，世界就是多样的统一。所以在艺术问题上应该宽一点。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 在大的方向 方针政策方面 而在艺术、艺术问题上要给予充分的自由。这并不是自由化。毫无疑问，“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们是要坚持的 这是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针，是最受广大文艺工作者欢迎的方针。

十二大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解决了方针路线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组织上也解决了交接班这个大问题。如果单是解决了方针路线问题，没有组织上的保证，那问题也不会真正得到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这个问题很大，毛主席在世时就提过，但没有解决好。这次是否解决好了呢？我认为是解决得比较好的。我在顾问委员会讲过这个意见：七十多岁了，还不当顾问？所谓过渡的形式，就是过渡到你不当官了，这才过叫渡。过渡到退休、离休。中央采取的过渡形式，这是一个创举。这样做使人感觉比较自然，比较稳妥。“文化大革命”十年，党内关系搞得很不正常，有些同志对交班感情上有些过不去，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搞好这个交接班。现在这样比较顺利，波动不大。要做好这件事不是个人问题，不是哪一个干部怎么安排的问题，而是党的事业，关系到未来的事业。现在主要是要搞好新老合作。搞好合作，是交接班的关键的关键。搞好交接班每个同志都有责任，都要为中央分担这个责任。现在大家担心的是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一再提出的十年动乱中的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反对三中全会的这种入，我们文艺单位怎么样，大概也有这种人吧！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陈云、小平同志一再谈这个问题，讲得很坚决，这几种人一个也不能进领导班子。我觉得我们文联、协会队伍要清理一下，领导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

最后讲一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问题。这是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了这个根本原则，所以才造成了空前的大悲剧。这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搞集体领导，这是防止个人专断的一种有效手段。现在我们的中央就是强调集体领导。一个单位也要实行这一条原则。一个单位民主集中制搞得不好，工作就可能没有成效，坏人钻空子的可能性就小。因为我们队伍里的问题，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在人民内部除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我们党内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根本制度。

学习和贯彻十二大精神，要见之行动，落到实处。在文学艺术各领域，都应迈出新的步伐，作出新的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文学创作要进一步繁荣，不但要提高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质量而且戏剧、电影、电视等作品，大都是以文学剧本为基础，也要提高思想、艺术水平，文艺的繁荣不但要看量多而且要以质取胜。要在质的方面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电影，特别是电视每天与千千万万的观众相见，是满足群众文化需要、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鉴赏水平的重要工具，要使之逐步提高思想艺术水平，减少以至消灭次品。文学、戏剧、电影工作者，都应和电视工作者齐心协力，携手合作，为发展电视艺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戏剧除继续发展话剧、歌剧外，要对戏曲现代戏和传统戏作进一步的合理的革新，使之适应今天观众的欣赏需要，真正作到推陈出新，移风易俗。

造型艺术，要注意发展雕塑、油画。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这方面都作出了新的成绩。要发展雕塑，一定要和我国现代化

建设和城市整体规划密切结合起来，使之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此，今后要为发展绘画、雕塑、油画创造更多适宜的条件。

音乐、舞蹈及其它艺术，也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但是整个说来，我国人民的音乐文化还不够发展。人民的音乐、美术教育作为美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民群众需要听更多更好的歌曲，需要看更新更美的绘画。我们要批判和抵制庸俗的、低级的靡靡之音，积极提倡健康的抒情音乐。

要开展健全的但又是活跃的文艺评论，要有互相争辩的气氛，要多一些互相探讨，少一些独断专横，要旗帜鲜明，又要互相尊重，反对那种庸俗的吹捧和过分的挑剔。各种文学、艺术创作的评奖是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良好方法，应继续开展并逐步提高。

我们要开创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走自己的路，促使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要做的事情很多。

载1983年1月5日《人民日报》

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

我今天来参加庆祝三联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感到特别地高兴。

岁月如流，我跟三家书店有五十年的交情了。今天到会的很多是我们文化出版界的同行，有不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们都为党的出版事业尽了力，作出了贡献。有的同志已先后离开我们不在人世了。我们今天深深怀念李公朴、艾思奇、柳提、沈志远、金仲华、黄洛峰这样一些同志，中国人民也都会怀念他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今天在座的徐伯昕、钱俊瑞、张仲实、胡绳、徐雪寒同志，以及一些我不太熟识的同志，都是老战友。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写作者和出版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我们许多人要靠拿稿费维持生活，但我们不是为金钱写作，而是为革命写作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会，主要也是为叙革命友谊而来的。这种友谊是一种最可宝贵的革命感情，是经历了困难、胜利和挫折长期考验的。五十年之久了，这就是半个世纪，时间不短哪！

我当时不认识邹韬奋同志，但我已久闻他的大名。对他的事业精神和革命操守十分敬仰。胡愈之同志是他的亲密合作

* 本文是作者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者，也是我素所敬慕的人物。鲁迅和茅盾，可以说都是生活书店的精神支柱。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党内党外的都有，大家对生活书店，以及后来的三联书店，都是怀着同样的革命感情。这因为这三家书店，不只是一般的进步书店，而是党所直接领导的最早的出版机关。这几家出版社，它们在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伟大转折关头，民族反帝斗争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有如春雷一声，曾在广大读者中唤醒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无数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

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同志都是书店老板，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老板，他们实际上也是老板，但这些老板与一般老板不同，而是革命书店的老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的关系，同志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讲话，也不叫什么“朋友们，同志们”，因为都是同志们，而且许多人早就是党内的同志了。

这三家出版社所以能在出版界、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我党所直接领导的出版机关。当然，我们还应提到，同样是党所直接领导的南强书店、湖风书店这样一些出版机关。它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文艺更早。但是三家书店却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它们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这几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今天来的人特别踊跃，特别热情，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许多负责同志都讲了话，王震同志也讲了话。对三家书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王震同志刚才讲到中国古代三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中国

的文化的的确很古老，也很灿烂，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民族的光荣。但是我国的近代文化，包括中国的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并不古老，历史也并不长，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亲近的，也是十分宝贵的。三联书店所经营的正是近代、现代文化。它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联。中国古代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其遗产浩如烟海，有无数的珍品。但是中国近代、现代文化，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虽然历史较短，却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我国历史上天翻地覆时期的文化。世界上诞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出现了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涨和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新文化也就随之诞生、发展了。我国人民现在正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三联书店所从事的革命文化的建设，其思想核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新的文化建设是和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分不开的，我们只有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改造，才能建设我们自己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三十年代在上海，我们许多同志都是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都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但还不懂得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经过延安整风以后，才逐步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也许三家书店的许多同志当时也跟我差不多，对毛泽东思想还没完全认识。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是坚信不疑的。当时三家书店是传播革命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中心。它在中国当时那样困难、那样艰苦、那样充满危险的条件下，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了革命思想

和革命文化，是有很大功劳的，所以它至今受到人民的怀念和爱戴。

讲到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都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为目的。后者又是以前者为基础，两者又是互相依赖，一时一刻也不能分离的。所有精神文明的产品都离不开物质的手段。书籍、图画、乐谱以及音乐厅、剧场、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等等，许多都是文化艺术本身，同时又都是它们的手段。物质生产要有积累，文化也需要积累，而且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需要积累。一个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高低，就是教育普及的程度，不但要看文化设施的多少，还要看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及它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也就是说，它对世界文化提供了多少珍品。文化积累。主要就要靠图书文化资料的保存和使用。

三家书店就是从事文化积累工作的，首先要注意现代、近代文化资料的积累。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精神文明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精神，但它也是物质，它变成了图书、资料、展览品、唱片、影片，这不都是物质吗？这些都需要积累和不断更新。所以搞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该重视文化积累。我们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古代文化落后，主要是近代、现代文化有些落后了。我们的古代文化并不落后，全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我国。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文化积累的重要。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的古代文化，已经积累了几千年，它的成品很多，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淘汰能够留传下来的都很精致。我们近代、现代文化，没有几千年，还不过一百年左右。所以这个积累非常重要。我们讲文化建设，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积累。要使积累工作做得更好，使它的精华得以保留、流传下去。我们不但要有绘画

馆、戏曲馆、音乐馆 还要有现代文学资料馆、电影、电视资料馆等等。

刚才和朱穆之同志谈到文化工作，我就讲了要注意文化积累的重要。不但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单位，各个文化单位都有一个积累问题。所谓文化发达，就是文化产品的不断生产、积累和流通，以及产品和传播手段的不断革新。特别是传播手段（包括发行）要革新。现在我们的印刷物出版物数量不少 现在最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并改进印刷技术包括装潢、插图等技术问题。现在，无论电影、印刷和出版技术都比较落后。要承认落后 不然就不能进步 承认落后 就要立志革新。书籍如此 电影也是如此。文学和电影尽管有了一些创新，但技术技巧方面革新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条件还比较落后。我们的文化艺术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并努力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化的积累、传播和革新。积累要丰富多样，传播手段要现代化，要革新，即使是现代文化，也要革新 要日新月异。所以 对于文化的保存 不但要善于传播，而且要勇于革新。

三联书店已经做了传播现代文化的工作。所谓现代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文化。你们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好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再前进。

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 和庆祝郭沫若故居开放

今天是郭沫若同志九十周年诞辰。郭沫若同志出生于一八九二年，一九七八年逝世。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

今天又是郭沫若故居正式揭幕。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同志是我国“五四”文化革命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和鲁迅是近代中国所诞生的两大文化巨人，堪称双璧。

郭沫若是诗人、剧作家和学者，又是革命行动家。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一年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说，郭沫若同志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崇高的评价。郭沫若的一生，的确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作为学术家，郭沫若同志涉猎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并在他所涉猎的许多领域都有新的建树。他首先是诗人 他的诗集《女神》以火山爆发般的热情 宣告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他在诗歌形式方面，也是一个革新家。他的不朽诗篇感染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他的诗歌的狂热的读者。由于喜读他的诗，因而对这位作者也就特别的喜爱，对他十分仰慕和崇敬。他又是剧作家，他创作的历史剧，也反映了郭沫若独特的风格。他的《屈原》一剧 如同雷霆万钧 给了当时反动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在全中国解放后所创作的《蔡文

姬》和《武则天》，又以新的气魄给历史人物以大胆的重新评价。他是历史学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者。他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等著作，至今仍保留着高度的学术价值。他是古文字学家，他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也都是惊人的。

总之，郭沫若同志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国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作为革命行动家，他始终和党采取同一步调，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共同着脉搏。他从来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笔，但如果革命需要，他也可以投笔从戎。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郭沫若“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低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当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后，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每天从报纸上探测有关他的行踪，担心他的安危，唯恐他遭到意外的不测。在三十年代，他虽然身在异国，和国内党的文化工作者仍保持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日本回到祖国，这时我才第一次和他会面，因为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谈不完的话。不久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又显出一个真正革命实践家的本色。全国解放以后，他担负着国家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从此，我和他的接触也就更频繁、更亲近了。终郭沫若同志一生，他都兼有学者、文学家和革命行动家双重品质。

郭沫若同志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极为丰富的，又是多方面的。这对我们是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现在开放郭沫若故居，自然不只是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巨人，而是要将郭沫若留下来的

文化遗产，加以分门别类的认真的整理和研究。鲁迅和郭沫若两人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他们的著作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今天，属于未来。当然，任何伟大先驱者都必不可免地带有他所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局限性。这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正确说明，而不能苛求于他的。

我们不仅要认真研究鲁迅、郭沫若留下的文化遗产，而且要认真研究产生他们这样的文化巨人的时代。只有认清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鲁迅和郭沫若以及他们的贡献。

“五四”时期是我国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美的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不只鲁迅和郭沫若，当时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有一大批革命的先驱者，他们创造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今天，“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所坚持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所形成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气氛，仍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研究鲁迅郭沫若和其他革命作家留下的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概括，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借鉴，是我们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鲁迅、郭沫若的文化遗产并取得科学成果，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切实的需要花费巨大精力的劳动，需要很多人去做，迄今为止，我们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有待我们大家的继续努力。

现在郭沫若故居即将正式开放，相信可以推动对郭沫若的研究，并以此形成一个资料、研究中心，提高这种研究的科学水平。不仅郭沫若的故居，现代文化艺术史上其他一些有卓越贡

献的人物 如茅盾、梅兰芳、田汉、老舍、徐悲鸿、齐白石等同志都应有这样的中心来开展资料征集、陈列和研究的工作。鲁迅博物馆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巴金同志创议已久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已着手筹办，要加紧办起来。并且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句空话，就要这样从一件一件具体事情，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了，也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做出了贡献。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文化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在十二大路线的正确指引下，这种局面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加倍努力，不断地用人类创造的知识成果把自己充实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要虚心向老一辈作家学习。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是学识非常渊博的人，他们不仅是作家，同时也是非常出色的学者。

今天，在纪念郭沫若九十周年诞辰和郭沫若故居开馆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郭沫若的榜样，学习他热心科学、文化、艺术事业，关心青年，奖掖后进的精神。支持中青年作家和研究工作者，鼓励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样，各方面的人才和成果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将蒸蒸日上。“五四”时期可以诞生鲁迅和郭沫若，今天我们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新时代的鲁迅和郭沫若的诞生创造更好的条件吗？

让我们努力吧！

研究问题 摸索规律， 就会有所突破*

听说这次座谈会会有很多中、青年作家参加，所以特地来看看大家。

过去我批评过一些人，不是都错了，但有些批错了，或批的地方不对。我也曾批评过刘绍棠同志，但以后看他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写得不错。

关于长篇小说，很惭愧，我看得很少。现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正在评长篇小说，承蒙你们关怀，许多作家的作品，都送了我一本，书架都摆满了，我很想看，但身体不行，看得不多，很对不起大家，请同志们原谅。近几年来，还是出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和五八年相比，有的比那时前进了。《李自成》我只看了头两本，写得不错。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写得很有特色，写湘西写得很好，有乡土味道。湖南出了一些青年作家，北京也出了一些中、青年作家，什么原因，将来可以研究。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一辑）

语言要精炼

我同意刚才刘绍棠讲的，文学要讲究语言艺术，语言应当精炼。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语言均应当精炼。写文章也应当精炼。我自己做不到，但深深感到，写长文章不是什么本领，有时反而是不成熟的表现。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就是文字精炼，长篇小说的语言也应当精炼，这是一门大学问。

作家是语言艺术家，我过去曾经讲过，有五位作家可以称得上是语言艺术家。这五个人就是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当时有人认为是否恭维得太过分了。现在看起来，我仍旧认为他们可以当之无愧。经过十年动乱之后，这几年又涌现出来一批新的作家，他们的语言艺术并不比“五四”年代的作家差。刚才听刘绍棠讲到语言要精炼，这可以做为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

要留有余地

在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提起我在延安时曾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要留有余地。当时他批评某些部门对计划打得太满，没有留有余地。这句话，我自己倒忘了，但毛主席却还记得。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文学艺术更要留有余地。中国艺术有其特点，讲究余韵、余味、余意，这是有道理的。过去有人批评，说这是唯美主义，唯心主义。实际上这是很好的文艺理论。

文学艺术不能大喊大叫，唱戏若是大喊大叫，观众就不会感

动。相反，也许只用一句话、两句话，或一个动作、两个动作，就很感动人，比讲十句八句还强。话若讲多了，有时反而令人生厌。要研究一下语言艺术的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摸索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感动人。当时毛主席讲留有余地，指的是经济工作，现在中央什么事情也都留有余地。左倾路线就不留有余地，过火斗争，检讨起来没完，老说你不深刻。什么叫深刻呀？没有底啊！

我们祖国三千多年来的艺术，有很好的传统，有自己的特点，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过去曾讲过，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学，自己的文学理论。但我本身并没有着手做，很惭愧。中国艺术有很好的东西，留有余地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条原则，也是世界艺术的一条原则。艺术有黄金点，超过了黄金点，就会使人厌倦，使人反感。现在作品多得不得了，其中有些作品有黄金，但超过了黄金点，事物就会向反面转化。有些电视剧，话太多了。李准同志，你也可以参加一些电视剧的工作，电视剧的艺术质量应大大提高。电视连续剧可以拍，但应多讲一些黄金点，留有余地。自然，李准同志还是很讲究语言艺术的。文艺要留有余地，长篇小说的篇幅也可以压缩一下，这对出版社也有好处。

要研究文与道的关系

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和思想理论，有一个根本问题要研究，即文与道的关系。这是几千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古人说，文以载道，我们也说文以载道。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道。文与道的关系，亦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大伙应当研究。文以载道，但如何载法，有不同看

法。苏东坡提出：文与道俱，主张文和道在一起，这种观点，我们看起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当时的道学家认为不行。因为这种提法，意味着文和道是两个东西，文就是文，道就是道。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所以道学家认为不行。道学家认为文以载道也不成，因为这种提法意味着道还是被载的，是船上装的东西，文和道还没有溶于一体，还是两个东西，所以不行。道学家认为文和道应当合在一起。文就是道，道就是文，文仅是表现道的一种方式而已。文与道的关系究竟如何，你们应当研究一下。这是多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本问题。

要研究文与艺的关系

还有一个文与艺的关系，也需要研究。有人认为文和艺是一个东西，但苏东坡认为文与艺是两个东西，艺是指技巧，主张文学要讲究技巧。如果要批评苏东坡，说他是修正主义也可以；他思想比较解放，突破了过去的一些框框。有人对他评价很低，认为这个人不行。但他在文学上和艺术上，还是有很高的成就的，是不可否认的。

不要怕有不同的意见

有一位作家写了一本文艺理论的小册子，引起了争论，但很多作家对这本小册子都很推崇。我翻了一下，内容并不很充实。很多作家讲话都是过分的。就是有人讲了过头的话，也不要抓住就整他。前几天纪念郭老，郭老有一个朋友叫宗白华，现在是北大教授，讲美学，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派人用车把他接了来。

他写了一本讲美学的书 名叫《美学散步》。一九二二年 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称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的诗人，而且是东方的诗人。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是他没有讲错。有些艺术家、评论家 特别是有些作家 讲起话来 往往都不留有余地 不但不留有余地，而且还常常过头，不然不过瘾。自然，也有好处，尖锐嘛！宗白华讲郭老是东方诗人，在当时听起来是过头，但现在看起来不过头。老一辈的人 当时有“五四”精神 就敢讲这些话。现在时代变了，要讲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最科学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就不怕有不同的意见，就不怕推翻。如果是科学 就不会被推翻。如果当成迷信，个人崇拜、教条主义 那自然不成，那危害会很大。迷信、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我都有，但不都是，也有正确的东西。

㉓ 总之 你们要研究 语言艺术、留有余地、文与道的关系、文与艺的关系，长篇小说的创作，就会有突破。

一九八三年

序《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

现在的年青人，知道羊枣名字的，大概不很多，因为羊枣同志死于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已经三十七年了！但是，老一辈进步文化工作者对羊枣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和他同事过，熟悉他的为人和作品，都知道他是个革命活动家、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学普及宣传的作家。他中年早逝，为革命而死；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羊枣同志原名杨潮，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湖北。他和革命作家也是评论家的杨刚同志是兄妹。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革命的暴风雨，就把羊枣这位从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进步青年卷进了革命漩涡中来。兄妹两人一生都和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先认识了杨刚，她和我初次见面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坦率、热情、好学又刚强。她引荐羊枣和我认识后，羊枣也同样给了我良好的印象。我先后介绍羊枣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羊枣在“左联”工作积极，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奔走。他当时是一个高级铁路职员，把自己的住处提供我们开会和掩护的方便，在经济上资助我们。他曾为“左联”所办的书刊

撰稿 并给陈望道同志主编的《太白》等杂志和其他进步报刊 以潮水、洋潮等笔名写了不少宣传科学普及的文章。抗日战争前夜，他著文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全国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成立抗日联合政府。他在上海塔斯社工作期间，开始撰写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文章。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由胡愈之同志等发起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主编抗日丛书和‘新青年百科丛书’。上海沦陷后 在党的领导下 他留在‘孤岛’坚持抗日文化工作，后因形势所迫，才离开上海去香港，用羊枣笔名写了大量立场鲜明的军事评论；‘皖南事变’发生后 为党在香港办的《华商报》写了不少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并积极援助著名作家邹韬奋等同志，从而受到迫害。一九四二年不得已撤退到桂林，根据当时战争形势 撰写了《太平洋的暴风雨》等书。

一九四四年六月，羊枣同志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 参加以王亚南同志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编辑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为东南沿海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他当时写了《方兴未艾的欧洲战争》、《从莫斯科看欧洲》等著名国际评论文章，指出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文章富有远见，文笔犀利。自从他到永安，死水般的东南文化界为之一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进步活跃局面。因此反动派把他看做眼中钉。一九四五年七月他被反动派哄骗逮捕。敌人从此并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当时被囚捕入狱者达数十人。羊枣同志在狱中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 拒绝写‘悔过书’ 拒绝‘加入国民党’ 同敌人始终进行面对面的坚决斗争。

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 即离开上海 到了延安 从此音信隔绝，许多情况都是后来听说的，但我却始终关怀他的行踪。当我听到他遇害的消息时，是深感悲痛的。全国解放后，我

也曾见到过羊枣同志的夫人沈强同志，当年的青春少妇，这时已白发满头。我避免引起她哀伤，对羊枣之死未便多所询问，现在听说她也不在人世了，真是不胜遗憾。羊枣同志被害正值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的前夕，消息传开后，全国新闻文化界激起了极大愤慨。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新闻记者五十六人公开在报上发表《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书》，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查羊枣在狱中受虐待情形和致死原因，下令严惩非法逮捕他的祸首。同年五月十九日，上海各界召开羊枣追悼大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在会上讲话，再次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当时，陆定一同志正参加筹办旧政协，送了一副挽联：“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缙绅蒙冤、国殇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寰。”以表达我党对羊枣同志的哀悼和对反动派的抗议。解放区的许多报刊也都对杀害羊枣的这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正义的声讨。

羊枣同志被害时，杨刚同志作为记者正在美国采访，得悉这个噩耗，曾写信给国民党当局，严词抗议。她写了《哭四哥》充满血泪的悼诗，诗中写道：“不信分离就是最后，不信死亡能把你消灭。”她把羊枣看作是“在大时代门前奠下了自己鲜血的人。”杨刚同志回国后，曾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我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羊枣同志的死，不过是被反动派残杀的成千上万进步文化工作者中的一个。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的年代，继闻一多、李公朴被害之后，羊枣又死在敌人狱中。

“四人帮”在十年动乱期间，竟然砸毁了羊枣在上海的墓地，现在闻已修复，这也是拨乱反正所应该做的。

编《羊枣选集》的耿青、公盾等同志要我写篇序言，这是义不

容辞的。诚如鲁迅为《白莽作 孩儿塔 序》中所形容 这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他是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发出的声响，是黑暗时代点燃起来不灭的星火苗，也是在阶级敌人的镣铐和锁链下自强不息地勇猛前进中留下的脚印。单就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这部选集的价值了。羊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而革命队伍里十分需要这样终身前进、永不后退的革命人。

载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怀念立波

人往往总有一两个和自己比较亲近，相知又最深的人，但就是对于这样可以称为知己的人，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他，能够对他作出比别人更正确的评价。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周立波同志的一生，以及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虽然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文章，说得不少了。但是以我和他相处之深，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一说，以表达我对他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

由于我和立波长期的历史关系，虽然他离开人世已有三年之久了，但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胸间，使人难以忘怀。我和立波最初相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虽然在宗族辈份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像亲兄弟。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九二八年他和我相识不久之后，就毅然地抛弃家庭，离乡别井跟我到了上海，过着飘荡不定的生活；我也永远不能忘记他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不止一次伤心地暗自流泪。而我当时也正失掉了党的关系。我也听说过他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他好容易考取劳动大学免费读书，不久却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随后在神州国光社当了一名小校对，为时不

久，又因鼓动工潮而被捕。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当他听到正式宣判二年半徒刑后，以及我和好友林通同志后来秘密去探监时，他虽然心情激动，但却神色坦然，安之若素，无所畏惧。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对于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是最早的考验，他是经受了这种考验的。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要体验什么生活，更没有想到要当什么作家，到延安后他所发表的《麻雀》等五篇作品，却是这段狱中生活的纪实。他刑满释放后，仍继续积极地寻找党的关系，没有半点灰心，半点后悔。这时我已参加了上海中央局文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的工作，我就把他引进了“左联”的组织。从这时起，他就更自觉地以笔墨为武器，为革命事业而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散文和诗歌，并翻译了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外国文学作品，积极向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他对鲁迅十分尊敬，并曾有书信往还。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立波即与李初梨、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和我一道奔赴延安。途径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党组织分配，他随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一度为美国卡而逊将军任翻译。同行的舒群也和立波一起到了前方。当时我们一行中，数林基路最年轻，到了延安后，即由党分配到新疆工作，不久被盛世才所杀害，成为有名的烈士之一。立波那时在西安给我的信中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烈的革命热情。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

绍了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立波不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或是在后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日子里，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同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國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國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所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为一体的。

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他说，“我的笔是停不了的，这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许多同志说立波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并非过誉之词。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他不务虚名，不追求名位，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勤勤恳恳地埋头写作。他有书生气，而又天真得可爱。他没有半点虚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弱点，总是把自己孩子似的坦率纯真表露在别人面前，这是立波最宝贵的品格。立波在他的作品中，曾经一再用人亲切的目光去观察并描写过牛，在党和人民面前，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立波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对立波的创作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座谈会之前，立波是延安文艺界最早下乡的少

数人之一，但毕竟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他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与老乡同住一个山坡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虽然说得有点过份，但也是真话。座谈会后，他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他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坚决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一九四四年冬天，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三五九旅南征，他主动请缨，随军南行。在立波的性格里，已经熔铸了不可战胜的顽强而又无限乐观的精神。他总是以一个普通一兵的战士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背上解放军战士的背包，从不骑牲口，他用两只脚徒步走了七个省的广大战场。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以同样的工作精神深入东北农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他又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北京回到了故乡农村，先后住了十来年。他长期地坚持深入生活，珍视和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执着，不加更易，数十年如一日。作为一位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作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啊！

立波深入生活，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个特殊地位，作生活的旁观者；而是首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名战士的身份出现，做到真正与群众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在湖南农村，年已半百的立波和农民一道耕田、锄草、挑泥、晒谷、种树、施肥。他说：“心需要用心换的”他与劳动人民真正做到了知心、交心。正因为他能投身于群众的生活激流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生活中汲取激情和素材，获得创作的源泉，他才能写出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艺术上更臻成熟、风格特异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及其他作品。《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两部名作或

从正面反映或从侧面抒写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立波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农村所进行的两次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所走的主要战斗历程。第二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虽然还在进行中，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原则下，正在不断改变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但是，这部作品无疑是已经丰富了、增添了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画廊的内容和色彩。

立波的创作力是旺盛的，随军南下后，他原计划要写一部记录那次可称为“新长征”的《南下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更兴致勃勃地准备动笔，无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这个壮志。但是他在病榻上所写的《湘江一夜》正是这部未完成的大作中的一件珍品，让一些随军手记存留下来。

立波十分赞赏赵树理“朴实无华，言无虚假”的风格。也可以说，这正是他自己正直的人品和文品的写照。五十年代后期，文艺创作和评论越来越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在批判所谓“中间人物论”的评论中，立波也多少受到牵连。立波比较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他不满粉饰生活的虚假浪漫主义，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从来不搞从无到有的蠢事”。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一定要写，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在中国作协一九六二年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赞同邵荃麟等同志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文艺创作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写好英雄人物的同时，要写好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主张。由此而被说成是宣传“中间人物论”，是错误的主张。连当时这场论战中的某些正确观点也被一概当作右倾言论加以否定了。

立波一生勤奋努力，好学深思。他常用“闻鸡起舞”的故事自勉规人。他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勤奋的学者。除了小说创作外，在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所贡献。他广博深蕴的中外文化素养，给他的创作影响甚大。应该说，立波在创作中，逐步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既得力于他的生活之源远，也受益于他的文化素养之流长。许多当时在延安鲁艺听过他讲课的同志，无不感受到他的教益。

立波同志与我们人天两隔了，他留下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

立波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是属于人民、属于无产阶级的。他为无产阶级、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人民对他将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载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

研究人才 爱惜人才*

现在各方面都开始重视人才，这是好事。然而，宋朝王安石说过“人才难得亦难知”。不仅发现人才不容易，了解人才也很难。因为任何人才既有长处，同时也有毛病。没有缺点的人才几乎是没的。人才的优点与缺点常常交织在一起，如果专挑他的毛病，可以挑出很多。所以，求全责备就难以发现人才。人才的发现有一个过程，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理解人才。

既然人才难得又难知，就要爱惜人才，就要用人不疑。就爱惜人才来说，当前要特别重视各类人才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人才开路，才尽其用。是爱惜人才；增加人才投资和经费，保护中年知识分子是爱惜人才；帮助克服缺点提出一定的要求也是爱惜人才。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我们对人才是不够重视的。不要说“四人帮”时期，就是开国后十七年，我们对爱惜人才这一点也注意得很不够。政治、思想运动搞得太多，伤害了不少人才。不久前我提出过要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要制定一系列保护人才、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策和措施。人才研究会应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制定人才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这固然有它的经济，政治等方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与中国人才研究会负责人的谈话。原载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面的原因，但是一些封建统治者注意起用一些人才为其服务，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可以研究一点中国历代人才思想史、人才制度史，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希望搞人才研究的同志多读一点马列的书。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很重视人才，也很爱惜人才，评价过很多历史人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他们的是非功过，给他们一定的历史地位。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干部和人才问题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我们人才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才研究会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推动干部和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为新秀群起，人才辈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

要重新研究认识论

我来过天津多次，同在座的很多同志在一起开过会，有些同志是老朋友了。我对天津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全国解放两、三年以后，我才第一次来天津，那时方纪同志主持天津的文艺工作。以后，同天津的关系就很深了。我在天津搞过“四清”，我也是天津党代会的代表，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一度在天津避难。这次来主要是休养，也想写点东西。当然，现在老了，写不出很多东西来了。总而言之，我对天津的感情是很深的。

你们开这个会，我很高兴。你们讨论得很好，会议时间虽然短，却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你们谈论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这次到天津来，虽然是在病后休养，但是还总想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同你们讨论的深入生活这个题目有关。

我来之前，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给我写了封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邀我参加讨论，发表一些意见。有的同志也说，我应该写点东西，于是我冒冒失失地接受了邀请。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也感到应该写一点什么。

多年以来，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战斗过来的。战斗中有很多错误，但总是战斗了，战斗的时间不短，整整半个多世纪。所以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

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现在作家提出创作要有新意，难道搞领导工作的，搞评论工作的，就不应该有一点新意吗？新意就是探索。世界发展变化得很快，我们发表文章，发表作品，总应该有一点新的探究。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摆老资格，也不能讲一点新的意见了。我不愿意自己僵化，而且坚决不想僵化，想跟年轻的同志一道走。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年当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徘徊，在倒退？这个问题不但在老年人当中（当然老年人要少一点），特别在中青年当中是存在着的。所以我认为，首先应当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总的是在前进，在艰难地前进，很曲折地在前进。假如不这样看，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马克思？我们为什么还要当党员？我们为什么还要搞社会主义呢？当然，马克思主义在总的前进运动当中，也有曲折，有反复，但总的是前进了，发展了。我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希望同志们都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纪念马克思不是一种仪式。现在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但是也有人怀疑，中国也有人怀疑，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当前出现了各种新的思潮 哲学上的 文学上的 我们都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来回答。新的思潮，不一定是正确的。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们应该研究和思考。我们不是提倡思考吗？这就是最重要的思考。

我想谈谈认识论的问题，要重新研究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认识论问题。文艺也是一种认识。文艺到底是形象思维还是什么思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还是其他什么

的反映，这都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认识论问题。有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的认识难道不应该更提高一步吗？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文艺。认识得正确 就进步 就发展 认识得不正确 就倒退，就犯错误。所以，我认为要把认识论的问题搞清楚。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工作者要不要深入生活，要不要下乡，都是与认识论有关的问题。如果要总结经验，就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怎么认识才比较正确，另外一种认识就不正确，就走弯路、走错路？所谓探索，探索什么东西？探索什么对象？这个问题是个专题。所谓深入生活，是为了认识生活；只有深入生活，也才能认识生活。我希望同志们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研究深入生活的问题。不能认为，是新的意见，这个认识方法就一定正确。当然我们不拒绝研究新的意见，新的表现方法，但总要用批判的态度。所谓批判，就是分析。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古代和外国东西，都要用批判分析的态度去继承借鉴。思想活跃，思想解放，就是批判的问题。我们不要把批判看成是消极的东西，而要看成是进取的、积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本身，便是批判的科学。同志们要有这种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我们党过去存在的很重要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是凝固的，搞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在认识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我们就是要认识客观世界 谁认识得正确 认识得深刻 谁就掌握真理 少犯错误。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犯错误之中走过来的，不要掩盖这一点。错误有什么可怕呢？人类历史就是在错误当中前进的。所以说，不敢

讲自己的错误，回避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之，认识论是个重要问题，实践论也是认识论的问题，希望大家都来研究这个问题。

深入生活就是为了认识生活，当然还有如何表现，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等问题。同志们对这些问题要探索，要讨论，甚至要争辩。是不是在报纸上争辩，就要看具体情况了。有些问题宜于在报上争辩，有些问题就不宜于在报上争辩。总而言之，我们的脑子要灵活运用。当前，整个国家在调整、改革。首先要调整组织，调整机构。我们搞意识形态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调整不行，不调整，一步也不能前进。国家经济体制不改革，能前进吗？文化体制不改革，能前进吗？人的思想不解放，能前进吗？因此，要调整、改革，要鼓励调整、改革。当然不能鼓励自由主义。

我主张作家大胆一些，也主张一些作家应谨慎一些，不要以为作家一定比别人懂得多。

再一点，讲讲团结问题。天津与北京相距很近，现在和北京联系很密切，今后应当更密切。天津作家艺术家和全国作家艺术家的关系很密切，新老作家艺术家的关系也很密切，这是最主要的。这次文联到天津来开会，我很赞成。全国都应该提倡这种风气。新老作家艺术家之间的互相交往，各种风格、派别的作家艺术家的互相来往，都要加强。现在有人讲，许多干部都愿意到‘天南海北’去，什么叫‘天南海北’？就是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到‘天南海北’去容易动员，到其它地方比如到老根据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些作家艺术家就不那么愿意去，当然也有的作家艺术家愿意去。我以为应该到那些地方去。团结是全国范围的，一方面要注意‘天南海北’，同时也要注意‘老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天津和全国的文艺工作都

有新的气象，希望我们在团结问题上做出榜样，天津的领导重视文艺，天津搞好了，北京搞好了，上海搞好了，全国文艺界的团结就会有更大的变化。

我今天讲了一个认识论问题，一个团结问题，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做出榜样。我觉得前途光明，大有希望。

我讲了以上这些话，表示对天津的祝贺。你们的座谈会，开得虽短，却很成功，我表示祝贺。

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七日

载《文艺界通讯》1983年第3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已经逝世一百年了。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人类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无影无踪地消逝了。许多曾经名震遐迩的学说已经失去它的光泽，不再能唤起人们的最初热情，而变得越来越暗淡了。可是作为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形象却永远放射着光芒，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却像常青树那样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它迎接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克服了重重险阻，始终胜利地前进。我们用不着讳言，在这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它曾受到严峻的考验。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说明这种情况的历史事实。我国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在这种时刻，往往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了，产生了怀疑。可是无论经过什么惊风恶浪，马克思主义总是显示了永不衰竭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地向前挺进。

这是什么缘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什么终极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运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自身的缺点，纠正自身的错误，并且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样就防止了停滞和僵化。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著作，指出他们如何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恩格斯于1892年为自己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明他早年所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某些分析和论断，由于情况的改变而过时了。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一切论断和观点都是臻于至善的永恒真理。相反，他们批判了杜林对于“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玩弄。他们以三大革命实践作为发展自己理论的主要依据。马克思尤其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能转化为生产力。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根据恩格斯的回忆，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种新的发现都是感到欢欣鼓舞的。这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可以促使马克思重新检验自己的学说，发展自己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发展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列宁并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原来关于革命的设想作为固定的模式，去制定十月革命的理论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曾经根据俄国的城市武装暴动的模式去进行，结果遭到失败。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农村包

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才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倘使不抛弃固定的模式，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我们的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当是同样的。我们党中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无论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上，或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每个民族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应强人从己，也不应强己从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实际相结合，所以必然要形成各自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色。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各个民族的走法却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列宁这个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多样性的、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异彩纷呈，终归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促进它的发展。

就世界的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目前我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完全照搬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理论，纵使这些经验和理论曾经是正确的，在当时条件下起过积极良好的作用，但在目前也要根据新情况加以重新检验和估计，需要发展的就应加以发展，需要改造的就应加以改造，而不能墨守成规。我们不应被习惯的惰性作用所左右，必须克服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

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和不同学派结成一定的同盟，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要寻找、争取、扩大的同盟军。马克思主义不能没有同盟军，恩格斯曾嘱咐过德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人，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也着重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最坏的错误。他甚至说：如果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同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应该重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要有同盟军的思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可以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应尽力争取和他们合作，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某一特定问题上和他们合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就是通过民族解放的要求和爱国主义思想情绪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应该轻视和排斥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和他们一道努力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的大业。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结成同盟。法国的杰出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同时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战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真诚朋友。他在三十年代访问苏联后所写的书简和别的文稿中，一再表示，世界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是和社会主义休戚相关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结成同盟军，要注意自身体系的独立性，要有团结和批评的两手，要力争马克思主义在同盟中处于主动地位，不使自己成为别人的附庸。

二 要重视认识论问题

要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个重要问题。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反杜林论》）这种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就是自由。在认识论问题上，有哪些方面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论轨道前进了？有哪些背离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要求解答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取得进展，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提高一步，我们的实践就可以更有成效，就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在这方面有弱点。我们党在建党前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准备，不像俄国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和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就发表了不少文章。中国的情况不同。陈独秀虽然是中国党的创建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是最早的建党人之一，并且是我党的第一个勇敢的殉道者，不过他的著作并不多。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中国党的理论上才成熟起来。经过七大，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需要积累经验。这个思想，他在一九六二年又提了一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认识它。因此，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说是

这三个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和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的总结。马克思大半生在英国度过，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英国写成的。英国不仅产生了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资本论》就是取它作为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范例。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最彻底，经历了十分复杂而又曲折的政治变革，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都取材于法国。同时，在空想社会主义方面，法国又有像圣西门、傅立叶这样卓越的人物。我国从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期起，就已经对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开始介绍。严复曾译出不少这两国的名著。唯独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接触得最少，也最不熟悉。王国维只是了解一些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观点。那时的人们都不熟悉德国思想家的著作。但是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继承、被改造，成为他据以剖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列宁晚年曾研究了黑格尔哲学，虽然也批评了黑格尔的思辨观点，但总的说来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不懂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他还曾经给当时苏联党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文，倡议组织“黑格尔辩证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列宁去世后，由于斯大林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蔑视，苏联哲学界并没有认真执行列宁的上述指示。在中国，尽管毛泽东同志对于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这种错误观点表示了反对，可是上述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潮仍冲击了我们思想界，使我们无形之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这就不能不给我们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带来偏差。

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自然要算是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尽管两论发表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但是比起斯大林这部著作来，它自有其优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它的优点，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缺点错误。比如，他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归结为方法和理论的区别，并把两者割裂开来。他对辩证法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在概括唯物主义三个基本特征时，他把世界及其规律是可认识的作为其中一项。这等于说唯心主义者都是不可知论者。其实不少唯心主义者也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如黑格尔、贝克莱。斯大林著作一发表，整个苏联哲学界都按斯大林的体系讲，哲学停滞了。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这一批评十分中肯，也很重要。斯大林只讲斗争，这是他那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政治观点在哲学中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斯大林的这一错误观点，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恩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律的原旨。毛泽东同志以此为基础，并根据他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不同矛盾应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建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党在文化上的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不仅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且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由此阐发了马克思所提出

的人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实践观点。不过在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引为教训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例如，对于理论联系实际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当作脱离实际来批判，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十年内乱时期形而上学猖獗，实用主义横行一时。林彪提出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一度成为指导思想。实用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便是抛弃系统知识和基础理论，否认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扬言只要背诵一小本语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用主义受到了批判。但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

我觉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可是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以致使这些地方后来竟成了荒芜不毛之地。这个例证告诫我们在坚持实践观点的时候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必须把眼光放远，不能只顾眼前之效。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

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 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143页)

认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目前理论界已有所涉及，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就进入理性认识，就反映了本质。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有大量的概念、判断只反映了现象，并未反映本质。另外，说感性认识只是感觉、印象，这也不妥。概念也有发展过程，就是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或由知性到理性。因此，不能说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采用了三范畴，即：感性、知性、理性。后来黑格尔也承袭了这一用法，只是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我认为在认识论中可以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两范畴，这样就可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缺陷。划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辨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知性的特点是坚执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的区别作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它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所以，知性所达到的只是抽象概念或抽象的普遍性。它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不是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之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它拆散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使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特性变成只有松散的外在关系。黑格尔所解释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恩格斯所肯定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黑格尔所规定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有

意思的。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把知性这一概念完全摒弃，以致常常使它和理性的概念混淆起来。从而知性的分析方法也就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方法而通行无阻，以致成为简单化、概念化的思想根源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作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十七世纪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即知性分析法）。另一种是由上面的行程再回过头来，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把这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且断言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方法（即辩证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才达到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才反映了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不过，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马克思并不是全盘否定知性的分析方法。照他看来，知性分析方法出现在认识过程的一定阶段，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方有效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变为谬误。知性分析方法是具有片面性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以为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主导方面，即所谓抓要害，就算抓住了事物的整体和本质。事实上事物的主导方面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这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彼此相涵，有着不可拆散开来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总体。因此，我们要记住列宁的话：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才可以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国历史上一些尊重事实治学严谨的学者也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比如，戴震所提出的“巨细必究 本末兼察”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在认识论方面这类问题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倘使我们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那么就可以使我们的马克思

主义水平得以提高。我觉得这在我们的理论建设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

继承过去的遗产，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有批判，不批判就无法继承和吸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要在各个学术领域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他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后来，批判的名声被搞坏了。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所谓大批判已经变质为恫吓诬陷的手段，这就需要拨乱反正，为批判恢复名誉。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康德的哲学就称为批判哲学。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的衡量和估价。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可以说是开创了批判精神的先河。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以思维着的知性为依据，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一切放在实践的法庭上去衡量、去再估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这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理论，它本身也是在不断经受实践的验证的。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能用原则去剪裁事实，而只能从事实中把原则抽绎出来。在封建时期，我国的经生讲究家法，师之所传，句句都是真理，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但是清代也有一些具有胆识的学者，不为这种僵硬刻板的法度所拘。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就不乏这种具有卓见的人物，戴震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本精湛之作。难道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不更应以这些前人作为光辉榜样并力求超过他们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并建立他们的伟大的学说。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写的《手稿》中就已指摘了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的错误。他还说他们就如神学家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那样，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当作历史的事实了。马克思主义和这种独断论的态度相反，它接受实践的检验，自觉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就包含着这种意思在内。在我们党内有两次都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为目标的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是革命的，而不是僵化的，所以它不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的检验下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我们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上，曾经产生偏差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批判”就是开国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和恶性膨胀，它为少数野心家利用，以致

造成一场全民大灾难。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曾警惕过“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 error，对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戏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而所犯 error 较少，成绩也较显著。这和我们如何认识并掌握作为文化批判依据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主张批判继承的，这就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存。这就是“扬弃”。过去我们很少谈否定之否定律，这对批判继承问题有一定影响。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条规律，同时又是他构成自己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他的体系毫无例外地都是按照自在——自为——自在自为即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构成的。黑格尔为了使自己的哲学纳入这个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结构，往往采取了人工强制性手段，特别是在由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过渡时就显得十分晦涩，甚至神秘。但是，唯物主义者是完全可以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历史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发展不外是一种哲学体系推翻另一种哲学体系，但尽管如此，哲学史却并不是错误陈迹的展览。他认为每一种被推翻的哲学都作为一个低级阶段保存下来了。比如辩证法就超越了同时也包括了诡辩论、怀疑论、相对主义。这种历史发展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但在我国理论界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大概是受到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律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力加排斥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也没有纠正这一偏颇，他对否定之否定律也有意见。他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一规律。听说，他以为生活中有些例子很难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去说明。比如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又否定封建社会，就没有包括低级形态在高级形态上的复归现象。但这是由于某些规律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只在更宽广的时空领域内才有效准。正如恩格

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中说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比如，私有制否定原始共产社会后，共产主义社会又否定私有制社会，这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固然，像黑格尔那样采用人工强制手段运用否定之否定律建立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体系结构是牵强附会的，但我认为也不可由于他机械运用的缺陷就否定这一规律，否定这一规律就会把文化发展的曲线进程看作简单化的直线进程，并且还会产生更严重的恶果。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彻底决裂”以及把过去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加以消灭，是和长期以来不讲否定之否定律，歪曲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含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扬弃的意义。

我们曾对批判继承文化遗产问题做过一些探讨，这几年更有突破。例如，以唯物唯心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划线去评价文化艺术遗产，就是曾经引起过讨论的问题。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把过去思想的发展史概括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认定只有唯物的才是好的，值得继承的，而一切唯心的都是坏的，必须抛弃，这就有些简单化了。列宁曾经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哲学笔记》第305页）黑格尔哲学就是聪明的唯心主义，它比那些被恩格斯称为江河日下和叫卖小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即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即聪明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但如果把

千百年来的文艺史一律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也失之简单化。根据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许多文化、文艺历史事实。难道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诗人不是不仅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者吗？

我想，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遵循恩格斯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是思想家是以前人所留下的思想资料为前提来建立自己的新学说的，因此，任何一种新学说都不能超越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我们不要把思想资料这句话理解得过于狭窄，它包括思想形式，也包括思想内容，同时也往往越出国界，涉及到外来的影响。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成就时一定要从世界的眼光看。《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文学正突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而成为“世界文学”。歌德比这更早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并对中国文学加以称赞。早在中世纪以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开始。最早，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就有了文化来往，印度佛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魏晋时期出现了带有思辨色彩的玄学，除了以老庄周易为骨干外，主要是受到流入中土的佛书影响。当时的名士名僧多由玄入佛，形成玄佛并用的一代学风。在传译佛典方面，最初是采用汉化方式，多以固有的老庄术语去代替具有自身特点的佛学名相，而在讲解佛法方面又多以外书比附内典，号称格义。经过这种汉化阶段后，由道安、鸠摩罗什等开始才逐渐转入信实可靠的正译。很可能正因为传译佛书经过了这样的曲折的探索过程，所以在当时产生了大量可称为翻译文学方面的理论，这些理论随同佛书的经论一起对我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不少成分融入我国文化里面。特别是唐宋以后，禅学盛极一时，从那时起，著名学者、作家无不

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学的影响。对这些方面我们迄今还没有进行较充分的研究，这和长期以来由于玄佛属于唯心主义学说，从而被视为必须抛弃的糟粕有关。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以为除了佛学中的辩证法外，它把认识作用和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在其职能、性质、类别等等方面所做的靡密细致的剖析，以及玄学在深化抽象思维能力，丰富了概念和范畴方面……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些，我们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予以总结。

目前国外有些国家把东方学改称中国学，加强了对我国学术文化的研究。可是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也落后了，必须急起直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不仅可以正确地描述并评价我国文化的历史事实，同时还可以揭示我国文化的发展规律，殚其系统，明其脉络，这无论在发展我们的文化方面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都会作出一定贡献。此外，我们还要在世界范围内去考察人类积累下来的文化成果，也要对当代的世界文化进行研究。文化是在发展着的。目前知识更新加快了速度，自然科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出现了许多跨界的崭新科学，这不能不对整个世界文化起着冲击作用，引起连锁反应。面临这种新形势和新情况，我们不能固步自封，采取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证明，禁锢的办法只有带来无知和落后，并且是行不通的。在开放的情况下，随着先进的、有益的、值得借鉴的东西，也涌进了一些有害的东西，我认为，即使是反面的东西也应加以研究。不敢接触，怎么去批判？思想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强大的说服力，才能消除它的有害影响。

四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人道主义和与此相关系的人性论，是关系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探索、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国学术界、文艺界近几年来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

对人的问题的探讨，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侧重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在进行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伟大学说的指引，我们才取得革命的

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仍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但是，阶级斗争究竟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斯大林所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98 页）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马克思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的。关于人的问题，他在早期著作中谈得比较多，比较集中，其中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当然也有不成熟之处。后期马克思集中力量研究经济问题，关于人的问题谈得少一些，但比之早期著作又有新的发展。只有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连贯起来研究，既看到两者的区别，又看到两者的联系，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完整准确的了解。

二三十年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集中力量研究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出了不少著作。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思想也很盛行。一个时期里，我国不少青年学生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颇感兴趣。这种现象，我们应该认真引导。我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真正克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亦译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提出来的，在打破封建主义束缚，揭露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统治方面，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作用，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

同环境下，有所不同，因此也要作具体考察和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是，必须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尽管这种人道主义学说，对旧制度的抨击，也曾经显示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力量；对历史的认识，也有过片断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总的说来，未能跳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框框。作为整个思想体系，未能成为科学。

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把费尔巴哈讲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从而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改造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并把它改造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异化”概念的改造起了关键的作用。

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

用它。黑格尔说的“异化”，是指理念或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说的“异化”是指抽象的人性的异化。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这在《资本论》中说得很清楚。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的异化现象，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顶点。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使“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实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个性的全面发展代替旧的分工制度下个人的片面发展”（《资本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他甚至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毫无疑问，这是从早期的马克思到成熟时期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应该说，这个问题是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有着思想继承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从文艺复兴以来，崇尚人的全面发展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就论述过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全面发展的主张。席勒在他的《美育书简》中更有出色的论述，他要求通过美育活动，使人获得解放，成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人（《美育书简 第二封信》）博立叶设想在他的未来协作制

度中使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17页）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先进人们崇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取消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以往人道主义者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力量”、“泛爱”、“美育”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经肯定地谈到人道主义。不能否认，这个时期他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错误影响。一八四五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呓语进行批判。在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也确实不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了，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看不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来成熟时期著作的区别，是不正确的；但是，否认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来成熟时期著作的联系，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后期马克思从根本上抛弃了人道主义，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即使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讲的人道主义，也是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不同的。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这和他后来所讲的名命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致的。而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抽象的，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理性和爱。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了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他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但未从根本上否定人道主义。后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创立，使马

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在更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抛弃了人道主义思想。

肯定人的价值，或者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那就要肯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异化。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异化”问题，理论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希望这个探讨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

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会尊重。当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由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或由于旧意识影响，在某些局部情况下，糟蹋人才，埋没贤能，侵犯人格尊严的情况，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劳动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的奋斗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

在当前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配合全国各个领域改革工作的进行，研究异化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采取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方法，克服和消除异化现象，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载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体制要改革，艺术要创新*

前几天，夏菊花同志来看我，要我参加杂技创新座谈会，并说我可以不讲话。现在我来了，同志们要我讲，还是讲几句。在文艺上我是赞成这两点的：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改革。体制上改革，艺术上创新。杂技是这样，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杂技在中国是古老的，古称“百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世界上所少有的。它是一种最群众化而又具有高度技巧的艺术。杂技不靠文字语言，主要靠精炼的，往往是难度很大的动作、技巧。技巧当然是属于一种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历来都不把杂技艺术当作比较高的艺术。相反认为，接近群众的艺术性不一定很高。所谓“下里巴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杂技和其他艺术一样也需要有很高超的技术。列宁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无产阶级不仅需要面包和马戏，而且需要更高的艺术。”可见列宁在这里并没有轻视马戏，而只是认为群众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列宁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谈马戏的，不是看不起马戏，而是说不但是要有马戏，还要有许多其他的艺术，也要有高级的艺术。鲁迅也讲过，连环图画也可以出现伟大的作家。杂技和群众联系很密切、很广泛，是群众喜爱和容易接受的，一看就明了，而且能够吸引他们。杂技艺术在我们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杂技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文艺界通讯》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国家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方面也是打先锋的，当我们的电影、戏剧还不能在海外开展活动的时候，杂技就一马当先，争得国外无数群众的喜爱和掌声，为我国赢得了荣誉。一九六二年，我到古巴去，那里就有中国杂技团访问。最近几年杂技在对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更是卓有成绩。国外的同志称赞中国的杂技技巧，代表了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代表了几千年古老的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大国。从杂技这种艺术形式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之悠久，传统之深厚，艺术之精湛高超。所以，那天夏菊花同志要我参加杂技座谈会，我是乐意的。你们讨论创新和体制改革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改革和创新，所有的艺术都应该这样，希望你们杂技走在前面。你们高超的技巧，那是你们经过苦练，下了苦功夫，发扬了我们自己优秀传统得来的结果，所以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应当的。我今天参加这个会，首先向你们表示祝贺，也表示敬意，因为你们在我们整个人民文化交流方面、文化外交方面，都走在前面。当然 还有音乐、歌唱艺术 那也是超过语言的障碍 各国人民彼此相通的。所以，我看到报上我们体育健儿受到了热烈欢迎时，我是很高兴的 这是应该的 但是比较起来 我们的杂技 我们的音乐，也应该受到尊重和欢迎。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观众的光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宣传不够？是不是也应该宣传？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就，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人的成就，而是几千年来的一代一代积累和不断更新 不断丰富 不断丰富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应该珍视这些杂技。所以 我今天来 首先是向你们表示感谢 你们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其次 我们应该更多地重视、帮助、注意发展这门艺术。创新的头一条 就是给它以丰富的新的思想，新的作风，新的技巧。什么叫创新，

头一个就是要有新思想、新作风。一定要把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个古老的传统结合起来、继承下来，加以丰富发展，使之发扬光大，决不能让它在我们手里丧失或褪色，而只能发扬光大。创新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中国过去的马戏，我看得很少，外国在四、五百年前就有马戏。但是，要把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东西、不文明的东西改掉，要把它改成文明的东西。每一个同志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搞杂技的同志想一想，这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不是我们非要贴一个社会主义标签 主要是让人看到优美的、健康的、使人向上的艺术，一定要努力达到这一个目的。我看，这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希望你们争取更大的光荣，夺得更大的成绩。

正确评价一位当代的伟大作家*

同志们知道我身体有病，答应了不让我讲话，今天来主要是看望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一些新同志。本来是座谈会，大家坐在一起，可以比较随便地交谈，我很高兴。但现在又把座位移到主席台来，就使我有点紧张了，不知道该谈些什么。

孔罗荪同志还是让我讲一讲，我没有准备，确实不知从何说起。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是茅盾同志的生前友好，他们讲，可能更亲切、更生动。当然，我也是茅盾同志生前友好中的一个。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左联”同他共过事，时间也不短。以后在文化部的时候，我们毗邻而居，朝夕与共，关系是密切的，所以有一种特别深的感情。茅盾同志逝世前夕，他要求入党的信，就是由韦韬同志交给我呈报党中央的。我的感情也促使我讲几句话。

举行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很赞成，通过学会的形式，对一位当代伟大作家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尽管现在学会显得太多了一些，有些滥，但学会多也是一种好现象，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活跃独立思考 and 自由探讨的空气。

学会要开展学术研究。什么是学术研究呢？学术研究就是科学研究。学术的成果，主要不决定于这种活动的频繁，而决定于它所达到的水平。水平不是一天可以提高的，但是经过学会这种自由研究，水平将会逐渐地高起来，很多新的力量会成长起来。还会有一天，后来的人认为我们研究的东西有许多是落后了，甚至是幼稚的。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能赶超前人。取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后来的人总是应该超过前人的。

就茅盾研究来说，固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应该说对于茅盾在文学事业上多方面的成就，至今也还没有作出全面的、深刻的评价。茅盾同志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不像郭沫若同志，既是诗人，文学家，又是历史学者，古文字学家，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开创者；但在文学事业上，茅盾同志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一位开拓者，一位光辉的先驱。对他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我们还没有作出全面的估价。我不讲别的，仅就茅盾同志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或者作为一个文艺编辑，他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刚才孔罗荪同志讲过茅盾同志改革《小说月报》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行动，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在同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夺过一个重要的阵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以后，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里，茅盾同志一直致力于文艺评论工作，批判鸳鸯蝴蝶派，批判封建复古的“学衡派”，热情倡导和扶植新文学创作。他是“五四”以来第一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

一九二七年茅盾开始小说创作，写了《蚀》直到《子夜》那样的巨著，为中国新文学树立了丰碑。同时他仍然没有放弃文艺

评论工作，最近我又重新阅读了茅盾写的几篇作家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写的《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等都写得很好，我觉得至今也可以作为我们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一。在那个时候，我们许多年轻的左翼作家都难免有些教条主义，而茅盾同志卓然不群，能够写出这种高人一等的文章，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作家作品放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做综合考察，又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他确实是比许多人高明的。因为他既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实践，又富有新旧中外深厚的文学修养，写出的文章自然不同凡响。我认识这一点也是较晚的。在“左联”时期特别是开国后在文化部共事时期我可以跟他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我也错过了许多学习的机会。茅盾同志不仅是一位很杰出的作家，作为一个评论家，也是杰出的，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解放后他因公务繁忙，没有继续从事创作，主要是写些评论，他的评论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热心培养青年作家，我记得茹志鹃同志的《百合花》就是因为得到他的赏识而蜚声文坛的。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老编辑，茅盾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有谁有茅盾同志这样巨大的丰富经验？很少嘛！作为老编辑，当然还有叶圣陶同志，他也是至今为人们所不能忘记的老人，他起的作用也是不小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茅盾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过去估价得还不够，还应该给予充分评价，使我们今天的编辑工作者，文学工作者有所效法。

关于茅盾同志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作为一个重要流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他的功劳和贡献，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自己讲的话也许带点自我批评的性质，说他一度也受过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

义里面是不是有自然主义的因素，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整个地说，他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茅盾同志一生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将永垂史册。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有个想法，或许不对。现实主义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些自然主义的因素；作为它的对立流派在浪漫主义里面也难免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甚至某些颓废的东西。这两个流派，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我自己认为这种提法还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总是有矛盾，又能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艺术史的问题了。在新文学的历史上，革命文学也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里面脱胎出来的。革命文学一些最早的作家，开始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而且常常一个人又是现实主义又是浪漫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学会可以开展自由讨论。既然叫茅盾研究学会，就应该尽量地使茅盾的面貌，不是被歪曲而是真实的再现，让大家知道。

另外，像茅盾同志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贡献，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进一步认识。刚才我说过，我和茅盾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我后来深深地感到，对他的认识和尊重是不够的。不但对鲁迅的认识和尊重不够，对茅盾的认识和尊重也是不够的。尽管经常在一起，我也没能很深地认识他，甚至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也不能说完全认识了他。所以认识一个人，特别是认识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个有特殊贡献的作家，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为大家所了解，或者不是能为大家所完全了解的，这需要时间。过去我们常议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有一个

核心问题就是讲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有矛盾，但有时教条主义地去了解。实际上，每一个大作家身上都有些矛盾，所以茅盾同志的笔名叫“茅盾”这个名字他不是没有理由胡乱取的。他并不讳言自己有矛盾，他的文章我过去看得不很多，最近又看了一些，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自我批评。茅盾同志，是一位比较深沉的作家，不那么外露，我觉得这个表现与内容是一致的。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随便发言，不轻易表示意见，这是他的优点。茅盾同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不轻易表态，他性格里面这样一种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茅盾同志是在中国大革命激流中产生的作家，他在这一点上当然和鲁迅不一样，他直接参加了大革命运动，首先，要弄清楚他是怎样反映这一大革命的真实过程，反映了哪些重要的方面，作品中所流露的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怎样妨碍了这种真实的反映。所以，研究这样一个作家，探索他是怎样出现的，经历了什么道路，有些什么经验，什么教训，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中学学习很多东西。茅盾同志参加革命，比我们谁都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茅盾，对我们来说更感到亲切，更有意义。自然，这中间也有曲折，一直到他逝世的时候，才提出要重新入党。本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所以党中央很英明，承认他的全部党籍。开始我也没想到中央这样决定，我觉得这个决定很得人心，不但对许多老作家是一种鼓励，对于整个文艺界、对于整个人民也是很大的鼓励。

现在，茅盾同志已经逝世两年了。对他做出科学的评价，完全有条件了。因为对当代人物，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做出评价就比较麻烦。第一，一时看不清楚“盖棺论定”，有时盖棺也不能论定。第二，有些问题因为是同时代的人，不便或不宜于公开评

论。而对于一个作家，经过长期的考验，经过千千万万人的检验，经过研究做出评价，我想总是比较容易，比较有条件的。而作出这种评价，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史应该怎样评价鲁迅、郭沫若、茅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出这种贡献。我自己可能做不出什么贡献了，但我愿意为做出这种贡献作出自己的努力，就是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使学会的组织不是徒有其名。现在学会多，耀邦同志也提过意见，有的学会徒有其名，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的学会，应该是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不要务名，而是务实。

怀念徐悲鸿先生

——在徐悲鸿纪念馆落成开幕式上的书面致词

徐悲鸿先生病势垂危，弥留之际，我闻讯赶到医院去看望，我是亲眼看着他去世的。一代杰出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徐先生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对我国的美术事业，这是个多么大的损失啊！事隔将近三十年了，至今想起来，我还感到悲痛和惋惜。为徐悲鸿建立纪念馆，表示了人民和国家对他的成就的高度评价和重视，这也表示了人民对他的深刻怀念。我首先祝贺纪念馆落成开馆，祝愿纪念馆今后的工作顺利，并为我国造型艺术事业作出它的贡献。

虽然我和徐悲鸿先生相识较晚，交往不多，但由于他在我国画坛所享有的声誉，以及他和田汉同志两人之间早在二十年代就已开始的友谊，我是早已心仪其人。悲鸿先生曾积极赞助田汉早年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并且完全尽义务地担任了“南国”的美术系主任。田汉同志三十年代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和监禁的时候，徐悲鸿在南京曾试图营救和保护他。北平解放前夕，徐悲鸿同我们党保持着接触。田汉同志秘密进入北平时，徐先生亲自派车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田汉曾向他转达了党对于这位处于围城之中的著名艺术家的高度关怀，并劝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要离开北平，而为迎接解放，协助多做团结文艺界人士工作。徐悲鸿果然下了这样的决心，坚决地跟着党走。他对我们

党很早就有正确的了解和支持。他在重庆时，曾坚决拒绝国民党反动派强迫他在反共、发动内战的宣言书上签名，并对当时解放区青年木刻家古元同志的作品公开著文给予高度的评价。徐悲鸿对我们党一向是同情和信任的。全国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热情地接受了人民对他的这个委托，精神百倍地开始了他的新的政治和艺术生涯。

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在造型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他曾和我多次谈到绘画上应如何对待我国传统的问题。我认为，他不但在艺术创作上很有成就，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是很有见解的。

毛泽东同志对徐悲鸿有过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音乐上中西结合的问题时，就特别举了徐悲鸿在绘画上的成就作为范例。毛泽东同志总是主张艺术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必须融中外于一炉。毛泽东同志对徐先生所以评价很高，主要就是因为徐先生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能够吸收西方优秀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从来就主张我们的文化艺术一定要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并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人民文艺创作中的精华，又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必须“结合”。而“结合”是不容易的，因为中、西的文化艺术各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又经历了各自独立发展的漫长进程。但是，结合毕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然的话，文艺的更新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了。

周恩来同志生前对徐悲鸿也很了解、很关怀，对他在政治上、艺术上的评价都很高。周恩来同志曾亲自指示恢复徐悲鸿纪念馆，他自己病危时还在询问恢复纪念馆的工作落实没有。

邓小平同志最近讲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

是中国特色？就是指的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有关的特点和传统。中、西艺术有共同的东西，有普遍性的规律，但中国的艺术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特色仅仅为中国所有。在文化艺术上，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独特的东西，那就对人类文化没有什么贡献了。

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影响、结合、融化并从而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就是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徐悲鸿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

载1983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 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在目前情况下召开，大家的心情是高兴的。因为十二大刚刚开过，最近又开了五届五次人大，整个国家的形势、党的工作状况，都有很大的变化，各条战线都在努力开创新局面。而文学，是时代气氛和人民群众情绪的反映，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会有不同的文学。现在全国人民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颁发茅盾文学奖，这对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设立长篇小说奖，这是茅盾同志生前倡议的。这是个很好的倡议。正如刚才周克芹同志所说，我们大家都怀念茅盾同志，一直到临终的时候他仍念念不忘要入党的事，他嘱咐他儿子韦韬同志要我向党中央转达，中央很快接受了他的遗愿，恢复了他的全部党龄。茅盾同志本来是个老党员，他的这种至死不忘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几年来出版了四百多部长篇小说，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很惭愧，我看得不多，这次得奖的长篇我只看了三、四部。四百部，从数量上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总和。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单纯以数量来衡量；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可以抵几十部、上百部平庸的作品。

巴金同志说了 这些作品还有一些缺点 这也是事实。《李自成》已经有了广大的读者，在评论界也获得了好评，可以说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虽然全书还没有写完，而且在评价上也有不同的意见。其它获奖作品也是同样，思想艺术水准容或有高低不同，但总是写得好的，有特色的。在六部获奖作品中，有四部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有的把矛盾写得相当尖锐，也比较深刻。比如《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冬天里的春天》、《将军吟》这几部作品，都从正面写了“文化大革命”，应该说写得不错，都有相当广阔的规模和深度，风格新颖，色彩浓郁。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议论，有些议论还是比较尖锐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时间这么长，灾难这么深，人们有很多感受，有很多意见，甚至还有很多牢骚，你不让他在作品中发泄出来，这可能吗？只要不是单纯发泄个人怨愤，而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真正做到恰如其分，忠于现实就好。我过去讲过，“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文学中得到反映，不反映那是不可能的，不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现在这四部长篇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但确已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所以大家重视这些作品，推荐这些作品是有理由的。

由此，我又想到茅盾同志建议设立长篇奖的重大意义。在这次评奖，评了一年，同志们花了许多劳动，评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创作，为了发展和革新，并不是说获奖作品就完美无缺。评奖的同时也要奖评，要加以评论。文学这东西，必须在自由讨论中、在互相竞赛中发展，也就是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手段来发展文学事业。这样才能促进而不会阻碍文学的发展，才能鼓励而不会挫伤作家的积极性。我们过去，包括我在内，没有注意经常做到按艺术规律办事，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手段，犯了许多

错误 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斗争，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作家。许多事情，我们都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艺术创作需要一定的才能，这本来是简单的道理，不应当忽视；当然也要十分重视把才能引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有些有才华的作家，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了；这些同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大都是很好的，是很有才能的。我是不是讲才能讲得太多了？不，文学艺术是需要才能的。

最近，我看了李子云同志和王蒙同志的通信，我看这是一封写得很不错的信，里面分析了王蒙的作品，分析得不一定都很确切 都对 但用了艺术分析的方法 在作家、艺术家之间采取自由谈心的方式互相探讨，这种做法很好。同时我也看到了王蒙同志的一个发言，也很好。他是不赞成搞那么多专业作家的，这涉及到文艺界体制改革问题，值得研究。发展文学艺术，必须用讨论的方法，评论的方法，竞赛的方法，这才是促进我们文艺发展的比较好的方法。这不是我的新的意见，毛主席早就讲过，归结到一点，也就是要贯彻双百方针。贯彻双百方针，一个重要问题是，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可以和政治、思想有关系，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互相混淆。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但它毕竟有相对的独立性。作家和艺术家有选择自己所擅长的形式和风格的充分自由。所以贯彻双百方针，要鼓励两个自由：一个是充分讨论的自由，一个是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发展的自由。学术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这就是百家争鸣。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越多样化越好，这就是百花齐放。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双百方针宪法里没有写，引起了疑问，外国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宪法的语言是一种法律的语言，双百方针毕竟不是政治的法律

的语言，不一定写到宪法里去。但双百方针是我们要继续坚持的方针。这不是自由化，而是防止自由化的一个有效的措施。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要反对。但是，我们只有保证了充分的自由才能防止自由化；反过来说，只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才能保证真正的创作上的自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做到使作家既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又感到心情舒畅，如果心情不舒畅，他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所以艺术风格和形式上的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和批评，但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比如现代主义、现代派问题，比如说意识流的讨论，要使作家感到这种讨论没有什么危险，对创作还有某些好处，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作家协会有的同志向我反映说，他们访问了高晓声，高晓声说：“我现在也知道没有问题了，对党的政策是放心的，但我拿起笔来总好像要左顾右盼。”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完全必要的，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家的必要的品质。但却需要消除这种左顾右盼心理，这种心理仍然是心有余悸的表现。旧时代的优秀作家常常是批判现实主义者，对旧社会采取批判态度，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现在我们的作家也批评我们社会的缺点和阴暗面，但是根本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个社会，而只是要不断改善它，改革它。我们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根本的不同。所以对作家要十分慎重地对待，要关怀他们，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有一点灵感和热情，你不能破坏他的情绪，使他根本不想动笔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当然要破坏，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那是要破坏的，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的。现在我们对作家的思想情绪更需要正

确的引导，要为国家培养人才，爱护和保护人才。爱护、保护是第一位。批评也是为了爱护。在我们的国家，什么是最可痛心的浪费呢？这就是人才的浪费。爱护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护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当权的嘛！不像三十年代 那时我们没有政权 没有法律机关 处在被压迫的地位 想保护也保护不了。今天不同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执政党，应该而且可以做到保护人才了。特别是对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创造，需要有更多的爱护、扶植和保护。要鼓励创新，鼓励探索，允许走一些弯路。京剧搞流派，已经是有了多少年了，文学方面当然也可以有流派。我不赞成人为地制造流派，更不要说是搞什么宗派山头。但我们可以支持流派、鼓励流派，只要不是人为地制造流派。对艺术上的问题，只要不涉及政治上重大原则的问题，应当有更多的自由讨论，不一定急于做结论，这对于我们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

这几年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获奖的六部长篇，不能说没有缺点，但写出了这些长篇不能不说这是我们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一个前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祝贺，祝贺他们的成功，并且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写作要注重“事信言文”

——答《写作》杂志编者问

《写作》杂志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就当前青年写作中的问题谈点看法。这个问题很大，我的回答也可能不全面，但是，我还是愿意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关于写作的普及与提高问题

写作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教育不普及 文化程度不提高 根本就谈不上写作。当然 也有例外 有些人虽然未受过学校教育，也可以写作。比如，民间文学的一些作者，没有上过学校，也能写出民间文学来。但是，我们讲写作能力 受点教育 还是必要的。我一向是这样认为 普及教育 是教育部门的事，也是全国人民自己的事，列宁也讲过这个问题。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 还有一种计算能力（搞数学）这三种能力 就是文化普及的基本内容。有了这三种能力，才能看，才能写，也才能够计算，这属于提高整个人类的文化水平问题。文化水平提高了，以后他是做作家，还是做理论家，还是做科学家、工程师，那又是第二步的事了，而且那也不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至于对每一个人的要求，就是要有表达能力，要有基本的文化知识。如果他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他怎么表达，他表达什么东西呢？

就是表达民间文学，也要有描写和抒情。所谓作品，无非是抒情和叙事。把这些讲清楚，讲得有条理，也就是表达了思想情感。当然，抒情里面也包括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有些青年有这样的愿望：他们想搞写作，有了写作能力，就进一步想当作家。要想当作家 问题就比较多了。要知道 讲写作能力、表达能力 这是一回事，要想当作家，又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历史上许多作家 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作家的。你们的刊物（指《写作》杂志），是帮助青年培养一种基本能力，即写作能力。至于他们学会写作以后，是当作家，还是不当作家，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 不管你当不当作家 要写作 就得要有表达能力。所谓“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首先就是指的能够表达 把意思讲出来 其次才是表达得好不好的问题，也就是艺术性的问题了。因此说，写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要处理好，不可偏废。

二 关于创作才能问题

当然 想当作家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 譬如深入生活问题、创作才能问题等等。写作需要才能，这句话不能一概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 天津有一个作家叫王昌定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 创作需要才能，后来被一些人批判得一塌糊涂。我说，他这句话并没有说错，至少，不能说完全错，也许他讲得不那么全面。文学需要才能，创作需要才能，但才能不是神秘的观念，不是天生的。是不是有天生的成分呢？也可能有，但总的来说，才能是培养出来的，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才能不能一概否定。譬如说，写诗的人，他总得有诗人的感受。写诗的人和写理论文章的人不一样，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感受不一样，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一种是

形象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单单只讲逻辑思维不那么恰当，因为艺术思维里也有逻辑，不能没有逻辑，写诗的人也有逻辑，那是另外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已经不是理论形态，也不是概念了。所以说，从培养写作能力的角度看，不论是想当作家的人，还是不当作家的人，都得努力提高写作水平，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问题。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人人都应当获得这种能力。昨天，我看了河北省的一个调查材料，材料中提到河北省老革命根据地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经历很丰富的老同志，他们对革命有功劳，后来有的就成了革命烈士，但他们大多数是文盲，这当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天就不同了，革命干部不应当再是文盲，因为文盲毕竟不能看报，这就要影响工作。我觉得，今天的广大青年，就应当不断增强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以适应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从实践中培养才能，这是很重要的。

三 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写作，包括写报告，包括做总结，包括写信，这是一种能力。狭义写作，就是指的 artistic 的写作，也就是文学创作，这个范围就比较小，但也很需要。这两个方面都是你们《写作》杂志的服务对象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这两个方面，都有表达能力问题，也都有艺术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艺术性没有表达能力就是“言之无文”就是“行之不远”。其言其文，也就不能流传，流传不了啊！我赞成普遍提高人民的写作能力。不论搞什么，就是搞四化吧，也要具备各种条件，就拿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来说，这里面也包括了表达能力。写

报告、写总结等等，都包括在内，这是普遍的问题，大量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他们爱好文学，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人想搞创作，其目的就是想当作家，我看不一定很好。当然，每个人都有各人的想法，当作家、当科学家、当画家，这都可以。不过，我觉得，一开始就想当作家，这种想法不一定很好。我的看法是，要搞文艺创作，也应当想到这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社会的需要。他努力去搞文艺创作，也许他不想当作家，结果却当上了作家。也许他想当作家，结果却成不了作家。在我们的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确实勤勤恳恳地在写作，但他仍然当不了作家。我国有很多民间歌手和从事民间艺术的人，他们当中，会唱民歌的人很多，而会创作民歌的人，却不是很多。鲁迅、郭沫若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当作家的，他们都是学医的，当作家是由一定的条件促成的。所以说，我赞成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写作能力，无论广义的，或是狭义的，都要提高。你们刊物中提到的新闻写作、应用写作，这些都很重要。所有这些写作，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什么“家”才去搞写作的。

四 写作应当注重“事信言文”

另外，写作还应当注重“事信言文”。这是欧阳修的话。就是说，你写出来的东西，事是可信的，语言要有文采，这四个字概括得很好。事情是真实的，语言表达又有文采，这样才能写好作品。欧阳修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再者，“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这八个字也很重要。言之有物就是不要讲空话，言之有序就是表达要有一定的顺序。事信言文、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做

到这三点也不是很容易的。现在有些作品，也是不太可信的。有些人写回忆录，往往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譬如说，从前有些人写文章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等等。写“我的朋友胡适之”无非想标榜“我是胡适之的朋友”是否真的如此呢？也很难说，我只不过举个例子罢了。所以说，无论写什么，一定要注意“事信言文”这四个字对于写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人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载《写作》1983年第4期

尊重历史 给历史人物 以应有评价*

郭沫若研究学会到底怎么办？

郭沫若是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讲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有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有不到一百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两类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传统，一个是五千年，一个是不到一百年，后者比前者离今天更近得多，对今天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因此更应该大力研究。特别是像郭沫若这样一位大作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剧作家、又是历史学家、又是古文字学家，涉猎的方面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所以更值得我们很好地分门别类地研究。

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因此我赞成成立郭沫若研究学会。当然，现在有些学会也有缺点，好像太滥。滥了不好，但学会还是需要的；并非滥竽充数的学会不但需要，而

* 本文是作者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三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且十分需要。这种形式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提高。学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意见，会有争论，这个没有坏处。没有争论、争鸣，学术怎么能发展繁荣呢？既然是学会，就是科学性的组织，所以研究郭沫若第一位的是讲求科学性，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既不要有溢美之词，更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范围很大，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算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他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中都有专长。所以在开国以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人，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对郭沫若研究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分门别类进行。

研究当代作家，特别是当代伟大作家很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古代作家还麻烦。当代作家有的还活着，或者同他有关系的人还活着，正因为是朋友、熟人，研究时难免夹杂一些感情。当然，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时代的感情，革命的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没有革命的感情怎么能研究郭沫若，研究鲁迅、茅盾呢？这同科学性不矛盾，恰恰是一种需要，一个条件。对郭沫若的研究应该有热烈的感情。

“五四”以来有人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看作两大流派，我看是可以这样看的。问题是具体研究一下这些流派的产生、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这两种流派都有它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因素。现在大家都承认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但它也有自然主义的流弊。我们对茅盾是很称赞的，他对这个自然主义也

有所批评。郭沫若是文学家，是以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我跟郭沫若同志谈过，科学好像不能有浪漫主义，但科学应该有幻想，有革命的感情。研究郭沫若的一生，不能离开他整个思想感情以及毕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果离开这些就不能正确认识郭沫若。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那时候我们受郭沫若的影响，也是在这个丰富的感情上受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但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

我们对郭沫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伟大的文化巨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郭沫若的功劳就是用他的著作、行动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事情。像我们这些人，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老一点的，受过各种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封建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信仰，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新的信仰。但郭沫若比我们强，因为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容易的。许多人都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诩，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对历史上的事情都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是很难的。首先一个问题是掌握历史材料没有？如果你没有掌握材料，没有这个“物”，怎么能算是历史唯物主义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列宁也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

想。’所以我今天讲 是表示一种愿望 要做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要掌握大量历史材料。郭沫若就有这个条件，鲁迅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掌握了中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当然 光堆积材料还是不行的 还要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材料，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把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奋斗目标提出来？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应当努力去做，要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历史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都不好。过去写的东西，机械唯物论不少 喽！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既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不是很容易。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信仰上可以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你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思想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很难说了。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很彻底的，但在他的晚年，唯物主义也没有贯彻到底，某些方面还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一点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讲到了。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相信毛泽东同志，甚至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这是后来才觉悟到的，知道了自己并不高明。可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难的事情，要终身努力。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个三十年代的老同志问我：你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什么收获？我想了一想，要讲心得只有一个：经过整风认识了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还是讲这个话，事隔三十多年了，我还是说：做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容易。拿这一点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

现在有些谈文学史的文章有一种倾向，贬低革命文学，好像“左翼”搞错了。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左翼”文艺运动。现在国外有些人专门贬低“左翼”，专门把受过“左翼”批评

的人抬得很高。恰当地批评，纠正过去我们“左”的错误是完全需要而且应该的，但贬低“左翼”，专门抬高“左翼”以外，甚至反对过“左翼”的东西就不对了。当年鲁迅和梁实秋争论到底谁是谁非，是非界限不能模糊。鲁迅过去批评他并没有错，鲁迅也好，创造社也好，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对的。如果有缺点，就是方法上可能有点“左”的情绪，还有一点就是不大讲策略。

评论前人的功过，不要因为革命运动犯过不少错误，犯过今天听起来像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历史做出不正确的估价。譬如从事文学革命，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生命，而是牺牲了，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对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做出正确估价，听任一些人妄加曲解，把“左翼”说成还不如梁实秋啊！还不如胡适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就相信了这些。这样地对待历史，就完全不是唯物主义，完全不正确了。当然，我们对梁实秋先生还是要团结的；听说他也表示想回来看一看，这表明他还是爱国的嘛。

郭沫若是在六十多年前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现在的时代和那时很不一样。几十年过去了，还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潮呢？五十年前是有这种思潮的。鲁迅、郭沫若都曾和这种思潮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反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创始人跟各种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了斗争，进行得很漂亮。马克思去世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这种斗争，不过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高明了。现在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潮，我们还要进行斗争，怎样学会更好地斗争？就是要知己知彼，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首先要了解他们。

鲁迅谈到当年《中国青年》上有一篇文章，对朋友讲得很多，

对敌人讲得很少，鲁迅认为应该更多地了解敌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重新分清敌我、是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现在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不同了，情况复杂了。最近思想界一度流行“萨特主义”。有人说鲁迅也是存在主义，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很荒唐的。什么主义也好，凡是流行的东西，都有一种吸引力，一些较年轻的同志，觉得这是“新生事物”，所以鲁迅也变成存在主义者了。

我们对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要加以注意和研究，不要想当然地乱捧或者乱骂一通，这不是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要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包括当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但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自己鲜明的思想旗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剥削阶级的思想混同起来，更不能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思想旗帜。

这次会开得很好，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一定能把郭沫若研究工作越做越好。

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

——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

记者 我是《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的记者 这次来参加《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有机会见到您，很高兴。有几个问题希望周扬同志给我们谈谈。

周扬 你们的刊物很大 创办的也比较早 头几期我看过 后来刊物多了，没来得及看，我的印象还不错嘛。今天怎么谈，你有什么问题啊？

记者：《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您在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经提到这部著作 那实际上是一个倡导 这之后《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现在全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了，您对今后《文心雕龙》以及古代文论的研究有什么希望？

周扬：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确实是世界少有的。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也十分丰富、十分宝贵。特别是《文心雕龙》，在古代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在中国没有其他的文论著作可以与之相比 在外国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当然比《文心雕龙》产生更早，他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者。古罗马则有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吉纳斯的《论崇高》都比《文心雕龙》早，

但都不如《文心雕龙》完整绵密。布瓦罗的《论诗艺》则晚了将近十个世纪。《文心雕龙》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它只论诗文而没有涉及戏文(戏剧文学)这是各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道路不同的原故。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是很稀有的。《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我看可以称得起伟大两字。在文论这个范围里,一千多年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恐怕世界上很难找出来。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在内,还处于中世纪,或者中世纪以前,还是黑暗时代。当然,中世纪在文化上也有成就,不能一笔抹煞。但是中国在中世纪就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价值还有充分估价的必要。它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千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就有这么一部书,虽然只有三万七千字,但对文学的各种体裁、各种风格、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批评鉴赏、文学的创作活动,文学的批判与继承,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全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对于《文心雕龙》、对于古文论的研究都是一个推动,现在全国的学会很多,不知道有多少。胡耀邦同志说,学会太滥了。学会应当是学术研究的组织,对于本学科的研究,应该有所促进、有所提高。成立学会,不是凑热闹,也不是把一些人请来游山玩水,它应该有个明确的目的。

我希望通过贯彻双百方针,把古文论的研究提高一步。但是这个提高包括文学创作的提高不能像物质生产那样定出一个指标。大跃进时有人提过中国要出多少个关汉卿,这是不

正确的，这是不能由主观确定的，这是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至于 什么时候出个关汉卿 出个曹雪芹 出个鲁迅 那是由许多条件、许多因素构成的。文化，不是以量递增的。所以，学术发展，学术提高，只有通过开展自由讨论，自由论争，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要鼓励个人的研究，但个人的研究成果也只有通过讨论才能看出来，才能为大家所注意。

记者：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经济战线上的任务，也是全国各行各业的重要任务。您在全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讲，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建设最重要，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

周扬：现在我们党提出，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是宏伟的，建设是全面的，既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建设最重要。马克思 恩格斯经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先进不先进 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的理论上的成就。我们讲理论建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理论，它是英、德、法三个国家，当然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理论的总结。德国的古典哲学起了一个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若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一是说明历史问题。真正的理论，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回答实际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且回答的准确、及时。我们说现在理论工作显得薄弱，文章没有说服力，就是还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个问题

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譬如 有的干部 他讲了许多话 都是陈言，别人讲过的，或者是上级讲过的，所以人家感到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小平同志的《文选》出版了，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著作，是我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及时地提出并解决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理论建设，要有创造性，这就需要有勇气。没有勇气，谈不到创造性。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基本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是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同志集中火力批评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经验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有勇气的。虽然毛泽东同志自己晚年没有贯彻到底，然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是与世长存的。小平同志概括现在的情况，又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同样是需要勇气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讲到理论工作的勇气，没有勇气，便没有理论上的创造。陈云同志讲不要唯书、唯上，要唯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书本上怎么讲就怎么讲，上面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怎么会有创造性呢？但是，也不能乱讲，要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这个规律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说 哲学家到这个世界里 来寻找真理 正像夜里在一个大屋子里寻找黄金一样，即使他们已找到了黄金，他还是不能确切地晓得那就是黄金 列宁的《哲学笔记》摘引了这段话，可

见 寻找真理 发现事物的规律 是很不容易的。今天 我们就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实践，寻找真理，发现规律。这是需要勇气的。

记者：关于文学创作的民族风格，关于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您在五十年代就提过，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广大理论工作者仍然很关心这个问题，您能再谈谈吗？

周扬：我讲过这个问题。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凭空建设 总要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 文化也好 理论也好 它都有个基础问题。凭空建设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列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像波格丹诺夫那些人 都是老革命，老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有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脱离实际，他想凭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是不能凭空建设的，只能在自己民族基础上，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东西去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派”没有搞通这一条，所以列宁的反对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危害性。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以前的大跃进时期。都有类似的倾向。要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建设，这样才能有民族特点。没有基础，就没有特点，要建设自己的文化，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要有个基础。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还是比较突出的，进步很大。

民族风格，是个形式问题，也是个内容问题。我想，首先是语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现在的文学创作运用民族语言有很大的进步。不但文学，戏剧也很突出，你看，哪个地方戏没有自己的地方语言？吉林的“二人转”是东北话；北京的“曲

剧”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语言 就没有地方戏 没有人民的语言 就没有人民的文艺。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民族形式时说，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东西讲起来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老百姓一看它就能接受 就喜爱 就感到是自己的作风 自己的气派。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心理、民族风俗、民族习惯吧。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在这点上讲，就比过去进步得多了。当然，有些作品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它确实是民族自己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民族特点。只是“文”“野”不同，有的还不精致，艺术性不高，这可以提高。现在的文学创作，比起三十年代，比“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都有很大的进步。翻出三十年代的东西一看，差距是不小的。关于文艺创作的语言问题，三十年代还有过论争。那时候，瞿秋白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倡大众文艺，大众语言，这是正确的，但把“五四”提倡的“白话”太贬低了，说是“新文言”是“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甚至比旧文言还坏。这就过“左”了。当时也有影响，我个人就多少受过他的影响。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同志。文章也写得很好。茅盾化名和他争论，比较起来，还是茅盾同志的意见正确些。后来秋白也比较正确了，《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就写得好，影响很大。

文艺理论的文章，最近我看的不多。三十多年来，进步还是很大的。过去，我们对中国古文论注意不够，现在，广大理论工作者正在努力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古文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当然，还存在着某些简单化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可以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的成熟逐渐得

到解决的。

总之，三十多年来，从文学理论上，特别是从文学创作上看，民族特色还是很突出的。进步是很大的。

在文学创作上，当前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大概也注意到了。有的作家不满意文学创作的民族传统和特色，想要追求西方。虽然人不多，但有影响，甚至影响还相当大，因为他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要创新。对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所谓追求现代派倾向，我觉得这也不必过分奇怪，但要进行批评，要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讲道理的方法，指出他不对在什么地方。对于外国的东西，像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一样，我们是要吸收的，批判地吸收，外国古代的，近代的，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文化，我们过去都不是拒绝的，现在还得借鉴呀。现代派当然要批判。但现代派是现代潮流，还应该去研究，不是迷恋，研究还是必要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艺术新的现象，怎么能不注意，怎么能不研究，一出来，一两句话就把它打回去，过去我们有过这种作法，实践证明是不好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不了解怎么进行批评呢？所以，学术讨论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没有讨论，就没有学术。

今天说的，就算对你们刊物的回答，因为我欠了你们的债，没有给你们写文章，这样可以吗？

记者：耽误了您的时间，谢谢。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于青岛

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一代杰出的戏剧 大师和时代的歌手

——纪念田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及许多革命歌曲歌词的作者、诗人田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联合举行纪念会，并且将举办“田汉研究学术讨论会”，以纪念田汉同志对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戏剧、电影、音乐、诗歌等各方面创作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纪念田汉，对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田汉同志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文化名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兴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造就了一大批志士仁人，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家和艺术家。田汉就是这样一个早期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革命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

早在二十年代，田汉就已蜚声文坛，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三

人以《三叶集》为名出版了他们青年时期的通信集，以他们的新锐的观点和纵横的才气为人们所注目。他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他们期望旧中国的新生。他还同我国最早的一些共产主义者相交往。他曾经为张闻天同志等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写过序言。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翻译者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文学道路上是一个赤诚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又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曾一度带有某些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一生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坎坷。一九三〇年，正当他由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转变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关头，他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敢于正视和总结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和浪漫倾向，表现了积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决心和信心。此后，无论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期间和抗日烽火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戏剧的复兴和发展时期，田汉同志都坚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他胸怀赤子之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在异常恶劣困苦的环境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他嫉恶如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也勇于克服自己身上的某些错误和缺点。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在十年内乱期间，江青一伙曾嚣张一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田汉同志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可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之流终于受到了历史审判。而田汉同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鲜明形象，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说到田汉同志的贡献，不能不首先说到他对于中国戏剧事业的巨大历史功绩。中国古典戏曲有悠久的灿烂的历史，曾经

出现过光照千古的元明戏曲时代。但是近代落后了。作为戏剧新形式的话剧则产生较晚。从二十世纪初叶才开始有现代新形式的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戏”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逐渐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趋于衰落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势下，田汉同志和他的战友们重新开拓了我国话剧的新路。他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优秀作品。创办有名的“南国社”组织演出。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情操，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的呼声，扩大了话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话剧事业的发展，称他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优秀代表作品《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等都列入中国话剧的保留剧目之中。他在创作中，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力图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他不仅把深切的生活感受，运用话剧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把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充满诗情的才华与奔放的想象，都一起熔铸在创作之中，《关汉卿》就是一个优秀的典范。田汉同志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田汉同志开始从事话剧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现在，话剧在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开花结果，形成了一支联系千百万人民的艺术大军，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忘记田汉和其他一些为中国话剧开拓道路的前辈们的巨大功绩呢？我们怎么能忘记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丁西林等这样一些同志呢？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奋发图强，去开创社会主义话剧的新局面。

田汉同志也是我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大家知道，“五四”以来，不仅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蔑视诋毁戏曲，即使是革命

的、进步的文化人，也程度不等地轻视戏曲，而田汉同志却看到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的宝藏，他看到了戏曲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认为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决不应该丢弃戏曲，而应当团结戏曲工作者，共同努力。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同志就率先投入了这一工作。他不仅组织了话剧的演剧队，还组织了几个戏曲演出队，团结广大戏曲艺人抗战。他创作和改编了不少戏曲剧本，积极进行戏曲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为旧戏注入了新的血液。

中国戏曲历史长，剧种多，剧目多，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并致力于戏曲改革事业，成立了由田汉同志主持的专门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戏曲改革既是民主改革，又是社会主义改革，两者是互相衔接而又密切联系的。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巨大变革。清理历史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戏曲遗产，使之适应新时代人民的需要，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有机部分。戏曲改革既包括文学语言的改革，又包括舞台艺术和戏曲音乐的改革。它的艰巨、复杂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下于我国的文字改革。周恩来同志曾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田汉同志作为戏曲改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实践者，尤为精神焕发，身体力行。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当时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团结广大戏曲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十分尊重戏曲艺术家，相信和依靠他们，善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他们一起致力于思想和艺术改革。他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著名戏剧大师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值得赞颂的。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创造性地改编了《白蛇传》、《谢瑶环》、《西厢记》等一

些优秀作品。他的戏曲作品，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唱词优美，才华横溢，大大地提高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也提高了戏曲艺术的地位。今天，我国戏曲有了新的面貌，自然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广大戏曲工作者的集体的努力，但是，田汉同志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在充分估价我国戏剧和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的时候，十分遗憾的是，我也要指出当前戏曲工作中还存在落后甚至倒退的现象，这是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的任务完全不相适应的。

田汉同志和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又是我们的前辈，他身上有一种突出的优点 那就是善于团结人 团结同志、朋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堪称我们文艺界的一位团结的模范。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 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 这是他的一个长处。”不论在话剧界、戏曲界、电影界、音乐界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他都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表达广大群众的心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豁达大度 不计私利。他关心群众生活 重视群众的疾苦 努力推荐和提拔后起之秀。他对同行和晚辈推心置腹，循循善诱，成为大家所敬重的良师益友。他和聂耳、冼星海、张曙的忘年之交和深厚友谊尤为大家所传诵。田汉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突出的。古人常讲“文如其人”，也就是说，一个文艺作品无不是作家、艺术家独特个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个性，他曾区分个性为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类；他自然是提倡前一类的个性。建设性的个性与无产阶级的党性是相一致、相吻合的。当然，由于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艺术家的个性和党性发生矛盾的情况，作

家的个性应当以服从党的最高利益为原则，田汉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总是以个性服从党性，最后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在今天我们纪念田汉同志的时候，《田汉文集》开始出版了，这是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做的一件好事。这个文集，是他一生辛勤劳作的结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次举办的田汉研究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五十位专家、学者参加。我们希望通过《田汉文集》的出版和这次讨论会的召开，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对田汉同志著作的研究和讨论。我相信，将来会陆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常常唤起我们的深切怀念。党爱护自己的战士，人民尊重自己的作家。田汉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我们要把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和革命精神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新的文艺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载198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邓拓文集》序言

邓拓同志死于“四人帮”之手，离开我们已十七个年头了。今天，我阅读他的文集，仿佛面对久别重逢的故人，不能不唤起我们对他的深切的痛心的怀念。

文集里的很多文章是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写的。他在一九三七年秋天起在那里一直工作了十年。我是日寇投降后才在那里同他初次见面。虽然早在三十年代，我们同在上海参加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但因为处于当时地下党秘密环境下，无缘相识。一九四五年，他和我都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工作，虽然共事时间不长，后来他到了人民日报社，我到了中央宣传部，彼此都仍然同在宣传部门工作，互相接触和来往的机会还是较多。聂荣臻、彭真同志曾先后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常常谈到他的为人，特别是谈他当年在战火纷飞中一面战斗，一面带着电台办报，随时准备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英勇事迹，无不为之唏嘘感动，这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集中所收的一些文章，仅是他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的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为我党新闻工作倾注了多少心血。

邓拓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他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爱好和多方面的研究。他不仅工于书法，对传统国画也很有研究，而且是写有不少作品的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为了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从青年时代起就

致力于历史研究，对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称得上是一个真正为革命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邓拓同志长期从事主持党报的繁重工作，这些研究与写作有很多都是业余进行的，这也说明了他的勤奋和才华，他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我国新闻史中一定会得到全面的公正的评价。

不过，就作品论作家，我以为最能表现邓拓同志的思想风貌的不仅是他的政论和学术文章，而且还有他的杂文，尤其是读者所熟知的《燕山夜话》。

《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 待人接物 到生产建设 领导方法 等等 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 写得引人入胜 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 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夜话》的另一特色，是在传播历史社会知识的文字中，渗透着一种热爱祖国和人民、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自豪的深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总是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美好事物的由衷的赞颂和对积极建设新生活的热情的召唤。历史知识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丝毫没有冲淡对现实的关注，倒是给人们增加了认识和改造现实智慧。即便在提倡认真读书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人们还要关心国家大事，端正学习目的。他在论述东林党人的品德的时候，引证了他们书院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这里也寄托了作者对东林党人的某种同情。而《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知识、情趣和道理 又是通过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朴实无华的语言传达给读者，娓娓动听，使人读了无形中增添积极向上的力量。

和那种以辛辣的讽刺见长的杂文不同，邓拓同志的这些杂文大都以传播知识，启发思想见长，可以说做的是正面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杂文中没有对现实中某些消极面、阴暗面的否定。这不仅因为他也写有少量直接讽刺和鞭挞丑恶现象的作品，而且表现在他的杂文的共同的基调是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精神，重视文化知识对于提高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重大作用。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左’的错误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恶劣作风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夜话》的这种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有的放矢的。然而，尽管当时党中央正在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左’的错误，重申调查研究 and 实事求是，《夜话》的发表也是作者衷心拥护和积极贯彻党中央这些正确方针的表现，但他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一九六二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以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但同时他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

一个作家发见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

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载198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一九八四年

对电影美学研究的一点希望*

电影出现在人类文化生活中不过八十余年，而它以视听的通俗和传播手段的先进，与后来兴起的电视艺术一起，成为本世纪拥有观众最多的艺术形式。但电影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最近三十年来的事。

胡耀邦同志勉励我国电影工作者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表达了党中央和亿万人民群众对电影的期望。我国电影工作者务必以百倍的奋发和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精神，来实现党的号召，力争高质量，力争多有一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它除了反映电影这种综合艺术所已达到的成就外，还应表现它奋力以求的目标。

近数年来，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盛，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电影美学在这个方面先走了一步。我愿借此机会，简单地说一说我对这项研究的几点希望。

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

* 本文原是作者为《电影美学1982》写的序。原载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题目是发表时《人民日报》编者所加。

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形式是重要的，决不可忽视。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黑白片和彩色片，普通银幕和宽银幕，都为电影在表现上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推动着电影向前发展。但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资产阶级按照他们的理想美化世界，他们的影片充斥世界市场，其中不少影片往往不是把世界美化了，而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艺术方法的影响下给了世界以精神污染。在这方面，我们革命的电影艺术家必须立大志，攀高峰，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二、我们的电影 正如其它艺术一样 是为人民的 首先是为人民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它在文艺界所引起的巨大变革，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我们的电影应当有美好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寓教育于娱乐。所谓‘非情节化’、‘非戏剧化’以及‘现代电影观念’等等，并不等于不讲情节，不讲戏剧性，不讲电影手法。创新的学说和理论都是值得注意的，应当加以研究，并吸收其长处。但是，这种研究，不能脱离人民的审美要求，应以最佳的表现手段，求得最佳效果。毛泽东同志为此作了生动的比喻：“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任何提高都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基础。

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历史功绩，在于改变了中国旧电影的面貌。它的主要成就是力争电影为了人民和为了社会进步。但在全国解放之前，它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点。而在当时的延安，

还不具备生产故事影片的条件。开国后三十多年来的电影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

三、电影这种形式是从外国输入的，尽管我国历史上早有灯影戏等与“影”相联的民间艺术，但它和我们今天称为电影的东西是纯然不同的两回事。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经验，拒绝学习是不对的。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 固步自封 尤其是在电影从业人员中 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这种学习，更是必要的。近年来电影界的学术空气开始浓厚起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学习的目的性应该明确，应该使别人的成就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中国是当代世界中幅员广大而又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电影应当具有我们民族自己的风格；我国又是多民族国家，还应该具有各个民族自己的风格。从《渔光曲》、《桃李劫》、《中华女儿》、《上甘岭》、《林则徐》、《林家铺子》到《城南旧事》、《夕照街》说明愈是民族的，愈能赢得世界的观众，从而为世界影坛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任何研究学科，都应该建立良好的学风，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锲而不舍的学风，并在此基础上，提倡首创精神。学术上艺术上不同的意见，应通过友好的认真的讨论和实践去求得解决。美学上有些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

我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尚处在幼年时期，而任务是繁重的。

因此，关于史的研究，关于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经验研究的，关于各个时期电影思潮的研究，关于现状的研究，甚至关于目录学的研究等，都应该有计划地做起来。这些都是从事电影美学研究的必备条件。美学的抽象，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要防止经院式的繁琐和谈玄式的不着边际，但也只有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克服它。

科学和文学要结合

我来参加这个会，对科幻题材的创作表示支持，对作家协会和科普协会讨论这一过去很少关心的创作问题表示赞赏。我的科学知识很少。我没有受过完全的普通教育，以后虽然读了大学，但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还是比较缺乏，如果说懂一些，也是后来自学的。记得前些年，我曾在社会科学院主持过一次会议，请科学上很有名气的钱学森同志讲演。他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他反对我说的科学无禁区。他说科学有禁区，反科学、伪科学就是它的禁区。当时我就认为，他这种精神很好，我是会议主席他敢于坚持真理直言不讳这就是科学精神的表现。讲科学无禁区确实不够严谨，所以后来我想把我的话改为：科学的探索无禁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四人帮”时期，什么问题都是禁止探索的，又因为在探索的时候并不能肯定它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所以，首先要鼓励大家勇于探索。全国解放初期我在谈戏剧改革时说过，要把神话与迷信区别开来。神话不应当反对，它虽然不科学，但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成分，特别是想象和幻想的部分则是艺术创作所绝对需要的，决不可少的。如果反对神话，不少好的旧戏就不能演了。当然，迷信是不好的。但首先也要慎重地区别什么是迷信。在创作上历来反对从概念出发，反对从概念出发来理解生活，但对于理论来说，概念是很重要的。离了概念，怎么谈问题呢？所以，首先要把科学的概念

搞清楚。因为在这些概念上常常会出许多问题。当然我也写文章，也在概念上出过问题。因此我要特别强调，首先要把科学的概念搞清楚。

科学地考察事物，有个宏观和微观的问题，从这两个角度都可以见到世界的真相。现在科学、哲学等领域都提倡既看宏观世界，又看微观世界，对我们搞意识形态的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观察事物 这就是既要宏观，也要从微观来认识世界。放宽了眼界，研究也就会得法。黑格尔的《美学》是从整个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艺术问题的，这一点很受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对它评价很高。黑格尔认为艺术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象征主义时代，第二个是古典主义时代，第三个是浪漫主义时代。这种分法不一定合理，但其中确实有辩证法。当然我们与黑格尔不一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 我们是唯物主义 但他观察事物的方法 正反合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搞文学的能有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工作就容易做得比较好。否则就容易走向唯心主义、形式主义。

我从来主张科学和文学要结合。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社会和艺术发展的总趋势。至于怎样结合，这当然有各种道路，但总的趋势是一定要结合。这是我的信念。我们研究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也应当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观察问题。

既然叫做科学幻想小说，那么幻想的作用便是不能否定的。要既尊重科学，又允许幻想。允不允许幻想，这关系到艺术的命运。列宁讲过，一个民族需要幻想。没有幻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科学幻想也应当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给人以积极、健康的东西，给人以鼓舞，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鼓

励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努力探索，不断上进。对于错误的思想应当批评；胡思乱想，在科学领域中搞精神污染，是不允许的，应当予以批评和制止。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三年国庆曾书赠景山学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这几个字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应该成为我国亿万人民共同的思想 and 信念。这也是我们的信念。

载《文艺报》1984年第1期

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感受是很深的。的确是一本好书，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方针的一本好书。谈的是评弹问题，涉及到的却是文艺的许多基本问题。不仅曲艺界，整个文艺界都应该很好地学习。我想讲几个问题，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文艺路线问题。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阐述。我们今天的文艺路线，大家都知道，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总方针。我们都是拥护和接受这个方针的。但是，再进一步问一问，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平常一讲到服务行业，常常多少带一点看不起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文艺界也是个服务行业。没有理由看不起服务行业。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纯粹为人民的，是为他们服务的。

什么叫服务得好？什么叫服务得不好？这要有个标准。我认为，陈云同志这本书里相当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讲了千千万万遍了，也确实取得了很不小的成绩。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的服务工作还没有做得很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好，还有很多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怎么样才能服务得更好。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文艺又是最大的服务行业。灵魂工程师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也像饭馆服务员一样 要给群众“端盘子”、“端碗”当然“盘子”、“碗”里装的不是物质食粮，而是精神食粮，是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因此，文艺工作者要经常地问问群众，我们端去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写的文艺作品好不好。也许这个问题在你们曲艺界不十分突出，因为你们天天给群众“端盘子”、“端碗”嘛 天天演唱给他们听嘛 演唱得不好 他们就不听嘛。但是在整个文艺界 还很有必要进一步讲讲这个问题。我觉得“服务”这个概念，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要了解服务对象的需要，要为此对象所能接受、所欢迎。凡是他们所不能接受、不欢迎的，或是不很欢迎的，就要研究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就要虚心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端去的“菜”不好 我们可以换嘛！“菜”的质量不高，就应该加工提高嘛！“菜”发霉了，变味了 就应该倒掉嘛 这好像是个最简单的问题，但我觉得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中国有句古话 叫“良药苦口”。药是很苦、很不好吃的，但为什么还要吃呢 因为它能治病。文艺也能“治病”、“强身”当然，它治的不是肌体的病，而是思想的病，它给人的是思想上的营养。但是文艺不能像药一样 它应当既能“治病”、“强身”吃了又让人“爽口”觉得甜。“强身”和“爽口”的一致 这才是好的文艺。现在 有些作品不但不能“治病”、“强身”反倒包含着毒性；还有些作品 虽然没有什么害处 但不好吃 不“爽口”使大家感觉到苦了，或者感觉像白开水一样。所以，我们的文艺作品里，有害的作品当然首先要清理，那些虽然没有害，但没有味道，在那里浪费人家时间的东西，也需要克服。要使文艺能够受到人

们的喜爱，适应服务对象的需要。这是个最起码的服务态度问题。但这又不像在菜馆里，服务态度不好，马上就能反映出来。文艺比较间接，你的作品不好，甚至有毒、有害，并不能马上反映出来。这就需要认真地注意社会效果，虚心地听取各种批评意见。陈云同志用很通俗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沿着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解决了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是我们首先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适应今天的观众、听众的需要，既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养料，又使他们感觉到有兴趣、有味道？既不是让他们吃有毒的物品，又不是让他们喝白开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简单的问题，请大家讨论讨论。

再一个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本书中反复讲，我们的文艺第一要注意政治内容，第二要注意文化娱乐。你们曲艺界有个好处，同群众接近，了解群众的趣味。而我们不少的文艺家，却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不要相信那些现代派的文艺家，那些都是方向上有缺点、有问题的。在当代文艺家中，为什么老舍、赵树理特别引人注目？为什么他们的成就比许多人更高呢？道理就在于他们同其他文艺家比较起来，更注意群众，更注意群众的语言、群众的口味、群众的爱好、群众的习惯，而且坚持不懈地和群众接近。有些作家瞧不起群众，瞧不起群众化的东西。老舍、赵树理却不是这样。作家要时时刻刻把群众放在心上，要喜群众之所喜，爱群众之所爱。在这点上他们至今还值得我们学习。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文艺的政治内容和文化娱乐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有鲜明的政治内容，但又必须使群众得到文化娱乐。陈云同志的谈话和通信里，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即既要注意政治内容，又要注意文化娱乐。而我们现在的有些文艺作

品，是不注意娱乐性的。文化娱乐，不能搞偏向，不能为娱乐而娱乐。但是，没有娱乐性总是不行的吧？我们有时候，也许包括我在内，都是只强调受教育。但还是要取得娱乐的，要有休息，要有快感，要有噱头嘛！没有这些，何必去听书？中国古代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寓教于乐”乐中有教嘛 曲艺也好 其它艺术形式也好，有的时候，政治内容与文化娱乐没有结合得好，所以人家不看呀！看得没有味道。陈云同志在这本书里，讲这个问题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内容跟文化娱乐，二者不可偏废，偏废了就是偏向。脱离政治是错误的，有害的，这是一种偏向；另一种偏向就是政治上没有错误，但没有娱乐性。买个电视机 花了很多钱 打开来 不叫你笑 不叫你快乐 不叫你休息 没什么可欣赏，那我看电视干什么呢？当然，庸俗化的娱乐，我们要反对，要抵制。但正当的文化娱乐，正当的休息，不但不能反对，而且应当欢迎。中国人民智慧很多，不能把他们的智慧卡住了。中华民族还是个幽默的民族，会讲笑话的民族。陈云同志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噱头。低级的噱头不能要，但健康的噱头却是不可缺少的。在艺术里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幽默，就没有艺术。清朝李渔讲戏曲，很强调插科打诨。相声更是离不开噱头。没有噱头，光彩、特色全没有了。所以陈云同志讲 政治内容同文化娱乐 这两者要结合 缺一不可 缺一就是偏向。这是关系到群众喜爱不喜爱的问题。

陈云同志在这本书中，还多次讲到推陈出新问题，传统曲目和现代曲目的关系问题。好几年前，他就大声呼吁，要支持新书，大力创造表现当代生活的新曲目。他说，对于新书，只要有三分好，他就鼓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曲艺也好，戏曲也好，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那么不管它的传统多么深

厚 终究要走向僵滞 甚至走向死亡。近几年 戏曲、曲艺的舞台是很活跃的，但是我觉得有一条不足，或者说，是一条带有根本性的不足，就是现代剧目、曲目比较贫弱。搞现代曲目有一定的困难。传统曲目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艺术上比较精致，一拿出来就吸引得住人。现代曲目有时候粗糙一些。粗糙可以让他慢慢磨得精致一些嘛！所以要大力支持、大力扶植现代曲目。

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要求古人讲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是不能向他们这样要求的。譬如戏曲、曲艺所表现的历史，有许多是加上人民想象幻想的历史。尽管这不完全是历史，不是纯粹的历史，或许是假想的历史，或许是美化了的历史，但难道能够简单地指摘这些传统书目的作者是歪曲历史吗？这些想象，往往包含了人民的愿望。包公、穆桂英、樊梨花，这些人物长期在群众中传颂，为他们所喜爱和敬仰。你能因为这些人物的艺术想象的产物，就把这些人物的舞台上抹掉吗？所以，对这些曲目怎么整理加工，确实要很慎重。不是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要求古人，而是从现代最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说明古人的言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曲艺遗产，有千余年的历史，长期积累，不是哪一个人独家经营的，是无数说书艺人集体创造的。这些遗产里，有不少糟粕，但也有精华，这些精华无论如何要爱护。对历史人物，完全按照今天对同时代人的标准来要求，是不对的。

还有个艺术语言问题。前几天，侯宝林、马少波、夏淳等同志到我那里去 他们谈到想成立个“戏剧语言研究会”。我听了很高兴，表示赞成。舞台艺术的语言，除了戏剧外，曲艺是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戏曲、曲艺有近千年、千余年的传统，有很多精华，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少有的。它们是和中国的地域辽阔又落

后联系在一起。因为落后，比如交通不发达，互相隔绝，就产生了各种地方语言，就产生了各种地方戏，各种曲艺。对这些，我们当然要很好地加以保护。怎么整理这些东西？建国三十多年以来，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足和失误，这项工作没有坚持下去。所以，那天他们几位谈了这个问题，我听了很兴奋。戏剧确实有很好的语言，曲艺也一样，有很生动的语言。当然其中也有不好的。精美的语言是珠宝，但这些珠宝又是同那些不好的语言混在一起的。怎么把它们清理一下，把不好的语言剔除、去掉，保住它的精华，把精华突出。我希望把艺术语言，曲艺的语言，戏剧的语言，各种地方戏的语言和各种地方曲种的语言，来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和清理。陈云同志讲要依靠老艺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们熟悉这一行。我希望曲艺界、戏剧界、电影界通力合作，使语言艺术的研究工作的成效更大，进展更快。

怀念老舍同志*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我国杰出的文学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我们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他本应该坐在我们中间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可是，他已离开我们近十八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位品格正直、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作家的深切怀念，愈益使我们感到他的去世对于我们文学事业的损失之大。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文学事业的文坛巨人，也将永远记住林彪“四人帮”陷害这位杰出作家对人民是犯了多么大的罪。

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等，以现实主义的笔力和幽默辛辣的特色震动了文坛，成为新文学长篇创作中最早出现的硕果之一。从那时起到他不幸逝世的一九六六年，四十多年间，他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内都写出了许多第一流的优秀作品，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如果说老舍写于三、四十年代的《离婚》、《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残雾》、《面子问题》、《四世同堂》等小说、剧本，既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我国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在纪念老舍诞辰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果的话，那么，1949年老舍从美国归来以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创作出的《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神拳》、《正红旗下》等剧本小说，则明显地标志着作家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他没有写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而主要是以他所最为熟悉和擅长表现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和感情，作为描写对象；他是冷静的，又是热情的。他的幽默饱含对人民的厚爱，闪耀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光彩。老舍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作品，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一生留下的那些传世之作，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丰富了世界的文学。他的作品已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了几十种译本。《茶馆》在西欧和日本引起的“老舍热”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四十年代在美国也出现过“老舍热”，那是由《骆驼祥子》引起的。老舍的文学成就，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荣誉和光辉。

老舍主要是以小说家、剧作家和曲艺作家而著称于世的；同时，他在散文、诗歌、杂文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位文学大家几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多面手”。他的散文和诗歌，正像他的小说和剧本一样，风格独具，不同凡响。老舍在文艺见解上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创造文学语言和艺术典型，大有裨益。

我们非常尊敬老舍同志，还因为他的品格高尚，是我国文坛德高望重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抗日战争爆发的那年冬天，老舍毅然抛弃大学教授的安适生活，别妻舍子，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从济南流亡到武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中。当云集在武汉的作家艺术家们酝酿实现文艺界的空前大团结，筹备成立抗敌救亡团体的时候，老舍为此到处奔走，备尝艰辛，表现了感人至深的爱国热忱。一九三八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正式成立 他当选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 实际上就是‘文协’的总管事和主要负责人。从“文协”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八年间，老舍一直肩负着领导“文协”的重担。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老舍始终不愈地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抗日爱国的文艺家的大团结献出了他的全部精神和力量。“文协”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抗击横逆，支撑八年之久，所以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广泛地团结作家艺术家，使这一时期成为“五四”以来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其中老舍有很大的功劳。我第一次面识这位久已闻名的老作家，是在抗战期间的一九三九年。当时 他作为‘文协’的代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的北路前线慰问团到达延安，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热情接待。他那谈笑风生的魅力，坦白真诚的性格，风尘仆仆的身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海外归来，继续担负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他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发展，日夜操劳 鞠躬尽瘁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老舍是一位热情澎湃而又严肃深沉的爱国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浅出深入，外圆内方。在建国以后，他热情洋溢地赞美新生活、新人物，成为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这是众所公认的。对于他解放前所创作的作品，我们也应当给以应有的公正的科学评价。他的创作风格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他那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有所发展的。这位生在“戊戌变法”时代的穷苦旗兵的儿子，从小就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王朝腐朽黑暗的双重痛苦。老舍走上文学之路，和他经受了辛亥革命、特别是

“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之后，以笔作枪的爱国实践分不开。如同他自己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说的“迫使他‘非写不可’的东西”，“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可以说，他的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对于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是有入骨三分的深刻认识和犀利观察的，正是因为感情上恨之愈深，在创作中才能刺之愈重，而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才能爱之愈烈。这位高度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不满足于只是描写旧时代，而总是不断面向新的时代，追求新的生活。在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期间，他不畏艰险，深入朝鲜前线慰问人民志愿军，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这里，我要提到另一位同样参加了抗美援朝斗争，并且写出了好作品的著名的党外的老作家巴金同志，他们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的情感；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也是令人钦佩的。

老舍是一位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语言艺术大师，他追求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和谐统一。这是老舍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老舍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性，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希望作品能对更多的读者、观众有所启发帮助，但是他不把读者、观众看作被动的接受者。他并不是在作品中赤裸裸地写“思想”而是讲究人物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讲究文学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讲究整个作品的艺术完整性，通过满足欣赏者的审美要求，用艺术魅力去打动读者，感染读者，让他们在不知不觉、自然而然间受到影响。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老舍呕心沥血，苦苦锤炼运用文学语言的精湛艺术。他说：“思想内容与语言是血之与肉，分割不开的。没有高度的语言艺术，表达不出高深的思想。”（《戏剧语

言》在这位语言艺术家的笔下 无论写什么文体 都能以高度凝练、准确传神的语句，刻画出独特的内容，传达出丰富的思想与感情。即使写一篇小散文，他也要力求语言简洁生动、幽默犀利 琅琅上口 并且富有音韵美。可以说 他的许多作品 在语言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老舍是一位文艺修养极为精深博大，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革新家。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他同我们的另一位杰出作家赵树理同志有不少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们都十分热爱和熟悉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不同的是，老舍对于中外的古典文学还具有更多方面的精深修养。老舍和赵树理相识较晚，却相知甚深。他和赵树理一见如故，志趣相投，他们曾共同致力于曲艺革新的事业。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又是如此相似，同样横遭不幸而又正气凛然，他们的英名将永远为后人所记忆。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老舍比较早也比较好地注意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三十年代起，他就放下大作家的架子，同民间艺人交朋友，拜他们为师，学习通俗艺术的艺术技巧，成为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他从民间文艺那里汲取营养，同时也熟知人民群众喜爱什么和不喜爱什么。他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他认为“土”比“洋”可贵，“土”比“洋”更难。这绝不是说他不懂洋玩艺。我们知道，老舍曾先后在英国、美国旅居七八年，非常熟悉欧美文学。他最初的创作，也曾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从不盲目地崇拜、模仿别人。他对于西方各种“主义”文学作品都有所研究和借鉴，但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却始终坚持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出发，坚持为本民族广

大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本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邓小平同志多次号召和提倡要创造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和艺术。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老舍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位前辈作家，也是一个先驱者。但他却一直在追求并坚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为一切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作家做出了足堪垂范的楷模。老舍始终没有离开哺育了他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决不会忘记他。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刚刚站立起来当家作主，就把“人民艺术家”的荣誉授予老舍同志。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顾老舍同志的一生，综观老舍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一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我首先向获奖的作者们表示祝贺，祝贺大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

关于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情况，冯牧同志刚才讲了，他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希望。我这里只讲一点，就是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不是我的话，而是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的话。

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短篇小说作家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队伍，这也是大家看得见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问题呢？难道像《围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抢劫即将发生……》和《阵痛》这样的作品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以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像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 本文是作者在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么伟大的事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全国到处热气腾腾，人才辈出。要表现这样的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要表现我们社会的本质方面，要不回避社会矛盾，反映尖锐重大的斗争，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不行的。我们的农业生产所以搞得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觉得 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是发展生产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关键问题。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为什么文艺创作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呢？当然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原因之一 我们的责任之一 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下，更好地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时候还挫伤了这种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不调动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这是明显的道理。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 也是不难克服的 也比没有积极性好。例如 现在农村里不好的东西还不少，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好。我这个人 讲过很多错话 但是要保护积极性、调动积极性这一点，我以为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调动积极性，否则没有前途。我们要搞好文艺工作，就要调动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然，要作家协会和文联干什么呢？

要调动作家的积极性和鼓励“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要善于发现真正的艺术家。评奖就是一种发现。也许我们发现的某些人后来证明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但我们的目的是发现真正的艺术家，这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在十个人里面，或者在一百个人里面，能发现哪怕少数几个人经过实践证明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人才 那么 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 就有成绩。这次评奖 有很多

受到奖励的人，他们将来不一定全都有很大的成就，但能有一些人有成就，就是作家协会的一大成绩。我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支持评奖和主张评奖的。

忆念周信芳同志*

今年是当代卓越的戏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同志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他离开我们也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抚今思昔，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周信芳同志（艺名麒麟童）不仅仅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京剧表演大师，更是一位我们党的坚强无畏的英勇的斗士。周信芳早在三十年代同党就有接触。四十年代更在党的领导下，向反动势力进行坚韧不拔的英勇战斗。他一生在政治上坚定忠贞，追求进步与光明，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创造无条件地全都奉献给了光辉的共产主义事业。

周信芳同志诞生在清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冲突的时代。严酷而伟大的时代，壮烈激昂的革命斗争，培养和造就了伟大的艺术家周信芳同志。他个人的命运和他的艺术实践一直和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他以戏剧作为战斗武器，明确认识到只有“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观客，那才是我的真价值”。因此他所上演的剧目，不论是前期配合反帝革命斗争的《宋教仁》、《大汉奸》、《学拳打金刚》以及以古喻今的《徽钦二帝》、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在周信芳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原载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

《文天祥》等剧目 还是他所擅演的优秀传统剧目《四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等 或矛头直指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或鞭挞邪恶，歌颂人民的正义和善良，莫不充满着激情，强烈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发着人民斗争意识的觉醒。他的艺术实践正是他自己的戏剧观的反映。我是他的忠实观众，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上海见到他，根据他的艺术风格，建议他编演以海瑞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言事的题材的京剧剧本 他欣然接受了。同年国庆 他就以《海瑞上疏》作为献礼剧目演出。戏的上演获得很大的成功，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以麒派风格表现独特的清官海瑞的形象。谁知这出戏竟成了“四人帮”对他进行残酷迫害的口实。周信芳同志虽已含冤去世，但他那不屈不挠的刚毅的风采和他的战斗精神将和他所塑造的舞台形象一起 永远流传后世 永志不忘！

周信芳同志创立的麒派艺术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形成的。他立足于传统，在同形式主义及噱头主义的京剧的斗争中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 去粗取精 锐意创新 给日渐凝固的京剧注入了新鲜活泼的因素，从而创立了刚健豪放、独树一帜的麒派艺术。麒派不仅是京剧老生的重要流派，对其他行当及戏曲剧种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周信芳的表演艺术对京剧的提高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中国戏曲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周信芳同志的一生是追求革命，跟随共产党，在艺术上不断革新创造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出版说明

从三十年代初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作为革命文艺运动和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一的周扬同志，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在理论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很多论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总结革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编辑出版《周扬文集》是十分必要而又具有迫切意义的。

选入本文集的文章，编排以年代为序，共分五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为第一卷；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为第二、三、四卷；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为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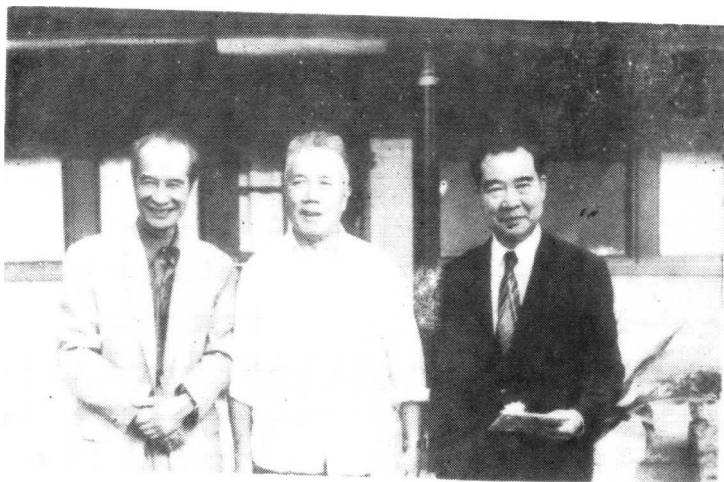
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凡出过集子或单行本的，文字以集子和单行本为准；凡发表过而未收集子的，文字以发表时的为准；凡未公开发表过的，文字以内部文件为准，或由当时的记录稿整理而成。

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文章，有的置诸同类型文章的首篇。凡学术性的论争，则不加说明。

一九七八年以后发表的个别文章，作者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作了适当的改动。



作者像



作者与白土凡夫、
林林的合影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
十三日与陈登科在
杭州